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毛泽东及其战友的赠书


内部资料 非卖品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谱写了中国革命最辉煌的篇章，也描绘了人类爱情最绚丽的色彩。他们是在革命时期、战争年代相识相恋的，他们爱得匆匆，走也匆匆，在枪林弹雨中经历着悲欢离合、生死考验，因而他们的婚恋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们为着崇高的革命理想，为着国家民族的命运英勇奋斗，他们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然而，他们也有着自己纯真的爱情，有的如涓涓流水，有的如红花烈火，他们至诚相爱，生死不渝……

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总有一个女人。那些生活在伟人和将军们高大身躯之后的妻子们，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奉献出那么多的辛劳，那样多的牺牲和那样多的爱。她们同样是伟大的、高尚的，她们同样值得人们敬仰、纪念与爱戴。

他们是我们的前辈，创下了赫赫的功勋，打下了红色的江山。我们以他们为骄傲，以他们为楷模。半个世纪以前，他们和我们同样年轻。透过他们爱情的双眼，我们可以看到战争年代的艰苦和追求，可以体味到理想和爱情的崇高价值。今天，我们的周围没有了战火与硝烟，却充满着金钱与享受、物质与精神的各种诱惑和迷乱，也许，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获得不少有益的启示。

1901年11月6日，湖南长沙县清泰都下板仓杨家，一个女孩呱呱坠地，“板仓杨”的主人杨昌济先生给女儿取名开慧，号霞，字云锦，期望女儿的一生能够在阳光的照耀下，有如灿烂的云霞，美丽火红。后来杨开慧果然不负众望，成为著名的革命烈士。她丈夫毛泽东在那首有名的《蝶恋花》词中，将她称为“骄杨”，赞她如“杨柳轻网直上重霄九”，与“万里长空”的云霞共舞，终于了却了杨昌济先生当年给女儿取名时的一番初衷。

杨开慧家住的下板仓房屋由土砖砌成，三面环山，青松翠竹，交相辉映，屋坪前是两口明净的水塘，再前面是一片宽敞的稻田，银练般的板仓河，在田野中逶迤流过，风光十分秀丽。开慧就在这明山静水的田园风光中度过自己的童年生活。板仓的山山水水留下了她的足迹，印下了她的倩影。儿时的生活虽然是清贫简单的，却也充满盎然生机，常常令她回味无穷。

开慧长到7岁，父亲从国外来信，要她上学读书。她家斜对门的杨公庙，办了长沙县第四十初级小学。山冲里从来不让女孩子读书，学校破例为开慧等7个女孩子单开了一个班。

杨开慧在杨公庙小学只读了三个学期，便转到离板仓五里多路的隐储学校去了。这个学校比杨公庙小学大，图书也多，为小开慧敞开了知识之门。辛亥革命发生不久，开慧从隐储学校转到衡粹女校，接着又转到麻林桥附近的县立第一女子高小。

杨开慧上学期间，父亲每两年从国外回来一次，给她讲述一些国外见闻和简单的道理，教她博览群书，把读书当作吸取新知识、新思想的一项重要方法。在父亲的鼓励下，开慧刻苦自学，阅读了不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打下了良好的文学基础，并练出了一手好毛笔字。

开慧从小爱读《木兰辞》，少女年华的她，不仅有花木兰那样不让须眉的爱国壮志，同时也有大家闺秀的温柔贤慧。对客居海外的慈父的思念，对家境日蹙的感伤，对学海无涯的焦虑……这一切使体弱多病的开慧，不时泛起孤寂和伤感的情杯，陷入青年人都曾有过的理想与现实冲突的烦恼之中。她非常渴望得到知心朋友的规劝，向他们诉说内心的苦闷，获取前进的力量。在为数不多的开慧遗墨中，有这样一封信。信中说：

我最爱之姐姐鉴：许久未晤，甚以为念。近维起居多祜，学业日增为颂！妹因发头昏，且生痲子，请医诊治，总难见效。校中的课堆积，偶一思及，颇为之焦灼也。妹与吾姊至好，素承规劝，有暇望赐数行，以慰系念。天气将寒，惟珍重。不一。此问大安！

愚妹杨开慧书上

这封信写于1912年深秋，那时开慧才12岁。

1913年春，杨昌济结束了在国外近10年的留学生涯，回到长沙。杨开慧和母亲、哥哥一起，也从乡下迁进了城里。同年，青年毛泽东也到长沙一师求学，拜杨昌济为师。他与蔡和森等经常到杨先生寓所求教，自然也就结识了杨先生的千金杨开慧。《毛泽东家世》一书对此有所记述。

一开始，当杨昌济同学生们交谈时，开慧常待在一旁，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听。后来，她逐渐加入他们的议论。杨昌济对这个聪明的女儿很是看重，对她的介入也极为赞许，并不时向毛泽东等学生推荐女儿的学问。时间一长，杨开慧自然成了这批学生中的一员，他们一起议论时事，抨击时政，并互相传阅笔记，交流心得体会，彼此之间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这批学

最深。杨开慧除了向他学习一些思想方法外，也不断接受他的一些生活方式。如她坚持洗冷水浴，行深呼吸，常吃硬食等体育锻炼的方法。她还在作文中写道：“要救国就要锻炼强健的身体。”这句话正是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所阐述的中心思想。

客厅里的感情交流逐渐升华，日趋成熟。严肃的杨先生终于发现那种藉眉目交流的感情。他没有责难任何一方。他珍爱女儿，也喜欢这位激进、睿智、不修边幅而又抱负非凡的学生。不过，他未提婚嫁之事。毛泽东也不曾提。毛泽东还不具备婚娶的物质条件，这一点他们心里都有数。何况，杨先生深知他学生所富有的强烈的自尊心，在吃饭问题尚未解决好的时候，毛泽东是决不会谈婚嫁之事的。

但是，杨先生是喜欢看到毛泽东与女儿杨开慧的日渐接近的。有时他与学生讨论问题，女儿悄悄走进来，默默坐在一角的藤椅里倾听。对此杨先生并不反对。而毛泽东这时就会表现出格外的精神振奋，思想敏锐，讨论也显出异常的热烈和深刻。

“润之，小女向我推荐了你的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杨昌济稍顿一顿，瞟了女儿一眼。杨开慧脸色微红，垂下眼帘摆弄衣襟。他把目光转向毛泽东，慢条斯理地道：“我看了。‘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讲得好。促使国家富强的活力蕴藏在每个社会成员身上，只有激励个人的主动性才能迸发出来。”毛泽东谦逊地笑道：“那是去年写的，是受先生的影响，还很幼稚。”

“嗯，‘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从《心之力》发展到这一段论断，这是你个人研究经历的成果。”杨昌济赞许地点点头，略一沉吟，换一种疑问的口气：“不过，你说‘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这里的意思……开慧，你是怎么看？”

杨开慧沉默了片刻才轻声细语道：“人家用枪炮打来了，你不用枪炮对付又怎么办？体不坚实，见兵而畏之……我看这个道理不错。”

毛泽东深深望一眼杨开慧，然后移开目光，重新面对他的先生。那一刻，他感觉与杨开慧的心相通了，跳动着同一节奏的脉搏。

1918年夏，杨昌济应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杨开慧随父入京。杨家住在北京鼓楼大街豆腐池胡同9号。不久，毛泽东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也来到北京。杨昌济推荐毛泽东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毛泽东经常到杨家看望老师，有时也在杨家吃住，与杨开慧有较多的接触，他常把进步书刊和自己写的文章、笔记送给杨开慧阅读。年方17岁的少女杨开慧对才华出众的毛泽东爱慕之心日深，毛泽东也多次向秀美、聪明、娴雅的师妹表示爱意。后来毛泽东赴上海时，两人彼此心照不宣，相约分别后互通信息。二人书信不断，互诉衷肠。杨开慧给毛泽东的信，开头只称呼一个“润”字，毛泽东给杨开慧的信，开头也只有一个“霞”字。

1920年初，杨昌济去世后，杨开慧扶柩南下，将父亲归葬长沙板仓。不久便从板仓来到长沙城，在李淑一父亲的帮助下，进了福湘女中。

1920年7月，毛泽东领导驱张运动从北京返回湖南后，身穿薄薄的旧长衫，迈着轻快的步伐到福湘女校，在选修班的教室旁边，找到了杨开慧。回湘后的重逢使两人格外高兴。毛泽东邀请杨开慧去省学联帮他工作，杨开慧一口答应。这年冬天，两人相约寒假在板仓杨家结婚，他们没有做嫁妆，不坐花轿，“不做俗人之举”。

曾在毛家当伙夫的邹香庭老人后来回忆了毛泽东与杨开慧举行简朴婚礼的情形：1920年冬的一天。毛泽东忽然对邹香庭说：“你去准备点酒菜，今晚我要请客了。”邹香庭心里有点奇怪，因为那时毛泽东的经济很不宽裕，

晚上，毛泽东带来了一些客人，都是他平日最要好的朋友和战友。大家吃饭喝酒，兴高采烈，谈今论古。杨开慧也殷勤招待客人，敬酒，送菜。

夜色已深，毛泽东才宣布：“今晚是我和杨开慧结婚的日子。蒙大家来热烈祝贺，我们十分感激……”客人们大感意外，纷纷说：“为什么不早点告知我们，也好带点纪念品来，以表示祝贺？”毛泽东笑说：“就是怕大家带礼品来，所以事先才保守秘密啊！”

大家跟着毛泽东一同笑起来，并以一阵热烈的掌声表示对新郎、新娘的祝福。

1921年秋，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后不久，杨开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掩护毛泽东的活动，她接来母亲，一起住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机关所在地——清水塘，自己则担任湘区党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

1921年8月，毛泽东曾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杨开慧参加了该校的筹建工作，并利用自己担任学联干事的身份，筹集经费。自修大学培养了不少早期共产党的干部。何叔衡、毛泽民、罗学瓚、夏明翰等人，当年都曾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过。

1922年，毛泽东又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担任该馆的负责人，主持馆内一切事务。当时图书馆内还设有秘密阅览室，藏有《新青年》、《先驱》、《赤光》等进步书刊，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1922年10月24日，杨开慧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一个儿子，取名毛岸英。

1923年4月，毛泽东离开长沙赴上海到中共中央工作。6月又由上海到广州出席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是毛杨婚后第一次分别，两情依依。毛泽东走后，杨开慧一人独撑家务，上有老母，下有小孩，生活清苦，负担沉重，真是度日如年，早晚翘首盼望夫君归来。中共“三大”后，毛泽东留中央工作。同年9月，毛泽东因事回到长沙，11月毛岸青出生，毛泽东此时在自己身边，杨开慧心中如沐春风，无限温暖。

12月底，毛泽东又要离开娇妻爱子远行，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杨开慧全力支持丈夫从事革命斗争，任劳任怨，从不怕艰难困苦，只是在离别之际，难割恩爱情。她眼含热泪，紧紧握着丈夫的手，一再叮咛：只身远行，要多多珍重。毛泽东凝视爱妻，更有一番离愁别绪在心头。他展纸挥毫，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贺新郎》词：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加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诗人毛泽东借用李白《送友人》诗中一句“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表达了与杨开慧分离的痛苦心情。“凄然相向，苦情重诉”，正是一对感情笃厚的青年夫妻离愁别恨的写照。像杨开慧这样一位年轻女子，上有老母需要照顾，下有婴儿需要抚养，革命工作又不能放下，而丈夫又要冒着风险出门远行，这时杨开慧心中的凄楚之情是可想而知的，难怪她“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要夺眶而出了。但杨开慧毕竟不是寻常女子，她深知丈夫与自己分别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因而强用理智去战胜情感的纠缠，热泪不是“潜然而下”，而是“欲零还住”。杨开慧深明大义，把革命的需要置于个人幸福

诗人把“昆仑崩绝壁”、“台风扫寰宇”这种自然界的巨大力量，用来比拟斗争风暴，更加重了割断个人“愁思恨缕”，献身人类解放事业的豪情，表达了诗人以四海为家，不沉湎于儿女情长的远大革命志向。然而，“汽笛一声肠已断”仍然写出了诗人内心的痛苦。“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重比翼，和云翥”两句，充分表达了诗人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深厚感情。

1924年2月，毛泽东由广州赴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6月，杨开慧和母亲携带毛岸英、毛岸青来到上海，毛泽东亲自到码头迎接，结束了半年多梦萦魂绕的两地生活。杨开慧协助毛泽东从事文书誊写和收发工作。1924年底，毛泽东因病请假回老家韶山，一边养病，一边开展农民运动。杨开慧也跟随毛泽东第一次来到韶山。他们按照当地风俗，以“走人家”的方式，到农民家里了解农村的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号召贫苦农民起来为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斗争。他们在韶山地区办起了一二十所农民夜校，建立了二十多个秘密农会和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雪耻会”，并创建了中共韶山支部，领导农民开展斗争。

韶山农民运动的蓬勃开展，引起反动派的极大恐慌，湖南军阀赵恒惕再次下令通缉毛泽东。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毛泽东、杨开慧先后离开韶山，南下广州。

毛泽东在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杨开慧继续协助毛泽东工作，负责通讯联络，经常来往于毛泽东与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林伯渠、李富春等人之间，传递文件、书信和消息。

北伐战争开始不久，杨开慧同母亲一起带着孩子回到长沙，住在望麓园。1926年12月，党派毛泽东回长沙指导工作，夫妻再度团聚。1927年2月，毛泽东、杨开慧一家先后到达武昌，住在都府堤41号。当时，杨开慧已临近产期，又要照料身边的两个孩子，但为了使毛泽东集中精力运筹革命大计，她几乎天天伏案工作到深夜，整理毛泽东在衡山等县考察农民运动带回来的调查材料。毛泽东多次夸奖道：“我这个好秘书，抄写起来，又快又好。”正是在杨开慧的协助下，毛泽东很快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在党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在武昌，杨开慧生下第三个儿子毛岸龙。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夫妇由武昌回到长沙，住在北门外沈家大屋旁的北角门楼。9月初，毛泽东赴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杨开慧带着孩子回到长沙县板仓老家。不料，这次夫妻分离竟成永诀。

当时的湖南，一片白色恐怖，许多革命者及其家属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杨开慧面对死亡的威胁，毫不畏惧，继续坚持地下斗争，深入群众中调查访问，宣传革命道理。她时刻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把为革命牺牲当作自己“喜欢的事”。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不久，即用暗语给杨开慧写信，说他出门后，开始生意不好，亏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这封信几经辗转，直到1928年春，才送到杨开慧手里。她找来地图，查寻井冈山的位置，远眺东南，心中不断呼唤着亲人的名字，愿他一切都平安。

长夜漫漫天难明，关山远隔信不通。长久的思念与等待，使杨开慧惆怅不已。1928年10月，她在寒秋孤灯下写了《偶感》诗一首，抒发了对毛泽东的挂念：

天阴起朔[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恨无双飞翩，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无论是在井冈山，还是闽西赣南，毛泽东都常常牵挂杨开慧和孩子们，只恨敌军封锁，局势动荡，无法联系。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给中央领导人李立三的信中写道：“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然而遗憾的是毛泽民并不在上海，早已被党派往天津领导地下印刷工作。毛泽东却一直在盼望着弟弟的来信、妻子的来信。

1930年7月27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城，十天后被迫退出，但是长沙、平江、浏阳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和赤卫队大部分暴露。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清乡”司令部司令何健卷土重来，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板仓、清泰、白沙一带就有46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何健悬赏大洋1000元，捉拿“毛泽东的妻子杨氏”。情况越来越紧张，形势越来越险恶。1930年10月中旬，杨开慧被捕入狱。同时被捕的还有保姆陈玉英和毛泽东8岁的儿子毛岸英。

敌人逼杨开慧交代毛泽东和红军的情况，逼她交出毛泽东的书信和共产党的文件。杨开慧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敌人恼羞成怒，把她打得遍体鳞伤，可她始终坚贞不屈。最后敌人甚至诱骗说，只要她在报上发表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就马上可以获得自由。但这也遭到杨开慧的严词拒绝。她对前去探监的亲友说：“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又嘱咐说：“我死后，不要作俗人之举。”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城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英勇就义，时年29岁。

杨开慧死后，遗体被亲友连夜运回板仓收殓，葬在青松环绕的棉花坡上。毛泽东从报上得到噩耗后，当即寄信给杨开慧的亲属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并寄款为杨开慧修墓立碑，上刻“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等字。全国解放后，他在接见杨开慧的堂妹时，曾说过：“你霞姐是有小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你霞姐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在接见他们当年的保姆陈玉英时，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杨开慧被捕经过和狱中情况，并说：“开慧是个好人哩！岸英是个好伢子哩！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我家就牺牲了6个，有的全家都牺牲了。”

1957年1月，毛泽东的18首诗词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这是毛泽东首次集中发表自己的诗词，反响广及国内外。杨开慧的生前好友李淑一怀着激动心情反复拜读了毛泽东的诗词，回想起毛泽东早年曾用“虞美人”的词牌填过一首词赠与杨开慧，但除记得头两句“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外，其余俱忘却了。于是，李淑一于1957年2月7日（春节期间）便写信给毛泽东。在信中，她谈及自己读毛泽东诗词的感想，请求毛泽东把过去书赠杨开慧的《虞美人》全词抄赠给自己。此外，她在信中附上了她在1933年写的悼念自己丈夫柳直荀的词《菩萨蛮·惊梦》。她说：“1933年夏，道路传言直荀牺牲，我想成梦，大哭而醒，和泪填《菩萨蛮》一首。”全词如下：

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
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
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
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兹。

李淑一的信寄出以后3个月，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在百忙中复信给李淑一：“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蝶恋花》一词即写在此信中：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李淑一收到毛泽东的复信后，当时正在李淑一执教的长沙市第十中学（一说第八中学）实习的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三年级（一说四年级）的学生读到了这首词，于是即写信请求毛泽东同意在他们的刊物上首先发表。1957年11月，毛泽东又在百忙中给青年学生复信：“来信收到，迟复为歉！《蝶恋花》一词，可以在你们的刊物上首先发表。《游仙》改《赠李淑一》。”1958年1月1日，《湖南师院》便最先发表了这首词，这是毛泽东诗词中，唯一首先在地方刊物发表的词，尔后，《人民日报》、《诗刊》等报刊才相继刊出。

这虽是一首悼念亡人故旧之词，但其思想感情却是深刻而崇高的。毛泽东把悼念和赞美有机结合，把个人的怀念和先烈对革命事业的挂念有机结合，把悲痛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机结合，因而格调高昂，鼓舞人心。毛泽东借着这个诗化了的神话故事来寄托自己对爱妻杨开慧的无限哀思、怀念和敬佩之情。

李淑一和柳直荀当年结为夫妻，是杨开慧当的“红娘”。柳直荀在建党前又同毛泽东一道从事农民运动，关系十分密切。因此，毛泽东收到李淑一的信，立即感慨系之，缅怀烈士之情难以抑制了。毛泽东在1957年5月11日的回信中还说：“暑假和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此外，你如去看直荀的墓的时候，请代我代致悼意。”

1962年，当友人章士钊向毛泽东请教词中“骄杨”作何解释时，毛泽东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可见，“骄杨”蕴含着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深深礼赞与怀念。后来，毛泽东应邵华、毛岸青之邀，把这首词写给他们的时候，又把“骄杨”写为“杨花”，并说“称‘杨花’也很贴切”。

1962年11月，杨开慧的母亲杨老夫人逝世，毛泽东致电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表示哀悼。电报说：“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

显然，杨开慧在毛泽东心中一直占有重要位置，他终生难以忘怀与杨开慧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深深怀念这位“亲爱的夫人”。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1916年入俄文专修馆。1920年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访苏。192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1月回国后主编《新青年》、《向导》杂志。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在党的第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曾主持八七会议,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负责人。此后曹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等人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此后,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33年到中央根据地。1935年在福建武平被国民党逮捕。同年6月在长汀就义。

1923年6月下旬,瞿秋白自广州到达杭州,召集浙江省党团会议,传达党的三大决议。他住在岳王村四伯父瞿世琥家里,与妹及两个弟弟团聚。叔侄见面后,叙谈一切,亲切欢畅。瞿秋白谈他两年中在苏俄的见闻,解衣挥汗,兴致盎然。

酷爱文艺的瞿秋白是第一次游杭州,西子湖畔诗意浓郁,挥笔写道:“飞来峰下坐听瀑泉——我恨不能再乘风飞去。且来此冷泉石上,做个中流砥柱。”此时,25岁的瞿秋白豪情壮志,预备在中国革命的疆场上干一番事业来。

6月底,瞿秋白惜惜离别四伯父和弟妹返回上海,住在闸北青云路师寿坊上海大学宿舍。学校就在附近的庆云里。

上海大学是在国共合作的呼声中,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于1922年10月由上海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组成立并发展起来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任校长。经李大钊推荐,邓中夏出任上海大学的总务长,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8月8日,上海大学全体教职员在一江春聚宴,校长于右任主持推定学校最高议事机构评议会,瞿秋白被推为9位评议员之一,后又被推定为上海大学丛书审查委员会、经济学系筹备员等职。

瞿秋白很快成为上海大学最有吸引力也是最好的教员。当时听他讲课的学生回忆说。

秋白是社会学系主任,担任的课程是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第一次听他讲课的时候,使我惊奇的是学生突然加多了。别的同学告诉我,大家都很喜欢听秋白的课。除了社会学系本班的学生,还有中、英文系的学生,其他大学中的党团员或先进的积极分子,甚至我们的好教师恽代英、肖楚女、上大附属中学部主任侯绍裘等同志都愿来听听。……

就在这个课堂上,爱情第一次走入了瞿秋白的生活。他结识了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学生,一位是丁玲,一位是王剑虹。王剑虹喜欢旧诗旧词,特别喜欢听俞平伯讲的宋词,常常低徊婉转地吟诵。瞿秋白在课后经常到她们的住处,教她们学习俄文,有时与她们一起到附近的宋教仁公园散步。这时,王剑虹对瞿秋白已经爱得根深,但她把爱情埋藏在心底。瞿秋白也是这样,爱在心里,却拘束了行动。最终,还是由了玲出面,把他们两人的手牵到了一起。

1924年1月,瞿秋白与王剑虹结婚了。但是,他们只共同度过了几个月

剩下一个人，难免有人去楼空，萧索悲凉之感。然而，人民大众革命斗争的火焰，正在中国大地上燃起，总有一天要形成燎原之势。一切革命者，都在用自己的光和热，加快这火的升腾。瞿秋白的悲痛，也被日日夜夜紧张奋斗的激情冲淡了。工作时，他依然是那样勤奋，那样忘我，那样生气勃勃。

第二次爱情很快就来临了，瞿秋白与他的爱人杨之华一起共同谱写了一个热烈、隽永、高洁、纯真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不仅在当时广为传颂，至今仍让人感动不已。

在极端尖锐的斗争中，许多青年的革命者，往往深感孤身力薄，而需要聚集大批战斗的勇士，也需要志趣相投、道义相合的朋友。在这个革命情谊交融的大家庭中，一些男女战友之间，会逐渐加深情谊，甚至很快便会发展到互相爱慕而结合。瞿秋白和杨之华之间的爱情，就是这种超乎常态的快速的结合。

杨之华又名小华、杏花，别名文君、文尹、杜宁，浙江省萧山县人，1900年生于萧山县坎山街三岔路。在这个小镇上，杨家曾经是当地首富，地主之外兼营米丝生意，后来家道虽然衰落，但在乡里仍然有些地位。杨之华幼时聪敏好学，性格温柔，又有超群的美貌，家人亲友宠爱地叫她“小猫姑娘”。但是这位小姑娘却很有个性，很有同情心。家中长辈一向重男轻女，哥哥们可以在专门为他们办的家塾读书，却不许女儿读书。杨之华常常躲在书房门外偷听塾师授课。塾师见她好学，便请求家长允许，让她与男孩一起读书。那时，女子缠足，是天经地义，杨之华屡次反抗，终于使母亲让步。五四运动前后，杨之华冲破封建藩篱，来到杭州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求学，深受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从杭州回到家里，她毅然剪掉长发，还下水游泳，上街骑自行车，一时轰动，传为奇闻。1920年她与沈剑龙结婚，去夫家时只穿一套粉红色衣服，既不坐轿也不带嫁妆，不请酒设宴。当时，她听说上海《星期评论》社要组织一批青年到苏俄去学习，便来到上海，结果没有去成，留在《星期评论》社工作。1921年，当时还是共产党人的沈玄庐在萧山县衙前镇与当地农民领袖李成虎一起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为了促进农民运动的发展，沈玄庐仿效党在城市中从办工人夜校入手开展工人运动的方法，邀请宣中华、徐白民、杨之华等人，兴办衙前农民小学，实际上成为发动和团结衙前农民的活动中心。萧山农民运动，1921年秋冬达到高潮，掀开了中国新型的农民运动史的第一页。杨之华在农民运动中受到教育，不久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这一时期，妇女解放问题引起了杨之华的重视，从1922年7月至11月，她先后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上发表了《社交和恋爱》、《对于“争论‘社交和恋爱’”的争论》、《离婚问题的我见》、《谈女子职业》等文章，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喊出了千万妇女要求自由解放的心声。她写道：“男女社交在社会上自然是很重要的问题。自五四运动以来，提倡公开的人也很多。可是终不易实行。……依我个人想起来，是因社交男女自己造成的障碍。一面说要社交公开，一面又做得不要社交公开。自相矛盾，自己搬了石堆，充塞了自己进行的路。”这时，有一个人向杨之华求爱，遭到拒绝，他竟背地里散布说杨之华同意与他恋爱。他对真正的爱情全然无知，却说“吊膀子”是“无产阶级的恋爱方式”。杨之华著文揭露了这个人的嘴脸，鞭挞了他的丑恶的灵魂。她写道：“‘吊膀子’是不生产者虚伪的没廉耻的诱骗异性的专有名词，所以社会上都认为吊膀子是两性间一种恶行为，

《社交和恋爱》，1922年7月《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

《对于“争论‘社交和恋爱’”的争论》，1922年8月11日《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

怜他们一天到晚做工都来不及，还有什么工夫去吊膀子？这位先生凭空拖了无产阶级来掩护他公然鼓吹吊膀子的主张，并且把知识、名望、人格蕴藏在漂亮衣服、特别言动堆里，不但污蔑了知识、名望、人格，简直污蔑了纯洁的无产阶级”。旧社会里妇女地位低下，杨之华痛感于妇女一生“何等枯燥！何等不幸！”大声疾呼妇女要独立，不做男人的寄生虫，“我们终要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不要仍旧去依赖男子；对于女子，我们应当有互助的心”。妇女们应该起来奋斗，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那时她们“将由被压迫被支配的地位，由自觉而进到自主的地位了”。

1923年底，杨之华报考上海大学，录取后在社会学系学习。她学习刻苦，追求真理，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她是上海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同时参加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国共合作中，她被派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妇女部工作。在那里，她认识了向警予。向警予担任该部助理，杨之华和张琴秋两人协助她工作。杨之华最初认识瞿秋白，还是在课堂上。杨之华后来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和秋白的初次见面，是在一九二四年一月间。那时，秋白讲授的课程是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老同学们告诉我，大家都很喜欢听秋白讲课。老同学向我形容秋白讲课时的情景说：“在青云路上海大学旧校址上课时，人都挤满了。房子陈旧，人多了，楼房振动，似乎要倒塌下来，但是人们还是静静地听，一直到下课为止。”

当我听秋白讲课时，学校因学生增加，原校舍不够用，就从闸北搬到了西摩路（今陕西北路）敦厚里。秋白讲课的地方是一个最大的课堂，但我一到那里，就觉得这个课堂太狭小了，窗外和门口都站满了热情的听众，其中除了社会学系的同学，还有中文学系、英文学系的学生，有时上海其他大学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也来听课。课堂里的气氛很活跃，同学们亲切地谈着话，愉快地笑着，直到秋白从人丛中挤进来，安详地走上讲台，大家才肃静下来。那天，他进来的时候，穿着一件西装大衣，拿着一顶帽子。他的头发向后梳，额角宽平，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跟他的脸庞很相称。他站在讲台上，亲切地微笑着，打开皮包，取出讲义和笔记本，开始讲课了。他的神态从容，讲话的声音不高，但站在课堂外边的同学也能够听到。

秋白讲课的习惯，是在上课之前，先把讲义发给我们，让我们预习，到讲课时，不是照着讲义念，而是在讲义的基础上补充了很多活材料。由于同学们的水平参差不齐，为了使大家都能听得懂，他引用了丰富的中外古今的故事，深入浅出地分析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当前的革命斗争密切结合起来。

一次偶然的机，使瞿秋白和杨之华走到一起来了。

有一天，苏联顾问鲍罗廷夫妇要了解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向警予因事离沪，上海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通知杨之华到鲍罗廷那里去汇报。她到了那里时，意外地遇见了瞿秋白，原来忐忑不安的心情顿时平静下来。瞿秋白担任他们谈话的翻译，在他的帮助下，她顺利完成了汇报任务。她后来说：“从这次工作接触后，我觉得他很诚恳，很愿意帮助别人。他不但不骄傲，

《对于“争论‘社交和恋爱，”的争论》，1922年8月11日《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

《谈女子职业》，1922年11月《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

《保定女师学潮给我们的希望》，《妇女周报》第34期，1924年4月。

杨之华：《回忆秋白》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藏在内心，只有当人们和他在一起工作时，才能深切感觉到这种热情的力量。”不久，在向警予、瞿秋白的帮助下，杨之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介绍人就是瞿秋白。

杨之华的第一次婚姻是由家庭包办的。杨、沈两家是世交，杨之华和沈剑龙在幼年时，便由双方的家长杨父杨羹梅和沈父沈玄庐定了亲。结婚时，沈剑龙还在学校念书。表面上看，沈剑龙俊俏聪明，但实际上是个贪图色欲，腐化堕落，而且思想变得越来越反动的花花公子，连他父亲也不满意这个放荡的儿子。沈玄庐支持杨之华到上海求学。沈玄庐与邵力子也是世交，杨之华到上海，常常住在邵家，她的女儿沈晓光就是住在邵家生的。沈剑龙在杨之华去上海大学求学期间，生活更加糜烂，在家乡愈发闹得不像样子。杨之华写给他的大量信件，他连看也不看，气得沈玄庐把这些信寄回给杨之华，说他儿子根本没有看。从生活方式到思想境界，这一对夫妻，从结婚的那一天起，就出现了裂痕，并且分歧越来越大，最后到了不得不分离的地步。杨之华把女儿的名字改为独伊，意思是只生这一个，以此表明她对沈剑龙的怨恨和决裂。杨之华要求与沈剑龙离婚，得到了沈玄庐的支持。

瞿秋白与杨之华相爱了，他们终于决定向着爱神指引的路走去。

1924年深秋，杨之华与瞿秋白先后到了萧山，一个回家决定与沈剑龙离婚，一个到萧山决定与杨之华结婚。于是出现了一场现在简直难以理解也难以想象，而在当时却因其浪漫主义的奇特的又是强烈的自由婚恋色彩轰动了上海大学革命圈。瞿秋白到萧山就住在沈剑龙家，3个青年人都坦率地开诚布公地谈彼此的想法——当然是杨之华和瞿秋白为一方与沈剑龙谈离与合。这种场面是无法描写的，也没有留下任何一点儿可供我们描写的资料。总而言之，竟然谈得很好，瞿秋白和沈剑龙这理应是“情敌”的对手非但没有决斗，而且谈得很痛快。曾经目睹这次谈判的杨之华的妹妹杨之英后来回忆说：

我第一次见到秋白是1924年11月，姐姐同他一起到萧山家中来的时候。当时姐姐已决定与沈剑龙离婚，她和秋白来家就是为商议这件事的。秋白给我的印象是文质彬彬，说话斯文，十分有礼貌。他们到家后，立即派人把沈剑龙请来，三个人关在房间里谈了差不多一整夜。临别时，我看他们说话都心平气和，十分冷静，猜想姐姐与沈剑龙离婚和秋白结婚的事已经达成协议。

接着，瞿秋白又请沈剑龙和杨之华共去他常州老家。破败的瞿氏宗祠，冷落的老住宅，满是尘土的母亲母亲的棺木，一切的一切，再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曾经是名门闺秀的杨之华一洒同情的眼泪，沈剑龙似乎亦被感动了，事情终于在常州定局……

1924年11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第一版紧靠报头并排出现了3则令人叫绝的启事：

第一则：

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

第二则：

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

杨之华：《忆秋白》。

《回忆杨之华》第147～148页。

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在瞿秋白和杨之华结婚前一月，由于发生了上海反动当局指使流氓打手杀害上海大学学生黄仁的“天后宫事件”，激发了上海市爱国学生和市民的抗议浪潮，反动当局气焰嚣张，蓄意扩大事态，并对上大支部书记瞿秋白科以煽动学潮之罪，下了通缉令。瞿秋白暂避入先施公司职员孙瑞贤家。杨之华一与瞿秋白结识就陷入险境，分担了风险。幸好军阀当局抄查慕尔鸣路兴彬里瞿宅时，瞿秋白已潜居在外，不然，这对新恋人的下场就不堪设想了。

年底，经过组织的安排，瞿秋白把新居安到当时比较安全的闸北区宝通路顺泰里12号，贴墙的11号为沈雁冰的住屋。当然，1924年的沈雁冰还不是茅盾，瞿秋白也没有心思顾及文艺，那时彼此都卷入政治斗争之中，弄得焦头烂额。在即将来临的风暴——北伐战争——之前，瞿秋白总算有了一个家。11月18日结婚时，据说沈剑龙还赠送给瞿秋白一帧照片，他把自己装扮成剃了光头、穿了袈裟，手捧一束鲜花并上书“鲜花献佛”的不伦不类的形象，也许他是真心诚意祝福瞿秋白获得了杨之华的爱情。瞿秋白则珍惜这朵献来的鲜花，在辟为瞿秋白纪念馆的常州瞿氏宗祠的一个展柜里陈列着一枚金别针，针面上有瞿秋白亲刻“赠给我生命的伴侣”，熠熠发光，永远象征着瞿秋白和杨之华的爱情。

杨之华离开沈剑龙后，沈玄庐夫妇从此不许她再来见女儿独伊。杨之华思女心切，渴望一见。瞿秋白非常理解她，热情地给予安慰，并于1925年初帮她抽空回乡探望。她避开公婆，偷偷地见了女儿一面，又匆匆而别。回到上海，杨之华仍对女儿思念不已。瞿秋白想尽一切方法为她解忧。他讲《安娜·卡列尼娜》故事给她听，

他说：“你过去在婚姻上所遭遇的不幸，一时不能见到孩子，这一点和安娜·卡列尼娜相同，旧的社会制度窒息了多少人们的心灵呵！但是你处的时代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时代完全不同了。你一定会得到你的幸福，你一定能够看到你的孩子，也一定能够和你的孩子在一起生活。”他写下一首长诗给杨之华，诅咒黑暗的旧社会，但孩子将有光明的前途，他会爱护她，培养她，教育她，使她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不久，杨之华征得瞿秋白同意，他们一起回到萧山家中。在母亲那里，他们决定派人去把孩子从沈家偷出来，抱回上海。那天，他俩站在山上，一会儿看到孩子出来，杨之华刚刚把她抱在怀里，就被追赶来的两个大汉把孩子夺走了。孩子哭喊着妈妈，杨之华的心都碎了，忍不住大哭起来。她和瞿秋白沿着河边，冷清凄凉地走着。两人都默默无语，杨之华第一次看见瞿秋白流下了眼泪。后来，杨之华的母亲，设法接独伊到外婆家来玩，然后把她送到了上海。母女终于团聚。

不久，瞿秋白和杨之华都投入了紧张的革命工作。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瞿秋白仍被选为中央委员。五卅惨案爆发后，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进一步展开反帝斗争，号召全上海人民起来举行罢工、罢市、罢课，并决定由瞿秋白和蔡和森、李立三组织行动委员会，立即成立上海市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宣言；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告全国民众书，指明五卅惨案的性质，号召全国人民组织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掀起全国性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奋斗；会议还决定出版《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任主编，加强党对运动的领导。瞿秋白用了很大的精力来办好《热血日报》。这份报纸对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军阀政府的卖国勾当、买办资产阶级的破坏活动，及时进行彻底的

上每天的评论很多，有社论、短评、呼声、“舆论之裁判”、杂感等，文章短小精悍，旗帜鲜明，尖锐有力。社论绝大多数是瞿秋白亲自写的。在现存的24期报纸的社论中，光是收进他在1926年自编的论文集的就有20篇。

五卅运动期间，杨之华被派往浦东区组织工人运动。她白天到工厂去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晚上就把工人提出的许多问题拿来与瞿秋白讨论。瞿秋白总是先让她谈谈自己的认识，然后帮助她进一步理解这些问题。他还为杨之华指定一些参考书，指明有关的段落，折上书角，让她自己学习以后，写出简要的通俗解答。杨之华在瞿秋白的帮助下，一方面向工人群众学习实际经验；一方面从书本上取得理论知识，然后结合起来进行宣传，进步非常快。杨之华后来回忆说，当时好像进了比任何大学都好的大学。

1927年3月，瞿秋白从上海到达武汉，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他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极为不满，热情支持了毛泽东有关农民问题的看法，亲自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写了序言，序言的结尾说：“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同年6月，瞿秋白出版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一书。这本书是在瞿秋白患病期间写成的。瞿秋白自青年时代起即染上了肺结核病，每次发作都是高烧、吐血，十分严重，此病一直缠绕他的终生，未能痊愈，给他带来巨大的痛苦。然而，病魔的折磨并未削弱瞿秋白的斗争热情，即使在病床上，他也以常人难以想像的毅力坚持为党工作。1926年春，瞿秋白因连续两个月发烧、吐血，中央决定叫他疗养，住进了上海宝隆医院。中央的好几位同志凑了一笔钱帮助瞿秋白。杨之华得知中央的决定后十分高兴。之前，她一直为秋白的身体担忧，多次劝他休养一个时期。瞿秋白总是微笑着对她说：不要为我担忧和操心。当前革命斗争这样紧张，需要做的工作那么多，我哪能放下工作休养呢？其实，我不是一直一面同敌人斗争，一面同疾病斗争的吗？还不是坚持过来了。

瞿秋白服从中央的决定住进医院后，对杨之华说：“这样也好，给我安排了一个安静的环境，我可以实现一个心愿了。我想编写俄国革命运动史，从中吸取有用的经验教训。”他把需要的材料和平时用惯了的文具等放在一只小提箱里，带到医院去了。开始，杨之华每天去看他一次，他总是让杨带回一张他需要的参考书的单子，要她到四马路的书店、书摊和图书馆去寻找。当他得到那些书时，就像得到了宝贝一样高兴，很快地读这些书。在头两个星期，他还听从医生的嘱咐躺在床上，就是不停地读着书。第三个星期起，就像在家里一样，坐在椅子上，趴在桌子上，兴致勃勃地写起来了。杨之华每次去医院看他，总要带回他的“产品”，成为他的第一个读者。瞿秋白写得很快，像往常一样，总是衬着复写纸写，然后一份交杨之华带回家，一份留在医院里。经过两三个星期的写作，几万字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一书就大部分编写好了。

在武汉工作时期，瞿秋白与任弼时、恽代英、苏兆征等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一起，同陈独秀作了很多斗争。后来，他主持了中央的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的错误路线在党内的统治。其后，瞿秋白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了中共党内的错误路线。

排斥出中央政治局，并且一直到 1934 年初，不分配他的工作。与此同时，杨之华也受到牵连，撤掉了她在党内的的工作。当时，杨之华想不通，既为瞿秋白感到不平，也为自己感到委屈。瞿秋白在这个特殊考验的时期中，耐心地鼓励杨之华说：“你要求工作的热情是好的，共产党员当然要为党工作。但在这种情况下要学会独立工作，自觉地、主动地去做。”在那些难捱的艰难日子中，瞿秋白鼓励杨之华读书，学俄文，把熟悉的工人的斗争生活学着写成短篇小说，学习翻译苏联的革命文学作品。当杨之华写了一篇叫做《豆腐阿姐》的短篇小说时，瞿秋白十分高兴，马上帮她修改，并向她说明修改的道理。当杨之华学习翻译苏联革命文学作品时，瞿秋白则一字一句地把着手教，每天翻译一段，每天帮助她修改一段。杨之华说：“在他的帮助下，我对新的工作逐渐发生兴趣了，对新的环境也慢慢习惯了，觉得自己仍然能够尽可能地为革命做一些工作，胸襟就开阔了，心情也舒畅了。”

瞿秋白自己在这段受打击的日子里是如何度过的呢？夏衍在《追念瞿秋白同志》一文中这样写道：

“1931 年前后正是狂风暴雨的时代，那时候的白色恐怖是异常严重的。在这样一个时期，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出乎意外的安详。态度很舒坦，布置工作很细致，这恰恰和同一个时期的某些同志的激昂、焦躁、乃至若干轻率的态度，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同时，大家也都能回想得起，秋白同志来参加文化工作的领导，正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他正受到了‘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可是，在我和他断断续续的近两年的工作接触中，丝毫也没有感觉到他受了打击之后的委屈的心情。日常谈话的时候他是那样的乐观，那样的‘潇洒’，那样的幽默，可是一接触到工作，他又是那样的生气勃勃，对敌人和旧社会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具有那样强烈的敌气和仇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最经不起打击——特别是来自内部的打击，而在秋白同志身上，是一点也找不到牢骚、委屈之类的个人主义情绪的痕迹的。他从来不谈个人的事，不谈过去的事，在任何困难危险的情况之下，他永远是那样的爽朗、愉快，丝毫没有感情上的阴影。他的这种高度的党性，高贵的品质，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瞿秋白受到王明集团打击的儿年中，他仍一如既往地入党工作，每天工作和学习的时间总在十几小时以上。据粗略计算，这一时期收集在《瞿秋白文集》中的文学著作就有 150 万字，平均每天写 2 千字。这还不包括他给党刊写的许多文章。这一时期，他与鲁迅一道共同领导了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这几年的生活也是十分艰苦的，因为秘密工作的关系，不能出去买菜，一直吃包饭。瞿秋白的严重肺病一直不见好转，杨之华千方百计地买些鸡和营养品给他补充营养。又由于特务的骚扰，他们又不得不多次匆忙离家躲避。光是去鲁迅家避难就有三次。长期的紧张工作和患难生活，使瞿秋白与杨之华之间的爱情日益升华，他们互相支撑，相依为命。瞿秋白用他的一份浓浓的爱心刻下了一枚图章：秋之白华。

1933 年年底的一个晚上，有一位同志来到瞿秋白家，对瞿秋白说：“中央来了电报，要你去中央苏区。”当时，他已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人民教育委员，兼苏维埃大学校长。一直向往和关心着苏区的瞿秋白，一听到中央要他到苏区的通知，马上高兴地说：“想去很久了！”他平静地点燃了烟斗，安详地吸着，过了一会儿，问：“之华可以同去吗？”那位同志迟疑了一下回答：“我可以把这个意见反映给组织。”第二天，那位同志带来了答

任白区中央局组织部的秘书工作。

分离的时刻快要到了。瞿秋白整理了他近三年来的文学著译。临行前的一天夜里，瞿秋白一夜未睡，坐在椅子上抽烟沉思，陷入分离的痛苦之中。快天亮的时候，杨之华醒了，瞿秋白悄悄走近她的床边，把十本黑漆布面的本子分成两半，对杨之华说：“这五本是你的，这五本是我的。我们离开以后不能通信，就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重见时交换着看。”他又指着桌上的一叠书说：“这是你要读的书，我给你整理好了。我还给你订了个半年的读书计划。”瞿秋白看着那些不能带走的书，不胜遗憾地说：“我爱读的这许多书不知能够保存到什么时候，希望你快来，如有可能，书也带来。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相见……”杨之华体会到瞿秋白的担心，耐心安慰他说：“不要紧的，过去我们离开过六次，不是都重见了么？这次当然也会一样的。”瞿秋白突然若有所思地紧握杨之华的手说：“之华，我们一起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被捕牺牲是意料中事。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还记得广东周文雍、陈铁君夫妇一同英勇上刑场的照片吗？即使我们不能共享胜利的喜悦，那样牺牲也是无尚幸福的。”

杨之华深情地回忆了他们分别的最后一幕：

“秋白离开上海的日子是1934年1月11日。那天晚上，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们各出一元钱，叫了一个菊花火锅，买了些苹果，准备了一顿比较丰盛的晚餐给秋白饯行。到深夜11点，秋白离开寓所到轮船码头去，我送他到门外。这夜刮着寒风，下着大雪，秋白只穿了单薄的寒衣，负着病弱的身体，迎着风雪向前走着。快到弄堂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走了几步，在白雪纷飞中显得昏黄暗淡的路灯光下凝视着我，缓慢地说，‘之华，我走了！’我激动地回答他：‘再见，我们一定能再见的！’他走了。我情不自禁地也往前走着，一直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大街尽头，我才回到住所。”

“我走进房间，看着整洁的书桌，上面放着笔墨铜尺和秋白留给我的书，墙角还挂着他的一件破单衣……一切如旧，他的音容笑貌，弯腰低头在书桌旁辛勤写作的姿态，都还历历在目。是的，不管离得多远，分别多久，都不可能从我的生活中抹去秋白的一切。我激动地看着他替我订的读书计划，翻着他要我读的一叠整整齐齐的书，其中有一本他翻译的斯大林写的《列宁主义问题》。我勉励自己一定照他的嘱咐做，我默默地祝祷他安抵苏区。”

过了半个月，杨之华就接到瞿秋白托人捎来的一张小条子，这是他在赴苏区的路上写给爱妻的。条子上说：“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见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语短情长，其中既有重回党的怀抱的欣喜之情，又有对杨之华依恋不舍的深情。杨之华一直盼望着早日到苏区去与瞿秋白团聚，但是，王明“左”倾路线的恶果越来越严重，上海的党组织继续不断地被破坏。不久，去苏区的交通也断绝了。杨之华终于未能去苏区与瞿秋白会面。上海一别竟成永诀。

瞿秋白在苏区工作了一年，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工作。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撤出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也随军撤走。干部、家属，还有舍不得丢弃的坛坛罐罐，在大军的保护之下，匆匆忙忙地向西而行。但是，身患重病的瞿秋白没被允许随军长征，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撤离苏区走到福建长汀县濯田时，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俘获。

敌人对瞿秋白进行软硬兼施，逼他供出党的秘密。瞿秋白在长汀狱中写了一篇长长的“供词”。他用很大的篇幅全面、热情地宣传和颂扬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驳斥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攻击和诬蔑。与其说这是一篇“供词”，不如说是瞿秋白对苏区充满激

敌人在他身上没有得到什么东西。蒋介石亲自下达了处决瞿秋白的密令。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唱着国际歌，在长汀的中山公园内英勇就义。

瞿秋白为了中国人民的事业，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牺牲时年仅36岁。他在临终之际写下了一篇《多余的话》，严格解剖了自己的一生，表达了对党的事业，对同志和战友的关心和热爱。同时，他也流露了对杨之华的深深的眷恋与爱情，他写道：“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瞿秋白与杨之华十年依傍的深情直至瞿秋白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放射出如此耀眼的光芒，让人无限感动与赞叹。

恽代英（1895～1931）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政治家、中国青年爱戴的领袖之一。江苏武进人。五四时期在武汉领导学生爱国运动，并组织互助社、利群书社、共存社等进步社团。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国青年》主编。1926年3月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1927年春主持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工作。同年5月，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后历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和宣传部秘书长。1930年5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次年4月29日在南京狱中壮烈牺牲。

1913年夏，恽代英以优异的成绩考进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预科一班。1915年进入该校文科中国哲学系学习。就在同年的下半年，恽代英结婚了。

结婚的那天，武昌涵三宫街一号恽家的寓院热闹非凡。新娘沈葆秀是恽家老友沈云驹的二女儿。沈家是江苏苏州人，与恽家是大同乡，当时在武昌官钱局做职员。两家过从甚密，父母作主，于是小两口结为伉俪。喜庆的日子里，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都来了。令人惊奇的是，聪明俊逸、知书达礼的恽代英不像别的新郎那样披红插花、一身绫罗绸缎，而是长衫素服，一副朴实大方的装束。

令人更为惊奇的事还在后头。三天后，新娘回门，向母亲哭诉，结婚已三天，代英一直睡在书房，对父母包办婚姻以示抗争！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猛士，恽代英极力主张男女平等，反对三纲五常，渴求婚姻自主，并以自己的行动向封建礼教宣战。出于对父母的尊重，他违心地与沈葆秀完婚，但坚持不过房，冷落了新婚燕尔的妻子。

其实，沈葆秀并非守旧、传统的女性。她虽“婉柔似室女”，但“豪爽似男儿”，“好读书，通情理，讲道德”，不愿做封建礼教的殉道者。她对代英早有了解，十分钦佩他的才华和为人。在婚后的日子里，她与代英隔房通信，向代英请教诗文。代英也回信向妻子宣传新思想，教她作日记。随着书信的往来，鸿燕的传情，代英对葆秀有了真正的了解，他对妻子萌发的爱是那样的热烈、执着。恽代英在日记中记述了他们这段刻骨铭心的恋情。他们“以口对口，以心印心”，互相体贴，互相帮助。恽代英鼓励妻子自立自强，葆秀支持丈夫求学和追求真理。他们经常相互勉励：待代英毕业后，过自立生活，“用全力造福社会，造福家庭”。

然而，甜蜜、幸福的日子不到三年，意外发生了。1918年2月25日，沈葆秀因难产而去世！突如其来的打击是那样的沉重，悲痛、感伤、泪水都无法使他心绪平静。他在悼念葆秀的挽联上写道：“回忆此三载姻缘，难禁我万行泪，怆然以悲。”深夜，借着如豆的灯光，他在葆秀的遗像上题写了一首哀婉凄切的七言诗：

郎君爱唱女权论，
幸福都拼付爱神。
常欲寸心如古井，
不妨人笑未亡人。
横风吹断平生愿，
死去已看物序更。
我自修身俟天寿，
且将同穴慰卿卿。

他把这墨迹稍干的照片珍藏在日记本里，经常取出观看，无论伏案读书或奋笔著文，都似有葆秀的灵魂在身边，陪伴他度过漫漫的求索之路。

爱妻的早逝使代英悲痛欲绝。在他的意识中，葆秀并没有离他而去，他盼望着冥冥中能与爱妻相遇，魂魄相依。他以书信的方式，在日记中接连写了四封情真意切的信，寄托了对爱妻的哀思和怀念。1918年3月1日的信中写道：

葆秀大鉴：

卿爱读吾书札。吾去年往庐山，曾数与卿书，卿心甚悦，岂意今日致卿以书，乃与卿幽明隔世耶！自卿弃吾以去，吾每夜不得卿入梦，窃意卿不致忽然于我如此，吾心中近来不知是何味。……吾万不料卿之舍予如是之速，而前日与卿所要约之事，一切尽成虚空也。夫此五浊世界，弃去固何所惜。然卿竟不为我厮守三五年乃至十年，使我至今嗒然茫然，无以为主，此诚非意中事也……

昔日相晤，谈时以口对口，以心印心，今日尚思此境得乎？吾今日亦不知卿已何往，吾焚此书亦未知能入卿目否？……吾致卿之挽联，现悬于卿灵前，未知能入目否？倘未入目，告我当抄寄一阅。伯文亦有一联，闻大姊、三妹备拟致一联。吾已与强弟言，彼等所拟如无大谬，以少点窜为妙，盖使卿得享受彼等自然之情中所发之自然之文，较高文雅典尤有价值多多也……

予已与全叔商议，预备将来合葬。全叔言，可做到。此语谅卿必甚乐闻，予等前言同死，卿固笑吾面漫；吾今日固念念于卿，然不能舍一家之众，并天下待我援手之人而就卿，惟有待天年之至以与卿同穴耳……

1918年3月28日的信中写道：

葆秀大鉴：

汝去我而逝已匝月矣。吾未知汝魂魄有知耶？我无汝尚能勉自排遣，汝无我又无汝所爱之弟妹，汝何以度日耶？吾昨闻全姊言，血晕之时毫无苦痛，汝幸能无苦痛而去，吾闻之亦心慰。吾无情之人，近来待汝较汝初逝时已略淡漠，汝当冷笑而置之也。惟余可以慰汝者，前与汝言合葬之事，父亲大人已经允许，不续娶之事亦可办到。现与汝卜地落驾山（即现在的武昌珞珈山——引者），先妣与王氏先祖妣墓地之间，择期本月二十七日发引安葬。呜呼！吾与汝姻缘如是之短，殊令人思之不服。他生之缘，愿无忘之。父亲意欲吾稍缓纳妾，吾意汝生前一杯一箸，犹爱惜不肯轻畀他人，岂以我身汝甘使他人一尝鼎耶？吾之有愧于汝，料汝英灵必能谅原。吾自今以后，惟当更求守身如玉，使此心如古井不波。吾意我若先汝而死，不知汝哀痛何如，或汝以身殉我矣。吾即不能以身殉汝，若更不能为汝守此心，守此身，他日同穴，以何面目向汝耶？……

吾惟愿常保此灵明，死后做夫妻，庶几不致再有缺憾如此刻。吾自问，除一种痴情，一种向上心，并此干净身体以外，更无事可以对得住汝。汝爱吾不肯深责吾，吾以此愈不能忘汝矣。汝怀孕十月，不知所受是何滋味，中夜疼痛不能安枕，尚宁默然自己下床料理一切，知我睡眠有定时，早起不欲过晏，终不愿轻易扰吾。呜呼！吾今日思之，愈不能不恻汝。吾不知体贴汝，待汝虽不严，而酷如此，吾惟有于汝去后，本吾良心，不作一负汝之事，不然吾无以自恕矣。吾愿吾他生托身为女子，与汝为妇，亦一尝怀孕分娩之苦，以赎此生之罪。此言出于吾之赤诚，汝必能相信也。

父亲知吾拟每月致汝一函，谓如此恐遭魔祟，此父母爱子之心。余意以

得每月得吾书，或非所愿，汝能魂魄依我，则余之心即汝之心，余之身即汝之身，更不必假尺素之力而情愫始通也。……吾言有尽，而意无穷，吾亦不知将来更何时致书于汝，惟于有必要情形时，必不忘致书耳。吾自号“永鰥痴郎”，我亦痴，汝亦痴，即痴于前矣，安容不遂终身痴乎！汝以吾言为然否？

这一封朴实无华的书信，字里行间跳动着一颗赤诚炽热的心。

从此，恽代英自号“永鰥痴郎”。他曾跪在岳父面前，发誓“此弦已断，决不复续”。后来曾有人欲与他作媒，他十分气愤地说：“女子丧夫，须守寡终身，男子丧妻，就可以转眼即忘之，而另结新欢。这是何等的的不平等，何等的罪过！”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每逢星期天，他就带着日记本，到葆秀坟头，一边看日记，一边凭吊葆秀。十几年以后，也就是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前夕，他曾回忆起葆秀去世时的心情：“那时候，我的心目中，只有家庭和妻子。她死了，我有点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我带着她的照片，在她的坟头捶胸顿足，流连忘返。我在向她一个人表达我的满腔赤诚，一片痴情。想想看，这是多么狭小的感情啊！从个人说，虽然可笑，但我并不后悔，我是真诚的。”他是真诚的。恽代英和沈葆秀共同生活的三年，正是他在大学刻苦钻研探索真理的时候，虽然受到过安那其主义的影响，思想上有不少浪漫成份，但他还只是一位二十余岁的热血青年，在茫茫黑夜里，怀着满腔爱国的热忱，上下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思想上还不成熟。爱妻的早逝，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他深深地陷入在绝望和痛苦之中。

但是，他终究并没有陷于一己之痛而不能自拔。他眷念、哀悼亡妻，痛不欲生，但他更想到“天下待我授手之人”，必须坚强地活下去。当时，由恽代英倡导创建的互助社的青年朋友们，担心恽代英过于悲痛而伤了身体，也经常星期天安排郊游，强迫代英和他们同行，去洪山、卓刀泉以及汉阳的琴台、归元寺，借以消除他内心的积郁。代英在悲痛之余，更为积极领导互助社的活动，推动了武汉地区的新文化运动。

1918年夏，恽代英毕业后，受聘担任中华大学附中教务主任（即校长），开始了新的生活。恽代英在中大附中任职期间，正是五四运动前后我国历史大转变的伟大时期。他以急进民主主义者的姿态，战斗在日益动荡、雄伟壮观的历史舞台上。他以卓越的才能，犀利的笔锋，救民于水火的热情，脱颖而出。1920年2月，他和林育南等人成立了利群书社，出售进步书刊，团结进步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此基础上，又开办了利群毛巾厂。1921年1月，翻译出版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一书。7月，与林育南等成立共存社，积极主张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改造社会。同年底得知中国共产党已成立后，结束共存社，参加共产党。

五四运动等一系列斗争实践的教育，恽代英找到了能够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为实现这个真理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从而投身到更广阔的战场上去。1923年8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团中央局成员之一。同年10月创办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任主编，先后在这个刊物上发表160多篇文章和通信，教育和影响了整个一代青年。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1925年参加领导五卅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1月出席国民党二大，为大会中共党团干事之一，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同年3月，不顾陈独秀的反对，在《中国青年》上登载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为全党认识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问题，起了积极作用。5月，受党委派，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总教官。1927年新春伊始，恽代英作为武汉中央军事学

代英离开父母时还是一个青年。十年间，他由武汉而宣城，而泸州，而成都，而上海，而广州，经历了血与火的战斗，已成为中国共产党著名政治活动家，广大革命青年崇敬爱戴的青年运动领袖，如今他又回到了处于大革命高潮中的武汉。十年间，人世风雨、鞍马劳顿虽然多少抹平了恽代英的内心哀痛，却未减弱他对亡妻无尽的怀念，只是这爱的怀念已经得到了升华，未亡人的思念不再是长饮不涸的苦酒，而成为创造新生活的力量和勇气。

也就在这十年间，沈葆秀的四妹葆英已从一个不懂事的少女长大成人，投身到革命事业之中，与恽代英肩并肩地一起战斗了。

当年二姐葆秀出嫁时，四妹年方十岁。在她幼小的心灵里，二姐夫十分令人敬爱，并受其影响，走上革命道路。五四运动中，年仅十四岁的沈葆英被爱国运动所感染，主动给示威的学生队伍送衣食。五四运动后，她在利群书社帮助送报、打杂、做饭，到利群毛巾厂干活，在实际生活中，她懂得了许多一般妇女不懂的事情。恽代英还主动担负了帮助沈家姐妹学习文化的任务。在恽代英的帮助下，1921年夏天，葆英考进了湖北女子师范。在进步思潮的影响下，学生们组织读书会，学习马列主义，一向死气沉沉的女师开始沸腾了起来。

在学潮中，葆英与同班同学范明洁结成了好朋友。明洁已是青年团员，但葆英尚不知道她的身份。一次，代英从上海寄来一本刚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这本刊物像磁石一样吸引了葆英，她一口气把它读完后，就放在枕头底下。明洁发现后问道：“这是谁寄给你的？”葆英说是恽代英。明洁很惊奇：“恽代英是我们的领导人，你怎么认识的？”葆英只说她二姐是恽代英的学生，恽代英经常来她家教英文和历史，她也就成了恽代英的学生了。接着，她们交谈了学习《中国青年》的感想。明洁问道：“你最喜欢哪篇文章？”葆英说：“所有的文章我几乎都喜欢。但比较起来，更喜欢恽代英写的《怎样才是好人》这一篇。”范明洁盯着问：“你觉得怎样才是好人呢？”葆英答道：“就是代英说的那三条：好人就是要有操守，有作为，为社会谋福利。就是说能给大家办事。”明洁拍着手说：“对！我们青年人就是要有革命理想。我们将来的理想社会是什么样子，你想过没有呢？”“想过，”葆英老实地说，“但也说不清楚。记得代英曾说过，那个社会，不允许人吃人、人压迫人，要人人平等、人人有饭吃、有工做。但我听代英说这些话的时候年纪还小，不懂得。现在看了《中国青年》，渐渐明白了。我觉得好像代英仍在我眼前，对我们姐妹们讲话，那么亲切，那么和气。我也常常想着那个理想社会。”

“你认为怎样才能实现那个社会呢？”范明洁问。葆英说：“我毕业后就去找代英，跟他干革命。”范明洁笑着说：“毕业还早哩！现在应该怎么办？”明洁启发道：“想革命，在武昌也一样，武昌就有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葆英的急切要求下，明洁介绍她入了团。1925年，葆英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1926年夏，葆英女师毕业后，被分配在省立第一完小教书。

在过去的十年间，恽代英与沈葆英虽人各一方，但始终有着密切的联系，葆英把入团的喜讯写信告诉代英，代英很高兴，鼓励她要好好学习，提高觉悟。代英经常来信，引导和教育葆英如何去“出卖阶级”（就是后来通常说的“背叛本阶级”），到工人群众中去。葆英在工作和思想上碰到疑难的时候，总是写信请教代英。代英在广州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总教官时，曾写信给葆英，问她愿不愿到广州帮他工作。葆英回信说，到广州去，她是很向往的，只是现在离毕业只有一年了，还是毕了业再去吧。代英赞同她的想法。

在十年的密切交往中，葆英积极投身到代英所服膺的革命事业中去；而代英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了，他需要助手。志同道合使他们的心贴得越来

今代英回来了！这里有他曾经热恋过的亡妻，有他心心相印的革命同志四妹。

一天，代英到葆英执教的省立第一完小讲演。演讲以后，校长和许多人都出来送别，葆英也跟着出来了。代英站在校门口，稍稍停顿了一下，对葆英说：“四妹，有点事我想和你谈谈。”旁边的人看到这情况，都会意地走开了。代英接着说：“四妹，今天天气还早，我想到二姐坟上去看看，你能不能陪我走一趟？我还有些话要对你说。”葆英点头说：“好。”

两人沿着通往洪山的马路向东走去。出了大东门，不远就是洪山。前面矗立着一块新的高大的墓碑，正面刻着几个红色大字：施洋先生之墓。施洋是我党早期优秀党员，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曾与恽代英等创办《武汉星期评论》，宣传革命思想。二七惨案的当晚被捕。在狱中，在法庭上，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数日后，在武汉英勇就义。代英站在施洋墓前，脱下军帽，凝视着墓碑。良久，他惋惜而又有点歉疚地说：“伯高（施洋号）兄是了不起的人。当年，我对他的外表和服装看不惯，同他有距离……革命使我真正认识了他……”他边走边说，很快来到了珞珈山后谷岭。

代英轻步走到他母亲的墓前，脱了军帽，行了三鞠躬。一会儿，又来到了葆秀的墓前。代英深情地鞠了一躬，低声说道：“葆秀，我和四妹来看你了。”

沉吟片刻，代英面对着葆秀的墓穴诉说道：“葆秀，你离开人间已有十年，我为你守义也守了十年。古人强迫女人守节，我坚决反对。而今我为你守义，是心甘情愿。这不只是我个人对你的情谊，也是为了给那些歧视妇女、不守信义的人看看，给他们一个回答：人间还有真情在！”说到这里，代英的情绪有些激动。

待平静了一会儿，代英继续诉说道：“今天，我已是个无产阶级战士了。我党担负着解放全国劳苦大众的庄严任务。我需要亲密战友，革命伴侣。四妹已经长大成人了，她也是个无产阶级战士了，为了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我希望她能和我并肩战斗。你九泉有灵，会同意我的心愿吧！”他的声音发抖了。

突然，代英转过脸来，对葆英多少有些歉疚地低声说：“四妹，原谅我！事先我没有征得你的同意，却在二姐墓前，先道出了我的心愿，你不会怪我吧！你愿不愿意和我结成革命伴侣，也可以对二姐说说。”代英的目光停留在葆英的脸上，饱含着渴求和希望。

一股暖流涌遍沈葆英全身，她一时语塞，无言地站着。是为这墓前求婚的方式感到意外？还是姑娘特有的羞涩而难以启齿？料峭的寒风吹拂着葆英发烫的脸庞。远处，偶而传来几声江轮的汽笛声。周围静极了，姑娘的心里却翻腾开了。她曾暗暗羡慕二姐有这样的好丈夫，自己成长中有这样的好老师。现在，他就站在面前，表达了他的心愿。葆英深情地望着代英饱经风霜的脸，默默地点了点头。

1927年1月16日，恽代英在武昌得胜桥寓所与沈葆英举行了婚礼。婚礼十分简单，没有惊动任何同事，只有亲戚数人在场。当时代英工作很忙，他不愿因为私事影响公务，仍然照常上班。回到家里，父亲说：“葆英已经接来了，快去换了礼服行礼吧！”代英没有依从父亲，他委婉地向老人说明了理由。他照旧穿着军服，斜佩着武装带，和新娘在一对红烛前面行了鞠躬礼，成了亲。代英按照军人纪律，仍回军校去住。很久以后，他的同事们才知道两人结婚的事。

难忘的1927年，恽代英和沈葆英在珞珈山后葆秀的坟前，埋葬了悲哀的过去，开始了崭新的战斗生活。

难忘的1927年，政治风云变化莫测，武汉几乎每天都有不同的消息。4

场举行的三十万人讨蒋大会。5月19日，发生了夏斗寅叛变，武汉形势岌岌可危。代英闻讯，立即率领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组织独立师，和叶挺等人一起击退夏斗寅部队。多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叛变，屠杀共产党人和赤色工农群众，而陈独秀步步退让，恹代英十分愤慨。7月15日，汪精卫叛变了。国共彻底分裂，国民党下令通缉恹代英。难忘的1927年，新婚半年的代英和葆英就被迫分别了。7月下旬的一天，代英穿着便衣，回到家里，对葆英说：“国民党已经通令捉拿我了，我要走了。”他歉疚而又坚定地说：“我们匆匆结婚，又要匆匆分手了。我深信，许克祥、夏斗寅、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无法绞杀革命。我要走了，你也得有应变的精神准备。你不要难过，我还要回来的。革命遭受挫折，但没有完结！”代英没顾上同家人辞行，趁着夜色，就匆匆地出门去了。此后，他受党的委托，参加了震惊神州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

沈葆英在代英走后，找到三姐家，请三姐夫去得胜桥打探消息。恹家已被军队包围，父亲和代英的四弟子强都被捆了起来。葆英在三姐的帮助下，打扮成小伙子模样，躲藏到汉阳的娘舅家。她焦急地盼着代英的音信。一天，三姐来了，带来了代英的信。一封发自江西某县城的信上说：跟老板做生意，老板很高明，一昼夜间赚了一万多，现在做新的生意，要到南边去。后来见到代英时才知道信中的隐语指的是南昌起义的事。“老板”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做生意”是起义，“赚了一万多”是消灭了一万多敌人，“向南去”是千里行军，向广东进军。每次三姐来看四妹，总带来代英的信。葆英顽强地坚持着，期待着与代英团聚的日子。

冬天来了，代英忙于筹划广州起义，家信少了。过年后不久，就在葆英焦急不安之时，忽然接到代英的一封信。地址看不清楚，信上说：刚刚做了一笔生意，赚了一笔钱，又倒出去了，但我们不失望。“事情总不是一帆风顺的，顺风、逆风都会碰到。我们的船可能到一个港口去，要是在那儿停些时等生意，我再写信来。”没几天，代英又来一信，说是老板同意你来帮助我们。信中说：“四妹，我在这儿等一阵，接信后可立即动身南来，从上海换海轮，直达香港。”信中还约定了沈葆英在香港投宿的旅馆。收到代英的信后，葆英立即动身，来到了香港，住进了约定的旅馆。第二天下午，代英来了，这对分别多时的恩爱夫妻终于重逢了。繁重的革命工作和艰苦的斗争生活，使患有肺病的恹代英身体更加消瘦。葆英看到丈夫脸色苍白，形容憔悴，重逢的喜悦中不免增添了几分忧郁。

香港环境复杂，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到处横行，时刻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他们住在一个平民区住宅里。每逢代英在家开会，葆英便在楼下放哨警卫。一天傍晚，同志们正在楼上开重要会议，突然闯进了大批巡捕。葆英不顾巡捕百般威胁，只装作什么也不知道。那天恹代英恰巧不在家，等巡捕离开后，她赶忙把当作暗号的一串辣椒收起，便匆匆忙忙地出门了。葆英在街上徘徊了三天后的一个早晨，才在街头碰到代英。他使了个眼色，二人没敢讲话，来到了一间屋子里。当葆英谈及这几天的境遇，流露出难过的情绪时，代英风趣地说：“你看，又闹孩子脾气了。革命是免不了风险、免不了牺牲的，要经得起考验。我还以为你也被捕了，你隐蔽了自己，还算是机智的。”

有一次代英看见葆英坐在房里闷声不乐，低声问道：“葆英，你在想什么？是不是觉得生活太苦了？”葆英没有叫苦，但心里确实有些郁闷，感到一颗心有时兴奋得像飞到半空，有时又寂寞得像被打入冷宫。代英看出葆英的烦恼，特意请妻子来到了一家咖啡店。

他们找了个稍僻静的角落坐了下来，要了两杯牛奶咖啡，慢慢地品尝着。

不，我不能离开你。这几天，我懂得了什么叫斗争，什么叫生活。我不怕吃苦，也不怕坐牢杀头，我就怕那死气沉沉的生活。”

代英望着进进出出的人群，对妻子说：“是的，我们要过人的生活，就不怕吃苦。你瞧，这里走进走出的人，有的是两口子，有的也可能将要成为两口子。他们中有的携儿带女，吃吃喝喝，所谓‘恩爱生活’、‘甜蜜岁月’，所谓‘美满的’、‘幸福的’家庭。而我们，身处异地，天天都担风险。你现在跟着我，担惊受怕，甚至连条被子都没有。你说怎么好？没有钱，没有固定收入，没有自己的房子，什么也没有，只有一颗火热的心，这就是我们的革命生涯。”

代英接着说：“书呆子，没有生活乐趣；浪荡子，不懂生活乐趣，他们把肉麻当有趣，把占有当幸福。有的人没有灵魂，只能算是行尸走肉；有的人妖里妖气，只能算衣架饭囊。瞧，那个女人多么恶心，多么俗气。好吧，你们干你们的，我们干我们的，这有什么！自从有了阶级，本来大家就不同嘛，乐趣也不同嘛！在这个地方，他们纸醉金迷，找到了乐趣。我们观察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也找到了理解生活的乐趣。”

葆英被这富有哲理的侃侃而谈吸引了，专注地听着。这对贫穷的夫妻、革命的伴侣，视王侯如粪土，看富贵如浮云。他们为实现革命理想而不懈奋斗，他们在精神上是富有者，他们有着革命者的幸福观。

在困苦和危险的日子里，代英夫妻相濡以沫，自得其乐。一天，他们约好在一个地方等电车。葆英先到，左等右等不见代英。过了一会儿，代英突然从电线杆子后面出现了。葆英很奇怪，问道：“怎么一出门就走散了？”代英笑着说：“不会的，刚刚见了面，怎么能让再分散呢？我刚才在旁边欣赏了你的美，我觉得你穿着旗袍，比起香港那些所谓的美人漂亮多了。”葆英怀孕后，反应很大，常常呕吐，不舒服。代英更为细心地照料妻子。他常弄点好吃的或炒个菜，让葆英一个人吃，给葆英买水果或其它营养品。由于经济拮据，代英自己常常饿着肚子，不让妻子知道。

1928年秋，党的六大召开不久，代英带着妻子离开香港，来到了上海，任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葆英担任机关机要员，抄写药水信件，登记来往电报，管理或递送重要文件。从黄埔军校、八一起义到在中宣部工作，周恩来与恽代英已是三次共事，合作很好。邓颖超同志对葆英也十分关心。后来，葆英生了个男孩，取名希仲，是代英父亲取的名，希望孩子长大了作个管仲那样的人。可是邓颖超和同志们却喊他“小乐天”，恩来同志则叫他“小代”，抱着孩子亲热地说：“小代啊，快点长吧！长大了接我们的班啊！”

葆英奶水不足，但又没有钱买奶粉，看着瘦弱啼哭的孩子，不由得落下泪来。代英一面安慰妻子，一面开夜车译书，挣得点稿费给孩子买奶粉。葆英心情很矛盾，她觉得若做好革命工作，则难带好孩子；若要带好孩子，便难做好工作。她将苦闷的心情告诉代英，代英鼓励她：“目前困难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阶级敌人的存在，目前要打击敌人，就要面对着困难，不在困难面前徘徊、却步……共产党人没有党性和母性的矛盾。我们要去斗争，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添加革命的力量；孩子也要安排得当，我们艰苦奋斗，也是为了换取下一代光辉的未来。”

沈葆英安排好孩子后，被党派到闸北一个缫丝厂作革命工作，担任一个党支部的书记，工作颇为出色。

恽代英和沈葆英，与瞿秋白和杨之华、周恩来和邓颖超等许多革命伴侣一样，在腥风血雨的年代里，毫不畏惧，携手并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日日夜夜地忘我战斗。

战”，而革命形势也正在急速发展。当时党内实际领导人李立三被有利的形势冲昏了头脑，不顾敌强我弱的基本事实，错误地提出要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号召“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像党内许多同志一样，恽代英对“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予以批评和反对。但李立三不但没有接受他的正确意见，反而撤消了他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的职务，让他到沪东区任行委书记，并要他立即搬到闸北去。

1930年5月1日，李立三下令工人举行游行罢工。盲目的游行示威失败了，许多同志成了冒险主义的牺牲品。沈葆英看到闷声不响回到家里的代英，知道他也上了街，心里颇为不安。代英是蒋介石切齿痛恨的人，被国民党重金悬赏捉拿的人，现在却天天在前沿阵地敌人的鼻尖上抛头露面，这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恽代英亲眼看到许多好同志牺牲于敌人的枪弹之下，内心更是痛苦。他激愤地对爱妻说：“四妹，困难，困难啊！党的事业现在处在最困难的关头。群众在受难，在流血。为了让群众少流血，我不能临阵脱逃。我完全理解我现在所处的地位。死，我早就看透了。十多年来，我经历了革命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行军、罢工、地下斗争，多少同志在我眼前倒下了，真是尸骨如山、血流成河啊！想想这条血染的道路，想想那些熟悉的面孔，我越来越感到自己肩头责任的重大。只要还活着，就要把烈士们手中的旗帜继续撑下去。”

代英望着窗外，深情地说：“你还记得我们在洪山上凭吊施洋墓的情景吗？他为革命捐躯，曾给我很大的震动！你还记得死在广州的萧楚女吗？我曾要你帮助他找个伴侣，他只活了三十四岁，就被敌人杀害了。他遗憾吗？我相信他是死而无怨的。半年以前，彭湃和杨殷献出了生命。你见过彭湃，多么能干的人啊！是千百万烈士的鲜血，换来了革命的大好局面。但是有的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及上海主客观力量的对比，梦想现在就占领上海，把群众推入冒险主义的血海。在这种时刻，怎么办呢？我是为了尽量减少群众流血牺牲，才挑起这副担子的。我能力挽狂澜，只能献身虎口，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想，血是不会白流的。革命志士的血，能够增长同志的智慧，擦亮勇士的眼睛。但愿人们能够从血的代价里很快地醒悟过来，我们的事业还是有希望的。我为此而献身，也是死得其所！”

这是一位无产阶级战士宽广博大的大无畏胸襟！

5月6日，不幸终于发生了：恽代英到杨树浦怡和纱厂活动时被捕。一对恩爱的革命伴侣，被反动派无情地拆散了。

恽代英由英国巡捕房引渡到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关在漕河泾监狱。1931年初，被解到南京江东门外的中央军人监狱。由于他的机智，敌人没有发现他的真实身份，只判了他5年徒刑。

早春的南京，淅淅沥沥地一直下着细雨。一天，太阳赶走了愁云惨雨。江东门外，莫愁湖畔，葆英匆匆行走在泥泞的小路上，她带着周恩来同志的口信去探监。想到就要看到分别一年的丈夫，心情十分激动。

葆英走进警戒森严的黑漆大门，穿过好几条阴沉沉的暗道，来到了一间小房内等待探望。一会儿，哗啦哗啦的脚镣声打破了寂静，葆英的心顿时像被刀扎了一样。她透过小窗口，看到代英被两个看守押了过来：长长的头发，蜡黄的面孔，没有戴眼镜，披着一件黄色的囚衣。她不禁鼻子一酸，差点儿掉出泪来。

代英已经看见了葆英，他很镇静，说：“四妹，你怎么啦？我很好啊！我是被冤枉的。等刑期满了，我们还是能够团聚的。我问你，家里人都好吗？”

葆英明白他问的“家里人”是指党和同志，连忙答道：“好，都很好！”

代英知道伍豪就是恩来同志，他眼睛一亮，忙说：“他回来了，谢谢他！”代英很高兴，接着说：“我在这里很好，同伴们都很照顾我，我每天还在练八段锦呢！将来出去还得做生意活命呢。对家里人说，千万不要惦记我，他们平平安安我就称心满意了。”

葆英把带来的包裹交给他。那里面包着衣服、食品，还有几本旧小说、唐诗宋词等。在书的缝隙里，葆英写了想说的话，讲她和孩子都很好。葆英指着包袱说：“家里人都很想你，知道你身体弱，又受了折磨，让我带了些东西来。里面还有一张小毛弟的照片。”

“小毛弟！”代英听说到儿子，十分高兴：“你能把小毛弟带好就行了。他长大了，能够帮助你。他比我有出息。我们贫贱夫妻，家里穷，底子薄，一切都要省吃俭用。不管日子多么艰难，千万不要亏待孩子。我不在家，一切都靠你操持了。你要好好教育小毛弟。”

代英还要说下去，一个看守突然从横道里走出来，大声吼道：“时间到，不许讲了！”又一个看守走上来，推了一下代英，恶狠狠地说：“还等什么？快走！”代英轻蔑地瞪了那个看守一眼，目光又移向了葆英，再次嘱咐道：“费心照顾好小毛弟，我不会忘记你的。”说完，就扭转身，拖着沉重的铁镣，头也不回地走了。

葆英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探监竟成了他们的永诀！

一个多月后，顾顺章在武汉叛变，出卖了代英。惊喜若狂的特务找到了恽代英在黄埔军校时的照片，到监狱来查证。面临死亡的威胁，高官厚禄的引诱，恽代英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移的崇高气节。蒋介石闻讯后，亲下手令、立即就地枪决。4月29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英在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的刑场上壮烈牺牲，时年仅36岁。

沈葆英在为恽代英的书信集《来鸿去燕录》作的代序——《致代英》一文中这样写道：“我们共同生活的三年，又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三年啊！大革命失败后的黑暗年月，港、粤、沪、宁，监狱刑场，刀光剑影，慷慨悲歌，直至那个血腥的日子，在南京城西的江东门外，你以你的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第一个战斗的十年中悲壮、忠贞、璀璨的一页。你短暂而壮丽的生命，在匪徒的狂叫和人民的悲愤中获得了永生。”恽代英是不朽的。周恩来于1950年5月6日为纪念恽代英殉难19周年所作题词中写道：“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十九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

恽代英牺牲后，沈葆英忍着巨大的悲痛，继续投入到丈夫未竟的革命斗争中去。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她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带着希仲回到了武昌老家，把孩子留在代英父亲身边，后来又留在上海子强家，自己四处寻找党。每当她孤独无依、生活无着的时候，总是在心中呼唤着代英的名字，以增添斗争勇气。1938年，这只离群的孤雁终于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党，找到了周恩来同志。当她和邓大姐久别重逢时，拉着大姐的手，禁不住哭了。这些年寻不着党，失群的孤雁日子过得是多么艰难啊！邓大姐说：“这些年辛苦了。”恩来同志亲切地说：“我们也在到处找你，找不着，以为你也牺牲了。现在回来了，就可以放心了。”

1943年，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安排下，沈葆英和儿子在延安相会了。母子见面的那天下午，恩来同志派来了警卫员，牵来一匹马，把她们接到他的住处杨家岭。恩来同志抚摸着希仲的头发，爱抚他说：“真像代英！小代，上学了吗？”邓大姐高兴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小乐天？长得这样高了。”恩来同志问希仲：“想爸爸吗？你知道你爸爸是什么人吗？你不知道的，连

留希仲在他窑洞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希仲回到葆英身边，对妈妈说：“听周伯伯讲过以后，我更想念爸爸了。我要像爸爸那样，也要像周伯伯那样，做个献身革命的好后代！”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恽代英英勇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革命理想，始终激励着沈葆英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踏着先烈的足迹奋勇前进。

王稼祥（1906～1974）安徽泾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党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1934年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遵义会议后，任中央三人指挥小组成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在中共七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宣传部代理部长。建国后，任中回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二、第三、第四届政协常务委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八大、十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1月25日病逝于北京。

朱仲丽，学名朱慧，笔名珠珊，1915年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父亲朱剑凡，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于1904年在自家的园林内，创办了一所近代中国女子学校——周氏家塾，专门招收女学生。满清皇帝倒台后，周氏家塾改为周南女校。朱剑凡先生“毁家兴学”，把数十万家财全部献给这座学校。他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和著名革命教育家。在“五四”运动前后和大革命期间，他和毛泽东以及蔡和森、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李富春、李维汉等许多党的领导人，共同从事过革命工作，并结识了刘少奇、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李立三、聂荣臻、萧劲光等同志。向警予和杨开慧烈士以及蔡畅、丁玲等同志，都曾是他的学生。

朱仲丽的童年时代，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与社会环境中，有机会经常和这些前辈革命家见面，聆听教诲。“马日事变”时，全家遭难，逃到武汉。大革命失败后，全家逃亡上海。父亲和哥嫂都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另一个哥哥在苏区任红军兵工厂厂长。她15岁时，就协助父亲做地下工作。1932年，她考入上海同德医学院。不久，她的父亲病故。由于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她曾被捕入狱，后获释，转入上海东南医学院。21岁时，她在东南医学院毕业，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

1937年底，朱仲丽带着姐夫萧劲光的儿子永定奔赴延安。她从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的同志那里知道，萧劲光是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担负着保卫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任务，那么，姐姐也一定还留在延安，不会到前线去。

找到姐姐、姐夫以后，朱仲丽带着母亲做的腊鱼和腊肉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她说：“你爸爸是个好人。我年轻时，在长沙闹革命，曾经在你爸爸办的周南女校内，吃饭住宿都不叫我付钱。他过早地去世了，很可惜！”毛泽东教育她说：“你来边区工作，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要准备当一个人民的好医生。现在，你是个大医生了，要记住，到共产党队伍中来，大医生也好，小医生也好，都不能自高自傲，因为你是来为人民服务的。”

朱仲丽很快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医院做了外科医生。由于她认真负责地为患者治病，并且具有较高的医术，很快就在边区小有名气了。

1938年9月金秋季节，边区到处是一派丰收景象，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即，延安城收拾得十分整洁。各根据地的领导同志都陆续来到延安，有的来看病，有的来参观。有一天，朱仲丽在手术室里为一位患者摘除眼皮上的一颗大麦粒肿。剪子、刀子、镊子不停地在她的手中灵巧地飞舞。邓小平、贺龙、关向应等几位首长脸贴着玻璃往里看着，当手术完毕朱仲丽抬起头来，他们都赞赏地向她点点头。

第二天，当贺龙看到朱仲丽时，笑着对她说：“你真有本领，拿着尖利

这是小手术。”从此，大伙都传开了，说延安医院里有位科班毕业的女医生，不但医术非常精湛，而且年轻漂亮。更有人见到她就说：“朱医生，你真厉害，拿着宰牛刀在人眼睛上开刀，一丝不差，手到病除，真不简单哩！”

很快，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始了。从9月29日开始，到11月6日结束，开的时间较长。会议开幕式由张闻天主持，刚刚从莫斯科归来不久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在会上做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最后由王稼祥致闭幕词。这次扩大的中央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的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提出了党在新阶段的新任务，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又要坚持我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即希望中国共产党及军队领导层加强内部团结，支持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的工作。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加强了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统一，保证了党能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会议闭幕的那天，举行了会餐，朱仲丽因经常为代表看病，也应邀出席了会餐。她坐在离中央首长不远的餐桌上，因吃饭的女同志很少，所以她格外引人注目。开始她有点拘束，很少吃菜，也不敢喝酒。随着会餐进入高潮，一些代表先后找她干杯。朱仲丽看到别人爽快地一口干了，她也只好一杯酒喝干。代表们见她能喝酒，就向她开始了轮番进攻，于是只见她一杯杯喝酒，脸颊飞红，更加引人注目了。在那边的首长餐桌上，王稼祥恰好与仲丽的姐夫萧劲光坐在一道，他们注意到了那个年轻漂亮的朱医生，正亲切地交谈，萧劲光热情地向王稼祥介绍了他这个能干的小姨子。会餐结束，毛主席也走过来与仲丽打招呼，朱仲丽很大方地回答了毛主席的问题。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23岁的朱仲丽人才出众，又是一位工作积极和受到大家信赖的医生，在边区医院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和白求恩大夫一块工作过，因此，成为大家关心和追求的对象。许多人都给朱仲丽介绍对象，其中姐夫萧劲光是最积极的一个，介绍的当然都是在延安的高级干部。朱仲丽心里自有打算，对许多人都持拒绝态度。萧劲光开玩笑地教训她说：“你这个死丫头，太骄傲了，是不是看不起我们的红军干部？”朱仲丽调皮地回道：“你别给我扣帽子。作为医生，我是全心全意为八路军干部、战士服务。告诉你，因为这事分了我的心，开刀、治病出了问题，你可得负责任！”

边区医院的工作十分繁重，朱仲丽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上。一天，萧劲光派警卫员叫她请一下午假，到他那儿来一下。朱仲丽以为谁生了病，吃过午饭，带上听诊器和血压表，匆匆忙忙赶到姐夫住的窑洞。刚进窑洞，姐姐就高兴他说：“八妹，你来得好快，我们等着你呢！”姐夫却上上下下打量着她，脸上带着神秘的微笑。那天，朱仲丽穿着带背带的蓝色工人裤和一件有彩色的毛衣。萧劲光满意地催促着：“八妹，快走吧，叫姐姐带你做客去！”“到哪儿去？看病人吗？”朱仲丽问。“你看——”萧劲光很神秘地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条子交给仲丽。条子上写道：

萧劲光同志：

请你在后方留守兵团的部队里，找三匹小蒙古马给我。谢谢。

此外，请带你的姨妹到我这儿玩玩。

此致

敬礼！

看到这张字条，朱仲丽不禁心头突突地跳起来。她虽然没有和王稼祥直接讲过话，但从别人的口中却了解到他的作风和为人，对他有着良好的印象。当时只知道他是接替王明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时同志接替他的工作后，于1938年8月初从苏联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并兼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

萧劲光下命令地说：“你这次非服从我不行！我不亲自带你去……噢，叫你姐姐带你去，警卫员带路。他是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可不是一般人，你大方点儿，去吧！”朱仲丽既感激姐夫对自己终身大事的关心，又感到见到王稼祥该多么难为情。

姐姐一路向仲丽介绍王稼祥是一位什么样的人。朱仲丽则一路怀着紧张的心情，暗暗地告诫自己，到了那里千万别脸红。

王稼祥的窑洞紧靠着一座石山，窑洞一半嵌入石头山里，窑洞口朝着桃林和延河，左右有平房，显然那是工作人员住的地方。王稼祥的秘书唐彬出来迎接了朱氏姐妹。她们见到了王稼祥——他身着浅灰色军装，正低头在办公桌上批阅文件，一绺短发垂下来盖在宽阔的额角。他的神情是刚毅和坚定的，又是凝重而和善的。

看到她们进来，王稼祥急忙站起来表示欢迎，并认真地看着朱仲丽。他们闲谈了一阵子，王稼祥问了一些医院的情况。电话铃不断地响着，最后机要员又拿来了待发的电报稿。看到王稼祥这样，朱仲丽和姐姐只好告辞了。王稼祥抱歉似地站起来，与她们握手告别。

王稼祥曾经有过一次婚姻。他是家里的独子，父亲王祖承原指望儿子高小毕业后就和自己一块学习经商，但儿子不肯，执意要读中学。父亲拗不过儿子，只好答应他到芜湖市的教会学校——圣雅各中学学习了。圣雅各中学的教员们非常喜欢王稼祥那种好学、沉静、懂事的性格，其中一位英语教员对王稼祥更是爱之如子。他有意要把自己的女儿玉兰嫁给稼祥。为此事，他亲自登门拜访王祖承。

王祖承见是教员的女儿，家庭本分，加之抱孙心切，便一口答应了这门亲事。于是急切地准备婚事，只待放寒假时，儿子归家办喜事。而这时，一心读书的王稼祥却一直蒙在鼓里，直到放假回家，才知父母已一切准备就绪。无奈，王稼祥就这样勉强地与一个比他大两岁的不识字的姑娘结了婚。结婚后他很快回到学校读书了。

后来，王稼祥因在学校闹学潮被学校开除了学籍，他决定到上海去考大学。临行前，玉兰把早已做好的一双鞋和一件长衫给丈夫带上。她知道丈夫并不爱她，但她嫁给他是“父母之命”，因而只能跟他过一辈子。她好不容易盼望稼祥回家欢聚，他却这么快又走了。那时，王稼祥才18岁。

此后，王稼祥再也没有机会回家省亲了。玉兰第二年因得产褥热而死亡，留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命先。王稼祥的父母在抗战时期因忧伤和疾病相继去世，只留下了一个姐姐。

1938年王稼祥从苏联回国后，也有许多人关心他的终身大事。一次毛泽东在开完会以后对他说：“稼祥，你的身体已经很健康了，以后总得有个伴侣。听说不少同志为你做媒，你为何没有中意的呀？是不是要下决心当一辈子和尚？”王稼祥当时很腼腆地回答：“谢谢主席的关心。”又有一次，毛泽东又和他开玩笑地说：“你今年才三十出头，古人曰三十而立，你是仿古；但古人又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还是没有仿古。”说完，两人相对大笑。

个人问题，但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又不是个人问题，必须严肃谨慎。在为数不多的几次接触中，他对朱仲丽产生了好感，但他还想更多地了解她的工作和为人。

一次，傅连璋院长约朱仲丽一道去为王稼祥检查肠胃病。治疗完毕，傅院长交待朱仲丽一项任务，说：“王主任的肠胃功能比较弱，你应该每周定时为他检查，监视病情，及时用药”。

得到这个任务，朱仲丽又惊又喜，感到自己与王稼祥靠得更近了。此时，她的心中已对王稼祥产生了爱慕之情，只是不敢，也不知道如何表达才好。

过了一段时间，朱仲丽知道王稼祥的病已经好了，总想去看他，又不敢贸然闯入，心里沉甸甸的。一天下班后到了姐姐家。姐姐突然问：“八妹，你和王主任之间的关系有进展吗？”朱仲丽摇了摇头，姐姐禁不住埋怨她说：“他早就态度明朗，可你还装蒜。要不，他会写那么个条子给你姐夫？我带你去时，没有看出他那高兴样子？只可惜那天坐一会儿就告别了，要不是事情多，他一定会留你多谈的。王主任在党内威信很高，人品难得，你常去不会失你的面子。”

朱仲丽终于下决心去看王稼祥了。那天下午，王稼祥正和后方勤务部部长叶季壮等人在他的窑洞里开会。看到朱仲丽站在窑洞门口不敢进来，他既感到意外，又感到高兴，立即向她招手，请她进来，并把她介绍给开会的几位同志。

朱仲丽看到开会的情形，心里有些胆怯，不知是坐下好呢？还是三言两语问问身体情况就走好？王稼祥立刻猜透了她犹豫不决的心理，微笑地说：“朱大夫，你请坐。稍等一等，一会儿就有空儿。”勤务员很快送来了一杯水。那几位开会的同志一听完指示纷纷站起来告别，他们不仅向王稼祥敬礼，又都毕恭毕敬地向朱仲丽敬了礼。朱仲丽“刷”的一下，脸红到脖子上，手足无措地站起来回了礼。她心里明白，这些同志已经对她另眼相看了。

客人走后，王稼祥和朱仲丽开始了第一次“单独会谈”。

“最近，奔赴延安来参加革命的爱国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了。他们历经艰险，献身于抗日救国运动，令人振奋！”王稼祥手中拿着烟斗，只吸了一口，“其中有你们医务界的专家。”

“是的，延安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向往的地方。”朱仲丽回答。

“来的越多越好，这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我们不能搞关门主义，对他们应真诚相见，充分信任他们，放手叫他们工作。”

朱仲丽深深地点头，由衷地拥护他讲的这些话。

“我们党中央对来参加抗日战争的高级知识分子，首先是要信任他们。”他的一双眼睛很有深意地投向朱仲丽：“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没有文化和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当然，也不可能取得全中国的革命胜利。因为，我们面临的敌人，是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是拥有现代化武器的强国。”

“是的！是的！”朱仲丽认真地回答。她当时觉得自己的政治水平不高，不敢妄加评论，对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腹中空空，也谈不出自己的观点。

王稼祥吸一口烟，喝杯茶，又兴奋地谈下去：“我们准备尽最大的努力，给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较好的生活待遇和工作环境，使他们安心工作，发挥特长，为党培训更多的干部。党向他们开着大门，经过考验，欢迎知识分子和专家们入党。”他的口气坚定，表情上充满了信心与热望。

王稼祥说了许多话，一时找不到话题了，朱仲丽也不知说什么好，两人互相看了一眼，朱仲丽红着脸，低下头，不知如何是好。

“我们下盘围棋吧。你会下吗？”王稼祥分明想多留她一会儿，朱仲丽

“下一盘玩玩吧！”王稼祥说。

朱仲丽终于从窘迫中缓过劲来，说：“我从小就学会了下围棋，但下得不好，输了不要笑我。”

王稼祥马上亲切地说：“我也下不好，我输了，你也不要笑话我。”

听了这话，朱仲丽的拘谨完全没有了。她看到王稼祥把装黑子的棋罐拿到自己一边，就调皮地说：“我用黑子，你用白子。”说着动手去拿黑子罐，两双手碰在了一起，朱仲丽的脸更红了。王稼祥则微笑着说：“好！黑先白后，让你先下。”把黑子送到朱仲丽的面前。

他们两个开始集中注意力布棋，窑洞里除了棋子的响声，静悄悄的。警卫员在窗外来回走动几次，不敢闯进来干扰。

朱仲丽找到有利的形势开始进攻。王稼祥一子一子地严密防范着，一时难分难解。电话铃不时响起，王稼祥拿起听筒回答了几个问题后又坐回原处。好不容易一局终了，胜负不悬殊，细数子，王稼祥输了两子。

王稼祥没想到朱仲丽的棋艺不错，看了看表，高兴地说：“来，再下一盘。”这一次朱仲丽输了六子。

两局棋下完，朱仲丽起身告辞了。王稼祥显然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他把仲丽送出窑洞，希望她经常来玩。

从此以后，八妹子经常去找王稼祥了。他们在一起听王稼祥谈革命道路，下围棋，打网球。王稼祥的网球打得很好，朱仲丽甘拜下风。在几个月的交往中，朱仲丽比较深刻地了解了王稼祥。他不善于也不喜欢用甜言蜜语来换取女人的欢心，他为人诚恳、稳重、不夸夸其谈。他的品德、为人、性格都令朱仲丽十分敬佩。王稼祥并未向朱仲丽求婚，他仍在这种接触中注意了解她。

有一次，朱仲丽从王稼祥那里回来，碰上了李富春，李富春问她：“八妹子，你上哪儿去啦？从王家坪回来吧？”

朱仲丽狡黠地说：“不是，是回医院去。”

李富春不放过她，快活地说：“那天，我分明看见你和王主任在王家坪打网球，你们一个发球，一个跑着接球，那个快活样子给我看到了，还瞒着我！可不能忘记请我吃喜酒呀！”朱仲丽急忙辩解道：“哪里呀，还谈不到呢！目前只是网球场上的对手。”

李富春终于忍不住问：“怎么还没有准备结婚？你们都认识快一百天了，别人都等不及了，难道你还要什么条件。”

朱仲丽看他着急的样子，就顽皮地说：“要是王主任把手中香烟戒掉，我就答应他。”

这个玩笑，一下子让好多人知道了。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就逗着朱仲丽说：“你好厉害呀！听说你要王主任戒掉烟才和他结婚！”这个“戒烟”的“逸闻”很快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趣谈，而王稼祥也终于没有戒掉烟。直到朱仲丽与王稼祥结婚以后，李富春见到仲丽仍在打趣她说：“八妹，烟没有戒掉，还是和人家结婚了。”

与王稼祥结识以后，朱仲丽特别感到需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她向组织上提出了入中央党校学习的请求，获得了批准，1938年秋冬之交，朱仲丽就进党校学习了。党校校址离延安较远，全是窑洞。同学们没有课本，只有笔记本，没有教室，在黄土地上席地而坐，以大腿为桌子，抄记者师的讲课内容。一日三餐，由班上值日的同学到伙房去打饭，大家蹲在窑洞里或土坪上，吃得很香。

党校的学员除了学习各种文件，还要到十里以外的山地上开荒，准备来年春天种谷子和栽土豆。自从进了党校，朱仲丽与王稼祥见面的机会减少了，

1939年的新年到来了，学校放了假，朱仲丽立即欢快地跑去看王稼祥。

王稼祥窑洞里的一切，依然如旧，令朱仲丽感到分外亲切。窑洞里烧着一盆红旺旺的炭火，一切都是暖烘烘的。警卫员和秘书见了她都笑盈盈地向她打招呼，王稼祥一眼看见她显得格外高兴。

朱仲丽一进门，看到总参谋长滕代远和总参作战一局局长郭化若正在与王稼祥一起研究事情，急忙退出身子。

“请你到唐秘书房里稍等片刻，可以吗？”王稼祥微笑着说。

“好的，好的。”朱仲丽赶紧答应。

唐秘书随即笑着对她说：“请到我房里坐坐，快了，快谈完了。”他把她引向左侧的窑洞里。

在唐秘书房里，朱仲丽受到热情的接待，唐秘书给她泡了一杯茶，这在当时的延安是一种特殊的待遇。接着他们俩就聊了起来。

朱仲丽看到桌上的俄文书籍，就对唐秘书说：“听说你是从苏联留学回国的，俄文一定好。”当时朱仲丽也想学俄文，因此对精通俄文的人都十分羡慕。

“说得不太好，要说俄文，不论是讲还是写，谁都没有王主任精通。”唐彬诚恳地说。

唐彬也很忙，朱仲丽刚坐下几分钟，他就一连接了三次电话，通讯员又两次送文件来。朱仲丽觉得自己没事坐在这里很不安，就想告辞回去了。

“朱医生，听说你的工作很辛苦。很多同志都说你医道好呢！”唐秘书一放下电话就赶紧接上话茬，显然生怕她起身告辞。

“不，还差得远！”朱仲丽不好意思地摇摇头。

唐秘书又坐了一会儿，看到朱仲丽没有什么话说了，于是急中生智，说：“我的眼睛里总不舒服，常常流泪，也不知什么原因。趁你今天在这儿，给我瞧瞧好吗？”

“让我检查检查。”朱仲丽忙站起来走到他身边，小心翻开他的眼皮，仔细检查，然后又压他的泪囊。“除掉轻度砂眼外，有明显的慢性泪囊炎。”朱仲丽仔细告诉他治疗中的注意事项，并让他去医疗所先取一瓶眼药水用。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了，王稼祥那边仍没有散会的迹象。朱仲丽看看天上的太阳已挂上头顶了，不能再傻等下去了。唐秘书则心里更急，来回走着，放她走也不是，留住她也不是，不知如何办才好。

正在这时，一位勤务员走进来，看了朱仲丽一眼，在唐秘书耳边说了一句悄悄话，便笑着走出去了。

唐秘书也笑开了，轻松地对朱仲丽说：“王主任留你吃中饭。实在对不起，他太忙了，你一定要等着。”

朱仲丽听了这句话，心中感到一阵慰藉，脸上露出羞涩的微笑。她仍然不知道，这一天竟是她一生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

那边的会议结束了，唐秘书立刻把朱仲丽带入王稼祥的窑洞，并且随即转身走了。

王稼祥让朱仲丽在火盆的对面坐下。当时延安取暖的炭盆，是在一尺高、一尺半见方的木架子中，嵌入圆形铁盆，盛着燃烧着的木炭。只有中央高级领导人才有这种生活待遇。

朱仲丽把一双手伸到炭火盆上取暖，心里顿时暖洋洋的，眉梢眼角盛满了爱意。王稼祥深深地注视着打扮得新鲜活泼的朱仲丽，拿起烟斗，装好烟丝，吸了一口，缓缓地说：“真好呀，新年来了，一转眼到了1939年了。你到党校学习忙吗？身体吃得住吗？”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份真诚的关切和爱护。

于从朱仲丽的口中欢快地蹦了出来。因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意味着她和王稼祥更靠近了一步。

王稼祥喜形于色，眉梢高抬，高兴地说：“啊，好！恭喜你！”

朱仲丽感到心中的暖流在激荡，她说：“我还要继续努力！”

“要珍惜在党校这段学习时间。”王稼祥说。

他们小声地谈着，忘记了腹中饥饿。他们谈起了小时候的趣闻，笑语连连，他们都把手伸到了炭火上，目光时时相碰，爱的纽带悄悄地把他们紧紧地绑在了一起。一时间，他们谁也不说话了，千言万语都在不言中，在互相会心的微笑中。王稼祥终于打破了往日的矜持，他情不自禁地握住了朱仲丽伸在炭盆火上的双手，一股爱的热流渗入仲丽的心窝，他们俩都沉浸在爱的幸福中。

他们没有甜言蜜语，没有海誓山盟，爱情的暖流通过两双手在两人的体内奔涌着，在两双眸子的互相对视中升华着。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王稼祥突然紧张地问。第一次求婚来得竟是这样突兀，这样令人狂喜，又是这样的自然。

“为什么这么快？”压抑着满腔的渴望与欣喜，朱仲丽故意反问道，声音中充满了爱情的温柔。

王稼祥的紧张情绪立即松弛下来，他拍拍仲丽的手欣慰地说：“好极了！只要你同意和我结婚，什么时候都可以的。”

尽管他说着什么时候都可以，但却马上放下了仲丽的手走到办公桌边，急切地一页页翻着台历。当然，没有翻过几页，他就回过头来问朱仲丽：“选在正月十五这天，这是农历的元宵佳节，我们在这一天结婚好吗？”

仲丽对他热烈的眼光与问话报以含羞的微笑。

王稼祥走近她的身边，把手放在她的肩上，看着她的双目，欢快地说：“你不做声，那就是不反对。”

爱的激流迅速流遍全身，朱仲丽深深地点了点头。

“好！我今天就给党中央写报告，请求批准。”

这时，勤务员进来摆小圆桌，桌上摆着饭菜：一碗炒鸡蛋，一碗土豆，一碗菜汤，两碗白米饭。这在延安算是丰盛的午餐了。

午餐过后，勤务员进来收碗筷，临走时向朱仲丽投以心领神会的一笑，显然猜到了他们之间已经作出的决策。

元宵佳节很快就到来了。王稼祥与朱仲丽踏上了结婚的圣坛。这一天，王稼祥让他的厨师老陈准备了两桌饭菜——四菜一汤。中央领导同志都来贺喜。毛泽东显得特别高兴，他笑着对朱仲丽说：“当年在长沙，第一次见你，还是小娃娃呀。真快，现在当新娘子了呀！”

王稼祥的婚姻是美满和幸福的。他结束了十多年的单身生活，身边多了一位细心体贴、全心相恋的爱侣。在朱仲丽的精心照料下，王稼祥面孔丰满了，身体壮实了，精神愉快了，他更加生气勃勃地投入了紧张的工作。结婚后，朱仲丽想把自己的消息告诉母亲，但遗憾的是，母亲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而她的女婿又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不能如实地把王稼祥的情况告诉她。于是，朱仲丽给妈妈写了如下的一封信：

亲爱的妈妈：

天天想念您，您老人家身体健康吗？局势如此，使我们不能相见。通信也不方便，向您请安的信也就少了。我们身体很好，您不要悬念。

我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这是您日夜操心于怀的事。我已于正月十五日结婚了。这个日子是吉祥的团圆日子。他姓王，人很好。你听了一定高兴，

天气寒冷，多加保重。
敬叩妈妈。
安康！

八妹子
1939年正月25日

谁知这封信引起了母亲的不满，显然，她对女儿对女婿的简单介绍深感不足。朱仲丽很快收到了母亲的信：

八儿入目：

来信收到，知道你身体很好，思想大有进步，令我高你已结了婚，安慰我于千里之外。只是我不知道女婿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年龄多大？思想意识如何？他系何许人物，你只字不提，如此荒唐，如此大意，将来何能办好大事？望你凡事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草莽从事。

母湘若字
1939年3月×日

后来，直到徐特立从湖南来延安，才告诉仲丽，他已告诉她的母亲关于稼祥的情况。老妈妈十分高兴，喜庆得了一个好女婿。

此后，朱仲丽一直伴随着王稼祥在风风雨雨中度过了35个春秋，他们一起出使苏联，为共和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患难情真，相濡以沫。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因心脏病猝发而溘然长逝。

朱仲丽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悲痛欲绝，我的心碎了。我在悲痛中，忘不了与稼祥共同度过的35年同志加夫妻的生活，也忘不了他那50年的不平凡的战斗经历。稼祥给予我的，是大公无私，是正直和刚毅，是质朴与厚重，是远见卓识的革命情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怀。稼祥给我留下的宝贵精神力量，渗透在每时每刻我的生活中，去泛起生命的绿荫，去奏出美妙的旋律。

彭德怀（1898～1974）原名彭德华。湖南湘潭人。1916年入湘军。1922年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在湘军任营长、团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领导平江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长，红三军团总指挥及军团前委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方军司令员，陕甘支队司令员，红一方面军司令员，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副总司令），中共北方局代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六、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2年初春时节，彭德怀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彭家围子。

家境依然是那样贫寒。早年母亲去世，彭家欠债累累，除留有二三分地种菜外，余均抵押。彭德怀回家时，抵押之地仅赎回及半。大弟在湘潭捻棕绳，二弟在家务农。父亲体弱多病，祖母已82高龄。

彭德怀在家务农，年迈的祖母有一桩久积在胸的心事：要彭德怀成亲。说来也不奇怪。彭家上一代是单传，彭德怀是头生子，这给全家带来了喜悦和欢乐。15岁那年，由于受当地元末农民起义军易华“打富济贫”传说和清太平天国革命故事的影响，彭德怀参加了饥民闹崇，遭到通缉，离家逃走。其后多年在外，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如今，好容易返家了，彭德怀已是24岁的大小伙子，生活的磨炼，铸就了他健壮的身躯和倔强的性格，当祖母的怎能不迫切地希望自己的长孙早日成家。

祖母的心愿，引起了他对往日的痛苦回忆——

彭德怀的舅舅家在乌石峰西麓斑竹塘大年冲。儿时，彭德怀就喜欢翻过苍茫翠绿，宛如刀削的乌石峰，到舅舅家去玩。在那里，有他心爱的表妹瑞莲。

彭德怀与瑞莲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瑞莲家境贫寒。彭德怀的舅舅也很疼爱她，待她甚至比亲女儿还亲。瑞莲对她的表哥——钟伢子（彭德怀的乳名）特别喜欢，钟伢子对瑞莲表妹倍加疼爱。插秧时节，当朝阳从山林间洒下，轻轻沐浴着片片小草时，钟伢子和瑞莲就伴随着山溪流泉，踏着山间弯弯的小径，拎着秧苗，来到田间插秧。收割前的一些日子里，钟伢子少不了要与表妹一道下地锄草，上山砍柴，下塘捉鱼。傍晚，当夕阳刚刚下了地平线，青山绿水变成了金绿色的时候，钟伢子和瑞莲便扛着农具，背着柴草，肩并肩回到家里。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人的爱慕之情逐日加深。

彭德怀平时沉默寡言，见人没有多少话说，甚至在自己的舅舅面前，话也很少。但是，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在表妹跟前，他却常常主动打开话匣子，诉说人世间的平和痛苦，谈论自己的理想和抱负。钟伢子讲到高兴之事，瑞莲便跟着格格地笑；钟伢子讲到悲伤之处，瑞莲也随着掉下眼泪。钟伢子与瑞莲真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啊！

彭德怀参加闹崇的那年，由于官府的通缉，家乡已经呆不住了，瑞莲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偷偷地哭了多日。彭德怀揣上五叔卖猪仔所得的800

做了挑堤工。在那里，他拼命干活，为的是多挣点钱，准备以后迎娶瑞莲。但是，他做了两年半工，至1916年春离开时，仅得三担半米的工钱。无情的现实使他得出一个认识：“所谓洞庭湖区是湖南米仓，就是这些堤工的血汗和骨肉积累起来的”，“而堤工局那些董事等，无一不是剥削堤工来发财的”。

1916年春节前，堤工要求年关预发工钱，彭德怀参加了，被当局认为是“不安分子”而遭驱逐。彭德怀回到了舅舅家，回到了瑞莲的身边。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彭德怀和瑞莲的亲事被正式定了下来。血气方刚的彭德怀不愿意重走祖辈男耕女织的老路，更忍受不了富人对穷人的剥削压迫，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又一次告别表妹，愤而去长沙投军。

阳春三月，伴随着春天的脚步，小草已从土里钻了出来，菜田里的蔬菜绿起来了，桃树、杏树红起来了。离家的那天清晨，瑞莲送钟伢子上路。

他俩肩并肩，走了一程又一程，一句话也说不出。倒是钟伢子先开了口：

“表妹”，他亲切地唤了一声，真挚地说：“我走了，要去找穷人的道理，穷人的出路。这条路很长很长，你能等我吗？”

淳朴、美丽的瑞莲先是埋下头，她咬了咬嘴唇，然后抬起水汪汪的眼睛，望了他一眼，没有吭声。这当口，她打开小包袱，拿出两双鞋袜，鞋底上绣着表示海枯石烂心不变的“同心结”。

他望望同心结，又望望她那双洋溢着深情的眼睛，一切都明白了。

送君千里总有一别啊，他俩要分手了。当钟伢子走了几步回过头来看瑞莲的时候，她仍然站在山头上望着，那双深情的眼睛盯在他的脸上，大声说道：“表哥，你去吧，我不拦你，我永远等着你！”

他报之一笑，旋即迈开大步走了。

他到长沙，投奔了湘军。从此，他虽然天天行军作战，忙于军务，但心里却时刻想念着自己的未婚妻。三年后，他当上了连长，军务更忙，事情更多。尽管如此，瑞莲的身影还是时时在他心中跃动，特别是在梦中，经常闪现着瑞莲亲切的音容笑貌。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打算与瑞莲结婚的1920年，噩耗传来，老实巴交的瑞莲爹，被地主逼债含恨身亡。狠毒的地主仍不肯罢休，还要卖瑞莲抵债。瑞莲至死不从，最后跳了崖，命归九泉。彭德怀得此消息，顿时如五雷轰顶，心肠寸断。他发疯似地跑上一个山头，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家乡的方向，呆呆的，默默的，很久很久没有挪动脚步。他正全力控制着内心的满腔悲愤，他发誓，要把这人间的罪恶和不平彻底铲除！

瑞莲的死，给彭德怀心灵上留下了极大的创伤。此后，有朋友给他介绍对象，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彭德怀回家时，正值泡稻谷种和排红薯种的时节。他和二弟商量立即开荒种红薯，解决秋后吃饭问题，要到舅舅家去挑回红薯种。到舅舅家去，他心情十分沉重，那里是他心爱的表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留下过多少令人难忘的美好记忆，但现在剩下的只有痛苦和忧伤。

第二天，越过几座大山到了舅舅家，时已中午。表兄周云和因参加赶汤督军，被捕枪毙了，妻子小产了，舅妈气死了。孤苦伶仃的舅舅见到钟伢子来了，扑上去抱住外甥，禁不住老泪纵横。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话。舅舅告诉他，云和是怎样被汤萝铭杀害的；瑞莲的不幸遭遇是如何发生的……

当夜，宿在舅舅家。彭德怀望着舅舅那饱经风霜的脸，说：“舅舅，到我家去住吧，家里人多，过日子方便些。”

舅舅坚持说：“现在身体还好，山中柴水也还方便，开了几亩荒地，除交租外，一个人也够吃，再过几年不能劳动时再到你家住。你家现在还穷，

彭德怀告诉舅舅：“要杀财主种田不交租，才能翻身。”

舅舅点点头说：“云和也是这样说的。”

早餐后，彭德怀挑着红薯种，依依不舍地告别舅舅，一步几回头。时节又是阳春三月，小草破土冒芽，桃红柳绿。6年前表妹送哥哥去寻找救穷人的道理，现如今表妹早逝，风物依旧，怎不令人伤悲！彭德怀是个硬汉子，他抹去眼角的泪花，把永世难忘的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挺着胸，平衡了肩上的重担，迎着春风昂首向前走去。

彭德怀回家后，与弟弟忙着开荒种地。祖母再次提出了钟伢子的婚事，彭德怀沉思再三，觉得不能让老人失望，只好应允了。但他对祖母说：“人要是由自己选。”老人答应了他的要求。

离彭家围子半里远，群山环抱之中，有个楠木冲，住着彭德怀的好友刘玉峰。他俩从小在一起拉排子车，后又同在西林围修堤。刘家贫困，两个妹妹给人作童养媳，受尽折磨，早早离开了人世，家中还有一个细妹了。给彭德怀说媒的人很多，他都不同意。有人提到刘家细妹，彭德怀一口答应了，说：“刘玉峰长得挺好，人也好，他的妹子像他，我不看了！”说是不看，因是终身大事，彭德怀忍不住还是相了一下亲，对刘家细妹是满意的。

1922年农历三月初七，彭家把媳妇迎进了门。刘细妹才12岁，不识字。婚后头一年，彭德怀只把她当小妹妹看，教她识字，读书，鼓励她放了脚，又为她取学名为刘坤模，希望她成为一个思想开通的女性。

1922年夏天，湖南陆军讲武堂开始招收学员，从湘军总司令部、各师到湖南各地方镇守使，都纷纷遴选初级军官应考。8月，彭德怀与黄公路等，一起考入讲武堂。一年后，彭德怀从讲武堂毕业，回到湘军二师三旅六团当一营一连的连长。第二年4月，代理一营营长。

彭德怀戎马生涯，颠沛流离，顾不上家，妻子刘坤模留在彭家围子侍奉年老的祖母和病重的父亲。1924年春至1925年春，两位老人先后去世，彭德怀才把她接出来，送她到湘潭女子职业学校读书。

大革命失败后，彭德怀同妻子住在南县官正街44号2楼，刘坤模就学于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五年级，准备下学期报考中学。1928年4月，彭德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他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军五师一团秘密成立了党委，任党委书记。

在一团开赴平江之前，彭德怀让刘坤模暂回乌石老家。自从彭家的老人去世后，刘坤模通常是在彭德怀驻防时来和他相聚，在部队开拔前回家。这次一团调防，对他们夫妻来说，只是寻常的短别罢了。谁也没有料到，不久以后在紧急形势下提前举行的暴动，使他们之间音讯断绝。

10年过去了。其间，彭德怀征战频繁，饮马南北，风餐露宿，顾不上考虑个人问题。

1937年12月，时任由八路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在会议结束之后准备启程回前方的一天，这对离别近10年的夫妇终于重逢了。

在延安城北门的宿舍里，刘坤模泣不成声，诉说着离别后的磨难。当时，彭德怀已立下赫赫战功，闻名中外，国人敬仰。刘坤模是闻讯而找到延安来的。

然而，他们未能重圆。1928年7月彭德怀在平江举行起义后，刘坤模在国民党官府的追查迫害下，经过七年的颠沛流离，无奈与人另组家庭，已经有了一个刚满周岁的女儿。

他等了近十年，她为他经受了多年的困苦，他安慰她：“这些年，你吃苦了咯！”

她没怨他，他又怎能怨她呢？

彭德怀回前方去了。临行，他勉励刘坤模好好学习，追求进步。

几十年后，当彭德怀谈起和刘坤模的这一段往事时，说：“这不能怪我，也不能怪她。”

1938年，彭德怀已到“不惑”之年。40岁的人多半都有几个儿女，而彭德怀却依然是孑然一身。他的老战友、老部下不能不为此着急，也不能不为此给予特别关照。

这年秋天，彭德怀从前方再赴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次中央委员会。会议是在活跃、开朗、民主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次会上，王明受到了批评，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略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取得完全的胜利。中共委员会在上述重大问题上取得新的统一，增强了党的团结。与会者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会场外，彭德怀还另有一番喜气：彭德怀与浦安修喜结良缘。

一天，彭德怀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去。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邀请从前方和大后方回延安开会的几个领导干部在那里聚会，中央组织部的一些青年干部也在座，彭德怀高兴地坐下来，和大家打招呼。

座中一个曾在北平师范大学上学的姑娘似乎引起了彭德怀的注意。她面目清秀，仪态文静，在北平念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21岁的年纪，已经有3年党龄，经历了在北平做党的秘密工作的严峻考验。她就是不久后成为彭德怀妻子的浦安修。彭德怀和浦安修初逢之后，李富春做了他们之间婚姻的介绍人。

关于彭德怀与浦安修的相识，还有另一说，则更为有趣。介绍人是风度翩翩的陈赓大将。

在为彭总婚事操劳的老战友中，最热心、最积极的要算足智多谋而又诙谐幽默的陈赓。他常说：“总不能让彭总当一辈子和尚呀！”于是，他决定毛遂自荐当个红娘。

陈赓这个红娘当得真巧，他不是直接在两者之间去牵红线，而是别出心裁地组织了一场女子排球赛。

赛前，他兴冲冲地去找彭老总：“首长，今天下午咱们机关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场女子排球赛，你是不是去看看！”

“我没时间。”

“关心群众生活嘛，不去，人家会说你架子大。”

陈赓的激将法可真灵验，这一“激”，彭老总果然同意了：“我有么子架子，看就看吧。”

晚饭过后，球场上人头攒动，大家听说是女子排球赛，又是破天荒头一回，而且彭老总还要亲自来看，因而几乎能去的都去了。

球赛中，陈赓顾不得看精彩的球艺，他的眼睛常常盯在彭老总身上，他是在作一种特殊的悉心观察啊！他发现，彭老总对一位戴眼镜的高个子队员颇有兴趣，有时甚至为她打了个好球而喝彩。

球赛结束，在陈赓的精心安排下，彭老总接见了队员们，热情鼓励了一番，并亲自送大家出门。

“怎么样啊？”陈赓趁热打铁。

“什么怎么样？”

“你看哪个女同志好？”

“那个戴眼镜的细高个不错。”

“噢，她叫浦安修，北师大学生。读书期间就入了党，前年投奔延安的，在陕北公学教书，学问，人品，样样都好。”

“我是个介绍人嘛。”

陈赓哈哈大笑，彭老总也笑了。

经陈赓说合，两人才谈起了恋爱。

一天黄昏，他俩来延河边散步。

这时候，绚丽的夕阳，只留下最后一道金光，浮映在烟雾渺茫的西天海角。这一道红艳艳的晚霞，映在延河上，使本来很美的河水更加美丽了。

从延河上吹来的轻风，轻轻地，悄悄地，吹上人面，微微的凉意渗入他俩的心脾。是情人漫步的时候，是倾吐衷肠的日暮。延河畔，彭德怀和浦安修两人正在倾心谈吐。

他俩从西安事变，谈到芦沟桥事变，又从芦沟桥事变，谈到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谈到坚决驱逐日寇出中国，誓死保卫我锦绣河山……不知什么时候，他俩的话锋一转，谈到了自己的身世。彭德怀讲了幼年时期的遭遇，青年时代的坎坷，然后借着皎洁的月色，把亲切的目光投向浦安修，轻声问道：“我是打柴棍子出身的大老粗，能配上你这个大学生吗？”

“不，你首先是人民的大将军。你的英雄业绩，我是十分仰慕的。”

“我命苦，你跟我吃很多苦头的。”

“革命总是要吃苦的，我不怕。”

这样的倾吐有多少次，他们谁也记不清。一次次畅谈，一回回交心，像是最佳的粘合剂，把两颗淳朴、真挚的心，紧紧地粘连在一起了。

不久，在延安的一孔窑洞里，彭德怀和浦安修举行了婚礼。“新房”的陈设十分简陋：一张粗糙的桌子，几把木制的凳子，一副木板床，两床延安土布做的被子，全部结婚用品就是这些了。然而，简朴的窑洞里，却格外热闹。彭德怀的老战友、老部下，浦安修的同事和同学，能来的几乎都来了。滕代远拿出自己一个月的津贴费——5元钱为老战友祝贺新婚。小小的窑洞里，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氛围，荡漾着一片庆贺的欢笑声。

几天后，战争又把彭德怀召回太行。新婚的浦安修也很快去前方，在中共北方局工作，和彭总共度敌后漫长的烽火岁月。

战争的生活十分艰苦，彭德怀和浦安修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彭德怀忙于指挥冀南反扫荡作战，浦安修不愿在丈夫领导的单位工作，想独立地在实际工作中经受锻炼。对此，彭德怀很支持，不要求妻子在身边照顾自己。浦安修只有星期六才抽空与彭德怀团聚，每次看到他和战士们过着一样的生活，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一点也不肯有特殊的照顾。

1939年冬，一个大雪纷飞、寒冷异常的夜晚，彭德怀和浦安修吃过晚饭，围着火炉相向而坐。结婚一年多了，紧张的战斗生活，使他们离多聚少，即使是短短的相聚，也没有时间坐下来谈谈知心话。这天，他们忙里偷闲，拉起了家常。

浦安修先开了口：“战斗生活这么艰苦，你肩负着党和人民赋予的指挥重任，身体不能累垮了，要注意点营养，补补身子。”这些话她憋在心里已经很久了。同志们早已劝过彭总，他就是听不进去，他们谁也没办法，只好转请浦安修劝说。浦安修看着彭德怀那张消瘦的脸，非常心疼，忍不住，终于说出了口。

浦安修话刚出口，马上就有些后悔。她知道，彭德怀是不会听的。果然，他发话了：

“我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我彭德怀是个什么人！不能忘记我为穷人打天下的使命。我怎么能在战士和人民面前搞任何特殊化呢？”

他非常激动，脸都涨红了。他看着炉子里闪动的火焰，心情很不平静，又一次向浦安修讲述起他的家世和青少年时代，那是一个充满了血泪和反抗

的革命者，不仅要打倒军阀、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而且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由按劳分配发展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要实现这一崇高的理想，需要每一个共产党人与人民一道艰苦奋斗，浴血奋战。彭德怀正是这样去做的。

那天晚上，平时寡言少语的彭德怀说了很多。作为一位革命者的妻子，浦安修更加了解了丈夫的为人，对他更增添了一份新的敬意。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极为困难的阶段。5月25日，日军奔袭合围八路军总部及北方局机关。总部和北方局连夜突围。太行清漳河畔，小南山村中，彭德怀的周围只有十几个干部和百余名战士，情况极其危急。彭德怀从容不迫，鼓励战友们：“台塌了不要紧，搭起来再干！”他一面部署部队在敌人的严密搜索下寻找收集失散的突围人员，一面回想着分析着这次敌人奔袭得手的原因。

27日夜，总部和北方局突围人员在小南山村集结。牺牲是惨重的。左权在突围中阵亡，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尚未找到，新华社华北分社社长何云等10余名工作人员牺牲。

彭德怀站在打麦场上点着一个个名字，问：×××，到了吗？×××，到了吗？周围的人一个个回答着。

大家注意到，他没有问到一个人——他的妻子浦安修。她刚刚找到总部，因为过度饥饿疲劳，倒在一个小屋的炕上昏昏睡去，谁也没有发现她。

北方局的部队被冲散了。她那么瘦，一定是牺牲了。大家默默地想，望着彭德怀，心里说不出是难过；还是更为感动。战友们的牺牲，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场里场外，都有人在落泪、抽泣……

事后，当彭德怀见到疲惫不堪的妻子时，终于嘘了一口气，说：“我以为你活不成了呢！彭德怀的老婆，可不能叫敌人抓活的呀！”

华北敌后抗战是一场以军事为中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思想文化的全面战争。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扫荡，使根据地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在一段时间里，抗日军民几乎没有盐吃，没有纸张用，没有布做衣，甚至吃粮也成了问题。彭德怀领导抗日军民展开了一场反封锁、反掠夺的经济战。他自己也和大家一样，生活极端艰苦，甚至连衬衣都没有穿的了。

有一天，浦安修左找右找，找不到一块布料，只好拿彭老总的破蚊帐裁剪了两件衬衣，在灰暗的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缝了起来。小油灯结出了朵朵蕊花，通红的火苗在扑扑地跳动。她的心也像蕊花一样在微微跳荡。她想起了彭德怀英勇无畏的英姿，耿直坦荡的胸怀，平易近人的风范，严于律己的作风，艰苦朴素的品德，她觉得他值得爱，她对他爱得更加真切，爱他爱得更加深沉了！她只用了两个晚上，就把两件“蚊帐”衬衣做好了。她把衬衣送给彭德怀，他笑呵呵地穿了一件，另一件送给了警卫员。

解放战争中，彭德怀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日夜操劳，运筹帷幄，连打胜仗。但他人也更消瘦了，眼皮微肿，周围一圈黑晕。他太疲劳了，浦安修心里深感内疚，觉得没有尽到做妻子的责任，决心留在他身边照料生活。中央批准了她的请求，调她到一野工作。

在彭德怀身边的日日夜夜里，浦安修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为他做可口的饭菜，洗衫浆衣，缝补衣袜。彭德怀对她也是一往情深，相敬如宾。他俩常一起商讨国事，谈论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前途，家里充满了宽松、融洽、和谐的气氛。每当彭德怀的战友来家相访时，他总要郑重地把妻子请出来，和客人见见面。有时有点空闲时间，他还帮妻子做些家务事。他在爱情上，对妻子同样爱得真，爱得深。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彭德怀英勇奋斗，南征北战，为新中国的创立作出

然而，事实并不是都如人愿。

1949年12月，彭德怀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经历了数十年戎马生涯，彭德怀告别硝烟弥漫的战场，开始指挥一场不用枪炮的新战役——恢复和发展西北地区的经济。他们在西安安了一个“家”：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一间小房子，一桌一床，两张椅子，再加上两张大地图。

就是如此简陋的家，他们也没能“享受”几天。彭德怀建设大西北的宏愿刚刚起步，就被发生在朝鲜半岛的激烈战争打断了。随着这场战争的发展和演变，他征衣不解，又不得不奉命率师跨入一场惊心动魄的国际战争风云之中。

战争紧张激烈，彭德怀顾不上给妻子写信。浦安修知道，彭德怀打起仗来不顾一切，常常几天几夜不合眼，也不怪他，但她又是多么思念前线的他啊！

正巧有一次机会。1951年10月中旬，浦安修参加“西北工业参观团”到东北参观。参观即将结束，参观团的领导人习仲勋对浦安修说：“这里离朝鲜很近了，你到朝鲜去看看彭总吧。”浦安修早就听说彭德怀曾因敌机轰炸，几次险些遭难，自然同意。

在组织的安排下，11月中旬的一天，浦安修由沈阳乘火车到安东去朝鲜。北方的冬天来到早，鸭绿江畔的寒流阵阵袭人，浦安修心里却充满了暖意，就要看到日夜思念的亲人了。志愿军司令部接到通知，赶紧向洪学智副司令员报告。洪学智知道彭德怀的脾气，对此事一定会加以阻止，就悄悄地把值班室的几个人找来嘱咐说：“这事要保密，不能让司令员知道。”随后派了一辆吉普车和一个警卫员前往安东迎接。

一进入朝鲜国土，浦安修宛如置身于另一个世界。黑色的夜幕，不断被五光十色的信号弹划破，敌机呼啸，流弹四起。汽车在弹坑累累的公路上急驶，突然一批敌机临空轰炸，司机左转右拐，猛然刹车，浦安修的头撞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前额划破了一大块，鲜血直流。车行一夜，天亮之前终于到达了桧仓志愿军司令部。

早饭时间到了，彭德怀和往常一样，反背着手来到食堂。看到饭桌上多加了几个菜，他感到惊奇，问道：“哟！今天是怎么回事？”

洪学智笑容可掬，道：“这个……今天有个客人要来这吃饭。”

彭德怀更觉奇怪了：“什么客人？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洪学智又笑了笑说：“你们是大熟人。”

正说着乐，头上扎着白纱布的“客人”来了。彭德怀见了一怔，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笑道：“噢，原来是你！”

洪学智和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吃饭中，浦安修望着彭德怀，久久挂念的心得到了安慰。她告诉他，她是顺道来看看的。

看着头上包着纱布的妻子，彭德怀喜悦的心情又增添了一份不安。很快，他又从个人的情感中跳脱出来，严肃地对洪学智说：“很多干部的家属都没有来，司令员的妻子来了，一百万志愿军指战员的家属怎么办！”他又转向浦安修说：“你住两天就回去吧。”

结婚这么多年了，离多合少，好不容易刚刚见面，又催促着尽快离开，浦安修一时觉得颇受委屈，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可是，她不怪他，她理解他，为了伟大祖国的尊严，为了亿万人民的幸福，他不惜牺牲个人的幸福；在他对祖国对人民无限深沉的爱中，她领受到了其中的一份。这就是一对革命者之间的高尚爱情。她为有这样的丈夫而自豪！

1959年的庐山会议，在彭德怀的一生中是一次重大的转折，也给人们留

中，他决心结束他 30 多年的军事生涯，去过一种名副其实的平民生活，举家迁出中南海永福堂，到北京西郊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吴家花园落户。迁家的请求是让妻子浦安修向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提出的。他对妻子说：“我没有工作了，中南海也没有活动的地方，再住会玷污党中央的声誉。”

浦安修深知，彭德怀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更没有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也没有什么“里通外国”同任何外国人合谋在中国搞复辟活动。她心里清楚，所谓“当代吴三桂”之说，完全是无中生有、诬蔑不实之词。因此，她毅然陪伴彭德怀到挂甲屯定居。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内翻土、挖塘、平沟、劳动生产、自食其力。不久，被安排到附近的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当上了一名特殊学员。党校领导杨献珍具体安排彭德怀的学习事宜。本来，杨献珍对大跃进中的错误做法就颇有意见，对彭德怀抱同情态度。很快，杨献珍在接踵而至的“反右倾”运动中被撤了职，也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彭德怀把自己的生活日程安排得紧紧的。浦安修当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吴家花园离北师大较远，她还和战争时代一样，只能平时住学校，星期六回家，陪伴彭德怀。

一天，彭德怀重读了《中共中央第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百思不得其解，自己那封信，怎么会使毛泽东这般震怒呢？向来不在妻子面前谈及中央成员之间事情的彭德怀，此时也忍不住向她一吐心曲：“你说说，我和毛主席也是老战友了，从井冈山以来同生共死 30 多年，这次无非是提了意见，为什么这样算帐，这样斗争？”

浦安修只有用眼泪来回答。从庐山风云突变之后，她也深深陷入在悲伤和痛苦之中。从大学时代入党以来，她勤奋为党工作，并不因为是彭德怀的妻子而稍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她生活极其俭朴，与彭德怀志同道合。她善良忠诚，对党和毛泽东抱有十分崇敬的心情。她答复不了彭德怀的问题，甚至害怕他提出的问题。她只有埋怨彭德怀：“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要去管经济上的事情呢？”

彭德怀有时默默地、有时又不耐烦地听着她的抽泣与埋怨。其实，他内心十分不安。他很感激妻子，和他一起在华北敌后度过了一般人难以想像的艰苦和危险的岁月。彭德怀常对她讲：“你跟我吃了这么多苦，从来没有埋怨我半句，我要感谢你。”浦安修总是不在意地回答：“我为什么要怪你呢？那要怪敌人。”

但是，现在她不断埋怨他，使他的心情更为烦躁。有时大声说，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应该说说？有时又把庐山会议算他老帐的那些问题，向妻子来说明原委。

浦安修又陷入了一种新的矛盾和恐惧之中。毛主席说彭德怀和他只有三分合作。在绝对敬爱的领袖和一贯信赖的丈夫之间，她应当相信谁呢？回到吴家花园，彭德怀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向她解释；回到学校，党委开会又要她汇报思想，揭发彭德怀的言行，她精神高度紧张，她知道，彭德怀所谈与毛主席之间的历史关系，一旦由她的口说出，其后果会不堪设想。

因此，她只有在家少问少听，劝他认错，责备他骄傲：“难道那么多领导同志都错了，就你是对的？”

彭德怀也生了气：“你懂什么？就你怕事！”

不可避免的是，20 年相敬相爱的夫妻出现了争吵，盼了一周的团聚，常常又不欢而散。她希望彭德怀通过学习反省作检讨；彭德怀却越学习越坚持自己的看法，对形势忧心不已。

别平反，连杨献珍这样和彭德怀密切相关的“重要反党分子”都翻案了，然而“所有人都可平反，唯彭德怀不能平反”。

彭德怀拍案而起，怒不可遏，他又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司机鼓起勇气劝他，彭德怀把手一扬：“杀头都不要紧，但事情要弄清楚！”

浦安修星期六回家，他把写的信给她看，有时给她进一步解释其中的内容。浦安修默默地听着，一边看他写的信，有时给他校改几个错漏字。

6月中旬，这封长达8万余字的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信终于写完，并呈送上去。与彭德怀要洗雪莫须有的罪名的愿望相反，他的“旧帐”升级，“新帐”再添。吴家花园门口的岗哨突然加重，荷枪实弹，高度戒备。彭德怀不再收到中央发来的文件或通知。

彭德怀夫妇再次忍受着更为巨大的精神压迫和痛苦。彭德怀不愿意妻子受到牵连，浦安修不愿意让彭德怀再多分心惦记她，只是他们各自心中想的谁都没说出口。最后，他们决定“分手”。

老友杨献珍得知此事，坚持反对他们“取此下策”。彭德怀苦笑一下，回答说：“这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取此下策。”

正式“分手”的那一天，彭德怀特意挑选了一个大大的梨，亲手把皮削得干干净净，亲手切成匀称的两半，放在一个盘子里，顺手推给了浦安修。

浦安修泪如雨下，抓起一半梨来。

杨献珍老眼含泪，急着喊道：“安修，不要吃梨！不要离婚！到你受更深株连的时候，离婚不离婚都一个样。”

浦安修看看杨老，又瞧瞧彭德怀，然后盯着抓在自己手中的那半个梨，狠了狠心，和着泪水吃光了。她哭诉道：“你们的话都在撕绞我的心肺，我的脑壳都要炸了，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场面了……”

彭德怀抓起剩下的那半个梨，使劲丢进了字纸篓……

“史无前例”的“文革”，一代民族精英、人民的大将军彭德怀又被揪上了批斗台，遭受到非人的肆意凌辱。彭德怀不甘受辱，强直着头，但无休止的批斗、谩骂、摧残，使他的身心受到了更为严重的伤害。

浦安修的命运同样悲惨。她原是北师大党委副书记，属“当权派”之列；而最紧要的，即便她与彭德怀“分手”，她也是彭德怀的妻子，是“造反派”的大目标。家被抄，人进了“专政队”，白天劳动，夜晚也不得好好休息。

难忘的是1967年8月11日下午。

浦安修被一伙红卫兵押到校内教学楼前，骤然间，她从人群中看到一个人，被押在三轮车上，纵然是衣貌全非，她也一眼就认出了他，一别两年的彭德怀。彭德怀也看到了她。四目相视，都痛苦地低下头。

当晚7点半，彭德怀和浦安修被拉上了会台，“批判斗争反党篡军的大野心家彭德怀和彭贼的臭妖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浦安修”万人大会，由北师大造反组织“井冈山兵团”主持，在一片“打倒”、“脚踏”声中开始了。

浦安修被两条粗臂反提着胳膊，两只大掌猛按着头，做成“喷气式”。耳里灌进一连串彭德怀的骇人听闻的“罪行”，以及她和彭德怀“狼狈为奸”的“罪状”。这场批斗大会，成为他们30年夫妻的最后一面。

浦安修被传去勒令交待彭德怀的罪行。一向温和文静的浦安修，这时顽强地闭口不答。当时出版的红卫兵《大批判通讯》上，登载过对浦安修审讯的记录按语：“时至今日，浦妖婆拒不揭发彭贼，企图顽抗到底，还千方百计地为彭贼涂脂抹粉。”于是，“专政”便落到了浦安修的身上，造反派怒吼着：“再不交代，就砸烂你的狗头！”8月31日晨7点，北京颐和园的大门徐徐打开，浦安修低头匆匆而入。两个小时后，人们发现了她，她静静地

医院，半夜，她清醒过来了，她又回到了这多难的人世。一天后，她又被押回学校管制。北师大批斗会后，彭德怀因精神受重大刺激，右半身麻木。其后，直到 1974 年 11 月逝世，残酷的“批斗”就没有停止过。他终于走了，身边没有亲人，没有同志。他把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他把全部的父爱给予了革命的后代。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平了反。沉冤昭雪，正义伸张。12 月 24 日，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彭德怀同志的追悼大会，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悼词。

彭德怀的老友杨献珍从“流放地”回到北京，正赶上中央为彭德怀平反。追悼会之后，浦安修到北京医院看望杨老，终于说出了当年“分梨”时的心里话：

“您是我最敬重的长辈，我吃梨，我是、我是、我是为了让德怀真的以为我绝情了，从此再也不惦记我了，他的精神痛苦太深了……”

浦安修泣不成声。

彭德怀在天之灵，安息吧！

刘伯承（1892～1986）四川开县人。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战争中，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暂编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后留学苏联。1930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中央援西军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6年10月，秋风阵阵，秋雨绵绵。中国大地上空，一颗巨星陨落，刘伯承元帅与世长辞了！他走了，汪荣华悲痛欲绝！几十年并肩战斗，几十年夫妻精深，化作一篇《送伯承远行》的祭文，遥寄亲人的在天之灵——

伯承，你走了，无论我怎样挽留，你还是走了！

此刻，夜已经很深。窗外，秋风瑟瑟，秋雨潇潇。我独自坐在室内，面对着你的照片，浑身上下感到清冷。我想听你说话，听你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对我说学习，说工作，说儿女们，说你自己想说又认为该说的话……可你只是看着我，一句话也不说。

对于和你的分别，我是习惯的。我们结婚后到达延安不久，你就离开正在抗大学习的我，随周恩来同志飞往西安，接着，奉命组织援西军。后来，又出任一二九师师长，率部奔赴抗日前线。在那战火连绵的年代里，我们总是分别的时日多，相聚的机会少。即使和你在一起，你也是时而下部队，时而到前沿，常常说一声“我走了”，便牵上骡子匆匆而去，短则几天，长则几十天才风尘仆仆地回到住处，一身硝烟，一身汗湿。

1942年5月大“扫荡”前的一天，你骑着马来到我身边，抚摸着怀中抱着的女儿，缓慢地说：“荣华，这次日军‘扫荡’规模大，很残酷。你还是把孩子托到老乡家，赶快回部队去，不然你和孩子都有危险！”我听你的话这样做了，临行前对你说：“你也要多加小心啊！”你却毫不在乎地笑了：“自打从军时起，我就作好了准备，路死路埋，沟死沟埋，狗吃了得个肉棺材。这样反而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你不要担心。”说完骑上马就走了……

那时，每一次分别，我都笑着为你送行，笑着对你嘱咐的。你不喜欢流泪。可是这一次你走时我哭了，哭得很厉害。回为你永远地走了，永远地离开了你为之奋斗的党、军队和人民，永远地离开了你热爱的我和儿女们。从今以后，除了你的名字，你的照片，你的业绩，我再也见不到你和蔼的面孔和高大的身躯了！

然而，你的形象，时时在我的眼前，在我的心中。这是五十多年前就开始了的啊！

那是 1935 年 4 月，红四方面军经过 20 多天的苦战，胜利渡过嘉陵江，打乱了敌人“川陕会剿”计划，取得了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胜利。但是，张国焘却坚持右倾逃跑路线，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而且借口“坚壁清野”，强令部队和省委机关在撤离时将沿途房屋和资财统统烧毁，搞得群众携儿带女无家可归。

目睹惨状，汪荣华和许多指战员都感到非常气愤。无奈，她只好跟上部队，再次踏上西去的征途。此一去，她不知何处才是归宿？红军的前途在哪里？

突然，喜讯传来，党中央、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就要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了！

6 月的一天，川西小镇杂谷垭街旁的墙壁上，贴出了一幅宣传画，上面画着两位高大的红军战士，正在热情握手。它象征着红一、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表达了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日夜盼望中央红军到来的心情。人们都在谈论着会师的喜讯。

来了！来了！党中央派出的代表团慰问大家来了。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夹道欢迎代表团的到来。整个山寨都沸腾了。

夹在欢迎队伍中的汪荣华，早就听人说过，中央红军里有个军事家叫刘伯承，他在中央红军后有十万追兵，前有金沙江水的千钧一发之际，巧妙地使红军顺利地渡过金沙江，甩掉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曾风趣地赞扬道：“伯承同志，你真是一条龙啊！”

代表团由十几人组成，其中有两位最引人注目，一位头发斑白、颇具学者风度；一位戴着圆框眼镜、富有军人气质。

汪荣华怀着好奇的心情询问身边的参谋陈明义。

“你不认识吗？头发斑白的是林伯渠同志，戴着眼镜的是刘伯承同志。”陈明义回答道。

汪荣华十分激动，久已闻名的刘伯承突然就出现在自己的眼前，她注意观察了起来——

高高的个头，穿着与战士没有什么两样，显得是那么的平常。但就在这平常的装束中，更透露出军人的威武，一个军事家的沉稳。

当刘伯承从汪荣华身边走过时，她以一个战士对具有崇高威望的红军领袖的崇敬和爱戴的心情，特别留心地看着。

这是汪荣华第一次见到刘伯承，并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 月 4 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决定全部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率领，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这时汪荣华因工作需要，已被调到总参谋部四局工作。在刘伯承的身边，他们见面的机会多了。

当部队北上至阿坝地区时，张国焘仍然坚持其错误的路线，竟然打电报给党中央，要右路军全部南下。中央几次电催，指出北上才是出路，但张国焘全然不听，公开分裂党，分裂红军，擅自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属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再过草地、翻雪山，向川康边境退却。在卓木碉，张国焘公然叛党，宣布成立伪中央，自任主席，并明目张胆地要朱德、刘伯承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北上。朱德、刘伯承严词拒绝，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张国焘气急败坏，将刘伯承软禁了起来，并擅自撤销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令其改任红军大学校长，实际上只是一个军事教员。在斗争激烈时，刘伯承曾被批判了三天三夜，但他始终毫不妥协。经过朱德、刘伯承和指战员的斗争，加上张国焘在敌人进攻面前多次碰壁失利，他不得不被迫解散了伪中央，同二方面军会师后，再次北上。

承了。

时间过去了一年。这期间，刘伯承和汪荣华等同志经常在一起行军。在第二次过草地时，汪荣华掉队了。刘伯承看到她行走困难，要把自己的马让她骑，汪荣华怀着感激之情谢却了，但她在首长的关怀和鼓舞下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一轮明月挂在草地的上空，照得一片片水洼闪闪发光。参谋陈明义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警卫员黄兴正以天作被，以草作毯，背靠背地躺着。

突然，小黄转身悄悄地对陈参谋说：“今天，我送了一封特殊的信。”

“什么特殊的信呀？你快说说！”陈参谋也侧转身来，好奇地催着小黄细说。

小黄说：“宿营后，刘总处理完公事，就磨了一盘浓墨，提笔工工整整地写起来。蝇头小字一连写了好几页纸。然后叠好，装进信封里，把我叫到跟前，嘱咐我一定当面交给汪荣华同志。你说，这是不是一封特殊的信？”陈参谋接上一句：“那也不见得有什么特殊。”

“你听我说呀。我立郎跑步送给了汪荣华同志，她拆信看完，脸都红了。”说到这里，小黄又躺在草地上，再不吱声了。

陈参谋又问：“她回信了没有？”

小黄从鼻孔里哼着说：“没有。”说完，就呼呼入睡了。

陈明义却没有立即入睡。他非常希望汪荣华能尽快地给刘伯承总参谋长一个满意的答复。是呀，张国焘虽然被迫同意北上，但他还在想方设法排斥、打击刘伯承同志。一个处在领导地位的同志，在逆境中同样也需要同志、朋友、亲人的支持和安慰啊！陈明义热切地等待着他俩之间的喜讯，默默地为他们祝福。

其实，刘伯承也在默默地等待着汪荣华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茫茫草地终于第二次过完了。8月的一天，刘伯承提出了到二方面军工作的要求，张国焘勉强同意了。于是，汪荣华随同刘伯承来到了山青水秀的甘肃成县境内。

一天傍晚，彩霞满天。刘伯承的警卫员高兴地来向陈明义报喜讯：“她同意了！他俩正在那边谈心呢！”

曲子镇边的清源河畔，刘伯承和汪荣华正在河边并肩散步。

汪荣华自打接到伯承的求爱信，心情很是复杂。是激动？是幸福？是羞怯？她自己一时也说不清楚。行军途中，她常听人讲，早年在讨袁作战中，刘伯承右眼负伤，在无麻药的情况下，接受医治，被德国大夫称为“军神”；他精通兵法，能征善战，指挥若定，战功卓著；他勤奋好学，知识渊博，虚怀若谷，品德高尚。自己与他一年多的接触交往中，汪荣华越发感到刘伯承的诚实质朴，光明磊落。她庆幸如今能遇上这么一位知己和良师，心里有一种无可名状的安全感和可靠感。真同他结成终生伴侣，能说不是自己的幸运和幸福吗？

但是，汪荣华也有顾虑。自己仅是一个年仅19岁的普通农家女儿，只读过一年私塾、上过两年洋学堂，文比程度不高，参加革命他才5年，东西转移，南征北战，打过仗，做过不少革命工作，但与刘伯承比较起来，不论学识和资历就都相差很远了，这能合适吗？

今天，他们第一次约会。汪荣华含着羞，把这些心里话掏了出来。刘伯承听了，朗声笑道：“这有啥子关系嘛！我家也是穷苦农民，祖父还当过吹鼓手。为此，我考秀才还被县官赶出了考场。正因为我们穷，才出来革命，才走到一起来了。文化水平低一些，可以学嘛。你自己努力，我尽力帮助。”

散步时，他们还谈到了和张国焘的斗争。刘伯承说：“张国焘这个人，为了征服我，对我是软硬兼施。软的时候，他可以流着眼泪给你说好话；硬的时候，他可以威胁要挟，咄咄逼人，甚至扬言：‘我要不看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就把你杀了！’我才不怕他那一套哩！”

汪荣华对张国焘的所作所为也深有感触，痛恨张国焘的阴险狠毒，称王称霸。

二人散步归来，汪荣华关切地对刘伯承说：“你眼睛不好，还写那么小的字，多费眼啊！”

刘伯承诚恳而又风趣地说：“生平第一次写这样的信，你说，能不认真严肃吗？”

说完，朗声大笑了起来，汪荣华一下子红了脸。霞光与河水交相辉映。这对长征途中的革命恋人肩并肩向前走着，心里充满了喜悦和甜蜜……

中秋佳节，花好月圆。刘伯承和汪荣华在曲子镇结婚了。

婚礼极为简朴。没有丰盛的酒宴，只有战友们的祝愿；没有崭新的被褥，只有跟他们爬雪山、过草地的简单行李；没有红烛新房，只是油灯草屋。刘伯承对汪荣华深情地说：“我们的结合是自由恋爱。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志同道合，就能永远战斗生活在一起，白头到老！”他们在经历了人间罕见的艰难困苦后结了婚，那幸福是特别不寻常的。

婚后不久，党中央就从陕北来电，要刘伯承去保安，接受新的任务。周恩来还特意派一个工兵连和一个骑兵班，朝二、四方面军北上的方向，接应刘伯承。

刘伯承和汪荣华已先干部队上路了，随行的仅有很少几个人，部队在后面跟进。

有一天，突然敌机袭击而来。一架敌机从他们头上呼啸而过，扔下一枚炸弹。他们刚刚卧倒，“轰”的一声，炸弹就在他们身边爆炸了。汪荣华抖掉身上的泥土，抬起头来，睁大眼睛，寻找刘伯承。透过烟尘，她发现刘伯承身上有血，急忙过去为他包扎伤口，同时叫警卫员赶快去找马和担架。

刘伯承看着汪荣华着急的样子，微笑着安慰道：“莫急嘛！负点伤有啥子要紧！打仗哪有不流血的。”

汪荣华顾不上说话，等包好刘伯承的伤口，才粗粗喘了口气，站了起来。哪知尚未立稳，她马上感觉到腿上一阵刺痛，原来她腿上也挂了花，只顾了刘伯承，自己受了伤却没觉察。

刘伯承心疼地赶忙招呼汪荣华坐下，急切地催促、协助她包扎好伤口。二人不约而同地抬起头，四目相视，会心地笑了起来。两人相互搀扶着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前进，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脸上滚下来。后来，警卫员找到了马和担架，刘伯承上了担架，汪荣华上了马，大家又继续向前行进。

深秋季节，天气已经很凉了。连续的长途行军，使他们感到十分疲惫，他们仍然坚持着，不肯停息，盼望着早日到达目的地。数日过去了，待到工兵连和骑兵班在会宁东南找到他们的时候，刘伯承和汪荣华已可以自己缓慢步行了。

在中央再次派出的中央警卫团骑兵连的迎接和保护下，刘伯承和汪荣华到达了保安，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大家都向这对在万里长征途中结为革命伴侣的新婚夫妇表示热烈的祝贺。

在随后的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不论是枪林弹雨，烽火硝烟，还是风暴雷霆，云遮雾漫，他们同欢乐，共患难。刘伯承健康的时候，他们相互勉励，为党和人民工作，在新长征的路途中继续并肩前进；当刘伯承生病时，汪荣华则怀着诚挚的感情，煎药喂饭，洗涮更衣。他们可谓“永远战斗在一

她哭了，哭得是那样悲伤。她遵照丈夫要永远同人民群众在一起的遗嘱，把他的骨灰撒到了太行山、大别山、淮海战场、南京和大西南，让他的忠魂与养育他的大地和人民，与他指挥千军万马战斗的地方，与长眠在那里的无数烈士，永远在一起，永远在一起！

这是多么伟大宽阔的无产阶级胸怀！汪荣华欣慰地告诉丈夫

伯承，你走了，永远地走了！我无法躲避开面对着的这个难以补偿的残酷现实。虽然，你没有像以往无数次分别时那样，对我谆谆地说过什么，但我心里明白，你留给给我的是什么，更明白，我在送你远行的悲痛之余，应该多做些什么……

安息吧，伯承！

陈毅(1901~1972)字仲弘,四川省乐至县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南昌起义部队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二师党代表、师长,红四军军委书记、军政治部主任,红六军、红三军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

—

张茜祖居湖北省汉阳县城(今武汉市汉阳区)。她出生时,正是兰花盛开的季节,母亲便给女儿取乳名“春兰”。1929年,春兰已满7岁,在汉口一所小学就读,母亲给她取名“掌珠”。以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女子中学。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年仅13岁的掌珠满怀爱国激情,积极投入了汉口的学生运动。

1937年,掌珠考取了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七·七”事变爆发,她积极响应周恩来、邓颖超的号召,经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介绍,于1938年春赴江西南昌,参加了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这年她才16岁。参军后,她改名为“张茜”。从此,“春兰”、“掌珠”只有她的亲人才这样称呼她。张茜参军后,被分配到战地服务团戏剧、音乐组。她经常在军部驻地及前线为战士们演出。她的演技日臻出众,歌喉婉转动人,加上容貌俊美,活泼聪颖,在演出《雷雨》(饰四凤)和《魔窟》(饰小白菜)等剧后,轰动了军部。

抗日战争初期,陈毅是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司令部驻扎在苏南溧阳县茅山根据地的水西村。他时常要到军部来开会。有一次,他在军部开会时,晚上观看了战地服务团的演出。张茜在话剧《一年间》中扮演一位飞行员的新娘子,她的表演甜美俊逸,感情逼真,给观众带来了很大的艺术享受,也深深打动了司令员陈毅的心。

陈毅的心中总是晃动着那个飞行员的新娘子的影子,挥之不去。于是,他终于忍不住跑到云岭找他的老朋友——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聊天。陈毅转弯抹角地提出,要朱克靖分派一些战地服务团的团员到一支队游击区去做战地服务工作,鼓舞士气。朱克靖十分赞同这个主张,答应向军部请示后,即可派一个小分队去。正事谈完了,陈毅仍没有要走的意思,朱克靖就提议到团里参观参观。陈毅欣然同意。

他们在团里遇到了去小溪边洗衣回来的张茜。朱克靖给他们介绍时,陈毅已亲切地宣称:“这就是那天晚上扮演新娘子的小鬼嘛!”张茜立即“抗议”说:“我不叫小鬼,我有名有姓哩!……”

陈毅立刻表示歉意说:“啊,真对不起!但你可知道,‘小鬼’可是我们革命队伍里的爱称哦!我知道你叫张茜同志,这是你原来的名字吗?”

张茜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童年时的乳名叫春兰。”

张茜有点害羞地点点头，就匆匆跑走了。

在一旁细心观察的朱克靖一眼就看穿了陈毅的心事。她试探地对陈毅说：“仲弘，你从大革命失败后，在井冈山打了十年的游击战争，如今已到三十而立的年龄，你也该考虑成个家了吧！”

“哎哟，同志哥，‘匈奴未灭，何以为家’啊！”陈毅故意摇着头这样说。

朱克靖却不想再跟他转圈子了，直截了当地说：“你看小张怎么样？”

“可以试试交往一下。”陈毅一听提到张茜后，再也不敢儿戏，认真地答应下来。

朱克靖与张茜谈话的结果，却出乎这位热心媒人的意外。张茜既不点头，也不摇头，来了个三问不开口。朱克靖不知道这个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好在事后向张茜的亲密战友打听张茜的意思。

原来，张茜对这件事有两点顾虑：第一，虽然年岁差别较大，但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是考虑到我自己和陈毅同志之间差距太大，陈毅同志才华横溢，文武双全，而我才疏学浅，如果和他结合起来，将来我就是天天跑步，紧紧追赶，恐怕也难学到他十分之一的学识。第二，服务团内外那么多人都想和我好，而我主要是想到自己参军不久，受锻炼较少，同时年龄也不大，所以对谁也没有那份心意，而现在偏偏选上了一位首长，岂不是有高攀的嫌疑？！

朱克靖针对张茜的思想，作了许多说服的工作，但倔强的张茜就是不松口。于是，张茜与陈毅的事就这样拖了下来。

二

1939年冬天，朱克靖为了使陈毅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张茜，在安排去一支队演出的队员时，把张茜作为主要演员调去了。

陈毅得知张茜即将来支队演出的消息后，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就要见到自己心中想念的人了；担心的是张茜会再一次拒绝与他交往。

张茜随演出队来到一支队以后，就碰上了借服装的事。要演出的剧中人里有一个相当于司令员身份的我军首长，领队同志指名要张茜去向陈毅司令员借。张茜当时心里挺别扭，为什么偏偏要我去借？但她自入伍后一贯组织纪律性都很强，那能为这件小小的借服装问题而不服从领导决定呢？结果还是硬着头皮去了陈毅那里。

“报告！”

“进来。”陈毅在里面应道。当他看到进来的是张茜时，真是喜出望外，立即站起来说：“啊，原来是在云岭见过的老朋友！”

陈毅热情地为张茜搬来凳子、倒茶，原由警卫员做的事情，他都自己做了。

张茜却拿出一副公事公办的神情，说明了来意。陈毅一听，立即爽朗地说：“要什么样的？我身上这一套可以吗？”说着就把衣服脱下来交给了张茜。

张茜拿起衣服走了。陈毅猛然想起，衣服里还有一样“秘密”没有取出来，急出了一头汗。

原来，陈毅也是刚从前线回来，听说服务团的演出小分队已到了一支队，不由地就想起了张茜，随手就在办公桌上挥诗一首。刚刚写完，尚未来得及仔细推敲，秘书送来一份文件，陈毅就把写好的诗往衣袋里一塞，看起文件来了。现在衣服被张茜拿走了，要是发现了那首诗……

的影响，让警卫员追回衣服，又怕伤了张茜感情的时候，机要员小高又送来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电报报告了日寇分几路向茅山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消息。陈毅再也没有时间考虑诗的问题了，他立即召集一支队副司令员、政治部主任一起商量如何打破敌人扫荡的问题。

陈毅没有参加服务团小分队于当晚组织的文艺晚会。张茜在演出结束后开始整理服装。她发现陈毅的上衣口袋里有“文件”，担心搞丢了，遂将那张纸掏了出来，展开一看，上面竟然写着“赞春兰”三个大字，下面是四句写得整整齐齐的诗，字迹十分潇洒、漂亮。张茜大大地吓了一跳，急忙把诗藏到自己的口袋里，生怕被别人看见。

等到躲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张茜才带着怦怦的心跳，小心翼翼地把那张皱巴巴的纸理开来，一遍又一遍地读了起来：

小箭含胎初出岗，
似是欲绽蕊露黄。
娇颜高雅世难觅，
万紫千红妒幽香。

张茜读着读着，眼睛似乎有些模糊了，泪花在眼眶里打着转。她心里想着：一个人能得到别人如此真挚可贵的爱情，难道还不应该知足吗？我却还在维护着自己所谓的“自尊”，太对不起陈毅同志的一番情谊了。当天晚上，张茜在床上辗转反侧，几乎彻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张茜就去陈毅的住处还衣服。当听到陈毅在里面说着“请进来吧”，张茜带着一副羞答答又含情脉脉的表情走了进去。她把衣服还给陈毅后，默默地坐在那里，欲言又止。

陈毅深情地注视着她，发现她的眼圈有点儿发黑，心疼地说：“你是不是太累了，昨晚演出搞得太晚了吧？”说着就将自己的茶杯装满一杯水，轻轻地放到张茜的面前。

张茜喝完了水，站起来轻声地说：“我走了。”但仍站在那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陈毅感觉到张茜的态度不同于往常，感到了张茜对他的期待。于是他走向前去，深情地对张茜说：“我一两天内就要到前线部队去了，你们两三个星期后也要到别的支队去，也许我回来时你们已离开了，见不到你，我会想念你的。”

“啊，是吗？你要去多久？”张茜的声音里明显地充满了失望与关切。

“难说，看战局发展而定，也许个把月，也许更长一些时间。来日方长呢！我一定给你写信，你也可以给我写信嘛！”

张茜没说话，当她走到门口时，陈毅握起了她的手，她也抬起头，深情地注视着陈毅，默默地连连点头。就这样，他们在对方的心里都播下了爱情的种子。

即将上前线的陈毅，感到浑身是劲，喜气洋洋。他给还在云岭的媒人朱克请写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信尾俏皮地写道：“……事情百分之九十九是‘大局已定’了”。

陈毅和张茜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鱼雁传书，后来，张茜被派往一支队工作。1940年1月的一个晚上，一支队司令部里响起了热闹的玩笑声、祝贺声和碰杯声，陈毅与张茜结婚了。等客人们走后，陈毅拥着自己的新娘子轻声问：“春兰，我觉得很满足，很幸福，你呢？”

“你哪里知道，我早就爱上你了，很爱你，可我又总是苦苦地觉得自己

“看，你又来了，从此以后，我不许你再说这些，不许说！”他紧紧地拥抱着她，热烈地、深情地吻着她……

三

婚后，陈毅便奉命渡江北上，第一仗就是在江苏泰兴以东黄桥附近打响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桥之战”。张茜和政治部的其他几位同志也参加了这一战斗。

1940年1月4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后，陈毅被任命为新四军代军长。在新四军军部成立大会上，陈毅热泪盈眶地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会后，张茜写了一首满怀激情的诗：

茂林四落碧血溅，千万人群泪涟涟。
君曾劝妻莫啼哭，今却当众热泪挥。
见君挥泪添伤悲，悲中添泪入骨髓。
君之壮志与誓言，踏破山河也相随。

新四军军部成立后，张茜到刚刚成立的抗日军政大学华中分校（五分校）任宣传干事，后调华中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新四军卫生部任政治指导员。1942年5月，张茜和陈毅的第一个孩子小侗（陈昊苏）出世了。这时，张茜还不满20岁。为了照顾好孩子，张茜只得忍痛暂时离开了自己的工作。不久，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丹淮也出世了，年轻的妈妈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43年11月，陈毅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张茜仍留在华中敌后。陈毅一路艰险，经由淮北、鲁南，昼赧夜行，穿插敌防，登太行山，西行阻雪，倏忽之间，已是次年二月了。在途中，陈毅思念张茜，写下了动人的诗篇：

地冻天寒西北行，山川遥共客心深。
最是荒村风雪夜，思君吟咏到天明。

张茜在艰难的处境中，全力抚育两个孩子，在精神与体力的双重付出下，竟开始了自学英语。没有远大的抱负，没有坚韧的毅力，这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刻苦自励、好学不倦的精神使陈毅十分欣慰并引以自豪。张茜毕生实践着自己“从头学起，努力做到基本相称”的誓言。

陈毅和张茜一别就是两年。当时邮电不通，音讯阻隔。张茜被分配到离家20华里的华中建设大学财经系任政治干事。为了照顾孩子，每到星期六，张茜总是拎着包步行回家。往返途中，她思念远在延安的亲人，百感交集，把无限深情都写进了《寄怀》一诗中：

鸣声凄凄孤蝉哀，情思郁郁人伤怀。
行云慵步回苍穹，游子久留羁旅中。
空向行云凝眸处，望穿秋水人不至。
几番报归盼欢聚，儿番又传归期误。
一别春夏已两度，幼儿成长双询父。

1946年7月，华东地区战云密布。张茜生下了第三个孩子——小鲁。她

整时间，夫妻才有短暂的相聚。1949年夏上海解放后，陈毅担任了上海市长，张茜带着3个孩子到上海与陈毅会合，这才结束了他们结婚后离多聚少的生活。

建国初期，张茜在上海俄文专科学校任宣教股长。为了提高自己的俄文水平，她顾不上照顾出生不久的女儿珊珊，于1951年初离职到北京太平湖俄文专修学校学习。在学习期间，她置多病的身体于不顾（张茜曾患有肺结核病），刻苦用功，终于较熟练地掌握了俄语。

1954年冬，陈毅调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张茜随同去京，先后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任编译工作。她以“耿星”的笔名，翻译出版了前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奇的小说集《沙原》和李昂诺夫的多幕剧本《平平常常的人》。

陈毅与张茜都是一生好学，对知识孜孜以求的人。他们在精神上的交流极为和谐。镌刻在张茜使用的铜砚上的铭文，正是这种和谐的精神交往的产物：

满招损，谦受益，莫伸手。终日乾乾，
自强不息。为了工作，必须休息。

铭文由张茜拟制，但其构思显然可以从陈毅《感事书怀》的诗篇中获得感应，而“终日乾乾，自强不息”更是他们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陈毅亲笔书写了这则砚铭。

四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陈毅受到了“四人帮”的打击与迫害。1969年10月，陈毅在“一号命令”下达以后，被疏散到石家庄。在石家庄，以往所享有的一切待遇均取消了。张茜自己动手煮饭，洗衣，在生活上悉心照料陈毅。此时陈毅虽感觉身体不适，但保健措施已完全撤消。张茜在去一家制药厂下放劳动的几个月中，凭着自己的聪颖好学，居然在药物学方面有了很大的长进。

陈毅的腹痛一天天加剧，张茜忧心如焚，考虑再三，写信向周总理报告了病情。这样，在流放一年后，张茜得以陪同陈毅回北京治病。但是，陈毅的肠癌已经到了后期，张茜在整整一年的护理中，心情压抑，呕心沥血，也身患绝症。而她振作精神，尽可能多地给予陈毅以慰藉而减轻剧烈的病痛。

这期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重病在身的陈毅和张茜怀着满腔义愤，向林彪一伙作了最后一场斗争。陈毅接连两次在中央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上作长篇发言，系统地揭露了林彪在军中所犯的错误，张茜则帮助整理发言稿。

在陈毅弥留人世之际，张茜特意把齐白石手书的诗词挂轴带到病床前，上面录的是陈毅写于1936年的那首脍炙人口的《赠同志》：

二十年来说是非，一生能系几安危？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春蓓蕾。

陈毅视此诗为“生平为诗，此压卷也”。可见，张茜用心何等深细。她自己同时也写了一首慰问诗：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即使是在回天乏术的情势下，张茜仍然祈望陈毅能度过他一生中最后的“忧患”期。这真正是几十年危难与共深蕴的痴情啊！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与世长辞了。毛泽东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给了张茜以很大的安慰。

3月，张茜被确诊为肺癌！动了肺癌切除的大手术。

张茜在重病中用不到一年的时间编辑了一部《陈毅词诗选集》，共收入100多篇诗词，从红军时期反映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作品，依次编至十年动乱初期即景言志的《题西山红叶》。张茜为这部诗集写下了评价中肯的序言，吟成了字字泣血的题后诗两章，其中一首是：

同病堪悲惟自勉，理君遗作见生平。
持枪跃马经殊死，秉笔勤书记战程。
波漾流溪冬月影，风回碣石夏潮声。
残躯何幸逾寒暑，一卷编成慰我情。

周恩来总理读了张茜编辑的《陈毅词诗选集》以后，对于张茜的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尤其对张茜所撰的序言和题诗表示了高度的赞赏。

张茜的病情日渐恶化，她自知已经不能好转。有一天下午，她把子女召集到床前，对他们讲了她心里久已想说的话：

“人总是要死的。我这一辈子自己觉得过得很幸福。我是穷家小户出生的女孩子，那时候要读点书很不容易，每个月为了交学费，老人尝尽了艰难。在旧社会我没有被毁灭，没有堕落，保持了清白，参加了革命。在党的培养下，我才学到了一点知识，能够担负一点工作，能够有一点作为。你们比我幸运，生长在解放以后，环境太顺利了。”

“我这个人一辈子都是理想主义的，总追求一个很高的境界，但总觉得自己的力量不足，达不到理想的境界，非常苦恼。我跟你们的爸爸结婚时，距离相差很大。我总是想缩小这个差距，使自己能和你们的爸爸相称。这成了鞭策我自己前进的力量。我在现实生活和家庭生活里追求的不是安逸和享受，而是孜孜不倦的苦学上进。我几乎没有什么娱乐。……遗憾的是，我的时间太少了，方法也不大对头，所以结果就不那么好……”

罗荣桓（1902~1963）湖南省衡山（今衡东）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一师一团特务连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营党代表，第二纵队党代表，红四军政治委员，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部长，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红军大学一科政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一一五师代师长兼政治委员，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7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派警卫员来到罗荣桓家，通知林月琴，到他的住处去一下。

数日前，北京城外卢沟桥的枪声，震惊了全国。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第二天，中共中央从延安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10月，军委主席团发布命令：邓小平由红军第一军团调总政治部任副主席，罗荣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不久，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七十四师合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整装待发，即将开赴抗日前线。

就在这节骨眼上，毛泽东让林月琴去他那儿，林月琴感觉很突然，也很紧张。来延安已有些日子了，也曾多次见到过毛泽东，听他做过报告，但毛泽东单独找她谈话，这还是第一次。心想：“主席工作那么繁忙，什么事非得由他亲自找我谈呢？”

林月琴刚走进窑洞，毛泽东已站起身来，热情地招呼她坐下，警卫员递来了一杯茶。

毛泽东微笑着说道：“啊，你就是林月琴同志，都做过什么工作？打过仗吗？”

林月琴赶忙答道：“原是四方面军的，当过宣传员，后来有一个营的妇女士兵哩。”

林月琴是安徽金寨县人，出身于一个小商人家庭。1929年入团，1930年参军。1932年，张国焘推行“左”倾的土地政策，她因家庭成份被错划为地主，受株连被送到劳改队。当四方面军向河南、陕西转移时，林月琴和几个女同志被遣散，可她们仍然自动紧紧跟随着红军队伍。有的指挥员称她们为“跑反队”，嫌她们在队伍后面累赘，叫她们回去，可是用棍子赶也赶不走。四方面军转移到川陕边地区，从鄂豫皖出来的同志又都成了骨干，林月琴担任了妇女工兵营长。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调到粮食局，经何长工批准恢复了团的组织生活，到达陕北后，转为正式党员。当时，林月琴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与罗荣桓结婚不久。

毛泽东听了林月琴的自我介绍，笑着说：“噢，你还是个营长嘛！你们结婚吃了什么？”

“怎么，吃面条也不请我！”毛泽东风趣地说着，林月琴也忍不住笑了，刚来之时的拘束感全没有了。

接下来，毛泽东亲切地向林月琴说起了罗荣桓的经历和为人。令林月琴惊讶的是，毛泽东对自己丈夫的为人是那样的了解——

荣桓出身在湖南衡山县鱼形南湾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青年时期，为了追求真理，曾先后在长沙、北京、青岛、武汉、广州等地求学。1927年，在武汉大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组织了鄂南通城、崇阳的农民武装暴动，后来带了一百多人，到湖南参加了秋收起义。三湾改编时，有些人在艰苦的斗争面前灰心动摇，少数人已经不辞而别了。荣桓坚定地留了下来，被任命为连党代表，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毛泽东讲到这里说：“为什么让荣桓当党代表呢？就是因为他老实。”

提到“老实”，林月琴不由地插话，向毛泽东说起荣桓讲过的一个笑话。

井冈山斗争时期，部队分到一批银元作为连队的菜金，装在一只箱子里，由荣桓保管，每次行军都亲自提着。一天，天气很热，山路也更加崎岖难行。荣桓提着三十来斤的箱子，一路上不断地倒手，口干舌燥，酷热难当，但他仍然坚持自己拎着行军。

下午，越过一座大山，一个农民战士跑上来，对罗荣桓说：“党代表，我来帮你扛吧。”不由分说，从罗荣桓手中夺过箱子。罗荣桓看这人面熟，知道是队伍里的战士，挡不住他连说带抢，箱子便由他拿去了。等到傍晚，部队宿营下来，那人连影子也找不到了，荣桓心里非常懊丧。事隔多年，荣桓记起来对妻子说：“那个时候，走进革命队伍的人很杂，看来也并不都是真革命哩，混饭吃的，找出路的，大有人在。那时，我们都是‘秀才造反’，脱不了书呆子气。一个知识分子要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不经过一番磨炼是不行的。”

毛泽东听罢，哈哈大笑起来，说道：“你看，从这件事上，他这个老实人也悟出一条道理呢！所以他对是和非、正确和错误鉴别得特别分明。”

毛泽东还告诉林月琴，荣桓在与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因此而遭撤职，被派到江西地方搞扩红工作。荣桓虽然蒙受委屈，但并没有动摇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仍旧老老实实地为党的事业工作，三个月过去，圆满完成了扩充三千名红军战士的任务。接着，毛泽东又说：“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当然，老实人免不了受人欺负，这也没什么，历史总会正确评定一个人的功过的。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老实实的态度是不行的。”

林月琴由衷地敬重毛泽东，他对荣桓的认识是多么的深刻。想起数月前同学刘桂兰向她介绍荣桓时也说过荣桓是“老实人”，几个月的朝夕相处，她已被荣桓为人的忠诚、厚道所深深吸引……毛泽东的话打断了她的思路：“现在，日本侵略者大举侵犯我国，我党肩负着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任。荣桓已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正准备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为了给友军树立一个好的风气，党中央决定，我军家属不要随队前往，荣桓同志已确定让你留在延安。”说到这里，毛泽东顿了顿，又关切地说：“你们新婚不久，马上就要离别，我是不是有点残酷？”

到这时，林月琴才知道，毛泽东百忙中约请她来，原来是亲自做她的思想工作。林月琴想到新婚不久的丈夫就要开赴前线，真有点恋恋不舍。但她随即从个人的卿卿我我中解脱出来，她不仅是革命者的妻子，她本就是一名革命者，一名红军女战士，支持丈夫上前线，是自己的职责。她立刻回答道：“那是革命的需要嘛！”

桶刷标语，动员人家送郎参军。现如今，你是自己送郎上前线啰！”

林月琴站起身来，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握了握林月琴的手，又亲自把她送出了窑洞。

回到家中，林月琴向荣桓说了毛泽东约见她谈话的情景，罗荣桓非常激动。毛泽东百忙中亲自做林月琴的工作，这是对自己的关心；毛泽东的褒扬和赞誉，更是对自己的信任。罗荣桓把毛泽东对他的关怀和信任深深埋进心底，加紧了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工作。临分别那天，林月琴送丈夫出征。罗荣桓对妻子说：“我走了，你留在延安好好学习、工作。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记住毛主席的话，永远做老实人，忠诚于党的事业。”

丈夫上前线了，林月琴在党校努力学习。当她一个人空闲下来的时候，她常常思念远在前线的罗荣桓，回想起他们从相识、相恋到结婚那些美好的日子，心里总是充满了甜蜜和快乐，从而冲淡了新婚离别的苦涩。

那是半年前的春节期间，林月琴党校的同学刘桂兰结婚不久，邀请月琴星期天到她的新房作客。

星期天那天，林月琴稍加修饰，来到了刘桂兰家，只见满屋的客人，她还以为是大家来庆贺新婚之喜的呢。其中最活跃的是冯文彬，他是罗荣桓、许建国（刘桂兰的丈夫）等人的老战友。他主动同林月琴搭话，询问她的家庭情况，个人经历，脾气爱好。林月琴以为他是组织部的，很大方地一一作了回答。谈笑间，林月琴注意到了在坐的一位戴眼镜的三十多岁的同志，坐在一边不说话，显得有些拘束，时而嗨嗨笑两声。

此后，林月琴几次去刘桂兰家，发现客人尽管常有变换，而这位戴眼镜的同志却总在坐。林月琴也认识了，他就是红军后方政治部的罗主任。

罗荣桓忙于打仗和政务，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事，还是个单身汉。老战友们商量着帮他的忙，刘桂兰自然就想到了同学林月琴，与罗荣桓倒是非常合适的一对。大家一合计，便向罗荣桓提亲。罗荣桓还有些不好意思，冯文彬马上自告奋勇陪同罗荣桓去见面。但大家又考虑到，女同志脸皮薄，还是先不向林月琴挑明的好，只要寻找机会，让他们先接触接触，有了了解，就好办了。

于是，刘桂兰出了个主意，邀请林月琴到她家作客，大家不禁连连点头，都感到这是个好办法。这样，就有了上述这一次次别出心裁的请客。

经过刘桂兰的牵线搭桥，罗荣桓与林月琴谈起了恋爱。其实，林月琴已经有了这种预感，罗荣桓虽然沉默寡言，十分憨厚，却深受周围同志的爱戴。渐渐地，林月琴已经喜爱上了他。

延安小卞沟的一所教堂，是党校的所在地。它和红军后方政治部，隔着一条延河，河身不过二三十丈宽，镜子一样光洁的河面闪亮着，静静地躺在水底的鹅卵石清晰可见。可是，春天到了，冰雪融化，延河涨水，徒步已比较困难，这成了罗荣桓和林月琴见面的天然障碍。有些爱逗乐的同志就把延河说成是银河，把罗荣桓和林月琴说成是牛郎织女。

牛郎织女相会，靠的是鹊桥，可延河上什么桥也没有，怎么过得去呢！二十五军六团政委王平帮助罗荣桓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听说罗主任没有牲口，便立即挑了两匹好马托人送去。罗荣桓将一匹送了人，自己留下一匹白马。从此，每天吃罢晚饭，当黄昏临近的时候，罗荣桓都要练骑马。警卫员、马夫要跟着，罗荣桓每次都笑嘻嘻地把他们支了回去。同志们晚饭后问警卫员：“罗主任呢？”警卫员的回答是：“练马去了。”不少同志纳闷：罗主任是从井冈山下来的，他难道还不会骑马吗？对这个问题知道得最清楚的自然是林月琴，她只要看到那匹大白马过了河，便悄悄走出校门。于是党校外的小树林里，宝塔山下，延河岸边，到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罗荣桓告诉她自己的家庭和经历，告诉她装钱的箱子被骗的轶事。他也谈到了自己曾在17岁那年结过婚，是父母包办的，娶了一位比自己大两岁的农家女，违心地当了新郎。后来，他离家参加革命，写了离婚书，解除了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林月琴也告诉她自己的家庭和经历，谈到了转战川陕、三过草地时，她是怎样带领着一批童养媳和地主的丫环出身的女战士抬担架、缝军衣。林月琴也坦率地谈到自己的文化低，小时候读过《千字文》、《女儿经》，参加革命后，由于张国焘实行打击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吓得不敢读书学习，从那两本书上学会的字，也大半还给了老师。罗荣桓鼓励她：“你还年轻，文化低可以学，可以逐步提高。”

他们的交谈充满了真诚和坦率。林月琴对他充满了信赖和敬重；罗荣桓也觉得她忠实积极、吃苦耐劳，是自己的好伴侣，感到十分欣慰。月亮高悬在夜空，皎洁的月光柔和地洒落在这对革命的恋人身上。寂静的夜晚，只听得延安水的流淌声，这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又是多么的难得。

延河两岸的山丹丹花开了，在朝阳的映照下，是那样的红艳妖娆，像是从天而降的一片片彩云。在这大好的春光里，经过组织批准，罗荣桓与林月琴准备办喜事了。

5月16日，被订为他们大喜的日子。这天，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了，恰好又是一个星期天。

简朴的新房里，贴上了鲜红的双喜字，两张铺板并在一起的床上，铺上了林月琴刚刚翻晒过的一张狗皮褥子，上面又铺上了一床用碱水洗净的旧毯子，两床半新半旧的棉被，放置在床铺的正中央。再加上老乡家的一张桌子，一把老式的木椅和一个脸盆，新房里也就别无家什了。

结婚的那天，前来贺喜的战友络绎不绝。远在西安的老战友宋裕和捎来了半袋洋面。于是，罗荣桓请伙房的炊事员擀面条。

当晚，政治部的所有同志，从部长、干事到警卫员、马夫和全体来宾，都吃了罗主任的喜面。面条里没有肉，油也很少，只放了点白菜、萝卜，但大家吃得香喷喷的，蛮有味儿。

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气氛却非常热烈，新房里笑声阵阵，贺声朗朗，不绝于耳。同志们纷纷祝贺新郎和新娘并肩携手，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到来，为民族解放、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贡献自己的一切。

新婚是甜蜜的，但他们并没有沉浸在个人的“蜜月”之中享乐。新婚的第二天，他们就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了。罗荣桓将部长们找来开会，布置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的传达、贯彻，要求各单位认真组织学习毛泽东在会上所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罗荣桓要求干部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注意解决在停止打土豪和没收地主土地以后干部战士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同时，他特别强调，学习中要紧紧掌握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一中心环节，既要讲联合抗日，又要保持我党我军的独立性；既要防止关门主义，又要坚定无产阶级立场，防止重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两个多月过去了，新婚不久的妻子又送丈夫上了前线……

转眼到了1938年，一一五师已经转战到了山西孝义。4月底的一天，与妻子分别了大半年的罗荣桓，显得与往常有点不同。他是一个不易外露感情的人，那天也有些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原来，延安来人了，林月琴也随同一起来了，这是经毛泽东批准同意的。

罗荣桓戴着深度眼镜，立在岸边翘望，一个身着整齐的军装，脚穿一双新球鞋的女同志，轻快地跑到了他的面前。她，就是林月琴。

新婚夫妻在战地相会，心情格外激动。不大会开玩笑的罗荣桓，望着林

“哎呀，你也变成‘洋包子’啦！”

在当时，能有一双球鞋穿已是很时髦的了。1938年春，林月琴曾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搞机要工作，她用自己的积蓄买下了这双鞋，一直舍不得穿。今天，要与久别的丈夫相聚了，她特意拿出来穿上。罗荣桓一见面，第一句话还真从它开始了。

他们谈得很多，很久。

林月琴告诉他，在西安工作时她经常给首长们送电报，认识了王明。他刚从苏联回来，在西安没有公开露面。

罗荣桓深有感慨地说：“噢！那可是个有名的人物。过去，他那一套给我们党造成了很大损失啊！我还没有见过呢，他长得什么样子？”

“矮矮的，胖胖的，没有什么特别，看不出他是犯过错误的呀！”林月琴感到惊奇。

“从外表上怎么能看出来呐！”

当时，王明的错误在党内还没有得到批判，但罗荣桓对此有切身感受。

后来，他们谈到了林月琴来前线后的工作安排。罗荣桓说：“关于你的工作，我已经和区党委林枫同志商量过了。他们要办一个党员训练班，准备让你到那里去培训新党员。”

林月琴听后并不高兴，心想，她从中央组织部带来的介绍信，是给一一五师政治部的，不是给地方党委的。再说，她从1930年参军以来，一直在军队工作。一一五师的梁必业同志也准备要她在司令部做机关协理员的工作。可是，好不容易到前方来了，又要分成两处，一个在军队，一个在地方，这多不方便！

罗荣桓见妻子没吭声，不忍心让远道而来的妻子不高兴。他耐心他说道：“我相信你能胜任在部队的工作，但我觉得还是参加地方工作为好。本来家属不让到前方来，允许你来，这是组织上的照顾，我们还要考虑对部队的影响。再则，地方工作对女同志比较合适，晋西北根据地刚刚开辟，有许多工作等着女同志去做。你最好不要在我所领导的单位工作，这样对你的锻炼可以大些。你看怎么样？”

林月琴感到荣桓考虑得很周到，愉快地答应了。随后，她到孝义区委报到，区委书记林枫指派她和郭明秋同志一道，着手办起了党员训练班，为根据地培养了一批地方工作骨干。

1939年初，一一五师挺进山东，林月琴又一次送走了罗荣桓，自己因怀孕，暂时留在晋东南。2月间，林月琴生下第二个儿子，因为孩子是在爸爸率领部队东进时出生的，所以取名“东进”。林月琴的大儿子是在陕北生的，取名“北屯”，寄养在老百姓家中，已因病缺医而夭折了，林月琴更为疼爱小东进。

6月，林月琴随一一五师留守处，从晋东南经冀南，跟徐向前和朱瑞同志一起到了山东泰西地区。林月琴产后才四个月，身体虚弱，还要照料孩子，一路跋山涉水，几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母子俩好不容易在战地与罗荣桓重逢，非常高兴。罗荣桓抱起儿子，亲切地问妻子：“你们一路辛苦了吧？”当罗荣桓听说同志们为了照顾林月琴母子，路上专门拨给她一头牲口，心里又不安起来。他郑重地对带队的朱涤新同志说：“这样做不合适，给同志们的影响不好啊。”

此时正是陆房战斗之后，泰西的形势很紧张。一天，罗荣桓正布置部队精简行装分路转移，突听“哇”地一声，小东进哭了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将视线移到炕上的小东进身上。有的同志主张抽几个同志护送小东进跟部队转移，罗荣桓严肃地说：“现在我们一个战士要顶十个用，怎能抽出人来护送

林月琴眼眶里噙着泪水，一时也不知怎么办才好。罗荣桓走到炕前，爱抚地摸摸小东进的脸，毅然说道：“我看，干脆把他交给群众养活吧。”

在细雨蒙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师部事务股长陪同林月琴，抱上小东进，骑上马，到了十多里外的一个小山村里，把东进寄养在一个老百姓家中。

林月琴含泪最后看了儿子一眼，狠狠心，出了门，连夜返回部队。再也没有比母子分别令人伤心的了，更何况她的第一个儿子已经夭折了！为了革命，她做出了极大的牺牲，跟着罗荣桓转战山东敌后。从此至1945年10月，罗荣桓和林月琴在抗日战场上共同度过了六年的战斗生活。

1939年8月，罗荣桓和陈光在山东梁山附近，指挥部队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歼灭日军长田敏江少佐以下三百余人，并且缴获了两门野战重炮。长田敏江是日本天皇的亲戚，那两门野炮是山东日军中屈指可数的重型武器。遭到这样沉重的打击，山东日军最高指挥官尾高龟藏气急败坏，纠集五千重兵，调动一百多辆汽车、装甲车，在梁山地区反复“扫荡”。

林月琴跟着罗荣桓、陈光和几个参谋长，带着一部电台，在青纱帐掩护下与敌人周旋。他们晚上住在老乡家，凌晨四时就离开村庄，进入高粱地。有时敌人从村西头闯进来，他们从村东头撤出去。有时敌人“扫荡”的车队从公路上通过，他们就隐藏在距公路只有几十米的青纱帐中。林月琴见罗荣桓总是从容不迫，她自己镇定自如，毫无惧色。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罗荣桓积劳成疾。特别是1942年以后，又得了严重的肾病，经常尿血，身体不好。毛泽东曾多次打电报来慰问，然而工作的重担又不容许他去疗养。1943年，党中央决定由罗荣桓全面负责山东根据地党政军领导工作，他的担子更重了。在这种情况下，协助医务人员照顾好罗荣桓的身体，成为林月琴的一项特殊任务。

从1942年冬以后，罗荣桓经常在担架上工作，林月琴就守候在他身边。那时候没有什么化验设备，林月琴用瓶子每天为罗荣桓取血尿，从血尿颜色深浅来判断病情的轻重。在罗荣桓住处的窗台上，常摆着一个个用来取样的玻璃瓶。林月琴配合医务人员，精心护理，对罗荣桓起居、饮食考虑得非常周到。罗荣桓是湖南人，最爱吃辣椒，林月琴根据医嘱劝阻罗荣桓，不要吃带辣椒的刺激性食物。

1943年和1944年，林月琴两次陪罗荣桓去医疗条件较好的新四军治病。从山东到苏北，要穿过敌人几道封锁线。一路上，林月琴处处注意罗荣桓的安全。后来，为了更好地给罗荣桓治病，陈毅请在新四军的奥地利泌尿科医生罗生特，跟罗荣桓到山东根据地。在医疗条件异常困难的情况下，林月琴协助罗生特，想尽办法医治罗荣桓的肾病，使罗荣桓坚持繁重的工作。

一次，为罗荣桓做尿道探测检查手术，由于器械落后，又缺少麻药，他忍着难言的疼痛，汗水把他铺下的床单都湿透了。即使这样，他还是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他一再叮嘱医生要沉着，别为他担忧。

1945年8月，战斗极为紧张激烈的临沂战役一时未能奏效，罗荣桓心里非常着急。当时，他连续尿血，身体很不好。而军务又十分紧急，有时一夜有好多份电报要处理，有时刚睡下就又被叫醒。当他听到临沂的情况后，再也躺不住了，便叫警卫员立即备马，要到临沂去。

警卫员出去转了一圈，吞吞吐吐地说：“报告首长，找不到马夫。”

“找不到马夫，你把牲口牵来！”罗荣桓有点生气了。

警卫员怯生生地说：“牲口也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

这回罗荣桓可真的生气了：“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呀？快去把牲口找来！”

要到临沂前线去的事。林月琴想到丈夫病情严重，根本就不能骑马，她急得没法，只得叫马夫把马牵走。现在她看到罗荣桓要批评警卫员，便走进来说：“不该警卫员的事，是我叫马夫把牲口牵走的。”

罗荣桓听后，压压火，等警卫员走了，他严厉地责备林月琴：“你为什么这样自作主张？”

林月琴平静地回答：“这是医生的嘱咐，罗生特大夫说你近来病情很重，要你绝对卧床休息。”

罗荣桓急了，说：“休息，休息，临沂打不开，教我怎能安心休息！”

林月琴也急了，说：“你的病这么严重，还要骑马到临沂去，你不要命了！”

罗荣桓责问道：“临沂打不开，就要增加滨海、鲁中、鲁南反攻的后顾之忧。这么重要的时刻，你不让我到前方去，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我不是共产党员，是国民党员呀？”林月琴自结婚以后，没见过丈夫对自己发过脾气，更没有听过这样重的话，又委屈，又难过，忍不住顶了一句，眼里已闪着泪花。

林月琴顾大局、识大体，不是个婆婆妈妈的妻子，在这关键的时刻，却一反当年送郎上前方的做法，阻挡丈夫去临沂，是不得已而为之。她深知丈夫的病情的严重，现在更经不起折腾。当然，她知道罗荣桓的脾气，从来都是和蔼可亲的，可今天突然发这样大的火，想必自己是劝不住的了。于是，只好含着眼泪走出来，设法“搬兵”。

正在院里玩的东进，头一回听到爸爸妈妈吵架，趴在窗户玻璃上偷听，见到妈妈走出来，脸上还挂着泪珠，吓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东进当年寄养老乡家，直到五岁时，山东抗日形势已经好转，才接回家的。林月琴此时也顾不上他了，径直走到黎玉的住处，把罗荣桓想骑马上前方去的事对黎玉说了。黎玉听后，连忙赶去阻止罗荣桓出发，罗荣桓只好打消了原来的主意。

临沂战役胜利以后，部队路经临沂。罗荣桓又要人搀着，带领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勘察临沂城的全部地形，总结检查组织指挥上的优缺点。林月琴走到丈夫身边，劝他说：“仗都打过了，城都攻下来了，就不必再这样辛劳了。你的身体……”

“瞧你，总是惦挂着我！”罗荣桓立刻打断妻子的话，指着敌人的防御工事说：“胜利，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们要珍惜所付出的代价，总结宝贵的经验教训，对得起牺牲的同志。”

就这样，罗荣桓虽积劳成疾，但坚持繁重的工作，领导山东军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战一结束，罗荣桓奉命率山东军区主力部队进军东北。林月琴与罗生特医生陪同罗荣桓从胶东半岛渡海到东北。罗荣桓在东北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随着工作任务的加重，他的病情更加恶化。毛泽东几次来电，催他去大连检查。罗荣桓患的是肾癌！需要手术治疗，毛泽东又亲自安排罗荣桓去苏联就医。

1946年7月，林月琴陪罗荣桓到了莫斯科。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罗荣桓在手术后伤口大出血，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手术。罗荣桓忍受着巨大痛苦，配合医生治疗。他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使苏联医生也竖起拇指，用生硬的中国话对罗荣桓连声夸奖：“真正的英雄！”

在苏联治疗的十个月间，林月琴既当秘书，又当护理员，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的事，全靠她一人办。罗荣桓手术后，刚刚恢复神智，就要林月琴给他讲国内解放战争的消息，读随身带去的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还时常请

1947年春，国民党占领延安以后，罗荣桓虽然尚未痊愈，但他急于回国参加解放战争。5月下旬，林月琴和他一起，返回到战火纷飞的东北战场。

林月琴从苏联回国后，看到同志们投身到火热的战争中，她也急于要求工作。

一天，东北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找林月琴谈话，准备安排她当政治部组织部的副部长。林月琴高兴地把这一消息告诉罗荣桓，可是，罗荣桓郑重地对她说：“你要求工作，我支持你，不过，还是不要去当什么副部长吧。”

“那么，我做什么工作呢？”

“有一件很重要的工作需要你去做。现在，部队在前方打仗，在哈尔滨有许多干部的子女进不了幼儿园，上不了学校。你把家属组织起来，办幼儿园、办学校，教育好下一代，就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帮助。”

林月琴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筹办起了学校。她自己担任子弟学校的校长，每天一早到校，抓孩子们的学习，和老师们一起给孩子们洗衣服、缝被子，什么都干。林月琴在担负学校工作的同时，还要照顾罗荣桓的起居饮食，每天中午回家照顾罗荣桓吃过饭，又匆匆返回学校。她一天来回跑两次，格外繁忙。

建国以后，罗荣桓一直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工作更忙了。手术后一度好转的身体又渐渐恶化。为了使罗荣桓在有生之年能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林月琴放弃了发展自己的机会，一心一意地当好罗荣桓工作上、生活上的助手，直至罗荣桓去世。

1961年，林月琴担任了总政主任办公室副主任，她为病情日益沉重的罗荣桓承办电文，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处理了许多日常工作。但是，她一直遵循着“夫人不要干政”的原则，从不喧宾夺主，越俎代庖。

1963年，罗荣桓病情日益恶化，医院发了几次病危通知，林月琴夜以继日地守候在病榻前。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贺龙、聂荣臻等领导同志，都先后到医院来探视。罗荣桓临终前，紧紧握着林月琴的手，深情地说：“多少年了，你为我作了很大的牺牲，我感激你……”

他走了，永远地走了，他在人民解放的前线奋战了一生，他的革命精神与世长存！

林月琴送走了亲人，自己又一次全身心投入到亲人未竟的事业中去。

两年多后，中国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叶群因林彪前妻的女儿50年代初期在罗荣桓家中住过，而对林月琴恨之入骨，企图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陷害林月琴，诬蔑林月琴是寡妇集团的首领，在生活上也给予种种刁难。1969年，林彪发布“一号命令”，借口备战，把大批老同志赶出北京，林月琴也被迫拖着刚满周岁的孙女，被放逐到广东。

林彪集团被粉碎后，林月琴返回到北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林月琴担任了总政干部部顾问，为落实党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奔走呼吁，做了大量工作。她把自己的有生之年贡献给了荣桓未竟的事业，她教育孩子继承荣桓的革命遗志，为实现四化作贡献，以慰荣桓的英灵……

罗瑞卿（1906～1978）四川省南充县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西游击大队大队长，红四军第五十九团参谋长、纵队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中央红军先遣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公安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1974年的秋天，郝治平陪同罗瑞卿来到福建，请老中医林如高先生治疗腿疾。次年的4月，郝治平因事回了一趟北京。按说这样短暂的分开，在任何家庭中间，都是极为平常的事情。然而，罗瑞卿在这期间，写了总题为《忆往事书赠治平》的组诗，诗中对这短暂的离别，流露出无限的眷恋之情。这种感情，在过去，在惯于征战的罗大将军身上，是不多见的。他在组诗的前叙中写道：

去年10月来闽治病，时近半年，初见成效。近日治平因事回京，这里只留我与点儿（罗瑞卿的小女儿——作者注），颇感大有所失。

组诗中，他深情地写道：“两两离别如隔岁，朝朝思念似盼星。”

这种感情来自于几十年的诚心相处，来自于8年的痛苦磨难，这种经历使他们的心更相通了，一刻也不愿分开。而当郝治平要从北京回来了，罗瑞卿便有一股难耐的激情：“红花耀眼迎亲人，莺声悦耳喜临门。”

他解释道：

治平从北京归来之日，院内木棉花正在盛开，清晨旭日临窗之际，又有黄莺在窗外高唱枝头，十分悦耳，似有预报喜事临门之兆，故有此句。

“4月”，对于他们来讲，更是值得纪念的月份，是他们幸福结合的月份，在这个月份里，小别相聚，又何等的富有诗意啊。

罗瑞卿又写道：

本年4月3日，为我们结婚34周年，时光易逝，好景却长。我们之间时日愈久，相知愈深，感情愈厚！公不离婆，秤不离砣（四川俚语），水乳交融，牢不可破，此之谓也。

—

罗瑞卿在组诗中说：“延安相识未知心，太行始得互恋情。”

郝治平原是开封第一师范的学生。1938年春天，她不满16岁，便同当时成百上千的热血青年一样，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她到陕北公学不到两个月便因工作、学习积极，能吃苦耐劳，理论能联系实际而入了党，随后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4期学习。到抗大不久，她就认识了抗大的副校长、个子高高的罗瑞卿。那是在五四青年节的傍晚，在延安北门外抗大三大队驻地广场，召开了“五四”营火晚会。抗大在延安的几个大队都到了。几堆篝火在熊熊燃烧，各个连队互相拉歌，歌声此起彼伏。晚会开始时，罗瑞卿作了简短的讲话。讲话的具体内容郝治平已记不清了。她只记得罗讲话极富感染力、极富鼓动性。本来，参加晚会的抗大学员大都正值青春年华，似乎都有一股用不完的精力。罗瑞卿一鼓励，人人火苗都腾腾地燃烧，欢呼声、掌声响成了一片，场面之欢快、热烈，郝治平终身难忘。

听了罗瑞卿几次讲话以后，郝治平感到他和她以前接触过的红军老干部一样，有质朴、坚韧、忠实的品质，又和他们很不一样。他讲话层次分明、干脆利落，说服力很强，显得很有知识。她还听老同志说，毛泽东曾把罗瑞卿比作黄埔军校的副校长、口才极好的邓演达，她想，这样的干部大约就算得上是知识分子工农化了。

随后，她又发现他十分严肃，不苟言笑。有时他的话讲得十分幽默，引得台下哄堂大笑，他却若无其事，仍然是那么严肃。她听到一些老同志说，在第二次反“围剿”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颊，他负了重伤，长时间昏迷不醒，生命垂危，组织上已经给他做好了一个长长的棺材，但是，他摸了摸阎王的鼻子，又回来了。可是，他的左颊却留落下了伤痕，嘴张不大，因此很少笑，显得十分严肃。她一度也相信了这颇为夸张的说法。后来，她才知道，不完全是这么回事。

在延安这一阶段，在郝治平心目中，罗瑞卿是一位深受同志们敬重的老红军、老首长，她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想法。

罗瑞卿认识郝治平，要晚得多。

1939年，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上1938年陕北大旱，边区的财政经济发生了极大的困难。中共中央在号召根据地的军民自力更生、上山开荒之后，又决定将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迁移到晋东南去。7月7日，罗瑞卿等率抗大总校、陕北公学等单位离开延安东进。此时，郝治平已结业，留校任第二大队的技术书记。

当抗大转移到延长县时，一天，郝治平在路上同罗瑞卿迎面相遇。她向他敬了一个礼，便走了过去。他停下脚步，把她叫住，问她是哪一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干什么工作。她有些拘谨地一一作答后便又走开了。罗瑞卿在和郝治平结婚以后对她说起这一段往事。他对她说：“那个时候你好高傲呐！”她对他说：“你是副校长，我是一个基层干部，我们以前又不熟悉，难道还要我主动同你拉呱儿不成？”罗瑞卿听了不禁莞尔一笑。

认识，郝治平早于罗瑞卿，而产生恋情却是罗瑞卿早于郝治平。

1940年6月，罗瑞卿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离开了抗大。同年底，郝治平也从抗大调到中共北方局党校继续深造。这一期间，郝治平收到过各式各样的情书，有知识分子写的书法工整的长诗，也有工农干部写的字迹拙朴的要求约会的便条。刚收到时，她还有点心慌，后来收多了也就不以为意了，对这些，她一概置之不理。一天，她刚下课，又收到了一封信，一看前面的称呼是“紫萍”。自从抗大转移到太行山后，她即改名赤茜，“是谁用谐音叫我原来的名字呢？”再看信尾，署名是“洛水清”。这三个字如果用四川话来读，不正是罗瑞卿的谐音吗？她脸上不禁飞起一片红晕。再看信的

但她又想：也许是罗主任要找我了解什么情况呢。于是，她依约而去。

从此，在夕阳中的村外河边上、小树林里，常常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七九河开，八九雁来”，随着春天的接近，他们漫步的距离也逐渐加长，路在他们的脚下变得短了。在交谈中，罗瑞卿详细谈了自己的经历，也说了他到陕北后的两次给他造成许多烦恼的不幸的婚姻。郝治平认真倾听了他的诉说，认为不幸已成为过去，只要罗真心实意对自己好就行了。而他能够敞开心扉谈这些自己也不愿回首的往事，正说明了他的真心。郝治平顾虑的是自己的幼稚，同他在政治思想水平上有很大的差距，恐怕不能当好他的助手。罗瑞卿对她说，你还很年轻，一切都可以学习。这正是你的长处。

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双方都感到对方正是自己所要寻找的伴侣，于是，罗瑞卿提出了结婚的要求。她轻轻地点点头，但提出要等她毕业以后。他询问她哪一天毕业，她说是4月3日，他立即说：“好，婚期就订在4月3日。”

4月3日，桃李芳菲。党校毕业典礼结束后，女同学们便簇拥着新娘郝治平，唱着歌，说说笑笑，向野战政治部驻地桐峪镇走去。罗瑞卿在镇口迎接，把她们都请到新房——一座在太行地区少见的新式两层小楼。为了避免惊动更多的人，罗瑞卿没有将举行婚礼的日期通知彭德怀、左权等领导人，出席婚礼的就是野政的一些同志。他们早早就来了。北方局党校的“娘家”人一到，小小的屋里便座无虚席，老乡家的孩子们也来凑热闹，更挤得满满当当。桌子上放着花生、红枣、核桃、柿饼这些太行山的土产。大家一面吃着，一面说着，新房里不时传出阵阵欢声笑语。

傍晚，客人们陆续散去。山区的天，说黑就黑，在小油灯下，他俩相对而坐。伙房送来了晚饭。有小米饭和特地炖的一碗鸡汤。吃饭时，他将鸡肫夹到她碗内，对她说：“这个最好吃了。”她说：“最好吃你怎么不吃？”又将它夹回他碗里。让来让去，最后他将它一分为二，一人吃一半。从此，罗家吃鸡，鸡肫总是剖成两半，他俩各吃一半。

二

罗瑞卿写道：

我与治平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1年结婚。“咬紧牙关，度过两年”，这是当时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抗战根据地的党政军民的庄严号召！婚后在太行的岁月，确属艰苦难言的岁月，但也是我们感到十分美满幸福的岁月。这是我们的骄傲，亦足见我们相爱之革命基础及其情真心挚。

他的诗是：“艰苦备尝开颜笑，生死与共爱更深。”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和日本侵略者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疯狂进攻，太行山的生活是艰苦的。吃鸡汤，这只是因为他们结婚，总务处特地让伙房给做的，只能是偶而为之，在平时，小米便算是细粮了。青黄不接时，常以黑豆当饭，没有青菜，菜也是黑豆，区别就在于后者放盐而前者无盐。盐水煮土豆也是常吃的菜。也许是吃伤了，后来郝治平便不怎么爱吃土豆了。

不仅生活艰苦，而且战斗环境也十分恶劣。当时，郝治平已分配到政治部秘书处。为了适应频繁的反“扫荡”的需要，政治部机关也军事化了，共编为第四、第五连两个连队，郝治平任四连指导员。

1942年初，郝治平分娩刚刚11天，便赶上了反“扫荡”。孩子被放进一个垫了小棉垫子的木筐，盖上小棉被，由通信员背着走。这一天，风雪弥漫，郝治平的头发、眉毛都结上了霜花。她十分想看看女儿，但部队在转移，

块油布，盖在木筐上面，然后，又策马去指挥部队和机关的反“扫荡”。在当时，一块油布就是罗瑞卿作为父亲能够给予孩子的最好礼物了。天亮后，敌机轰炸，通信员避入一个窑洞，刚把木筐卸下，一颗炸弹把窑洞震塌，通信员赶忙把木筐从土中扒出。孩子怎样了？郝治平仍然没有机会看看，就又上路了。直到傍晚，才在一个小村庄住下。进入屋内，郝治平赶忙掀开小棉被。一看，心都凉了。只见婴儿浸在屎尿中，冻得皮肤青紫，连哭声也没有了。一阵沉默之后，房东老大娘把孩子抱起来，看了一看说：“别急，我来试一试。”她把孩子放在炕上，用手一遍一遍周身按摩。许久，孩子终于哭出声来，得救了！孩子无论如何也不能带了。于是，将她寄养在辽县麻田村一户老乡家里。孩子是在桐峪生的，在麻田托付给老乡，孩子的奶娘便给她起名叫“峪田”。

5月，日军又发动了2.5万人的“拉网大扫荡”，兵分七路，于24日完成对窑门口、青塔、艾铺地区的包围。25日，在包围圈中的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机关在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一部掩护下向东、北、南三个方向突围。彭德怀突破了重围，但左权和总部几位干部却在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罗瑞卿和供给部长杨立三等总部大部分人员仍在包围圈内。罗瑞卿命令大家分为战斗小组化整为零，分散突围。

在被敌人包围的这几天，罗瑞卿一直未见着郝治平。她正跟着杨立三率领的另一支队伍寻找突围的道路。一天，她跳一个高坎，崴了脚。杨立三让她骑自己的马。郝治平说什么也不骑，她对杨立三说：“部队可以没有我，却不能没有你。”杨立三劝之再三，她就是不上马。他只好让她行军时拽住马尾巴。

这一天，罗瑞卿走过一个叫“王前”的地方，不禁闪过一个不祥的念头。当晚，罗瑞卿与杨立三会合。他看到了郝治平，惊喜地对她说：“啊呀，你没有死啊！”她点点头说：“我是拽住老杨的马尾巴走过来的，老杨是我的救命恩人。”

只剩下他们两人时，他对她说：“今天我经过一个地方叫‘王前’，听起来就像是‘亡茜’。我明明知道这个想法很可笑，可是我真为你担心啊！”

罗瑞卿夫妇的生活要数在太行这一阶段最为艰险和困苦了。但是，他们俩思想上都具有共同的崇高理想：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他们的精神生活是非常充实的，都把战胜困苦艰险当作是一种幸福，越是艰难困苦，他们相爱愈深。

到解放战争时期，生活不像在太行时期那样艰苦了。但罗瑞卿和郝治平经常是一个在前方指挥打仗，一个在后方办子弟学校，离别是经常的事。于是，每次重逢便胜于新婚，而每次重逢又意味着新一轮分离的即将来临。但是，由于他们都全身心地投入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的事业中，他们没有时间产生“相见时难别亦难”的离愁别绪。在他们的心目中：“藐视敌顽如草芥，只知工作与斗争。”

三

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先后在公安部、总参谋部担任领导工作，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他又投入到没日没夜、紧张而又繁忙的工作中。他的责任是保卫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不论毛泽东到哪里，他总要随行，特别是每逢节假日，或在天安门城楼，或在怀仁堂，他都要站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常常风趣地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

郝治平曾说：“新中国建立后，许多同志都能够夫妻一起去天安门观看

证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绝对安全，就比平时更加忙碌。他总是把保卫工作布置得非常周到细致，督促检查，唯恐有失。毛主席只要出来，他总是随在身前身后，直到毛主席退场。因此，在整个公安部长任期内，他一次也没有同我一起观看过焰火。节日里，我往往是一个人带着孩子去天安门。开始，我虽然不免有点遗憾，但当我从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看到瑞卿那高高的身影时，我却深深地为此感到骄傲和光荣。有一年国庆，我得到了一次上天安门的机会，看见毛主席来了，我兴奋地和大家一起挤上去握手，回来后，瑞卿还责备我，说这样给毛主席的保卫工作增加了困难。”

由于罗瑞卿工作忙，郝治平的担子就更重了。一方面，她有她的工作，在党的宣传战线上辛勤地工作着；另一方面，她要担负更多的对子女的教养责任，自称是孩子们的班长。人们都说，严父慈母，可在罗家，倒过来说，严母慈父，似乎更恰当一些。的确，郝治平对孩子们管得多一些。别的方面不说，在生活上，她的原则是能吃饱、穿暖就行。50年代，人们都以艰苦朴素为荣，罗家的孩子在穿着上也同样是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是老三，孩子个子长高了，裤角管就再加上一截。谁都不认为这样有什么寒碜。

罗家的孩子大都在校寄宿，而罗瑞卿又很少在家，越是节日他越忙，不能同家人在一起。罗瑞卿的孩子在回忆文章中说：

每天清晨，我们醒来准备去上学的时候，爸爸常常是忙了一夜，刚刚睡下。晚上，我们已经进入梦乡，爸爸往往是开会还没有回来。一连好几天，甚至一个星期我们都见不上他的面。在我们的记忆里，大多数的日子都是这样过的，这好像已经成了我们家的规律。而我们越难见到爸爸，就越觉得他好，觉得他亲，就越觉得和爸爸在一起的时间是那么珍贵和美好。

星期天，爸爸照例是要办公的。但是他总会抽出些时间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把这叫作爸爸对我们的“接见”。有时是谈话，有时是散步，有时是打球。爸爸健谈，也很风趣。经过长时间紧张的工作之后，在短暂的休息中，爸爸的笑容是多么舒畅啊。我们围着爸爸，抢着说，抢着笑，这真是我们最幸福而满意的时刻。可是，时间总是那么快就过去，爸爸又回到他繁忙的工作中去，无论用什么方法挽留也无济于事。即便是这样短暂的“接见”，也是难以保证的。爸爸经常出差，很长时间不回家。

尽管这时他们的生活比起战争年代来，要安定多了，条件要好多了，可是，繁重的工作使他们无暇安排自己的生活，然而，罗瑞卿和郝治平都清楚，他们之间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在一次全家人团聚时，罗瑞卿深情地巡视着他的孩子们，然后情不自禁地说：“你们谁也没有你们的妈妈漂亮。”当着孩子的面，罗瑞卿用发自内心的感情，赞美着自己心爱的人。

工作是紧张的，生活是平常的，不知不觉的，过了17个年头。

四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罗瑞卿写道：

1965年12月，林贼因我们坚守主席和党的阵地，拒绝上他们的贼船，竟以突然袭击的卑劣而又奸险的手段对我们横加诬陷，百般折磨，对待我们甚于对敌，致我腿残身病。某些方面，治平所吃的苦头比我还多还大。

罗瑞卿出事对郝治平的打击同样是摧毁性的。她没有人可以商量，也没有一个人能听她倾诉。她不仅要把这一切独自默默地承担起来，还要设法去

1966年12月的一天，红卫兵分别从医院和家里把罗瑞卿和郝治平劫走，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批判所谓罗瑞卿篡军反党集团大会。此时，罗瑞卿的腿已摔断。造反派便惨无人道地用筐把他连抬带拖地弄上台。

在会场上，有人照相拍电影。郝治平低着头。红卫兵揪住她的头发逼使她抬起头来，她就是不抬头，正在争持间，忽然听到身旁的罗瑞卿对她说：“把头抬起来，让他们照！”郝治平受到了鼓舞，心想：“我又没有罪，怕什么？”于是便抬起头来。

会后，罗瑞卿被送往一个警卫部队“监护”起来。随后，便是三天一小斗，五天一大斗，直到1967年3月底。罗瑞卿和郝治平只有在这些批斗会上才有见面的机会。1968年2月，郝治平也被投进了监狱。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罗瑞卿和郝治平的待遇有所改善。1974年1月5日，郝治平出狱。8月，她到医院去看望罗瑞卿。医院怕罗瑞卿夫妇过分激动，已预备了氧气，准备急救。但郝治平虽然很激动，表现得却很坚强。到了这时她才知道，由于林彪一伙的故意拖延，使罗瑞卿的腿伤迟迟得不到治疗，直到1969年因左小腿已无法保存才不得不做了截肢手术，并被摘掉了股骨头。她抚摸着罗瑞卿的残肢说：“少一条腿没有关系。只要心脏还在跳动，就可以为党工作。”

1975年，罗瑞卿被任命为军委顾问，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罗瑞卿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他全身心地投入了拨乱反正的工作。

罗瑞卿一恢复工作便进入了不分上班下班、没有白天黑夜的状态。桌上的文件卷宗堆积如山，办公室内电话铃声不断，来访的客人一批接着一批。他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了工作。他豪迈地对一些老战友说：“别看我现在腿不行了，真要打起仗来，给我一辆吉普车，我还能打几个冲锋！”为了处理排得满满的事务，他经常是废寝忘食，午睡，往往是假肢不取下就那么和衣打一会盹儿。由于行动不便，他甚至尽量少喝水，以便尽可能节省上厕所的时间。罗瑞卿不愿意麻烦别人，心中特别渴望能走下轮椅，扔掉手杖，大干一场。

1977年，组织上请了两位西德专家给罗瑞卿安装一个重量更轻、质量更好的假腿。这两位医生告诉他，可以安装人造股骨，以改善左腿功能。罗瑞卿怦然心动，决心把腿治好。

1978年3月，郝治平在体检时，发现肺部有一个阴影。连续观察，它长得很快。3月13日，她第二次动手术，切除了一叶肺，并证实是原乳腺癌转移到肺部。罗瑞卿得知郝治平的病情后，心情沉重地对孩子们说：“我不能就这个样子。我要出国治腿。今后我不能再要你们的妈妈照顾我。我要治好腿，照顾她，让她过得愉快轻松一些。”

7月1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罗瑞卿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治腿。在西去的飞机上，郝治平坐在背对飞行方向的椅子上，坐在对面的罗瑞卿知道郝治平有晕车、晕机的毛病，便要同她换座位，郝治平说：“算了，一会儿就到了，我能坚持。”罗瑞卿摇摇头，然后艰难地扶着桌子走到郝治平这边来，硬是让郝治平坐到对面去。

郝治平看着对面而坐的，已是白发苍苍的罗瑞卿，不由得想起一件件往事。她想起了新婚之夜那一碗鸡汤，想起了反“扫荡”中他盖在孩子木筐上的那块油布……她想，在革命斗争中他意志如钢，可对待家人，又是柔情似水啊！

7月下旬，罗瑞卿住进了医院。8月1日，手术前一天，郝治平带了一束鲜花，在张彤大使陪同下坐了两个半小时的汽车去医院看望罗瑞卿，同他在

回去休息吧，我已经服了睡前的药，明天就作手术。你放心，一切都会好的。”说完，他微笑着，摆着手，目送着她出门。这就是罗瑞卿留给郝治平的最后影像。

8月2日，当郝治平赶到医院时，罗瑞卿已经进了手术室。中午，从手术室传来消息：手术成功。守候在手术室外的她激动得掩面痛哭。但因怕感染，医院未让她看望他。傍晚，又传来消息，他已苏醒过来，还用英语对给他动手术的医生道了谢谢和晚安。

看来一切顺利。经劝说，郝治平回旅馆休息。她刚躺下，听到了不祥的电话声，接着便有人敲门。等她赶到医院，罗瑞卿因突然心肌梗塞已与世长辞了，时间是凌晨2时40分，北京时间是上午9时40分。

……

郝治平又一次从极度悲痛中挺了过来，她永远忘不了罗瑞卿远行之前对她的微笑，这是她心目中永远珍藏的春天。

许光达（1908～1969）湖南长沙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青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见习排长，同年在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任排长、代理连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参谋长，第十七师政治委员、师长，红三军第八师二十二团团团长、八师师长，红三军第二十五团团团长。1932年赴苏联，先后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7年回国。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第三分校校长，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区司令员，中央情报部一室主任，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八路军一二师独立第二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二兵团军长，第二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兼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院长，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

1938年10月14日，邹靖华在延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10年前的1928年阴历8月20日，许光达与邹靖华结了婚。新婚燕尔，刚过10天，由于叛徒出卖，许光达被迫离开了心爱的妻子。谁曾料到，这对夫妻一别就是10年。10年生死两茫茫！历尽千辛万苦的他们，却传奇般地在革命圣地意外相逢了！动人的故事在延安一时传为美谈。

在这喜上加喜的日子里，许光达和邹靖华都很激动。妻子脸上泛着红晕。丈夫握住妻子的手，高兴他说：“10年了，我们硬是走到一条路上来了！”身经百战的将军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诗兴勃发，连夜写下了一首诗，送给妻子作永久的纪念：

我俩的结婚整整已经有了10年，
然而相聚的时间仅仅只有两个月零21天。
不知流过了多少的伤心泪，
也曾受尽了艰苦与辛酸，
丝毫也不能摧毁我们铁的心愿。
在生命的途上还会遇着狂风巨涛，
像从前一样的冲破，
我们永远的骄傲自豪！

——在结婚后10周年日写给我的泽以留后念

华 1938.10.14 延安

邹靖华有些颤抖的双手接过诗稿，把它紧紧地贴在胸前，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激动的泪花不由自主地滴落下来。10年来，丈夫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她则是在期望和绝望的苦痛中熬过来的。那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新婚之夜。亲友们都已散去，新房里就剩下了新郎和新娘。忙碌了一天的新郎，这才走到了新娘的身边。他伸手欲把新娘头上的盖头揭开，又有点胆怯，但还是鼓足了勇气揭开了。那对火红的蜡烛明晃晃的，照得满屋通红，此时好像也有些害羞似的，若明若暗。新郎心里怦怦直跳，偷偷看着新娘。新娘满脸飞红，更加楚楚动人。

他们的婚姻原本是包办的；但他们又是自幼相识，有着较深的感情基础的。

户农民家庭。小名叫五伢子。9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家贫上下起学，许德华经常站在学堂的窗下偷听老师讲课。教书先生邹希鲁，原是清朝末年的举人，看上了这个勤奋好学的放牛娃，免费收为学生。11岁那年，他考上了长沙县立第一小学高小部。13岁时，考入长沙师范。邹希鲁老师也受聘到长沙师范教国文。在此期间，许德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1922年春，邹希鲁托人到许家，向许德华的父亲提亲，要把9岁的女儿桃妹子许给14岁的五伢儿。许子贵一向敬佩邹希鲁，当然是满口答应。桃妹子，名叫邹经泽，后改名邹靖华，是邹希鲁的次女。邹希鲁长年游学在外，顾不上家。那年长沙一带久旱无雨，禾苗枯死，眼看生活无着，邹希鲁的大哥一狠心上吊死了。叔公逼着邹希鲁的妻子卖掉桃妹子和小女儿杏妹子。邹妻走投无路，悲愤上吊自尽。邹家连遭不幸，只得早点为桃妹子找婆家，他自然想到了自己的得意门生许德华。许德华当时还小，对婚姻之事似懂非懂，谨遵父命就是了。

邹家在长沙东乡金家湾。桃妹子对许德华并不陌生。她记得前年春天，父亲带她去他教书的学校看人家开运动会。

来到一个沙坑旁，她看到两根铁柱架着一根细竹杆，有几个手握大竹杆的男生在试着从上面跳过去。父亲告诉他，那叫“撑杆跳高”。

突然，一个矫健的身影从横杆上一跃而过，像只燕子一样轻松。父亲欣喜地告诉桃妹子说，刚才从眼前掠过的小伙子叫许德华，是个勤奋好学、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将来一定大有作为。

可那时桃妹子根本不会知道，父亲已有意选这个小伙子做女婿。

其实，邹老先生早就对许德华有了好印象。他喜欢这个孩子聪明上进，刻苦好学的劲头儿，又觉得他出身农家，为人忠厚诚实，安守本分，女儿将来嫁过去也放心。

1925年5月，许德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月，他参加长沙群众声援“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头上受了伤，鲜血顺着面颊流下。他急忙躲避警察的追捕，闯进一家院子，意外遇见了桃妹子，又惊又喜。原来这是桃妹子的姐姐家。1926年春，许德华被黄埔军校录取。到校不久，他特意给桃妹子寄去一张照片。

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许德华所在的黄埔军校第五期学员迁来武汉，并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7月，许德华武汉军校毕业，赴职之前，匆匆忙忙回家探亲。

许德华来到邹希鲁家门前，轻轻地叩了几下。门“吱呀”一声开了，出来一位十四五岁的妹子。她抬头一看，眼前站着一位十八九岁的青年军官，身材修长，脸膛黑里透红，浓眉大眼，透着智慧和聪明。她认出来了，喊了一声“五哥”！

许德华也认出了这正是自己思念的桃妹子，只是比一年前相比长高了。桃妹子把德华让进屋，冲着书房喊道：“爹爹！德华哥回来了！”

桃妹子给德华倒了一杯茶，就忙着烧饭去了。邹希鲁与许德华拉着家常，相互询问着别后的情况。饭后，邹希鲁因学校有事出去了。两个年轻人坐到了一起，诉说着心中的思念。

在桃妹子眼里，德华已经长成真正的男子汉了。他体格魁梧，身材健壮，军校生活的锻炼，使他文静的气质又增加一层刚勇的色彩。桃妹子强按心中的喜悦，把一年多的情况尽数倾吐出来。

谈着谈着，桃妹子突然问道：“德华哥！你说农民运动糟得很，还是好得很？”

这一问题使德华很兴奋，他对桃妹子刮目相看了。他多么希望桃妹子能

桃妹子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他的公开身份是黄埔生。

许德华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认为，农民运动好得很！”桃妹子会心地笑了。

他俩倾心谈着。渐渐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了……

1927年9月，三河坝战斗中，许德华负了伤，被安排在茂之前村的一个老家乡养伤。房东孙大妈尽心照顾，孙大妈的女儿翠花更是无微不至。翠花19岁，是赤卫队员，没有一般女孩子的娇气，更多的是飒爽的英姿。翠花看中了他，孙大妈喜欢上了许德华，想让德华留下成个家。许德华望着眼前这位慈祥的老妈妈，心里想：“大妈，我不能留下来给您当女婿，苦命的桃妹子在等着我，革命事业在呼唤着我。”许德华伤口初愈，即告别大妈和翠花，寻找党组织去了。

许德华徒步到了潮州，乘火车到汕头，又乘船到上海，没有找到党组织。又辗转到了安徽寿县，和党取得了联系，并担任了安徽国民党三十三军学兵团的教育副官。这个学兵团实际上是由一批南昌起义下来的共产党员控制着，反蒋反封建的革命气氛很浓。1928年6月，许德华等共产党人不慎而暴露身份，逃出了寿县学兵团。党派许德华和另外6名同志去西北军做兵运工作。途中，许德华请了假，顺便回家探望。

许德华赶到家的那天正是中秋佳节，真是月圆人亦圆，全家人高兴非常。第二天，父亲许子贵拿出了邹希鲁的一封信。这时，邹希鲁已经去清河县当县长。临走前，给许子贵这封信，说如果德华回来，就为他们完婚。

说实话，许德华心里惦念桃妹子，但结婚之事还没想过，主要是因为自己四处奔波，行踪不定，留着桃妹子守空房，反而不好。许子贵却想用结婚来拴住儿子，选定了阴历8月20日，为他们成婚了。

新婚之夜，二人说起了悄悄话。

许德华说：“桃妹子，我是个穷光蛋，你嫁给我，可要吃苦啊……”

“不要这样说，我会种田，也会绣花，我能自己养活自己。”

许德华故作神秘地问：“你知道郭亮吗？”

桃妹子一惊，瞪大了眼睛望着丈夫。郭亮是共产党的大头目，被国民党杀了，头就挂在长沙城的城门口。为这事，爹爹在家里大骂国民党凶残。丈夫问郭亮干什么？

许德华又问：“报纸上说共产党人都是青面獠牙，杀人放火，你相信吗？”

“这可是瞎说！姨父就是共产党，爹爹的学生中也有好多人是共产党，全是些好人。”说到这儿，桃妹子像品出点什么，问丈夫：“你是哪个党的？”

“我哪个党也不参加，我就是黄埔生。”许德华戏谑地反问：“你喜欢哪个党？”

桃妹子小声地说：“共产党。”

“好！那我就争取当个共产党。”许德华用试探的目光看着妻子。

桃妹子点点头。

两颗充满青春活力的心贴得更近了。德华暂时忘却了心中的烦恼，脸上挂满幸福的笑容。桃妹子也尽情享受新婚的甜蜜和丈夫的体贴，只怪时间过得太快。

这是结婚后第10天。两人正要就寝，门外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

许德华开门一看，见桃妹子的继母手打灯笼站在门外，还没进门，就喘吁吁地说：“快，五伢子你快躲一躲！”

德华赶忙扶岳母进屋坐下，递上一杯水，并不惊慌地问：“娘，出什么事儿了？”

岳母告诉他，傍晚收到一个亲戚从长沙送来的信，说是汉口来了电报，

德华心里有底了，一定是汉口那边知道了自己是共产党员，才发来缉电。那位在长沙警备队当差的亲戚在他结婚时来过，颇为敬佩黄埔出身的许德华。这次多亏他来报信，否则……

桃妹子震惊了，急切地问德华：“你当真是共产党？”

许德华点点头。

“你快走，走得越远越好！”桃妹子已顾不上为自己着想，此一别前途渺茫，何日才能重逢？自己依靠谁呢？她还为丈夫担心，德华在外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

许德华用手帕擦去妻子的泪水，安慰说：“桃妹子，多保重，我会回来的！”

“德华，放心走吧！我等着你！”桃妹子再也说不下去了。

许德华顾不上与家人一一告别，立刻出了家门。桃妹子把丈夫一直送到浏阳河边，送上了一只小木船，久久伫立在河边，眺望着远去的亲人，泣不成声！

这匆匆一别就是 10 年！

许德华逃出了湖南。他估计，定是一起去西北军的那 6 个人中的一个在武汉被捕，出卖了同志。西北军已去不得，许德华再次与党失去联系，暂时找到了清河县岳父那儿。后又逃到北平，病倒在旅店。在旅店老板的女儿帮助下，找到了地下党的廖运周同志。经廖运周介绍，1929 年 3 月，许德华来到江苏无锡，在国民党独立旅警卫营第一连第三排当排长。

在无锡，许德华与党接上了关系，同警卫营的另外两名中共党员编为一个党小组，在独立旅里开展兵运工作。

1929 年 9 月，许德华被派往上海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军事政治训练班学习。在学习班学习约一个月，许德华被分派到湘鄂西苏区从事军事工作。离开上海时，他改名许光达，取意不懈地奋斗，必达光明的彼岸。

1930 年春节，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在监利县汪家桥成立，许光达任参谋长。1930 年 7 月，红二军团在公安县正式成立，贺龙任总指挥，许光达在红六军十七师任师长。从此，他跟随贺龙开始了湘鄂西苏区的战斗生活。

1931 年 8 月的一次战斗中，许光达胸部负伤。由于伤势太重，苏区医院条件太差，很久未能痊愈。第二年，组织上决定把他转送上海医治。许光达在上海养病期间想给桃妹子写信，又怕暴露身份，给家人带来麻烦。于是，他想出个办法。信是这样写的：

德华兄：

安徽寿县一别，你说回家成亲，婚后即归。至今两年有余，不见音信。是爱妻扯你的后腿？还是自己激流勇退？

望来信告之。

顺致福安！

廖运周

收信人地址是：长沙县东乡苦竹园，收信人是许子贵。

再说桃妹子。自许光达从家里逃走后，警备司令部三天两头到许家坐堂要人。他们要么把许子贵一家拉到街上示众，百般凌辱；要么敲诈勒索一番，搞得许家鸡犬不宁。桃妹子不止一次梦见大夫被敌人抓住砍了头，一次次从恶梦中惊醒，泪水滴湿了枕头。直到邹希鲁被罢官回到长沙，告诉她许德华已到了北平，桃妹子才感到一丝宽慰。

后来，桃妹子到一家袜厂去做工。她白天上工，晚上还要伺候老板娘。

华离婚。桃妹子回绝了，老板就给桃妹子挂上“共产婆”的牌子，每天让她站在工厂门口，只要下班的工人从她身边走过，老板便指着她说：“谁要是通共产党，这就是榜样！”

由于长期过度劳累，桃妹子身心受到摧残，累得经常咳嗽、吐血，有一次竟晕倒在织机旁。医生说她得了“痨病”。她怕爹爹难过没有告诉他，自己默默地忍受着疾病的折磨，等待着丈夫归来。

一天，桃妹子突然在报上看到许德华的名字登在了被杀的“共产分子”名单中。她惊呆了，丈夫的死讯摧毁了她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她用裤带把自己吊在树上，幸好邹希鲁把她救了下来。

那是1932年4月的一天，许子贵突然收到许光达从上海寄回家的怪信。信的内容让人摸不着头脑，许子贵把信交给了邹希鲁。邹希鲁看完信，觉得此信大有文章，来信人可能知道许德华的下落，是投石问路之计。因而，他建议尽快给这个廖运周回信，问问德华的下落。桃妹子立即代表全家写了回信：

运周：

来信收悉。感谢你的挂念。其实，德华自1928年秋离家，一直未归。他现在生在何万？死在何处？望来信告之。

又及：他的妻子桃妹子现在工厂做工，苦得很，一心在等他。全家人一如既往，恕不赘述。

盼望回信。

许子贵

许光达顺利地接到这封信，长期悬在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立即给家里写回信，说自己在上海做事，一切都好，并邮来200块银元。这是他在上海节衣缩食，把组织给的医疗费和生活费节省下来的钱，寄托了许光达对亲人的眷恋之情。信中，许光达还嘱咐桃妹子读点书，才能明白做人的道理。

许光达的第二封信到了桃妹子手中，她双手抱着信紧贴胸前，高兴得哭起来，丈夫还活着！许子贵、邹希鲁老泪纵横，一家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

不久，桃妹子就进中学补习课程，后来又考上了长沙师范。她试图给丈夫写信，可寄去的信如石沉大海。

她哪能知晓，许光达发走信的当天，被推到了处置室，医生要为他做手术。由于叛徒出卖，供出这家医院是我党秘密联络点，组织上将许光达迅速转移。后又因许光达的伤在上海无法治疗，组织上把他送到了苏联医治。

桃妹子没有收到许光达从上海寄来的回信，却收到了丈夫从苏联写来的信。全家人正担着心，这下又乐开了。许光达知道妻子不懂俄文，为了与妻子通信，在信中附上了10张小纸条，纸条上用俄文写着他在苏联的地址。桃妹子急忙寄上了第一封信。很快，10张小纸条全用光了，始终不见回信。事实上，许光达一封也没收到。这是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的关系恶化，双方关了边界，不再通邮。人各一方，他们又陷在无尽的思念、忧虑之中。

许光达伤愈后，留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七七”事变后，许光达回到延安，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延安卫戍司令员等职。许光达以他黄埔军校和苏联东方大学的资历，当时在延安的地位以及潇洒倜傥的儒将风度，自然引起许多姑娘的爱慕。抗大是人才集中的地方，漂亮能干的姑娘又多。况且，许光达又与妻子多年失去联络、生死不明，有人劝他再娶，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始终惦念着妻子，打听妻子的情况，他真诚地期待着、盼望着，甚至在呼喊：“桃妹子，你在哪里呢？”

力。她理解了丈夫所从事的事业的意义所在，甚至为丈夫而感到自豪。抗战爆发了。举国上下，群情激昂，抗日活动风起云涌。桃妹子也跃跃欲试。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是父亲的老友徐特立先生。现在国共合作了，徐老先生来长沙公干，顺便来探望分别多年的老友。徐老早年做过毛泽东的先生，在湖南教育界是德高望重的前辈。他见邹希鲁让这么个二十四五岁的知识女性在家赋闲，竟批评起他了。他问桃妹子：“想不想去上大学？”“想呀。什么学校？”“抗日军政大学。怎么样？”桃妹子想，这个大学又能学习，又能抗日，我愿意去。于是，她很高兴地答应了。

“不过，”徐老先生故意要试试她的决心，说：“这地方可很远，在大西北的延安，生活也很艰苦，你敢去吗？”

延安？那可是共产党的地方。去那儿，我不也就成了共产党了？对，我也要走光达的路，说不定光达也在延安呢。就冲这，我一定要去。

想到这里，她坚定他说：“我不怕远，我敢去！”

要走了。桃妹子想想这些年的苦难生活，恨不得马上就走。可又一想，自己所以有今天，不也是那些生活的磨难使自己成熟起来的吗？她又有点留恋了。

桃妹子和父亲商量，把原来用的学名邹经泽改为邹靖华，意为靖忠报效中华。从此，她一直用这个名字。

第二天，邹靖华回到了萝卜冲许家，把去延安的打算告诉了许子贵。许子贵是个明白人，虽然舍不得邹靖华走，但这个年月，媳妇去当红军，他也就同意了。

邹靖华回到长沙，会见许光达的妹妹桂妹子，约好了一起去延安。她们一起来到了长沙八路军办事处，拿了徐特立写的介绍信，按照预定的行程上路了。

她们来到了武汉，在寻找八路军办事处的途中，遇见了国民党的侦缉队的盘问。邹靖华身边带着当年许光达从黄埔军校寄给她的那张照片，身着军装，挎着战刀。她十分珍惜这张照片，这次去延安又带在了身上。可是，沿途搜查甚严，带在身边不方便。于是，她们来到了长江边。靖华拿出照片，看了又看，最后忍痛撕了，心里充满了惆怅。

她们来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林伯渠同志。林伯渠与邹希鲁也是故交，热情接待了她们。邹靖华想，林伯渠认识的人多，于是向他打听许光达的下落。林老认识许光达又同情邹靖华，只是林老心细，先打了一个电报到延安告诉许光达，邹靖华要去延安。因为，当时有些人参加革命后解除了父母包办的婚姻，而另组家庭。林老想，许光达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呢？

许光达接到电报后，又惊又喜。和妻子失去了6年的联系，她不但顽强地活着，居然还要来延安参加革命，这真是喜从天降。他立即给林伯渠拍了回电，欢迎邹靖华到延安。可惜邹靖华没收到电报就驱车来延安了。

几天后，她们到了延安。远道奔波，十分疲劳，她们正想痛痛快快地睡一觉的时候，一位小战士来到了她们的住处。

“谁叫邹靖华？”

“谁找我？”

“我们教育长。”

“你们教育长是谁？”

“许光达！”

一位高大的军人走了进来。借着微弱的麻油灯，邹靖华一眼就看出这是自己思念多年的丈夫！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许光达也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无声的泪滴落下来。

的流水声在静谧的夜间响动，那是许光达和邹靖华说不尽的心里话，诉不完相思情。

第二天，许光达领着妻子应邀到毛泽东家作客。一见面，毛泽东就握住了邹靖华的手，高兴他说：“祝贺你们夫妻团圆！欢迎你到抗大来念书！”

邹靖华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但却久闻大名。父亲邹希鲁曾是毛泽东在长沙师范读书时的国文老师，徐特立伯伯来家时常和爸爸谈到他。毛泽东向邹靖华打听长沙的情况，也打听了他的老师邹希鲁和其他老师的情况。最后，送给邹靖华几本马列主义的小册子，风趣地对邹靖华说：“光达是信马列的，你可不要信佛哟！”

邹靖华和小姑桂妹子被分配到抗大四队女生二队学习，开始了革命的生涯。转眼之间，邹靖华来延安两个多月了。10月14日，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迎来了她与光达结婚10周年纪念日。如今，她终于从昔日的苦痛中熬过来了，见到了自己日夜思念的亲人，见到了宝塔山，见到了延河水，见到了飘扬的红旗，开始了崭新的革命生活。

10月的西北风哟，凉飕飕；10月的黄土坡哟，金灿灿。陕北的10月，正是收获的季节。

夜深了，邹靖华精心收藏起丈夫的诗稿，带着幸福的微笑进入了梦乡……

许光达和邹靖华在延安一共生活了4年。1939年5月，邹靖华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延滨，意为诞生在延水河畔。1941年又有了一个女儿，取名玲玲。

1942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也是最艰苦的年代。经许光达一再请求，中央军委批准他到对敌斗争激烈的晋西北，任晋绥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兼独立第二旅旅长。他们把延滨留在延安，带走了吃奶的玲玲。

进入二分区地界时，到处是劫后惨状，他们一天一夜没有吃饭了，到达保德县境时，才在老乡家讨到吃的，许光达夫妇不满周岁的女儿玲玲饿坏了，吃得过多，当晚得了急性肠炎，医生拿不出治这病的药，建议派人护送玲玲回延安。许光达不同意，他刚从延安来，哪能立即又回去呢。他让医生用土方草药给玲玲治病，玲玲泻了一夜，许光达夫妇心疼地守候了一夜，第二天玲玲就停止了呼吸。邹靖华悲痛得昏了过去，许光达紧紧抱着女儿，跌坐在凳子上。他亲自给女儿找了一处长眠的地方……

1946年，许光达被任命为纵队司令员，并奉中央军委之命，西渡黄河，参加保卫陕北、保卫党中央的战斗。

1948年2月，许光达指挥围攻宜川的战斗。在战前侦察时，敌人的一发炮弹落在了许光达附近，弹片嵌在他的后背上。当时，许光达全神贯注地忙于战前准备工作，竟没发现自己受了伤。回到驻地，觉得背上隐隐作痛，才发现那个弹片。邹靖华要扶许光达到卫生所去包扎。许光达说：“不必了，大战展开之前，指挥官负伤，这对部队情绪有影响。”

邹靖华要拔出嵌在许光达肉里的弹片，但又怕许光达疼，始终不敢下手。

许光达安慰她说：“当年关云长刮骨疗毒，不哼一声，我这点伤算得了什么？”许光达如数家珍，把身上一块块伤痕介绍给妻子。听着听着，邹靖华哭了起来。

“瞧你，像个孩子似的。我身上的伤不算多，闵洪友才是冠军呢！干革命嘛，流血负伤是家常便饭。我和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比是幸运的，想起他们我心里就难过，为了完成烈士们未竟的事业，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警卫员蓝德明正好进来，他帮许光达拔出了弹片。许光达严肃地对小蓝和邹靖华说：“你们谁也不准乱讲，透露出去，按动摇军心论处！”

1950年5月14日，许光达乘飞机离开兰州，到北京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任命。

达夫妇踏进了新的共同奋斗的天地中。

为了我军的装甲兵建设，许光达呕心沥血。他经常亲自查阅许多原版的俄文资料，召开各种会议反复讨论，反复研究，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常常是邹靖华把饭菜送到他的办公室里来，他也顾不上吃。邹靖华劝他注意休息，他却摊开双手，表示难以从命。有时回到家里，许光达也迟迟不睡，坐在办公桌前工作。看见丈夫日见疲惫，邹靖华真心疼啊。本想解放了，能让丈夫轻闲一下，他却更累了。邹靖华尽量帮丈夫做些事，以减轻他的劳累。

不久，装甲兵机关党总支成立，邹靖华任总支书记。这样，邹靖华可以有更多的条件和时间来帮助许光达分忧了。

装甲兵机关的人员来自不同的单位，思想问题比较复杂。有些同志认为自己是“土包子”，搞技术不行，要求回步兵去；有些人虽然愿意来装甲兵，但接触到技术问题有畏难情绪；也有人闹地位、闹名利。因此，做好思想工作当务之急。经过邹靖华和党总支同志的努力，很快稳定了机关干部队伍的思想。

许光达一再强调：“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他号召机关人员每人都要学会一种驾驶技术，或是坦克、或是汽车，至少要学会开摩托车。邹靖华连自行车都不会骑，但她响应许光达的号召，鼓起勇气学骑摩托车。有一次，摩托车翻车，把她摔得鼻青脸肿。回到家，许光达心疼地劝她注意安全，邹靖华笑着说：“你司令员有令，我拼死拼活也要执行啊！我不能扯你后腿。”

邹靖华体贴丈夫，支持丈夫的工作，许光达也非常关心、尊敬自己的妻子。

邹靖华身体瘦弱、多病，许光达尽量地照顾妻子。装甲兵机关每周有一两次电影，每次看电影许光达都要搀着夫人的胳膊，一同走向座位。熟悉他们的人，经常能看到许光达搀扶着老伴的身影。有一次，许光达正在书房里工作，儿子延滨走了进来，脸上泛着红晕坐到爸爸的身旁：“我找了个女朋友，拿不定主意，请爸爸帮我参谋参谋。”许光达笑笑：“你先和妈妈去商量商量，妈妈同意，我就没意见。记住，内事不决问妈妈，在咱们家里，真正的一家之主是妈妈，而不是爸爸”许光达还叮咛他：“延滨，别忘了，明天是妈妈的生日，又是星期天，咱们上午陪妈妈去故宫，回来为妈妈过生日，怎么样？”“是！”延滨顽皮地给爸爸敬了个军礼。在许光达参加的重大的礼仪场合中，夫人经常可以陪同前往。但邹靖华却不愿参加这种活动，因为她出身清贫，解放前得过肺病，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参加革命后又随丈夫南征北战，艰苦的生活使她未老先衰，与那些又年轻又漂亮，在闪光灯前彬彬有礼、光彩照人的夫人相比，自然有些逊色。但许光达每次都硬拉她去参加活动，他说：“国家的威仪，不仅仅表现在外表上，而主要是看一个国家的国魂、士气、民风和人民的精神面貌。在这方面，你是可以把那些外国武官的夫人比下去的。‘糟糠之妻不下堂’，这是做人的起码道德，也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崭新的道德风尚。何况你我是患难多年的夫妻。”

许光达与邹靖华之间的感情，不仅经历了战争年代艰难困苦的考验，也经受住了和平环境的考验。全国解放后，他们身居高位仍然互相督促、互相帮助，在荣誉和名利面前始终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

建国初期，有几天，许光达突然变得沉闷，不说也不笑。他对妻子说：“靖华，有件事，我要和你商量。中央和军委决定授予我大将军衔。可我受之有愧，好多资历比我深，贡献比我大，当过我的直接领导的同志，却授予上将军衔，相比之下，我的是高了些，心里很不安。”许光达说得很真诚，“我已上书中央军委和毛主席，要求降为上将。可是，被驳了回来。主席讲，这是经过集体讨论定的，是全面衡量的，照顾到方方面面，就这么定了。我

的指示办。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你帮我拿拿主意吧。”

“你看这样好不好？军衔降不下来，要求降低行政级别行不行？这样，不就同别的大将有所区别了吗？”

许光达为之一振，连声说：“好，好主意，我马上给中央军委打报告，要求行政级降一级。”他感激地握住妻子的手，“你可真是我的贤内助啊！真乃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靖华也。”

许光达要求降级的报告被军委批准了。他的行政级定为五级，这就是我国十员大将中，其他九员大将都是行政四级，惟独许光达是行政五级的原因。

20年过去了。这期间，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光达和邹靖华为党和人民勤奋地工作着。

然而，“文革”的厄运来临了。许光达，这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卓越的军事将领，也成了祸国殃民的奸臣们篡党夺权的障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1967年8月14日，许光达被捕了。临出门时，许光达对邹靖华说：“靖华，看来你得有个准备，可能还要再过一次10年那样的生活。”

那是多么不堪回首的10年啊！邹靖华感到惊愕，我们吃了那么多苦，浴血奋战，才换来了今天，可为什么革命的功臣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敌人？

许光达见妻子默不作声，又说：“你还记得我写给你的那首诗吗？你我都是大风大浪里闯过来的，今天也同样不会在任何艰难面前低头！”

邹靖华望着丈夫那刚毅的面孔，两眼噙着泪花，使劲地点着头。

许光达走了，严刑拷打，轮番批斗，残酷折磨，许光达的健康状况恶化，心脏病经常发作。他带着对妻子的无限眷恋，对林彪集团的无比痛恨，含冤而去。

1969年6月3日，专案组通知许延滨，许光达8点半死去。他的确去世了，他死在了厕所的马桶上。一颗耀眼闪光的将星陨落了！

在许光达的遗物中，有一本《毛泽东选集》，扉页上有许光达写的一首诗：

身经百战驱虎豹，
万苦艰辛胆未寒。
只为人民谋解放，
粉身碎骨也心甘！

这就是人民的大将军的豪迈胸怀，惊天地，泣鬼神，光昭日月。

6月26日，《解放军报》只刊登了许光达病逝的消息。邹靖华手捧报纸，没有眼泪，她心里有的只是恨。“文革”动乱，她也受株连，被戴上高帽子，挂上“许光达的臭老婆”的牌子游过街。

她更记得造反派抄出了她珍藏了30年的“情诗”，责骂她：“老没正经的，头发都快白了，还写情书。”

当造反派发现，这诗写于30年前时，觉得丢了丑，硬强词夺理说：“不管怎么说，你保管这份情书就是思想糜烂，精神颓废。革命者应该是心里只装着‘革命’二字，不能有任何杂念。”并且责令邹靖华，必须与许光达划清界限。

邹靖华嘲笑道，“我们结婚都40年了，彼此的心都早已凝结在一起了，这界线能划得清吗？”

是的，许光达和邹靖华在革命的大熔炉里早已合为一体，彼此的心早已凝结在一起了。这是谁也无法分开的。昔日的“情诗”是革命者爱情的结晶，又在以后的生涯中，鼓舞他们献身革命。

自己所献身的事业奋斗不止的力量源泉，10年，又是10年，直至永远。

陈赓（1903～1961）湖南省湘乡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副队长、连长。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和讨伐陈炯明的东征。1926年赴苏联学习，次年回国参加南昌起义，任营长。后赴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做情报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团长、师长，红军步兵学校校长，红军干部团团长，陕甘支队第十三大队队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太岳军区太岳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

一

那年，上海大学刚刚开办不久，全国革命青年闻风紧从，纷纷至“上大”学习。陈赓从长沙到达上海。他怀着强烈的求知欲，经常到“上大”旁听。

当时的上海大学坐落在青云路师寿坊第三条弄堂，没有校门，没有大礼堂，没有图书馆。这里有三件事最惹人注目：一是庶务课的门口挂有一大幅红布，上面贴着各式各样纸头写的文章、诗歌、学习心得和漫画，右角上写着“上大学生墙报”。另一件是收发室的旁边摆着一个书摊，摆着《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等刊物和许多文艺书籍。再一件是任教的师资雄厚，既有瞿秋白、张太雷、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等革命先驱，也有颇负盛名的教授学者如沈雁冰、陈望道等。

最使陈赓津津乐道的还是这里的辩论。学生来自各地，成份不同，政治信仰各异，遇到问题就辩论。有一次陈赓正在谈论中国革命要从农村爆发的问题时，忽然一个身穿工装的女同学站起来，大声说：“不，中国革命首先应该由工人阶级发起！”于是，陈赓与她辩论起来，各执己见，谁也不肯相让。陈赓心中敬佩道：好厉害的一张嘴！

不久，党在上海工人区办起了平民夜校，陈赓到那里任教，却与那位在上海大学和他辩论的姑娘不期而遇了。

姑娘叫王根英，17岁，是英商怡和纱厂的女工。她在厂里长期领导女工进行斗争，是小有名气的工人领袖。她在斗争中深感自己文化低，所以夜校一成立，就约了妹妹王根妹和十几个女伴，成为夜校的第一批学生。她仍是那样的热情奔放，爱辩论，在课堂上发起言来侃侃而谈。

陈赓借着夜校教室里微弱的灯光，看见王根英那张娴静而又显得稚气的脸上，有一双天真无邪的黑眼睛，左眼上方一颗美人痣。她那清脆而庄重的嗓音尤其使他赞叹不已。此后，她那圆圆的脸庞和齐耳短发，常常闪现在陈赓面前。他很想找她谈谈，可她，似乎在躲着他，或许这就是爱的信号。

于是，陈赓毫不犹豫地写了一张字条：“我爱你！”让人递给正在前面发言的王根英。王根英一看，脸红心跳手发烫。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家哪里经过这样大胆的挑战，何况又在大庭广众之下！一分钟过去了，陈赓没有料到，回报他的既不是脉脉含情的注视，也不是悄悄把纸条掖进怀里……这位

唾沫，“叭”地粘在墙上。

寒冬里，陈赓脊背上沁出了一层汗。

他又急又气，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一张纸条接着一张字条地写，一张接着一张朝前递。

她毫不示弱，回报的还是一口唾沫，“叭”地往墙上一贴。

散会了，同学们轰地围上来，为这种奇特的求爱方式不住喧哗。

而此时，在没有喧哗的地方，他俩默默对视，一任爱情的波涛在胸中奔涌。

不久，陈赓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返回湖南，两人一别就是4年。

1927年4月27日，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赓和王根英作为代表，相逢在武汉。

“根英，咱们结婚吧。”

“亏你想得出，开会怎么结婚？”

“嘿，那还不容易，被子搬到一个床上……”

王根英一把捂住陈赓的嘴：“你别胡来，没有证婚人我可不能嫁给你！”

陈赓找到周恩来，周恩来满口答应，并帮助他们筹办了简单的婚礼。陈赓和王根英的被子搬到一起了，小屋成了洞房。

他们没有蜜月。不几天，王根英去出席国际工人太平洋劳动大会，随之奉命调回上海新闻路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他们再次相见时，陈赓已经在南昌起义中受了重伤。第二天，他们家里诞生了一个小生命，取名知非。为了避开敌探特务的追踪，他们两年搬了五次家。根英竭力掩护陈赓，保障他的安全。

1933年3月，陈赓被捕解往南京。王根英在闸北酒楼上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着急，竟和怀里抱着的知非一起从酒楼上掉了下来，母子都受了伤。此后，她只能在妈妈家里和乡下的亲戚家里隐蔽，望眼欲穿，思念着咫尺天涯的丈夫。不料陈赓刚刚逃出铁窗，她又身陷囹圄……

1937年8月，国共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作为中共全权代表来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周恩来亲自到南京国民党的“反省院”救出了王根英等一批政治犯。不久，周恩来就带她到了西安。她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八路军总政治部，陈赓也是闻讯当天从三原地区三十一军驻地赶来的。

就在这天晚上，陈赓写下了下面一则深情的日记：

8月27日。上午乌云密布，下午微露晴意，大家都喜形于色。昨日根英由西安到云阳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为我们庆贺，并另辟一室，使我们作竟夜之谈。是晚彼此互诉离情，直达深夜，尚无疲惫，其快乐有胜于1927年武汉新婚之夕。根英在狱中达4年，艰苦备尝，在敌威迫利诱下，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不为动摇，使我对她更加敬佩。从此我俩的爱情更趋稳定，而绝对不可动摇了。

匆匆相见，又是匆匆作别。

1937年9月15日，王根英离开陈赓的司令部，回到云阳总政治部。第二天，就在陈赓率部出师抗日的同时，王根英离开总政治部，前往延安陕甘宁边区党校学习。在分手时，陈赓送根英上了卡车，对押车的副官风趣地说：“她是我老婆，我叫陈赓。你把她带回延安。路上的事我就不管了。”

1938年秋天，党组织满足了她的要求，调她到一二九师供给部主办的财经干部学校当政治指导员。

不久后的一天，敌人进攻南官地区，师供给部被敌人包围。王根英随警

带出来。她沿着狭窄的小路往回跑，把挎包取出。刚一出村，不幸与敌人遭遇。等到村外的部队冲进来接应她时，敌人罪恶的子弹已经射入了她的胸膛。

此时，陈赓正率领三八六旅越平汉线西进。他在当天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一跃而起，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起来，五脏六腑仿佛都在燃烧！他独自一人走进积雪初融的树林，坐在砍倒的树上，双手蒙着脸，沉痛地回忆着根英。他掏出日记本，写下了一句话：“今天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

无限悲痛萦绕着他。他中断了已持续记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日记。他发誓：“我要为她守节三年！”

1941年，他派人给冀南的杨秀峰送去一封信，请他查找王根英烈士的墓。

1946年1月，上海地下党找到了正在一家西餐馆里当仆役的知非，辗转将他送到陈赓身边。父子相见，陈赓一把抱住知非，第一句话就是：“你妈妈的坟已经找到了。党很关心，开“七大”向牺牲的先烈们悼念，还挂着你妈妈的像……”

二

悲痛使陈赓的头发一下秃了许多。就这样，经过了两年的时间，陈赓终于从悲伤中挺了过来。

爱情又一次悄悄地来到了他的身边。时间是1940年五六月间，地点在山西武乡县潘龙镇。这是由抗大总校文艺工作团团长王智涛导演的一幕“巧遇”。

抗大总校文艺工作团的三位姑娘一早起来，唱着跳着，顺着山区土路，朝潘龙镇走去。团长叫她们来取道具。在王智涛家里，她们看见了陈赓。他是养伤路过这里的。姑娘们早就听说陈赓许多传奇，围住他，叫他说些战斗故事。

“我有啥好讲的！”陈赓低头看看伤痛发作的腿，眉毛胡子柔情地皱了皱说：“会昌受伤的时候，我当时真想开枪自杀！”

三位姑娘一愣，她们听过不少首长做报告，像如此坦荡开朗的还是头一个。他不炫耀自己的功劳，却谈起了负伤后的思想斗争。

他朴实无华，谈吐豪爽，初次见面就给姑娘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她们天真无邪，直到抬着道具出门，也没领悟取“道具”的真正含意。

王智涛指指她们的背影，问陈赓：“你喜欢哪一个？”

“好哇，你在给我做媒？”陈赓落落大方，用下巴点了点，毫不掩饰：“中间那个。”

中间那个是傅涯。她1918年出生在浙江省上虞县。她大哥傅森在林伯渠影响下，早年参加了革命。1938年初，傅森从西安写了一封信，动员妹妹去延安参加革命。同年4月，傅涯和弟弟伏希、妹妹余立，千里迢迢奔赴延安。

不久，陈赓和傅涯单独见面了。他对傅涯说：“我有许多男朋友，也有许多女朋友。你愿不愿做我的女朋友？”

她觉得他很文雅，没有庸俗习气和粗鲁作风。在那个年代，大家都认为姑娘必须泼辣、大胆，而且有意志——这就叫做有个性。而姑娘希望每个男人都有高尚的人格，都有真正的感情：真诚的、平等的、革命的爱情。傅涯默默地点了点头。

“不过有一条，”傅涯说道：“你不能干涉我的工作，别把我当成你的附属品。”

其实，在约会之前，傅涯考虑过，他有四种经历：上过军校，有知识有文化修养；在城市白区工作过，能不为酒色所迷；被捕过，立场不动摇；打起仗，不怕牺牲……延安的姑娘不正追求这样的人吗？可她……犹豫了。参加革命前，她有过一个“男朋友”。她已经去过几次信，可他只热衷于化学，坚持要科学救国，不肯到延安来。傅涯想等他们的关系结束，再与陈赓交朋友。

想到这里，傅涯说：“你让我再考虑考虑……起码过3年！”

她这种语气使他感到有些难堪。他沉默了片刻，坦率地说：“我是说交个朋友。”

他们见面的机会很少，但是共同的理想和事业使他们渐渐产生了真挚的感情。她对陈赓那朴实而又坦率的感情，出于自尊，又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他，完全尊重她独立自主的个性，甚至连句玩笑也不开。

傅涯仔仔细细考虑了3年。

陈赓也老老实实等了3年。

直到1943年2月，陈赓到山西涉县一二九师师部开会，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腾出了司令部院内的一间西屋，他俩才在那里结了婚。婚礼上，傅涯清唱了一段苏联民歌。陈赓快活地说了不少笑话。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悄悄对她说：“你算找着一个好人。”

婚后第二天一大早，陈赓拉开房门，对问候他的战友大喊：“昨天我爬高山如履平地……”羞得屋里的傅涯面红耳赤。

半年以后，他又成了玩笑大将军。

傅涯也习以为常。有一次她问他：“你老实讲，你是不是瞒了3岁？”

陈赓哈哈大笑：“兵不厌诈嘛。”

傅涯也笑了，戏谑地说：“你呀，老婆到手，本性暴露……”

陈赓有记日记的习惯，每次分手，傅涯总把自己心爱的笔记本送给他一个，留作写日记用。每当部队轻装转移时，她宁可扔掉自己的被褥，也要把陈赓的日记带走。行军过河，装在马褡子里的日记本被水弄湿了，到驻地后，她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日记本一本本晒干，然后再小心翼翼地保存好。

以后陈赓任太岳军区司令员，傅涯在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工作。有一阵子傅涯紧闭着嘴唇，默不作声。陈赓诧异地问道：“怎么啦？”

傅涯笑了笑，说：“我还年轻，老住在这里……”

他向她眼前跨了一步，又紧紧抓住她的手腕，使劲将她的双手紧贴在他胡子拉碴的脸上，轻轻地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从家乡到延安抗大，是为革命而来。抗大培养出来的干部应该到第一线去。”

“你同意我走？”

“同意。可你别把我忘了，每天临睡前闭眼想我5分钟，我也想你5分钟。”

在陈赓的支持下，傅涯搬出了司令部的院子，住在附近双曲村农民家里，从事农会工作，每隔七八天回来团聚一次。陈赓只要有空，总要到河边去接傅涯。遇到同志们问他：“司令员，干啥去？”他总乐呵呵地说：“接老婆！”

三

经过了空前激烈的解放战争，陈赓立下了汗马功劳。新中国建立后，他又上了朝鲜战场。

1952年夏天，正在朝鲜指挥志愿军作战的陈赓，奉调回国。他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跟着周恩来，来到中南海丰泽园。他欣然接受了毛泽东交给他的

校址定在哈尔滨。陈赓在那里一干6年。军事工程学院健全地站立起来了：到1957年就拥有校舍60万平方米，教师1600人，专业34个，实验室149个……而陈赓却被心脏病击倒了。

他已经发作过两次心肌梗死了。第一次就在1957年。这一年他特别忙。2月到南京、无锡、镇江、苏州等地视察防务；3月又从上海出发，去沿海岛屿勘察。由于过度疲劳，他曾摔倒在浴室里。他严重失眠，靠眼药水才能入睡；经常感到头晕目眩。4月回到北京，紧接着又是各种会议。6月底又离开北京，冒着炎热，前往广东、福建等前沿勘察。9月，出访苏联。10月，海陆空大演习。他从上海回来，脸色蜡黄，不住地用手摸着胸部，对傅涯说：“我可能坚持不了啦！”但他还是支撑着，照常上班。12月19日，他的胸部就出现了疼痛，整个胸部像个不停充气的皮球，窒息得他有种濒死的感觉。他终于从椅子上滑到地板，不醒人事。

他被抢救过来以后，在医院卧床3个月。如果他能像普通人那样，安静地完全遵守医嘱，休息一段就好了。但是他心急如火，就像战争年代听不到枪声一样寂寞，不能指挥打仗一样难受。在建设时期，他的长期战争生活培养的习性，在他身上几乎成了一种驾驭他的惯性——他不把一天的工作排得满满的，甚至不打几个电话，他都会难受得想发火！——实际上，他有损伤的“发动机”正在作超载运行。1959年上半年他任军委副总参谋长，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有个国防科研项目要在京郊20公里处试车，他要亲自去观看。这天一早，家里同时接到两个电话，傅涯两只手拿着两个听筒，一个是军委值班室，一个是中央保健室，都是阻止陈赓去的。傅涯放下电话追到门口，汽车已经开走了。她只好给那个单位打电话，请他们准备些急救药品。中午，陈赓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大发脾气：“傅涯，你汇报吧，就说我活着回来了！干嘛给人家单位添麻烦！”傅涯一解释，陈赓气又消了，笑了起来，风趣地说：“妻子的约束很必要，可是你要给我工作的自由啊！”这年五六月间，终于诱发了第二次心肌梗塞。这以后，他被迫退居第二线。

1961年，陈赓病情加重。傅涯陪他一起去上海休养。可是一到上海，陈赓就打电话给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请组织上考虑安排傅涯立即工作。结果，她整个白天忙于去徐汇区搞调研，早出晚归，根本没有时间照顾陈赓。

一天，陈赓收到中央军委的文件，上面写着：

中央军委要求人民解放军所有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都要就自己参加革命战争的整个战斗经历，写一篇作战经验总结。

……

陈赓立即兴奋起来。面前的稿纸仿佛打开了他库存的智慧闸门，使他浑身是劲，情绪高涨。他甚至骄傲地感到，自己已经恢复了健康，解脱了世事的烦恼，完全融进了战斗历程。

傅涯送来茶点和报纸。因为陈赓沉浸在高度集中的思考中，竟迟迟认不出她来。傅涯站在那里端详着稿纸后面的丈夫，心里百感交集。她感到丈夫似乎在一刻刻地变得疲乏衰颓，好像他那宽阔的胸脯压着千斤重负……

小儿子知涯跑进来，叫嚷着：“热，爸爸给我脱衣服！”陈赓伸手拽住袖口，用力太猛，忽然觉得有一股沸腾的浪潮先是渗入了他的胸膛，随之又涌向太阳穴。他顿时脸色苍白，大汗淋漓，颓然倒在沙发上。他轻轻对儿子说：“去叫你妈妈……”

傅涯赶来时，疼痛似乎已经过去。他脸上装出没事的样子，打起哈哈：“欢迎，欢迎！”

陈赓笑着说：“托福你家，请你陪陪我。”傅涯在他身边坐下。她不知道他这是第三次心肌梗死的前兆。

到了夜里，陈赓久久不能入睡。在他那蒙着一层仿佛是月光的苍白的脸上，两只眼睛发出了向前逼视的光芒。在黑暗中，那光芒具有某种特别感人的力量。他侧身凝视着对面床上的傅涯，深情地问：“傅涯，你怎么不看看我？”

傅涯连忙伸手打开台灯，侧转身来，默默地望着陈赓。那灯光的出现，仿佛缓解了他痛苦的心情。看得出来，他此刻所涌现的激动心情，甚至可能比同傅涯第一次会面那天更加激动。他知道，剩下的时光已经不多了。只想说话，不停地说话，说出自己的感情和他所经受的一切……可惜傅涯没有完全意识到——以后想到此情此景，她总觉得无限遗憾。

傅涯对着陈赓望了一会儿，就劝慰他：“不舒服就好好睡一觉，暂时别想写文章的事情了。”

陈赓苦笑着摇了摇头，又伸出右手晃了晃，然后指着脑袋惨然一笑：“机器一开动，怎好停下来？”

第二天的黎明，陈赓被剧烈的胸痛惊醒。正巧是星期天，医院里的大夫未能及时赶到，傅涯紧紧握住他的手，焦急地望着他的眼睛。陈赓已经把牙齿咬得格格发响，使尽最后的力气挣扎着……

“陈赓！”傅涯低声呼唤着，热泪顺着面颊滚滚流下。她紧紧握住他的手，手在渐渐变凉；她望着他的眼睛，眼睛已经失去了光泽。他仰脸躺着，不再回答……

陈赓逝世后，傅涯总是一边工作，一边抽空整理陈赓的日记和文字资料，借以寄托哀思。

傅涯的体质也越来越差，还时常抱病整理有关陈赓的回忆文章。更使人敬佩的是，她还四处奔走，找李强、童小鹏、帅孟奇、夏之栩等同志查找材料，写了一篇翔实生动的王根英烈士传——《报国何计女儿身》，发表在《红旗飘飘》上。这篇史料，在她为数不多的文章里，足以显出她大将夫人的宽广胸怀。“也算是偿还一点自己对他生前照顾不周的心意吧。”她说。

徐海东（1900～1970）湖北黄陂（今大悟）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三十四团任代理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黄陂县区农民自卫军队长，中共黄陂县委军事部部长兼区委书记、县赤卫军大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八团、三十五团、三十六团团团长，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第二十七师师长，红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师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师长、副军长，红二十八军军长，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代书记，红十五军团军团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届中央委员。

在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中，有一位被毛泽东称为“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海东。为了他从事的革命事业，他的妻子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无私的奉献。先是他的童养媳妻子备受牵连，吃尽苦头。他与第二位妻子周东屏结婚后，从1940年1月起就卧病在床，在后来30年的岁月里，一直得到妻子的精心照料。

徐海东有一个“窑将军”的雅号，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都这样亲切地称呼他。这一雅号，说来颇有来历。1936年6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经西安秘密来到陕北苏区采访。在《西行漫记》中有专门的一节“红色窑工徐海东”，描写了他与徐海东会见的情形，记述到徐海东传奇性的经历和他童养媳妻子的遭遇：

一天早上我到彭德怀的司令部去，发现他有好几个部下在那里，正好开完会。他们请我进去，开了一只西瓜。

我们围桌而坐，淘气地在炕上吐起瓜子来。我注意到有一个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年轻的指挥员。

彭德怀看见我瞧着他，便开玩笑说：“那边这个人著名的赤匪。你认出他来了吗？”新来的那个人马上面露笑容，脸涨得通红，嘴里露出掉了两个门牙的大窟窿，使他有了一种顽皮的孩子相，大家不由得都笑了。

“他就是你一直要想见的人，”彭德怀又补充说，“他要你去访问他的部队。他叫徐海东。”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比他更加神秘的了。除了他曾经在湖北一个窑场做过工，外界对他很少了解。蒋介石把他称为文明的一大害。最近，南京的飞机飞到红军前线的上空，散发了传单，除了其他诱惑（红军战士携枪投奔国民党，每人可获一百元奖金）以外，还有下列保证：

“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投诚我军，当赏洋十万。凡击毙其他匪首，当予适当奖励。”可是就在这里，羞怯地长在一对宽阔的孩子气肩膀上的，却是南京的悬赏不下于彭德怀的脑袋。……

徐海东给我的印象是我所遇到的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不论在态度上、外表上、谈吐上和背景上都是如此。……他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很为自豪，他常常笑着称自己是个“苦力”。

……

的兴趣，连忙坐直了身子。他若无其事的回答，显然没有准备，使我不能不怀疑这是实话。

“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四方面军。”

“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个是红军。其余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决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徐家六十六个人。”

“六十六个人！”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被杀的有我二十七个近亲，三十九个远亲——黄陂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在红军中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军占领黄陂县时她被捕。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

徐海东看到我脸上吃惊的脸色，就惨然一笑。“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最大而已。蒋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乡被占领时，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下。”

徐海东，这位具有传奇和神秘色彩的大将军，1900年6月17日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夏区徐家窑（今属大悟县）一个窑工家庭。祖辈六代都是窑工，父亲和几个哥哥都是做陶器的师傅。徐海东从小机敏好学，8岁那年，父母商议生活再苦也要送他去念书。读书3年多时间，因打了财主的儿子，被迫辍学。13岁那年，就进了窑场当窑工了。

窑花子的生活，徐海东整整过了11年。在父母的包办下，他与童养媳的妻子田德载成了亲。平常，徐海东爱喝酒、看大戏，最喜欢的还是读《七侠五义》、《水浒传》之类的侠义小说，幻想着大别山里再出一帮英雄好汉，那窑花子就能时来运转了。

1924年夏季的一天，徐海东吃过晚饭，刚到窑棚外的场地上纳凉，一个穿长衫带礼帽的青年从对面山上走来。此人是徐海东在喻家祠堂读书时的同学吝积堂。吝积堂后来在武昌董必武主办的武汉中学读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受党派遣，回乡作革命宣传工作。在吝积堂的引导下，徐海东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等书刊，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他听吝积堂说寒假后要回武昌，非要吝积堂带他一起去找共产党不可。吝积堂想着他和童养媳新婚不久，怕家人不同意。徐海东满有把握地说：“我这个窑家没有什么可恋的，她也不会管我的。”

这一个阴历年，徐海东过得特别简单。他没喝酒，没串亲戚，也没有玩骨牌。田德载见他这么节省，还以为丈夫变得规正了呢。妻子是一位贤慧能干、吃苦耐劳的农村姑娘，协助婆婆省吃俭用，忙里忙外。然而，她哪里知道，徐海东是为了省下一点钱，好做去武昌的盘费啊。

1925年3月初八，徐海东选择了“若要发，不离八”这样一个吉利的日子，只对家人说是赶庙会去，连一件衣服也没带，就与好友吝积堂上了路。从家乡到武昌，有二百四十多里路。一路上，徐海东憧憬着未来，满心喜悦。一直到离家很远了，他才觉得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不该瞒着家人，对不住妈妈，至于他那个媳妇，由于是父母包办的，也没觉得特别难舍难分。

这年4月8日，徐海东在武昌由吝积堂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用挑水挣来的钱交了第一次党费。不久，党派他到直系军阀刘佐龙部队，名为

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三营九连任代理排长，参加了攻打汀泗桥、武昌等著名战斗。

大革命失败后，我党进入创造红军的新时期。1927年6月，徐海东离开武昌，回到了黄陂北乡。一路上，他见到“打倒北洋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拥护国民革命！”的标语依然写满墙头，农民协会仍然很活跃。老乡高兴地告诉他：“夏区最大的劣绅李旭亭被镇压了，财主们再不敢像过去那样逞凶了！”乡村的形势比他预料的好得多。当天傍晚，徐海东回到了徐家窑。站在山坡上，远远地就看见那徐家草屋顶上的缕缕炊烟，猜想到妻子在做晚饭了。离家两年了，家就在眼前，母亲、父亲还有妻子近在眼前，心情特别激动。一踏进家门，他就大呼着：“妈，我回来了！”

家里的气氛却十分凄凉。双目失明的母亲听到儿子的声音，伸出一双颤抖的手抚摸着儿子的肩膀，泪珠从那苍白的面颊上滚滚而下，嘴里喃喃说道：“元清（徐海东的学名），还走吗？”徐海东不见父亲的身影，颇感到意外，连母亲的话都没顾上回答。

妻子田德载站在一边，两眼直看着迟迟归家的游子，泪流满面。听到丈夫询问公公和大哥的近况，德载难过地告诉他：“他老人家和大哥在一年前已先后病故了。”徐海东一闻噩耗，跪在地上哭了起来。母亲和德载也哀声啼哭着。

徐海东强忍着悲痛，望着泪人儿一样的母亲和妻子，想到他离家两年家里日子的艰难，心里很不是滋味。又想到家里就靠妻子张罗度日，硬维持着这个穷家，心里更充满了对贤妻的感激和敬佩之情。

与家人团聚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奇怪的是徐海东这两天闷闷不乐，饭量大减，彻夜难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党的事业比什么都重要，他不能老呆在家里。这会儿他能做些什么？怎样挽救革命呢？他想到返乡路上的情形，农民的革命热情十分高涨，如果党中央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村，领导广大农民起来斗争，革命仍有成功的希望！

田德载并不了解丈夫的心思，只觉得两年不见，他的脾气却大变了。德载以为丈夫思念去世的公公和大哥，多次劝他节哀。很快，她发现丈夫心里想的不是这些。母亲以为儿子吃不惯粗米杂粮，便告诉媳妇每天做点可口的饭菜。那天，田德载提着一篮子鸡蛋进城卖了，花钱买了两瓶白酒，回家炒了两样菜，端在丈夫面前，让他消愁解闷。可是，事与愿违。从前能喝酒的徐海东，如今滴酒不沾。

不几天，徐海东意外遇到了一块在武昌参加共产党的好友田道生。在他的介绍下，徐海东找到了黄陂县委书记陈金台，组织起农民自卫军，徐海东当队长。徐海东动员徐家兄弟、侄儿和乡亲们参加了农民自卫军。大劣绅李旭亭的儿子和外甥纠集一批流氓恶棍，自称“三十八老子”，歃血为盟，发誓要捉拿徐海东。徐海东带领300余人，巧妙地与敌周旋。后因出了叛徒，自卫军被打散了。为保存革命力量，徐海东又回到了徐家窑。成天为丈夫提心吊胆的田德载看到丈夫平安回来，又惊又喜。

1928年秋，鄂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又开始发展，党决定恢复夏区的工作，任命徐海东为区委书记。各项工作刚有起色，县委提出“年关暴动”的号召。由于条件不成熟，暴动搞了几天，敌人一来，又失败了。徐家也被抄了。徐海东强忍失败的痛苦和与家人的生死离别，又一次远走他乡。此后，他就没能再回徐家老窑。

徐家被抄的前一天，田德载得到当地党组织的通知，扶着双目失明的婆母，跟随许多乡亲们连夜逃走。田德载和婆婆冒着寒风，拄着打狗棍，提着破篮子，一路沿门乞讨，艰难度日。由于当时天气奇寒，他们来到亲戚家里

每天外出讨来残汤剩饭送到婆婆手里。婆婆吃着冷饭充饥，内心感激不尽。一天中午，德载讨饭归来，发现婆婆跪在观世音菩萨像前，双手合掌，在低语诉说：“我儿元清闹暴动惹下大祸，实在对不起受苦受难的穷人，也对不起左邻右舍，求求菩萨饶恕我儿的罪过，保佑我儿的安全……”说毕，她咚咚地磕了三个响头。之后，她又仰起头，以虔诚乞求的神情面对着菩萨塑像，唧唧啾啾地说着话。一连说了三遍，磕了九个响头。她突然站起来，用嘴咬破右手中指，血流出来了。田德载冲进庙内，急切地问道：“妈！你为啥要这么做呢！”婆婆含着眼泪说：“我在观世音菩萨面前为元清消灾消难哩！”说话间，田德载紧抱着婆婆痛哭起来了。

婆媳相依为命，在外地躲藏多日，终于又回到了徐家窑。窑场的几间茅棚都已烧塌，遍地都是破盆、破罐和破缸。婆媳忍不住哭了起来。

正哭着，二叔走了过来，安慰她们。二叔还告诉她们，海东在徐家被抄的夜里回来过，并请二叔转告母亲和妻子，是他连累了她们，他要为徐家报仇，要为天下劳苦大众报仇，他走了，他找红军部队去了。

婆媳听说海东还活着，心里好过多了。田德载扶着婆婆找到四哥徐元海。徐家兄弟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筹集木料、茅草，重建了草房。田德载在丈夫和亲人的影响下，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早已有了认识，她支持海东的革命事业。她曾对海东说：“你为国为民尽忠我是高兴的。我宁愿吃糠咽菜，也要照顾好妈妈，管好这个穷家。你们军队上有些什么事情要我，也尽管嘱咐。”此时，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经四哥徐元海介绍，田德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决心为党的事业而奋斗。

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经过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慢慢地走上轨道，摸索到边界武装割据的道路。到1931年1月，便发展改编成为红四军。徐海东先后参加了一、二、三次反“围剿”。1932年6月，蒋介石亲自出马，坐镇武汉，发动第四次“围剿”。徐海东当时任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在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整编部队，进行动员，投入战斗。

国民党反动派铁蹄所至，无恶不作。他们狂妄叫嚣，要把大别山区的共产党斩尽杀绝。地主、豪绅纷纷乘机拼凑保安队、民团，还乡倒算，推行保甲制，野蛮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许多村庄被捣毁，层层山林被烧焦。徐海东的家乡也在劫难逃，徐海东的亲人惨遭蹂躏。

一天拂晓，敌人包围了徐家窑，挨家挨户搜捕红军亲属。一群敌人端着闪亮的刺刀，冲进了徐海东家的草屋，将田德载绑了起来。婆婆听见敌人绑了儿媳，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将手里的水盆向敌人泼去。敌连长大怒，开枪击中婆婆的胸部。婆婆倒下了，田德载疯了似的扑上前去，大哭道：“妈妈，你死的太冤枉了！”敌人血洗了徐家窑，杀害了徐海东的66个亲人，其中有徐元海等近亲27人，远亲39人。

田德载被押送到敌人团部审讯。敌团长知道，她不仅是共匪头子徐海东的婆娘，而且还是共产党。皮鞭的抽打，枪毙的威胁，都没有能从田德载口中逼出点什么，反而激增了她对敌人的无比仇恨。

敌人一看田德载不吃硬的，就采取软的方法感化她，一日三餐都让她吃好，还允许娘家亲戚探望。一天，国民党黄陂县县长到狱中来，装出一副和善的面孔，说了许多“徐海东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将领，也是黄陂不可多得的人才，请他过来参加国军，共谋大事；他跟着蒋委员长干，将会让他当个师长或军长，到那时，你这个官太太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啦”等等之类的话，骗德载让海东回来。敌县长的阴谋无疑只会落空。

敌人使用软硬兼施的办法都失败了，很快有意传播消息，要将田德载枪毙处死。娘家人得知此讯吓坏了，主动捐粮捐款，派人四处说情送礼，希望

狱是可以的，但她要立即另嫁他人，与徐海东断绝一切关系，否则，我们就将田家三代人全部杀光！”无奈，田德载由娘家亲人保释出狱后，被迫与一位忠厚老实的贫苦农民结婚了。

徐海东离开了母亲和田德载以后，无时不在惦念着她们。当他得知母亲和亲人被敌人杀害的噩耗，妻子田德载被迫改嫁的不幸消息，悲痛万分，眼泪滚滚而下。连日以来，他好像得了一场大病，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又开始吐血了。病情好转后，他把仇恨牢牢地记在心里，决心率领红军健儿多打胜仗，多杀敌人，为死去的亲人们和活着受苦受难的亲人们报仇雪恨。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徐海东和许多同志一起坚持斗争，为重建红二十五军，保卫根据地作出了卓越贡献。残酷的斗争生活，把一个铁一样的硬汉子累垮了。他患上了肺病，经常发着高烧，吐血，原来胖乎乎的脸变得又黄又瘦。但他毫不在乎，即便是生着重病，躺在担架上，他依然亲自指挥着战斗。

1934年11月16日夜，徐海东和整编后的红二十五军的指战员告别了大别山，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长征。

12月10日，红二十五军已进入陕西省的雒南县。那天中午，徐海东正参加鄂豫皖省委在小镇庚家河召开的工作会议。突然，镇外枪声大作，敌人六十师由鸡关头方向偷袭过来。由于过度疲劳，红二十五军在庚家河东西的徘徊发现敌情已晚。战斗一打响，省委立即中断了会议，军首长们跑步上了阵地，激烈的战斗全线展开。经过二十多个回合的反复冲杀，一直打到太阳落山的时候，终于把敌人打垮了。

这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的最后一战，徐海东又一次负伤了。这是他第九次负伤，也是负伤最重的一次。一颗子弹从徐海东的左眼底下进去，又从颈后穿出，流血过多，昏迷了四天四夜，到第五天才醒了过来。

这次负伤，徐海东结识了周东屏。他醒来的第二天，看见一位女护士坐在身旁，眼睛里饱含着焦急不安的泪花。女护士叫周东屏。她看到昏迷多日的徐海东副军长醒了过来，喜形于色。她马上去做了碗面条，一口一口地喂到徐海东的嘴里。

在这次战斗中，负伤的还有程子华军长，两只手都被敌弹打穿，伤了骨头，流了不少血。徐海东吃了面条，精神好了些，立即询问部队情况。当他听到营以上干部负伤的不少，程军长也受了伤时，挣扎着要起来，要周东屏和警卫员扶他去司令部去，并要周东屏去照顾程军长。

部队继续行进。大伙用担架抬着程子华、徐海东行军、作战。每到一地宿营，周东屏先用自制的高锰酸钾、盐水给徐海东消毒，又把树根熬成药水给徐海东洗伤口。当他痛得浑身抖动之时，周东屏像痛在自己身上一样，眼里含着泪水。同时，她发现他的一只耳朵失灵了，只有大点声说话他才能听见。尽管他伤口感染，经常发高烧，但仍然还要求回到战斗岗位上去。

葛牌镇战斗时，天下大雪，政委吴焕先向周东屏、警卫员交代说：“你们快抬着徐副军长转移吧！”徐海东听说敌人来了，忘记了伤痛，跳下担架要到指挥所去。周东屏、警卫员再三相劝，也无济于事。徐海东大怒，硬让两名警卫人员架着他爬上白雪皑皑的山头阵地，协同政委吴焕先、参谋长戴季英指挥作战。这一仗打胜了，红二十五军转危为安。徐海东返回农家，看见周东屏为他生好了火炉，做好了饭，高兴地笑了，他感到自己的心在不寻常地跳动。他浑身像被火燃烧着。他喜爱这个聪明机灵的女护士。而且，他从周东屏的眼神里发现她也喜爱自己。

一天晚饭后，徐海东和周东屏漫步在山道上。还是豪爽的徐海东，首先

人贩子卖给一户农家当童养媳……”

徐海东的话头，把东屏的思绪引到了过去的岁月。她生于安徽六安县一个木匠家中。家里穷，父亲有病，13岁那年被人贩子用50块大洋，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她哭着与婆家大闹，跑了出来。14岁加入了共青团。她跑到了湖北红安县，找到了郑位三同志，软缠硬磨了两天，终于接受她参加了红二十五军，当了女护士。红二十五军离开大别山时，把一些老弱病残的同志留在原地。周东屏等七个女护士坚决要求远征，军政治部才同意把她们带出来。长征的第三天，敌军前阻后追，形势十分严重。军政治部为女战士的安全担忧，决定把她们精简下来，每人给了八块大洋。周东屏大胆泼辣，猛地站起来，把银元摔在地上，要求去见参谋长戴季英。戴季英担心女护士们长途行军拖累部队，仍然劝她们留下来安家。正好这时，一匹战马疾驰而来。周东屏她们透过晶莹的泪水，看到是徐副军长来了，立即迎了上去，坚决地表示：“我们生是红二十五军的人，死是红二十五军的鬼！”徐海东望着这七个可爱的姑娘，向戴季英说了情。戴季英同意了。她们破涕为笑，捡起银元交给军政治部那位干部，忙赶部队去了。

周东屏年满18岁，个头不高，长相虽不出众，但她天真、纯朴、勇敢，有丰富的战场救护经验。上一次徐海东说情，并没有对周东屏留下多少印象，这次徐海东负伤，却将二人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徐海东对周东屏讲述了自己的家世，真诚地叙述了田德载遇难改嫁的经过，以及对东屏的爱恋之情。周东屏认真地听着，不由自主地掉下泪来。阶级感情使他们心心相印，徐海东突然紧握住周东屏的双手。此时此刻，一股幸福的暖流，涌遍了他俩的全身……

冬去春来。经过周东屏两个月的精心照顾，徐海东的伤口已基本痊愈了。

红二十五军转战于商县与商南之间的龙驹寨。一天，政委吴焕先用手拍着徐海东的肩膀，开玩笑来了：“老徐，有人在背后骂你哩！”

“政委，你说说，人家怎么骂的？”

“有人骂你长了四条腿！”

“日他妈的！谁骂的？”

“别发火，你到底是不是四条腿？”

“我是人，又不是牲口。”

“看来我不揭发，你是不会承认的。”

“你揭发吧，我到底犯了什么法？”

吴焕先笑了笑，说：“有人反映你和周东屏在外边谈情说爱，披着一件大衣，这不是四条腿吗？”

徐海东笑着说：“日他妈的，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那天天气寒冷，我把大衣给她披上了……”

“我也经常想，你身体不好，需要人来照顾。听说你爱上周东屏，我是高兴的，她聪明能干，又受过苦，我看将来你娶她做老婆，肯定是美满的。不过，我提醒你你现在可不能结婚呀！”

“大敌当前，你徐大哥知道应该怎么做。”

“等到举行婚礼那天，我给你们当司仪，让大家热闹热闹……”

说着说着，二人哈哈大笑起来了。

1935年9月18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水平镇，与刘志丹率领的西北红军第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并将红二十五军与西北军合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当时，由于程子华、刘志丹的关怀，徐海东与周东屏结婚了。结婚那天，他俩想买两块手绢交换纪念，可是身上只有5分钱，没买回来。晚上，

起了不久前牺牲的吴焕先，心里平添了几分哀伤。第二天，徐海东目送妻子前往瓦窑堡红军医院去工作。

1938年初，徐海东又犯病吐血，党中央命他返延安治病。直到10月，他的身体仍未复原。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一次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对贺龙说：“中国有三部著名的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又问徐海东有没有读过。他向毛泽东说：“《三国演义》看过，《水浒传》也看过，这《红楼梦》嘛，不知是什么，没看过。”毛泽东笑着说：“那你算半个中国人！”说得在坐的大笑起来。

徐海东回到家里，问周东屏：“你能想办法搞到《红楼梦》吗？”周东屏听人说过有这样一部才子佳人书，就说：“你还有闲空看这种书？”徐海东说：“你看过？”周东屏说：“马列的书我还看不过来，

我还去看它！”徐海东笑着说：“我算半个中国人，你呀，连半个都不到！”周东屏瞪大了眼睛，不知所说何意，逗得徐海东大笑起来。

徐海东爱他的妻子。当时，从大后方来了许多有文化的女青年学生。一次，有位同志向徐海东半开玩笑他说道：“要‘改组’吗？我帮你介绍一位漂亮的大学生。”徐海东一听很生气，说：“胡扯！东屏是受苦人，我是泥巴人，我们既是夫妻，又是战友，我怎能干那种事！”

徐海东进了马列学院学习，他十分珍惜这一学习机会，又想着早日上前线。9个月后，党中央终于批准了他的再三请求，派他和刘少奇同志一起去华中。徐海东高兴极了，迫不及待地赶回家中，向周东屏报告这一好消息。

刚满两岁的女儿小松子的哭声将他迎进了家门，徐海东赶忙把女儿抱在怀中，小松子看着爸爸笑了。徐海东把准备出发的消息告诉妻子，周东屏开始还以为又是在开玩笑，也半真半假他说：“出发就出发，说今天走，我马上打背包。”徐海东说：“好，就准备出发吧。”周东屏这才明白真的要走了，看着丈夫微笑着说：“我还真想在这里好好学习文化，前方有文化学校吗？”徐海东说：“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大学校。学文化，哪里不能学！不过，你要想留在延安也可以。”说罢，走出了窑洞，突又转过头来说了一句：“我看，还是一起上前线。”徐海东心里总觉得有点抱歉，让周东屏既当战士，又要当妈妈，实在难为她。周东屏理解丈夫，她连夜整好了行装。

1939年9月15日，徐海东伴随刘少奇等同志，离开了延安。他们经西安来到洛阳，一路上紧张、劳累，徐海东肺病复发，咳嗽不止。到了竹沟，发生了大咯血，而且病情十多天没见好转，刘少奇命令把他抬到了江北指挥部。徐海东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1940年1月，徐海东在周家岗战役之后又发生大咯血，从此病倒了。他不能起床，每天24小时，躺在一副担架上，吃饭、翻身、大小便，都得靠妻子帮助。他经常发怒，难以忍受这种生活。周东屏安慰他，精心照料他，但他急切想恢复工作，时刻不肯脱离为之献身的革命队伍。1941年1月中旬，当他听到皖南事变之时，几乎气昏了，病情一天天加重。中原局将此情况电告延安。毛泽东对徐海东的健康极为关怀，亲自复电徐海东“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看了电报，流出了眼泪。他把毛泽东电报的8个字写在一个月份牌上，放在担架上。这样，徐海东才安下心来休息。

抗日战争的后5年，徐海东都是在担架上度过的，但实际上并未停止工作，仍旧参与指挥了多次战斗。徐海东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病痛折磨，从未呻吟过一声；周东屏在他的担架边守护了5个春秋，无微不至，尽心尽力，帮助丈夫度过了一道道鬼门关。

一次，徐海东突然大口吐血，床前的二号洋瓷盆吐了半盆。连续几天几

手无策，同志们已在悄悄准备后事。深夜，守候在床边的周东屏忍不住流泪，低声哭泣着。徐海东从昏迷中醒来，似乎也感觉到自己不行了。他低声说：“哭什么，你是个红军，共产党员，不该哭哭啼啼嘛！人总是要死的，死并不可怕，只是我为党做的事太少了。”他说着，又昏迷了。

垂危之际，地方党的一位同志找来了一名中医，近60岁，名叫沈默。军医和领导看这中医貌不出众，名声也不响，担心他医术不高，坚决不同意让他主治。有人提出，要吃他的药，一定得报告中原局领导。

周东屏不懂中医，但她知道徐海东在长征途中负伤、患病，正是吃了中药好转的。她不要人请示上级，不让人告诉医务部门领导，一个人断然决定，立即请沈先生开药方，马上派人去抓药。可是三副中药取回来煎好后，周东屏又忧虑起来：是啊，万一吃坏了，这责任太大了。海东不只是自己的丈夫，而且是党的高级干部，他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怎么办呢？

警卫员把抓中药的消息告诉了发高烧的徐海东。徐海东把周东屏叫到床边问道：“药煎好了吗？”

周东屏如实地说：“好了，只是大家怕吃错了药……”

“拿来，”徐海东微微睁开眼说：“中药不会吃坏人的。”

一句话，解除了周东屏的疑虑，她亲自把煎好的药捧来，看着丈夫吃下去。可是，她心里七上八下，不安地坐在床前，不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眼见病人慢慢地安睡了，她也坐着睡熟了。

无名中医，也有本事。沈老中医用药很灵。到了第二天夜晚，徐海东三副中药下腹，高烧退了。周东屏破涕为笑，同志们奔走相告。沈老先生这才知道，病人不是开始人们对他说的“杨副官”，而是大别山区出了名的徐海东。老中医陪同周东屏在徐海东身边观察了一夜，第二天就背上个筐，上山挖草药去了。徐海东的病情又出现好转，周东屏久久悬着的心也渐渐放了下来。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撤离华中地区时，徐海东随后方机关转移到山东。1947年9月，天气骤冷，徐海东病情又一次加重。毛泽东和党中央指示他赴大连休养（当时大连已解放）。在妻子的护理下，他们来到大连。他们住在临近老虎滩海滨的一座住宅，风景如画，空气新鲜。到此徐海东才得到有效的药物治疗，肺结核得到医治，却留下了严重的肺功能损害，以致不能正常地生活和工作了。周东屏经常陪伴徐海东到海边散步，他也利用时间给妻子讲述《红楼梦》中的动人故事。

1951年5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到大连看望了徐海东夫妇。临别，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党中央，安慰徐海东把病治好，感谢周东屏对徐海东的精心照顾和无私奉献。1955年初，徐海东被授予大将军衔。1959年，周东屏应邀参加了国庆10周年庆祝大会，被安排坐在第一排上将的位置上。

徐海东生命的最后5年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中度过的。1966年6月初，在京养病的徐海东和周东屏一起去看望贺龙元帅，在贺帅家里高兴地玩了近一个小时就返回了。林彪、“四人帮”借机造谣，说徐海东与贺龙密谋“二月兵变”。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从天而降：说徐海东“手伸到全国全军”，“夺总参和军兵种的权”，“彭罗的黑干将”。1967年“七·二”事件后，停发徐海东文件，禁止与外界来往，撤走所有直接照顾徐海东的工作人员。后来，

又下命令解放军总医院不再供给徐海东一切药品和氧气。徐海东的肺部百分之八十已失去功能，受尽了折磨。林彪、“四人帮”还不罢休，1969年1月，将他大儿子文伯“隔离审查”；将女儿徐红隔离，不准回家；大儿媳也被送到河南总参“五七干校”。周东屏实在无法，将两个孙女由阿姨带回

残的儿子，周东屏和小儿子文连承担了全部家务。

1969年10月25日，由于林彪下达了“一号命令”，徐海东夫妇和小儿子文连被强行疏散到河南郑州干休所，被软禁在那里。林彪在河南的亲信执行着“将徐海东置于死地”的旨意，采取断药、断氧、不治疗、不护理的办法。周东屏这位经过长征的女战士，经过一连串的打击之后，这时也忍不住落下泪来。她和孩子们向党中央求援，向北京求援，可是电话通不到北京，写的信也送不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手上。随同到郑州的秘书，实力监视徐海东的人。

1970年3月25日，一代名将徐海东含恨离开人世。周东屏痉挛地扑过来，紧紧抱住丈夫那还未冷却的遗体，失声痛哭！是林彪害死了徐海东！海东死得太冤枉了！林彪一伙得知徐海东逝世的消息，大为高兴。并立即规定：不准登《人民日报》，不准登照片，不准写评价，不准送花圈，不准在骨灰盒上覆盖党旗。

然而，历史是由人民来写的。1979年1月24日，党中央彻底为徐海东平反昭雪，邓小平亲自主持追悼大会。周东屏非常激动，在徐海东的遗像前，她告慰英魂：“海东，你可以含笑九泉了。我和孩子们一定继承你的遗志，学习你的革命精神，把一切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彭雪枫（1907～1944）河南镇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起历任红军第一方面军师长、师政委，

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兼驻太原办事处主任、新四军竹沟后方留守处主任、豫东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1941年，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1944年9月，在河南省夏邑八里庄与日伪军作战中牺牲。

1940年，33岁的彭雪枫还未结婚。周恩来、邓颖超、朱德、彭德怀都关心过他的个人问题。然而，邓颖超却收到了一封彭雪枫的来信，上面写道：

特向大姐郑重声明，我个人的问题并未解决，海阔天空，独往独来，岂不惬意？已经老了，已经老了！

就在这封信发出的第二年，他认识了林颖。

林颖是18岁那年来到解放区的，刚刚跨进解放区，当晚接到通知，新四军四师彭雪枫师长请来参加抗战的同学们吃饭。林颖莞尔一笑，心想秀才就要遇上兵了，不知这位赫赫有名的抗日战将是何模样的人？

桌上摆了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高粱米稀饭和几样小菜：碧绿的菜秧、嫩黄的鸡蛋、细如丝的凉拌萝卜、油亮亮的红烧扣肉，颜色滋润，香气扑鼻。这在根据地已是上乘的饭菜了。

彭雪枫从门外赶回来，笑盈盈地挨个与大家握手，询问每个人的名字，从哪里来的，生活和习惯。站在后面的林颖细细端详着彭雪枫，心里不觉惊讶赞叹，好一个英俊的彭师长啊！他高挑个子，宽阔的胸膛，粗浓的两道卧蚕眉，明亮的双眸闪烁着热情机敏的目光，鼻梁笔挺，动作利落大方，一身洗得发白的军服平整整洁，更衬出他的潇洒气度。他与每一个年轻人握手，都望着对方的眼睛，很郑重热情地一一介绍，像个温厚的兄长，一点不像威风凛凛高人一头的军官。

他开口说话，话不多但真诚热情：你们在国民党地区，坚持抗日宣传，受到百般压制，吃了许多苦，现在你们来到了根据地，是回到家，回到党的怀抱中来，可以痛痛快快、自由自在地抗日、干革命了！今天特备饭菜，请大家一聚，表示祝贺和欢迎！林颖听得心里感到很热乎、很激动。

大家开始吃饭，毫无拘谨地聊着，窗外传来低低的争吵声。彭雪枫立即站起来，招呼大家继续吃，自己走了出去。

林颖的座位正靠窗口，院内的事她看得清楚，听得真切。

“彭师长，我有件劳神费劲解不开的事，想找您讨个主意，可这位小同志就是不让我进门。”

“彭师长，我告诉大爷您今晚有客，让他等会再来，他就不肯……”战士解释。

“大伯，您还没吃饭吧？来，进屋一块吃，等吃完饭，您再给我细细说说是啥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彭雪枫声音和蔼，没有丝毫埋怨。他请老人进屋，自己对门口的警卫战士说：“小鬼，我讲过多少次，不管我在干什么，只要老乡找，就让他进，不要挡嘛！不是有急事、难事，老乡会大老远来敲我们的门吗？今后要注意，记住了吗？”他语气严肃，但不是高声训斥。战士连连点头。老大爷坐上桌，大口嚼着白面馒头，跟彭雪枫无拘束地谈开了……

一讲，知识分子听了觉着深入浅出，入情入理，有见解，有文采；没文化的老乡和战士们也频频点头，句句听懂，觉着有味、带劲！这样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报告，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政策水平、文化修养和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是作不出来的。林颖是做妇女工作的，那些连县城啥样也不知道、斗大的字认不了一筐的妇女，提起彭师长，也竖大拇指！于是，久而久之，彭雪枫的形象在林颖的心中占了一席之地。然而，这时的林颖还无心谈情说爱，她的心思全在她的工作上。

林颖长得相貌出众，倔强能干也出众。她是湖北襄樊人。父亲不是个很有知识的人，他当过学徒，善于经营，后来就开起钱店，家境逐渐富裕，给大女儿林颖找了丫头、老妈子伺候。他主张女孩子读《女儿经》、《烈女传》等，这样长大订婚嫁人能成个体面的少奶奶。谁料女儿任性、倔强，对四书五经中贬低谩骂、束缚妇女的内容非常反感，不愿背书，“女子无才便是德”、“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样简单的句子，私塾先生教多次她硬是不背，气得老先生不断用戒尺打她手心。小手又红又肿，依然无啥长进。母亲心疼女儿，实在拿她没办法，只好允许她考“洋学堂”。读完小学，她就以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中学，读书专心，看小说更入迷，巴金、鲁迅、冰心的作品，她爱不释手。“七·七”事变后，她和同学们一块上街游行，焚烧日货，募捐筹款，慰问抗战伤兵。女儿的抛头露面引来亲戚朋友的耻笑、辱骂，把母亲震怒了，为了维护门风，为了束缚任性的女儿，一向吃素念佛，文静贤良的母亲强令女儿跪在地上，使尽全力抽打女儿耳光。眼见着自己手心红了，痛了，鲜血顺着女儿嘴角流下，她又累又心疼。长跪在地的女儿却紧闭着眼，咬紧嘴唇，不躲不闪也不求饶。母亲无奈，跺脚骂道：把这孽障带到乡下关起来！她拒绝吃饭以死抗争。家中实在无法，只得由她去了。林颖如同冲出牢笼的小鸟，倍觉天空辽阔，自由珍贵，她立即报名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三个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决心为抗战尽力，投入了奔赴抗日根据地的行列。到抗日根据地后，她不愿意再到文工团跳舞唱歌，因为不能直接实现她追求妇女自由、独立、解放的愿望。她坚决报名到基层去做妇女工作，越贫穷、偏僻、落后的乡村她越想去，她要在解放妇女的斗争中，实现自己彻底解放的理想和命运。

有一天，林颖到行政公署开完会，刚要离去，眉眼总挂着善良笑容的公署主任刘瑞龙叫住林颖：

“小林，我问你一件事，你认识彭雪枫师长吗？”

“当然认识！”林颖爽直答道。

“你对他的印象如何？”刘主任太熟悉林颖的个性了：泼辣、大胆、快人快语，从不转弯抹角，一是一，二是二，想问什么就对她直说，不必担心她承受不住缄默不语，她会直言不讳他说出自己的印象和见解，不管评论的对象是谁。

“印象很不错！”林颖大大方方地回答，接着像平时汇报工作一样，有条不紊地摆出三条根据：“第一次见面就留下待人特别真诚、亲切的感觉；第二，他对老乡，对战士平等、尊重，没有大干部的臭架子；第三是有文才，有水平，作报告不拿稿子，可记下来不用润色，便是一篇好文章，有理有据，有情有感，富有鼓动性和说服力！”

刘主任是十分欣赏面前这位年轻部下的。他带着一丝神秘的笑说：“林颖，我可是已经向彭师长介绍你了。”刘主任也来了个一二三：第一，革命坚定，一心抗日救国；第二，做妇女解放工作扎实、能吃苦；第三，要求自己严格，敢讲话，最反对首长路线。

其实，刘主任早就听说，林颖对那种嫁给领导干部后便不再做实际工作，

庸、花瓶，可悲可叹！她在多种场合下发誓赌咒：绝不与此类人为伍，绝不当官太太！想到这里，刘主任不由叹了口气说：

“小林啊，我把你的倔强，你的个性和理想都向彭师长介绍了，他乐意和你建立联系，先嘛，通通信，然后接触接触加深了解，看看他能不能与你成为理想的爱人。”

“什么，和我交朋友？”原以为是老领导了解情况的林颖顿悟缘由，两颊飞红，惊喜地反问，丝毫没掩饰内心的兴奋。彭雪枫是她内心尊敬爱慕的真正男子汉：他是四师一颗最亮的星，是远近闻名的抗日英雄，他有出众的相貌，非凡的才干，他若能成为自己的终生伴侣，那是多么美妙幸福的事啊！这一瞬间，她真后悔自己的幼稚和极端的发誓：天下男人都死光了，我不结婚也不会当官太太，我要坚持自己的人格、自我和尊严，靠自己的努力，走自己的道路。她从来没把彭师长列入自己追求的对象，也没想到彭师长会注意到自己——一个小小的妇女干部，并乐意交朋友，早知有今日，她也不会把话说绝了！

然而，狂喜之后她冷峻细想，不觉又犹豫、疑虑。她内心呼唤着自己的名字：林颖，林颖，他是四师师长兼政委，如果只是想娶房妻室，必然要调我到部队与他朝夕相处。我只能当妻子，当孩子的妈妈，没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追求，只剩下×××爱人的内涵。我追求的妇女解放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毫无疑问是失败了！我白挨了手板，白挨了嘴巴，依然走母亲的老路，生儿育女，夫荣子贵……想到这些，林颖不寒而栗，她理智地答复刘主任：“我愿意与彭师长通信，像一般朋友那样，因为我确实尊重他，坦白点说：也确实喜欢他的英俊、洒脱、才识和气度。但是，尊敬不等于爱情，喜欢也不等于爱情，这里有质的区别。我还不太了解彭师长，等我们接触一段，看看彼此感觉能否一致而定吧！结婚，毕竟是终生大事，如果双方不能理解，没有爱情，我宁可把这一荣幸让给更幸运的姑娘。”

刘主任点点头，望着她远去的背影，又禁不住摇摇头，真没见过这样坦率、倔强的姑娘。但是，刘主任更了解彭雪枫：他是河南镇平县七里庄一个耕读之户的后代，爷爷、伯父、父亲，能教书、善种地，更爱习武，使彭雪枫自小养成勤学敏思的习惯。他后来在北京做地下工作时，取唐朝诗人杜牧《山行》一诗中的名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之意，将原名修道改为雪枫。1930年参加红军，身经百战，从江西到陕北，从延安到苏北，他戎马生涯仍酷爱读书习文。他对自己要求极高，对自己恋人的期望当然不会低：希望才貌双全，既有妻子的温柔，又有战士的豪气；既有女性的灵秀，又有共产党人的理想……他自己知识面宽，感情丰富，理想中的爱人标准这样高，确实很难如意。然而，刘主任认定，彭雪枫不打算解决是假，不愿降低标准是真。他关心这位年轻有为的师长的幸福，一直注意为他寻觅。

刘主任熟悉了县妇女部长林颖，发现她秀气之中的倔强，热情之中的坚韧后，非常高兴，他猜想这位不同寻常的姑娘可能恰恰符合彭雪枫的理想。在书里不是常说，一物降一物嘛。

过了不久，林颖真的收到一封信，牛皮信封左侧有着鲜红的大字：新四军第四师司令部。不用拆信，林颖的心便加快了节奏，秀气的脸庞为喜悦点染，越发显得俊俏。她稳稳神，撕开信封，急切地读着这封既是意料之外，又是意料之中的来信。

林颖翻开信纸，不觉一阵好感，分明没有竖格，可白纸上一行行字迹，俨然像训练有素，排列整齐的士兵，赏心悦目。读罢内容，林颖更觉感情如诗如画，不能自恃。信中写道：

年了。我心中的同志，她的觉悟、品格和才能，应当是纯洁、忠诚、坚定而又豪爽，军人究竟还是军人，我的军衣已经穿了十八年了。”

“我是一个十分平凡的共产党员，有许多缺点，很需要一位超过同志关系的同志，更多地了解我，才能更多地帮助我，也才能更多地相互帮助。”

“有时间，我们需要长谈……”

林颖细心地用彭雪枫希冀爱人的“纯洁、忠诚、坚定而又豪爽”十个字衡量自己，不说十全十美，也不算一点边不沾，否则，彭师长是不会给自己写这封信的。她心里暖暖的，只是再读两遍信，琢磨希望“有位超过同志关系的同志，更多地了解我，才能更多地帮助我”这句话，心里又敲开小鼓：他可能特别希望有位知心伴侣朝夕相处，他肯定不会同意我结婚后离开他到远处工作。因为据她所知，部队领导干部结婚后，几乎没有一个不把爱人调到身边的。彭雪枫这么重感情，恐怕不容易答应我离开他。况且，在林颖内心深处，对自己并不是有绝对的把握，她担心自己为彭雪枫完全倾倒之后，会不会像攀援大树的青藤，再不愿离开感情丰富、多才多艺的丈夫，不愿去困难重重、问题累累的穷乡僻壤拼搏，她认定人是有惰性的，惰性是潜移默化的……

林颖下决心利用开会的机会，坦率地和彭雪枫谈一谈，她要当面得到许诺，她才能允许自己跨过比同志更进一层的关系。

月光溶溶，湖水低吟，柏树林里虫鸟安睡，十分幽静。大青石上坐着英俊的彭雪枫，林颖依着一株柏树，借着树荫掩饰激动引起的颤栗，她不愿在没有认可的情况下，过早流露出自己无法压抑的爱慕之情。她又是坦率的姑娘，不加保留地讲述自己接到信后喜悦、幸福以及瞬间产生的顾虑和犹豫，情真意切。彭雪枫含笑听着，她喜欢林颖的灵秀、聪慧，更喜欢她的豪爽、落落大方，大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慨。

林颖话锋一转：“彭师长，你了解我的家庭，表扬我一个高楼小姐，能放弃舒适生活到敌后受苦，没日没夜做妇女工作，你并不完全知道什么是我的动力。当然，抗日救国，这是第一条。这第二条，是我自己的痛苦经历。”林颖叙述了在家中为争得宣传抗日的自由当众受罚的情形，接着说：我总是牢牢记住被打耳光的情景，告诫自己：必须有我的生活，有我的事业，有我的追求。我不能走母亲那条道路，所以我到根据地来，不愿再跳舞唱歌，决心做妇女工作。这几年，也有不少同志给我写信追求我，但是只要这方面有点不尊重我的人格和事业，我便坚决不允。现在我唯一的担心是，倘若我们结婚后你就要把我调到师部来工作，我只有放弃妇女工作的事业，自己再也不会会有什么发展。平心而论，部队适合女同志的工作并不多，我担心久而久之，我会成为羽翼下不再能飞的小鸟，成为你大树下不再能经风雨的小草，成为你的花瓶、摆设，真正是弃之可惜，放之无用的玩物。”林颖的一席话，彭雪枫听来如雷贯耳，深深被震撼了。他过去只了解林颖的豪爽、热情，却不知她始终在为女性独立的人格、事业拼力抗争。只听说她曾经拒绝过一些人的爱，却不知她的动机和原因。如果说交谈前他喜欢林颖的纯洁和坚定，听罢这番心迹表白，他更为她的自尊自爱自主自立的个性和追求所倾倒！这样的女性，正是他渴望得到的，能给自己激励和帮助的好姑娘！彭雪枫眼里闪现出奇异光彩，他猛然伸出双臂，把面前这位秀气坚强的姑娘揽到自己的胸前，紧紧地拥抱着，沉默了很久、很久。林颖依偎着他，听得见彭雪枫胸膛内那颗坚强有力的心脏剧烈地跳动，像一支节奏明快激越的奏鸣曲，真动听，她期望他回答：又害怕听到他的回答！她担心他拒绝自己的请求，更担心自己不能承受被拒绝的巨大损失！她甚至希望就这样永远站下去，她品尝

姑娘，我们结婚吧！”彭雪枫捧起林颖发烧的脸庞柔声请求。姑娘惊异地发现，彭雪枫明亮的双眸柔情似水，平日宏亮的声音充满诗意：“我绝不干涉你的工作，不把你调到身边，‘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只要你给我写信，只要我知道，不管我走到多么遥远的地方，有一位美丽的姑娘，一位坚强的同志，一个有理想的女性惦记着我，始终与我志同道合，为着一个共同目标努力奋斗就足矣！”

彭雪枫是位多情的男子，更是位守信的丈夫，新婚第二天清晨，天边刚露鱼肚白，林颖已踏上返回淮宝县工作岗位的路程。她勉强自己一直往前走，坚决不回头，她真没料到分离——自己坚持新婚第二天的分离，竟使自己失魂落魄，依恋的泪珠成串地滚落，她不愿让彭雪枫看见自己的软弱。前面要拐弯了，转过树林再看不见村庄了！林颖终于强忍不住扭过头去，彭雪枫，自己最亲爱的丈夫，依然站立在村口，见她转身，又高高扬起胳膊，清爽的晨风送来他宏亮的声音：一路保重！

婚后，缠绵的书信往返，林颖始终坚持在基层工作第一线。有一回，几位部队领导绕过彭雪枫，办理了林颖调往四师的手续，两人齐心反对，未成。结婚头几个月，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一个星期，连雪枫自己都在信中幽默地说：“这恐怕是古今中外所不多见的吧！”

后来，地方政府以工作需要为名，把林颖安排到四师所在县工作，林颖打好背包，坚持跑到离师部最远的区委蹲点发动群众。彭雪枫理解她不愿当官太太的心理，也同意了。

这样，彭雪枫在前线指挥作战，林颖在后方做群众工作。只有书信，成了他们互相鼓励、交换情感的纽带。从1941年9月至1944年7月，在不足三年的时间，彭雪枫写给林颖的信就有80余封。这些书信，不仅记录了他们当时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工作、学习、生活的概况，而且着重体现了夫妻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高尚情操。

他们结婚不久，就赶上全党整风运动。彭雪枫在信中就常常讨论整风运动中遇到的问题。当他从林颖的信中得知，她对别人提出的意见感到难以接受时，彭雪枫多次写信从思想上对她进行教育。他在信中写道：“……你要一百二十分地下一番克己的功夫！先苛责自己，别抱怨人家！任何人（连水平最低的人在内）对你的批评，不管当面的或背后的（背地里的批评，即是所谓“舆论”），你都须要以善男信女们对观音菩萨似的虔诚态度，先来自我反省一番。为什么人家有这种批评呢？为什么人家有这种舆论呢？只好反而求诸于己了。……那些批评，或许有言过其实的地方，或许有不完全符合事实的地方，然而，无风不起浪呵！我就不同意你这种‘躬自薄而厚责于人’的态度！前年我们不是谈过吗？我们不应为舆论所左右，然而也不应该漠视舆论！这里头包含不必做优柔寡断、东倒西歪的人，同时又包含着反对那种刚愎自用、不听人言的自以为是的态度！就是说，我们要以谦虚的态度，批判的精神，去接受舆论！”

“我们忠诚坦白之对于爱，一如我们忠诚坦白之对于党。”这是彭雪枫1941年送给林颖《斯大林传》时，在书的扉页上写的赠言。于是，这便成了他们夫妇问共同生活的政治基础。雪枫还写道：“革命者的爱情，首先建立在政治上，工作上，性情上和品格上，自然也有花前月下，然而已经不是卿卿我我了，而是花前谈心，月下互勉，为了工作，为了事业，为了双方的前途。”“这种爱才是最正当最伟大最神圣的！”“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一般人对他的爱人，是不容易看到缺点的。所以在起初，感情无限好，但日长天久，弱点逐渐暴露，感情就会淡了。”所以，“只要对方在基本上是可爱的，是值得爱的，那就够了，把功夫用在相互帮助，相互教育，相互鼓励

彭雪枫不仅十分尊重林颖在婚后要求自主自立的决心，而且对于爱情有着十分独到的见解。他说：“我觉得夫妇之间，那种庸俗低级的趣味主义的态度和习性，并不能维持夫妻关系良好友爱于长久，而应相互采取一种严师益友爱侣的态度和习性，方能保持永久。”为了求得夫妇之间的和谐与进步，彭雪枫主动在信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诱导林颖正确对待自己的丈夫。他在信中说：“今天开了一个会，费了8个小时，解决了一个同志的党性问题。一个女同志在会上对她爱人所犯的错误进行隐瞒，而不尽情暴露，因为他们是‘夫妇’。她，这样的她，不是我的爱人。我所期望的颖，是热爱她的爱人的人，而同时更热爱着党。”

彭雪枫还在日常生活中严格要求林颖，他常对林颖说，你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又是首长家属，在物质生活方面千万不要特殊。有一次，林颖丢失了钢笔，有位领导同志知道后，把公家的一支笔送给了她。林颖因为工作需要也就收下了。彭雪枫知道后，觉得这不是小事，不能揩公家的油。于是，他用自己的稿费，为林颖付清了钢笔钱。

后来，林颖回忆说：“尽管我们相处的时间是短暂的，但你的优良品质，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却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你对我的许多教言，始终是鞭策我，鼓舞我不断前进的力量。”

彭雪枫和林颖在婚后的日子里两地书往返不断，相比之下，总是彭雪枫的来信多，林颖的回信少；前者的信长，每次信封都鼓鼓的，后者的信短，常常是薄薄的一片。以致雪枫在信中经常批评她信写得“太简单”、“太抽象”，甚至埋怨她说：“最急人的是久不接你的信，最恼人的是总不见你的长信！”

客观上，林颖工作在基层，个性要强，工作条件艰苦仍努力一心放在工作上，加上信件投递也不甚方便。更令林颖感到吃力的是，结婚后就怀孕了。第一次怀孕眼看就要生产了，正逢鬼子扫荡，她挺着个大肚子在天寒地冻中东躲西藏，结果，他们的女儿出世了，可很快夭折了，十月怀胎一场空，让林颖伤痛不已。

1945年1月底，窗外北风呼啸，雪花飞舞，林颖躺在暖和的床上，细细端详身边刚出世、酣睡中的胖儿子，眼眉、鼻子整个再版了雪枫，她心里一阵阵幸福、宽慰：时间过得真快啊，与雪枫结婚三年了，可她细细算过，夫妻团聚的日子满打满算，不到半年。其实林颖何尝不惦念出生入死的丈夫呢！她珍藏了雪枫给她的每一封信，每一张便条，按照收信时间一张张叠在一起，用针线装订成册，每每夜深人静，便像规定好似的，从头到尾细细读一遍。每当读到信中落款：深夜两点一刻；6月6日夜亦即7日晨1点40分；……她仿佛能看见雪枫那历尽风霜苦难依然英俊的脸庞浮现出脉脉深情，心里充满了温情和甜蜜。她庆幸自己找到了情真意切的丈夫，感受到爱情的诗情与画意。

回想起因为自己的固执，夫妻错过了多次重逢相聚的机会，林颖的心头掠过了一阵悔意，自己对待丈夫也许太自尊，太自私了。她含泪亲吻着儿子胖胖的小手，心里暗暗铭誓：待儿子小枫满月，她带孩子去师部住段时间，与雪枫好好地谈谈心，过过日子，她会更加体贴和照顾丈夫和孩子，让幸福、和谐、充实、美满永远伴随着全家……

会面的时机终于来了。小船离半城码头还有二三里路远，林颖在舱内已坐不住，她兴奋地抱着小枫走到船头眺望：雪枫知道她们母子回来，一定会到码头迎接，她要让雪枫早一点见到他们爱情的结晶，她盼望看见雪枫英俊的面容上浮现的欢悦笑容！

码头上没有雪枫高大的身影。抱子上岸后，林颖在人群中急切的寻觅着，

安慰的神色。

“林颖同志，我告诉你，雪枫同志壮烈殉国了！”邓子恢政委沉痛地说。

“这是真的？！”林颖几乎惊呆了。

“去年9月11日，雪枫同志在河南夏邑里庄战斗中光荣牺牲了。”

“政委一定弄错了！”林颖匆匆摸出衣袋里的三封电报：“这是我生小枫前后雪枫发来的电报，都是今年的，他怎么会去年9月牺牲？！”

张爱萍师长落泪了：“林颖同志，请您原谅，这些电报是我代雪枫拟的稿子，我们不忍让您在月子里过于悲痛！”

天旋地转，人影模糊，林颖在众人搀扶下走进雪枫的灵堂。她一望见灵台上雪枫含笑的遗像，猛然扑上去，凄楚地流泪哭诉：“雪枫，雪枫，你不该走，我还有好多话没给你说！……雪枫，雪枫，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想改变部没有机会……雪枫，你有儿子了，只是我们的小枫还没见过爸爸……”

在那些痛裂肝肠的日子里，林颖收到了来自国内外的许多函电，对她和孩子表示亲切的慰问，周恩来、邓颖超也前来看望。林颖重新振作起来，她含泪吻别了托付邱一涵大姐照顾的小枫，又返回泗宿县工作岗位。她决心把儿子养大，她要告诉儿子，他的爸爸是个多么好的人，永远不能辜负他；她也要把自己内疚的心理如实告诉儿子……

刘亚楼（1911～1965）福建省武平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西游击队排长，红四军第三纵队八支队政治委员，第十二师三十五团政治委员，第十一师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委员，第一师师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副司令员，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1939年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6年回国。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

己巳清明，在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陵园，一位头发灰白，脸庞仍然带着俄罗斯血统印记的妇女捧着一束亲手栽培的鲜花来到原国防部副部长、空军第一任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的灵前。她的脚步很轻很轻，就像当年生怕打扰正在运筹帷幄的将军。“亚楼，我看你来了。”她的声音很轻很轻，就像当年生怕惊醒因劳累过度而衣而卧的司令员。她掏出手帕轻轻拂去骨灰盒上的灰尘，就像当年为凯旋的亲人拂去军衣上的尘埃。她把鲜花放在灵前，默默地凝视着镶嵌在骨灰盒正面那张异常熟悉、倍感亲切的遗像。24年了，24个清明，年年她到这里送来无穷的思念，捧起不尽的回忆。那是44年前一个风雪纷飞的冬夜……

1945年岁尾的一个夜晚，在中共大连县委书记王西萍的小客厅里，坐着一位风华正茂的姑娘，一张有着鲜明俄罗斯人风采的脸庞，端庄秀丽，一双大眼睛像一泓湖水晶莹清澈，两条粗壮的辫子垂在身后，丰盈苗条的身材奔涌着青春的活力。姑娘和王书记很熟，作为县妇女代表他们没少打交道，多少次汇报请示工作从未拘束过，可是今天却显得格外拘谨局促，甚至有点儿紧张。尽管室外是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她的鼻尖上还是沁出了细细的汗珠。她的紧张是有缘由的，因为一会儿王书记要给她介绍一位陌生的男子。

姑娘时年18岁，正是多梦的时节，亦正是情窦初开的年华。在她那个年代，18岁已是婚嫁的年龄，多少痴情的男子向这位出水芙蓉一般水灵的姑娘投去多情的目光，渴望她能抛出绣球。但是姑娘自有择偶标准，她理想中的“白马王子”，应是一个英俊高大、威武潇洒的真正的男子汉。可是呆会儿将要见到的男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门外响起了停车声和脚步声，房门开处，中共大连市长韩光和一位高大的军人跨了进来。

“这位是刘亚楼同志；这位是翟云英同志，我们县的妇女代表，一个十分能干的女将。”王书记一边热情地招呼客人坐下，一边笑着向双方作着介绍。

“你好，翟云英同志。”刘亚楼落落大方地向姑娘伸出了结实有力的大手。姑娘抬起头来，只见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正注视着自己，胸口禁不住突突地跳动起来。当她的手和刘亚楼的手一接触，脸上立时飞起两朵红云，羞怯地低下了头。以后他们三人说了些什么，姑娘全然没有记住，只记住了刘亚楼给她的第一印象：英俊高大、威武潇洒，一副大将风度。姑娘的眼力不错，刘亚楼确是一员骁勇的虎将。

刘亚楼原名刘振东，1911年2月诞生在福建武平县桃澜区大洋泉村一个

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军这所革命的大学学校里，他从一个普通的士兵很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22岁时就挑起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政委和红一军团第二师政委、师长的重任。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担任第一军团第一师师长。他所率领的部队作为长征路上的开路先锋，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占领腊子口，奏凯直罗镇，创造了一系列光辉战绩，为红军摆脱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长征胜利后，他又先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和教育长。1939年1月，党中央送他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其间适逢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他加入苏联红军驰骋于反法西斯前线，又一次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他随苏联红军，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来到大连工作。

然而，这位在沙场逐鹿中屡操胜券的虎将，在个人婚姻上却一再受挫，发生了两次裂变，几年来一直是孑然一身。一位哲人说过，任何一个单独的男人和女人都是不完整的，他们都只是一个圆球的一半。只有男女双方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圆球，才能在生活的道路上滚滚向前。亚楼是个凡人，也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他需要女性的温存和体贴，需要另一半圆球的支持。几年来，他一直在寻觅知音。“梦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在王西萍家的灯光下，翟云英进入了他的视野，他立即被姑娘的俏丽所吸引。

数天以后，在王西萍家中，刘亚楼和翟云英又一次见面了。这一次姑娘已不像上次那般羞涩。她心中的琴弦在和刘亚楼握手的那瞬间已被重重拨动。她平静地坐在那里，一双大眼睛注视着亚楼。亚楼虽然从心底里喜爱姑娘，但是两度的婚姻裂变迫使他十分谨慎小心，他不希望在他的生活中出现第三次爱情危机。于是他采取了迂回战术。

“小翟，日本鬼子虽然投降了，但是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我是个军人，要上前线打仗，而打仗是要流血、死人的哟。”

“这我知道，革命总会有流血牺牲的。我的爸爸就是牺牲在日本鬼子手中的……”姑娘望着亚楼，叙述起自己的家史。

1911年深秋，一个名叫翟凤歧的中国青年，因不堪忍受贫困和饥饿，只身从东北去俄国谋生。但是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人民并不比中国百姓的日子好过，他们同样挣扎在贫困、饥饿和死亡线上。冷酷的现实使翟凤歧的一腔热望化为泡影。他先是在远东的海参威，以后几经辗转，由赤塔到伊尔库茨克再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过着颠沛流离的苦力生涯。其时，一场大革命风暴正在俄罗斯上空孕育，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正积极酝酿推翻沙皇统治，血气方刚的翟凤歧很快接受了革命思想，投身于工人运动。1917年他参加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随后为了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他又参加了由任辅臣同志领导的“中国红军团”，开赴前线同高尔察克匪帮展开殊死战斗。“中国红军团”的英勇顽强，受到了列宁的高度赞扬，并把该团命名为“红鹰团”。在阿拉伯耶夫斯克战斗中，翟凤歧腰部负伤撤下火线，养好伤后被分配到伊凡诺沃纺织厂工作。在那里他结识了纯朴善良的青年女工安娜·卡兹米洛芙娜。安娜也是个苦命人，从小失去双亲，和哥哥米哈依尔·卡兹米洛维奇相依为命。十月革命胜利后，安娜进厂当了纺织女工。共同的命运把这对不同国籍、不同民族的青年人联系在一起，两人结为伉俪。四年后他们的爱情之树结下了两枚果实，生了一儿一女。1929年翟凤歧和安娜携长子翟云海（苏联名安德烈）、幼女翟云英（苏联名塔玛拉）回中国大连省亲。当时的中国社会危机日益尖锐，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受到十月革命洗礼的翟凤歧懂得，中国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才有前途。在安娜的支持下，他毅然留在祖国投身于革命洪流。他积极穿梭于工人贫民之间，以自己在苏联的亲身经

特务的注意，1942年不幸被日本宪兵逮捕投监。在狱中他受尽非人的折磨，终被严刑拷打致死……

姑娘说到这里，声音哽咽，两行热泪滚滚而下。亚楼静静地听着姑娘的叙述，心中卷起股股热浪。他十分钦佩这位永远不能谋面的老人，同时为姑娘深明大义、通达事理而暗自高兴。

“小翟，你知道么，做一个军人的妻子是要吃很多很多苦的哟。”

“我不怕苦，能吃苦，什么苦都能吃。”

姑娘的话不假，她是在苦水中泡大的。从她懂事起就体会到家境的贫寒和父母的艰辛，小小少年就接受了生活的挑战。她懂得体恤父母，捡煤核，挖野菜，和妈妈一起帮人家洗衣服。父亲去世后，她更是和母亲一起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

坦诚的交谈使他们的心贴得很近很近，亚楼看到时机成熟，便向姑娘坦陈了心曲。但是什么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刘亚楼时年35岁，而翟云英年仅18岁。一个正处豆蔻年华的妙龄少女要嫁给一个年长17岁并且两度结婚的男子，免不了引起人们的议论。对这种世俗偏见，姑娘不予理睬，她自有主见。只是安娜妈妈有点沉不住气，她告诉女儿要亲自见一见刘亚楼再作定论。

初春的一个晚上，刘亚楼来到安娜家里，望着这位纯朴善良、历经磨难而坚强不屈的俄罗斯老人，他亲切地叫了一声“妈妈莎”（俄罗斯人对女性长辈的尊称），随即用纯熟的俄语和老人交谈了起来。安娜一听见那遥远而又熟悉的乡音，眼里顿时放射出热烈的光彩，等她听完刘亚楼叙述的身世和遭遇，老人的眼眶湿润了。百闻不如一见，她相信女儿的选择，更相信自己的眼睛，欣然答应了这门婚事。

1947年5月1日，由韩光同志主持，刘亚楼和翟云英在大连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蜜月尚未度完，亚楼奉党中央之命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夫妻双双告别安娜妈妈，离开大连的秀山丽水，策马东北解放战争的前线。

诚如亚楼所说的，军人的妻子要吃很多很多苦，亚楼奔赴设在双城的前线指挥所，云英和其他领导同志的眷属留在哈尔滨。两人天各一方，过起了战地的牛郎织女生活。翌年春天，身怀六甲的云英忽然得了一种怪病，鼻腔流血、屡治不止。她深知丈夫军务繁忙，责任重大，为了不牵扯他的精力，她迟迟不让别人告诉亚楼。不料她的病情急剧恶化，日重一日。罗荣桓夫人林月琴同志望着生命垂危的云英，急电前指把亚楼叫了回来，望着躺在病榻上脸同白纸、气息奄奄的妻子，这位泪不轻弹的硬汉双眼发潮。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怕影响你的工作。”

“哎——你呀！”亚楼爱怜地抚摸着妻子的秀发，重重地叹了口气。他立即四出奔走，八方求医，幸亏一位经验丰富的德国籍医生精心治疗，才把云英从阎王殿门口找了回来。

全国胜利后，刘亚楼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当时中国空军一无所有，一切从零开始建设。繁忙的工作使亚楼无暇顾及妻子和孩子，云英毕竟是感情丰富和细腻的人，她和每个做妻子和母亲的女性一样，渴望得到丈夫的爱抚，享受人间的天伦之乐。特别是星期天，看到人家夫妻双双去剧场影院、商店公园，她羡慕极了，她多么希望亚楼能陪她和孩子去一次商店，逛一回公园，看一场电影！可是亚楼似乎有永远忙不完的工作，处理不完的军务，看不完的文件，开不完的会。望着丈夫布满血丝的眼睛和疲惫不堪的面容，她既心疼又抱怨。

“实在太忙了。”

“忙！忙！人家忙不也能休息吗？”

“谁叫我是司令员呢，你以为司令员这个称呼叫起来好听、听起来舒服吗？不！它意味着比别人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

做妻子的还能说什么呢？如果说云英对其他事情都能理解，有一件事却使她怎么也不能谅解。安娜妈妈从1929年来到中国以后，即和苏联的亲人失去了联系，几十年来，老人苦苦地思念着故国的亲人，渴望和亲人团聚。每当亚楼去苏联访问或会谈，翟云英总希望亚楼能兼顾一下。凭亚楼这样的职位如果说一句话，请苏联有关方面查询一下，也许不难找到，可是亚楼说：“国事和家事相比，国事重要，我怎能在国事活动中去处理家事呢！”为此，云英不知抹了多少回眼泪。

1965年初春，亚楼感到身体极度不适，经检查肝癌已到晚期。在病笃沉重之际，他把妻子叫到床边，一双干瘦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脸庞。“阿英，我们一起生活了近二十年，你跟着我吃了很多苦。你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我从心底里感谢你。如果说这些年我为党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一点成绩，和你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恐怕不多了，你不要难过，死是客观规律，谁也不能违背。在五次反围剿中，在长征路上，在反法西斯前线，我没有想到能活到今天。能看到革命胜利，看到人民空军一天比一天壮大，祖国一天比一天富强，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在这个家里，我有三件事没有做好，请你帮我做完。第一把孩子抚养长大，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第二好好赡养我的老父亲，为他养老送终；第三务必帮安娜妈妈找到失散的亲人，在这件事上我对不起她老人家，请她能谅解。最后我希望你做一个坚强的人，正直的人，像高尔基所说的‘大写的人’。”

1965年5月7日，刘亚楼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终年55岁，时年云英仅38岁。中年丧偶，使云英陷入生活的低谷，但她没有消沉，她把对丈夫的一腔爱倾注到三个孩子和两位老人身上，认真地执行了亚楼临终前的嘱托。她精心把三个孩子抚养长大，如今大儿子滨滨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二女儿红红和小女儿珍珍均是军队干部。对亚楼的父亲，她一如既往悉心照顾，每月按时寄去生活费。十年浩劫期间，尽管她自己身处逆境，仍嘱咐孩子按时寄钱寄物。1978年老人寿终，她率子女风尘仆仆亲赴武平奔丧，料理后事，替丈夫尽孝道之情，被亚楼家乡的人民传为佳话。最后一件事尽管费了许多周折，但办得非常漂亮。1986年中苏关系渐趋好转，她不失时机投书苏联红十字会请求协助查找亲人。一年后，她终于盼到了回信。她的舅舅米哈依尔·卡兹米洛维奇早在1937年辞世，她的表哥柯利克·弗拉基米尔·米哈依洛维奇一家健在。获悉亲人的消息使母女俩欣喜万分，她立即去信邀请表哥全家来北京相聚。蛇年之首，皓首白发的米哈依洛维奇老人率全家来到北京，95岁高龄的安娜终于在阔别60年以后和亲人团聚，了却了心愿。

云英圆满地办完了三件事，她自己也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在1965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怀着不可告人的险恶用心，指使叶群抛出了无端捏造的所谓“刘亚楼揭发罗瑞卿四条”。以此达到“以死人整活人”的罪恶目的，他们派人要翟云英作证。翟云英虽然不知道其中内幕，但她懂得不能说违心话，做违心事，更不能加害于人，遂严词拒绝作证。她说：“我们和罗总长一家过去常有接触，我和郝治平大姐也常见面，关系是很密切的，也是正常的。我从来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反党言论，更谈不上有什么罪行。亚楼生前对罗总长很尊重，我没有听到他说过罗总长有什么问题。如果你们一定要我作证，那好，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证明他们是忠于党忠于人民

表明她是一个坚强的人，正直的人，一个如高尔基所说的大写的人。“亚楼，我没有辜负你的期望，你要我办的事我都办完了，你要我做到的我也做到了，请你放心吧。”云英凝视着亲人的遗容心中默默地说道。照片上的亚楼笑了，这是信任的笑，欣慰的笑，满意的笑……

肖华(1916~1985)江西省兴国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红四军军委青年委员,连、营政治委员,第十师三十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陕甘支队第一大队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三四三旅政治委员,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鲁西军区政治委员,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辽东省委书记,南满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干部部副部长、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兰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1938年冬,王新兰终于接到久盼的调令,派她到八路军一一五师去。这意味着从此她就要在自己的心上人——肖华身边工作了。突然降临的幸福,使她兴奋得几夜也没睡好。

11月21日那天,王新兰与陈赓夫人结伴,离开了她生活了一年多的延安,踏上了东进征途。

汽车驶出延安,王新兰回头望去,高高的宝塔山,清澈的延水河,今天要离开了,心里又好像失去了什么,空荡荡的。在这里,有她多少珍贵的记忆。

记得有一天下班后,王新兰和女伴们在延河边散步,兴之所至,她们不由得放开歌喉,唱起了新学会的陕北民歌《信天游》。

毛泽东恰巧也来到延河边散步,他被甜美的歌声所吸引,询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唱歌的那几个姑娘是哪里的?”

“是新华社新闻台的报务员,其中一个肖华同志的对象呢!”

“噢!”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时就熟悉肖华,一听肖华的对象在此,微笑着招手喊道:“唱歌的小同志,你们过来嘛!”

王新兰自1937年秋与肖华分离后,在延安通信学校学习,毕业后当了报务员。她聪明、好学,能歌善舞。她发报的声音,也像她唱歌一样,特别清脆,好听极了。

王新兰几个人听到毛泽东招呼她们,赶紧跑过来,向首长敬礼。

毛泽东上下打量着王新兰,笑着问:“你就是肖华的女朋友?你知道肖华在哪里?”

王新兰睁大了眼睛,摇摇头:“不知道啊。”自从云阳镇与肖华分别后,她几乎没有一天不想他。肖华只在平型关大捷后,从山西给她写过一封信,由一位同志带来。那位同志又急匆匆要走,新兰来不及回信,只托来人带去自己在延安拍的一张照片,寄上自己对肖华的一片深情。

见王新兰一副茫然的样子,毛泽东打着手势,慢悠悠地讲开了:“肖华就要率部东进打鬼子去了。渤海区和日本就只有一海之隔,从渤海区坐船过海,就到日本了。你要现在不去找肖华,将来他打到日本去了,日本的漂亮姑娘多咧,你要是去晚了,日本姑娘就要把肖华抢走了!”说完,毛泽东忍

“抢走就抢走吧，我才不怕呢！”王新兰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她知道，毛泽东讲话风趣幽默，这是在开玩笑。

毛泽东又问：“你不想去找他？”

“嗯……”王新兰脸一红，没说出话来。

毛泽东沉吟了片刻，说道：“小鬼，我今晚要给肖华拍电报，叫他在山西八路军总部等你几天，我们想办法送你去那里，你看好不好？”

王新兰的脸更红了，心怦怦直跳。要能随肖华同行，一道工作，这该是多好啊！

临与毛泽东告别时，主席握着她的手，说着：“你等着！”

第二天，毛泽东果真派秘书送来一份电报。王新兰急忙打开，电文不长，上面写道：

主席：来电尽悉。国难时期，一切以民族和党的利益为重，个人问题，无须顾虑。

肖华

王新兰知道，肖华战斗在抗日前线，无暇顾及个人问题。其实，自从与新兰分别后，肖华何尝不想她！

大概毛泽东估计到王新兰会有些失望，他托秘书转达了自己的话：“肖华现在身负重任，我会另找机会，一定尽快把你送到肖华的部队上去。”

那一夜，王新兰久久不能入睡。肖华打来的电报早已深深印在她的脑海里。肖华深情刚毅的面庞又浮现在她的眼前。“一切以民族和党的利益为重”，这掷地有声的话语，激荡着她那充满柔情的心，她的心里翻腾开了。是的，他们都是革命者。肖华12岁入团，14岁转党就当了兴国县团委书记，当年毛委员考察过他的工作情况，还表扬了他！18岁，周恩来副主席就提名让他当少共国际师的政委。长征路上，他打过不少硬仗，有智有勇！而自己呢，9岁当红军，长征路上是大哥哥大姐姐们拾过来的。

肖华的电报，发自热血男儿报效祖国、坦荡赤诚的胸怀，它使王新兰第一次懂得了革命者崇高深沉的爱情：既意味着思念、团聚、幸福和甜蜜，更包含着理解、信任、尊重和支持。想到这些，王新兰为有这样的未婚夫而高兴。

王新兰已经为自己的幸福而陶醉了，手里的电报仿佛变成肖华的大手，那么亲切，那么有力，又那么温柔。恐怕是职业的习惯，王新兰放在胸口的右手食指自然地敲动起来，敲得认真、动情、长久。王新兰甚至相信，远在千里之外的肖华一定能听见，一定能听懂她那发自心灵的电文。

这发自内心的电波虽然无声无息，却成了王新兰和肖华两颗热恋的心相互联系的纽带……

汽车在崎岖的道路上颠簸着，王新兰想到这次去一一五师工作，一定是毛主席的安排，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脸上禁不住露出了甜蜜的微笑。

从延安到冀鲁边区，如在和平时时期，坐火车只有几天的时间，可是在抗日烽火连天的艰苦岁月，王新兰她们却整整走了一年！有时随大部队行动，有时随游击队活动，进进退退，打打停停，几次穿过平汉铁路、胶济铁路，和日本鬼子、汉奸们周旋。

在这艰难困苦的一年里，电台成了他们与一一五师联系的唯一工具。每到一地，王新兰立即去所在地部队，只要有电台，她立即上机工作，娴熟、敏捷地敲打着电键，向挺进纵队领导报告情况。看不见的电波，载着她的深情，飞往挺进纵队司令部，飞往肖华。

华的报务员们一收到那节奏分外清脆的信号，就知道准是王新兰打来的。离肖华越近，王新兰的心越是不能平静，手中的键敲得越轻快。打完电报后，她就睡下了。

黎明时分，鬼子突然包围了部队驻扎的小村子，村口架起机枪，疯狂地扫射，情况危急万分。王新兰被窗外激烈的枪声惊醒，找到支队长。支队长命令王新兰等非战斗人员设法突围，进泰西山区去找游击队。

王新兰飞身上马，紧贴在马背上向村外冲去。等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后，她才发现，随她骑马、跑步一块冲出一百多人中，大半是地方干部、机关勤杂人员和民兵，她是唯一的正规军的干部，又是唯一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革命。大伙一致推选她当队长。形势紧急，刻不容缓，她毫不犹豫地带着这支参差不齐的队伍，按照支队长的嘱咐，向山区进军。他们昼伏夜行，几次与小股敌人相遇，几次巧妙与敌周旋，转危为安。

再说肖华。快一个星期过去了，一直没有收到新兰的电报，真急坏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他不敢往坏处想。

自平型关战役后收到王新兰的照片，肖华一直把它珍藏在日记本里。战斗紧张时，他顾不上想新兰。战斗结束后暂时平静的日子里，他时常打开来看。平时，王新兰一发报，他就知道他们转到哪个部队，知道他们的位置。如今整整一个星期听不到王新兰发报的声音，他们的位置失踪，肖华怎能不急！

七天过去了，王新兰终于找到当地游击队，有了电台，她立即发报。

挺进纵队报务员一接到王新兰的电报，立即赶来向肖华报告。他连门也没敲一下，就哗啦闯进了肖华的房间：“报告司令员，收到了！收到了！”乐得合不拢嘴。

“什么收到了！收到了！”肖华明知故问，兴奋的喜悦仍然抑制不住，挂在脸上。

又过了几天，王新兰终于回到津浦支队。然后经过辗转周折，总算来到一一五师师部，在师部工作了一段时期后，罗荣桓把她派到了冀鲁边区的一支部队，然后随该部队到达了冀鲁边区。

王新兰正巧在1939年的11月21日到达目的地。肖华的技术书记小杨在前引路，她终于走进了一座普通的农舍，里间是卧室，外间放着一张方桌，几把椅子。这就是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肖华的指挥部。

一个身挎盒子枪的小战士从里屋跑出来，他顽皮地向她敬个礼，伏在小杨耳边说了句什么，嘿嘿笑着，跑了。

“他笑啥？”王新兰有点奇怪地问。“他说早就认识你！”

“早认识我？”王新兰更奇怪了，“在哪里？”

“在照片上！”小杨笑着解释。

原来肖华有时把新兰的照片拿出来看时，被警卫员战士也看着了。

王新兰脸有些红。看来，肖华还真的想她。

正说着话，一阵急促有力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新兰！新兰！”人还未见，却先喊了起来。

一个英俊潇洒而又熟悉的身影一下子出现在王新兰的面前，新兰心头怦怦直跳，站了起来，迎上握来的一双大手。

肖华紧紧握着新兰的手，怜爱地说：“长高了，长大了！”

王新兰羞涩地望着自己朝思暮想的人，发现肖华也变了，瘦了，黑了，特别是那双灼人的眼神中，增添了几分深沉和凝重。“曾经有一个星期电台的同志没有听到你上机工作，真把我急坏了。”肖华又提起了此事。“我们一直跟敌人打游击，好几次我都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新兰动情地说。

见我们的。”肖华爽朗地笑了。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炮声恰似结婚典礼上的礼炮，肖华和王新兰这对恋人结成眷属。

新婚之夜，他们百感交集，战争是残酷的、艰苦的，而此时他们的心中是幸福的、甜蜜的。他们谈了很多，很久，特别是想到两年多以前的意外相识，他们还真相信缘分，相信有情人终成眷属——

那是1937年8月，陕西三元县云阳镇。中国工农红军即将改编为八路军，红军总部的一些高级将领正聚在这里开会。

王新兰原是红四军的宣传员，奉命调回延安学习。她与两位女战士走到云阳镇，恰遇几天暴雨冲坏了去延安的公路，只好住下来，等修路通车。

这天傍晚，三位姑娘来到镇子东头，看着平整的草地就像舞台，她们就手脚发痒，边唱边跳了起来。

王新兰身着合体的军装，跳着欢快的刀马舞，一个亮相，收住了舞姿。周围响起了一阵掌声和喝采声。她一眼认出，叫好的正是陈赓师长。

陈赓笑着，向王新兰介绍身边的肖华：“他是肖华政委，是我们红一方面军最年轻的指挥员。”

王新兰走上前去敬礼问好。肖华刚满21岁，脸庞英俊，说话时总带着笑，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官架子。

通往延安的公路修了一个月，王新兰几乎每晚散步都能遇到肖华。他们随意拉家常，王新兰总有提不完的问题，肖华也奇怪地问她：“9岁还是个娃娃，当年红军怎么肯收你的？”

一次，王新兰发现肖华久久打量着自己，颇觉奇怪。她扯扯衣襟问道：“肖政委，干嘛这样看着我？”

肖华有点忘情，经王新兰一问，脸上更显窘色，赶忙掩饰道：“我看你身体单薄，年龄又小，长征时怎么没掉队？”

多日的接触，肖华已经喜欢上这位美丽、聪明的女孩。

王新兰当时13岁，稚气未尽，对热情的肖政委也颇有好感，喜欢与他一块儿玩。

肖华听说去延安的公路快要修好了，这意味着他与新兰就要分别了。他喜爱新兰，但又矜持害羞，如何向新兰表白呢？

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热心地当起了红娘。他派通讯员找来了王新兰。

“罗主任找我有什么事？”王新兰一路上心里直犯嘀咕。她忐忑不安地走进了罗荣桓屋里，望着这位戴眼镜、面容严肃的首长，很是紧张。她并不认识他呀。

罗荣桓看着王新兰不安的样子，直截了当地问：“我今天找你谈件事情。你喜欢肖华吗？”

王新兰没迟疑，爽快地回答：“喜欢呀！”

“你爱他吗？”罗主任又追问了一句。

这一句可把王新兰给问住了。她还是个情窦未开的少女呀，罗主任的活仿佛没听懂。是啊，她一直觉得肖华挺可亲的，可是从来未往“爱”字上想过。

“肖华说他爱你，”罗主任又接着说，“希望同你建立恋爱关系。”罗主任停顿了一下，又说：“我们革命队伍，恋爱是以双方共同理想为基础的，也要讲情投意合。你若不爱他，我去对肖华说，让他打消这个念头。”

“不！您让我想想。”王新兰有些沉不住气了。她确实没想过“爱”这个字，但却不能容忍“不爱”这个词。一向口齿伶俐的王新兰，此时变得结

她陡然觉得难为情，急忙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

罗荣桓乐了，他亲切地拍拍新兰的肩膀说：“你是同意了？”

王新兰羞答答地点点头。

罗荣桓笑得更开心了：“既然这样，你到延安后就不要再找别的男朋友喽！”

“那当然！”王新兰回答得很干脆。

话音刚落，肖华突然推门进来。罗荣桓打趣地对肖华说：“怎么，在隔壁坐不住了？好了，台我是搭好了，下面的戏该你自己唱了。”

罗荣桓笑着走了出去，让管理科长杀鸡备饭，为肖华和新兰庆贺一番。

“你真坏！”王新兰等罗主任一走，想起自己刚才的狼狈相，不禁开口埋怨肖华，撒起娇来，肖华笑在脸上，甜在心里……

傍晚，肖华牵着马送新兰。路短，话长，转眼已到村口。肖华站住了，语重心长地开了口：“要分手了，我没有那么好送你的，这床丝棉被是打土豪时分给我的。延安冬天冷，你身体单薄，就拿去用吧。”

王新兰接过又轻又软的棉被，心里立即涌起一股暖流。她用手抚摸着花色的被面，赞道：“真好看！”

“以后看见被子，就等于看见我了，可不许忘了我哟！”肖华叮咛着。

王新兰抬起头，第一次看懂了肖华双眼中依恋的神情，就跟前些天久久打量自己时一样，心里又甜又有点害羞，没有说话，只轻轻点了点头。

“你会给我写信吗？”肖华握住了新兰的小手，话音都有些颤抖。

“写啊！”新兰心跳得更厉害，一个劲地点头。

肖华放心了，翻身上马，转眼间消失在夜色之中。那身影矫健挺拔，像直冲蓝天的雄鹰。

初恋的欢欣与羞涩，分离的惆怅与留恋，从此轮番撞击着这对恋人的胸膛。两年多过去了，他们重逢了。他们终于结成了比翼双飞的战鹰，一起翱翔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硝烟之中。

谭震林(1902~1983)湖南攸县人。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秋上井冈山,先后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红四军二纵队党代表等职。红一方面军长征后,留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长。抗战时期,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第二师政委、中共淮南区党委书记。1945年6月,当选为党的“七大”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副政委、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军区政治委员等职。建国后,任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调中共中央任副秘书长。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文革”中受迫害。1974年重新出来工作,当选为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9月30日在北京逝世。

1939年春,周恩来副主席视察抗日前线,专程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周恩来此行是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托,传达和敦促执行关于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指示的。临走前,周恩来又为干部的婚姻之事说了情。这是因为项英副军长在男女问题上始终抓得很紧,军部一度提出“枪毙恋爱”的口号。对于敢破坏规定者,轻则撤职开除党籍,重则可能军法从事。周恩来不赞成如此“一刀切”,对男女恋爱卡得过死,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258团”的原则。这就是,年龄超过25岁,参加革命满8年,团级以上干部,可以恋爱、结婚。正是周恩来带来的这股春风,解决了许多老同志的“个人问题”。

那一年,谭震林37岁,正是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这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将,多年来驰骋疆场,全身心地投入到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去,但还是单身一人,倒也来去无牵挂。

谭震林从小在湘东边陲长大。他出生时,父亲为他取名喜起,是盼望喜事降临的意思。但在民族压迫、阶级剥削的社会,喜事是不会降临到贫困的市民家庭的。他12岁时,开始了艰辛的学徒生活。书纸店的活累得他喘不过气来,但他却意外地获得了晚上偷看书的机会,明白了不少道理。他曾这样说:“中国的历史,我是怎样了解的呢?我是从书店里了解的。因为小说《水浒传》是讲造反的。历史书上的陈胜、吴广,那是搞农民起义的。读了,就晓得革命。”他还结合自己的革命实践,谈到从《水浒传》等书中所受的教益:“要打倒欺侮穷人的坏蛋,光靠英雄豪杰一个人的力量不行,还要靠一伙肝胆相照,利害一致的人一块去造反,就像书中说的‘聚众起事’。攸县有句俗语也这么说:‘一堵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这是一个道理。”

读书促使谭震林的头脑开了窍,不平的世态唤起他的反抗精神。他不再是逆来顺受的学徒,而是20来岁、血气方刚的青年工人,投身到了大革命的洪流中去,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6年10月12日,谭震林由余来、戴述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表明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的志向,他要求改名“谭虎”。余林觉得这个名字太露,说:“云从龙,风从虎,虎啸生风撼山林,还是叫‘震林’好!”谭震林高兴地说:“这个名字好,我就叫谭震林。”

从此,谭震林踏上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新的征程。从参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战斗在赣南、闽西、参加三次反“围剿”战争、保卫和发展福建革命根据地、坚持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战斗在铜(陵)繁(昌)前线,他出生入死,屡建战功。

党方面委任。但是，县政府早已从县城搬到了乡镇。三支队开抵铜繁前线以后，川军也趁势退出了防线。于是，谭震林带着三支队司令部移驻繁昌县中分村，担负起了保卫繁昌防线，阻击日军“扫荡”的作战任务。

新四军不设政治委员，三支队司令员是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的，因此，谭震林实际上主持着三支队的工作。艰苦的斗争生活，加上身患多种疾病，使谭震林比实际年龄要苍老得多。而敌情严重、戎马倥偬的紧张战斗，使他的婚姻问题总摆不上议事日程。如果不是周恩来的到来和同志们热心帮助，谭震林与葛慧敏这对患难与共的革命伴侣，也许成为陌路人。

葛慧敏，原名田秉秀，安徽蒙城人。1920年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她从小在蚌埠长大，后入南京汇文中学读书。毕业后，来到了上海，在仁济医院雷斯脱实验室学内科。由于受到我地下党的影响，她积极投身到革命活动中去，到工人夜校上课，讲授抢救伤员的知识，教唱革命歌曲。1936年，经赵伯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在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潘粹年的帮助下，化装成医务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辗转香港、广州、汉口、郑州到达西安。她弃学从军，到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处，在第五区队接受训练。训练结束后，被派往江西南昌新囚军战地服务团。1938年4月，随军到了皖南，在军部驻地泾县云岭附近的汀潭开展民运工作，发展“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同年8月，重新入党。1939年2月，她由汀潭临时调回军部，参加战地服务团第二工作队。不久，调至第三支队。当时，新四军第三支队已经由原来所在的南陵县的南四区沙滩脚，向前方移到繁昌县的繁一区赤吉乡中分村。

19岁的田秉秀身材修长，五官端正，留着齐耳的乌黑短发，微笑时面颊上还现出两个笑靥，显得格外秀丽俊俏。平时总是穿着灰色军服，打着绑腿，戴着军帽，腰系一根皮带，脚上穿双黑布鞋，出门工作时总是夹着一把伞，肩上挂着一个草绿色布包，包口上缠着一条白色毛巾，要是夏天，还要戴顶小斗笠。这一身戎装打扮，给这位文雅端庄的少女增添了几分飒爽英姿，显出一副威严气概。当她脱下军装，赤着双脚，卷起裤管，同妇抗会员们一起，站在村头溪水中为战士们洗衣裳时，宛然是一位村姑。说起话来操一口普通话，看上去这位在南方长大的少女，倒像是北方的姑娘。由于她待人和气，村民们都愿接近她；由于她英武不凡，大家又非常敬畏她。她布置的工作，人们都乐意接受并积极地完成。人们欢喜她、敬重她，随之用多种称呼来称呼她。青年人称她“田大姐”，老年人称她“田同志”，与她同公屋住的徐崇辉及其老伴张氏，则亲切地称她“秉秀”。

谭震林与田秉秀几乎是同时来到中分村。村南有个绰号“老光蛋”的，名叫徐崇道，谭震林就住在他家。田秉秀住在村东的“三公所”。“三公所”是徐姓三个小公堂合建的公屋，前后两进共8间，中间有个大天井。后进两侧房间是公堂仓屋，前进两侧房间是看仓屋的贫苦农民徐崇辉一家7口住着，天井左侧厢房便是田秉秀的住处。

最初，谭震林对田秉秀并不了解。在后来的工作接触中，谭震林很快喜欢上了这位稳重而又能干的姑娘。

那是铜（陵）南（陵）繁（昌）三县妇女救亡训练班在中分村举行的开学典礼上。这个训练班是中共铜南繁中心县委筹办的，校长是由县委妇女部长田文兼任，田秉秀任副校长兼负教学事务。会前，经田秉秀争取，国民党繁昌县县长张孟陶决定到会并亲自给妇训班赠送锦旗。但这位县长又担心自己压不住阵脚，故特地邀请了谭震林参加开学仪式。

会上，陶县长双手提着一面绣有“妇女先锋”四字的红绸锦旗走到台上，这时，田秉秀和另一位女民运队员迎面走了过来，不卑不亢地接过了县长的

人心弦的话语，甜润清脆的嗓音，雍雅端庄的英姿，无不为人所赞美，也打动了青春早已悄然逝去的谭震林的心。从那次会后，他开始打听她的名字，他想更多地见到她。

一天，谭震林正在司令部小憩，突然，门外传来“咚咚咚”的脚步声，谭震林正想站起，门却被推开了，进来的正是田秉秀。谭震林倒了一杯开水递到她的面前：“田秉秀，什么事把你急成这样？”

“谭司令，中分村妇抗会抓到两个尼姑。”

“你们抓尼姑干什么？”谭震林没等田秉秀把话说完，就奇怪地抢问一句。紧接着说：“只要爱国，共产党对和尚尼姑还是保护的呀！”

“经过审问，她们招供是芜湖日军派来的间谍，刺探军情的。”田秉秀讲出了事情的真相。

谭震林默默地点头，他为田秉秀敏锐的眼睛、高度的警觉而感到满意。

在一番对话之后的静寂时刻里，谭震林这才发现田秉秀那副戎装仪容——灰色的军帽，宽大的军衣，密匝的绑腿，佩上腰间一条宽实的皮带，还有那白皙的脸膛上两颗秋水般清澈明亮的大眼睛，使这位秀丽的姑娘显得格外威武、俊俏……

谭震林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把口琴，闲着就吹一吹。政治部几个年轻人也来凑热闹，先后找到四五把口琴。于是乎，一把口琴队组成了。琴声经常招惹得那些爱唱爱跳的姑娘们前来观看。

谭震林经常抽空去看望妇训班的学员们。一天，太阳快要落山了，刚从前线归来的谭震林跳下马背，来到了妇训班，还掏出口琴为她们吹奏一曲《采茶扑蝶舞》，归去时已经日落西山了。

又是一个晴天的傍晚，太阳西沉群山，天色却还明亮。谭震林晚饭后来到涧溪边散步，一眼瞥见田秉秀正在溪边浣洗衣裳，这就使他猛想起田秉秀平时常在青年人中教唱的那只皖南民谣《洗衣曲》，于是掏出口琴吹奏起来。那美妙动人的琴声，随着清澈的溪水荡漾，流进了洗衣少女的心房。

田秉秀情不自禁地伴着琴声唱了起来：

一根棒儿两尺长，
姐在溪边洗衣裳。
红叶子落在溪水里，
咿得儿哟得儿哟，
不知飘落到何方？
哎呀咿得儿哟，
哎呀咿得儿哟。

这首歌谣抒发了“洗衣姐”对远方情人的思念之情。也许是田秉秀被这种真情实意所打动，仿佛她自己也成了歌中人，唱得是那样情真意切。

叶啊叶，你别忙，
奴家有话托你寄情郎，
收拾行李早还乡，
咿得儿哟得儿哟，
大家一起赶豺狼。
哎呀咿得儿哟，
哎呀咿得儿哟。

……

唱歌的倒是无意，吹琴的却是有情。田秉秀刚唱完歌词的一半，谭震林已经走近她的身旁。这时的她，不由得脸刷的绯红，心里“通通”直跳，只得拎起水淋淋的衣裳，扭头往“三公所”跑去。

谭震林对田秉秀的好感被同志们觉察了。当地的特委书记问谭震林：“谭司令，她怎么样？”

“不错。”谭震林爽快表明自己的看法。

“看中了！”特委书记兴奋了：“我们找她谈话。”

“别胡来！”谭震林严肃起来：“婚姻不能一厢情愿，要双方都同意才行，莽撞不得！”

然而，偏偏出了莽撞之人。

一天，谭震林请服务团的同志吃饭，男女各一桌，田秉秀自然也来了。

宴会是在晚上举行的。当两杯饶酒下肚以后，男同志们话语多起来，姑娘们不管那么多，只是一个劲地吃。

忽然，一位男士举起酒杯，说：“女同胞们，你们只知道吃，只知道喝，晓不晓得今天喝的是什么酒？”

“谭司令请的酒啊！”女同胞们回答。

男同志说：“这是什么酒？”

“这是谭司令和田秉秀的定婚酒！”

“哈哈哈哈哈……”

人们的笑声，惊起了落在院中树上的飞鸟。

谭震林没想到他们会如此恶作剧，赶忙说：“你们不要胡来嘛！”

“谭司令不要不好意思嘛！”

田秉秀顿时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她看到女伴们正惊讶地望着自己，看到男同伴们得意的笑声，忍不住把筷子一放，只身跑出院子，到村外的田野里，哭了起来。

同伴们把她找回来。

“你要和司令员结了婚，我们还可以沾点光！”

“哈哈，我们这里要出一位司令夫人！”

同伴们的吵吵闹闹，搅得田秉秀心绪更加不安。本来，她是敬重谭震林的，但是今晚之事，令人有被捉弄的感觉，谭司令是以权势压人！

年长一点的章蕴大姐说：“田秉秀同志你不要误会，谭司令请客不是那个意思。即使他看上你了，也得征得你的同意才行啊！”

“你们合计好了，背后算计人。”田秉秀的气还没有消。

“这怎么是算计你呢？是关心你！”

田秉秀和衣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她想起了曾经像哥哥一样关心她的未婚夫。

那是在大上海的日子里。他是复旦大学的学生，英俊、蔚洒。他带她去租界看苏联电影，他带她去公园，他和她一起看进步小说，他曾想带她一起去投奔八路军、共产党！由于她再过几个月就大学毕业了，结果他先行一步，她追随而来，但他们失去了联系。后来，她才知道，他离开上海时，泅渡苏州河呛了水，坏了肺，大口吐血，壮志未酬身先死。她惊呆了！在月升中天、夜深人静之时，她只有凝望着未婚夫送她的订婚戒指，默默垂泪。

谭震林突然叩开他的心扉，她心慌意乱。她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他是首长，他是领导；他风度翩翩，气宇轩昂；他已是中年，老练成熟，豁达乐观；他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卓越的军事才能。而她自己，只是一个还未成熟的新兵！他正是自己所需要的良师益友，而要结为终身伴侣，这从未想过！她心里矛盾极了！此后几天，她没搭理谭震林。

“我不去，你们愿意你们去。”田秉秀生气了。

“你不去，不更叫他们说你了。你们两个没有任何关系，你才大大方方地去看他呢！”章大姐劝导她，“越是不去，别人越说。你想嘛，是不是这个道理？”

田秉秀想想，也是这个理儿，去就去吧。姑娘们说说笑笑，走进了谭震林的住所，七嘴八舌，与谭震林打着招呼。

突然，又有人使“坏主意”，在窗外叫道：“你们都出来，帮帮忙好吧！”

田秉秀还未明白过来，女伴们忽拉一下子全冲出屋，把房门立即锁上。

谭震林急忙喊道：“都回来，不要再恶作剧！”

呼喊也无济于事，门外一片嘻笑声。他和她被反锁在屋里。

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人。田秉秀默不作声，谭震林先开了口：“这些人，尽胡闹，净帮倒忙！”

略停顿了一会儿，谭震林继续说道：“秉秀同志，这件事弄成这样，让你受委屈，我很是不安。当然，同志们并无恶意。我对你是有好感，可这要征得你同意，你不同意，我决不会用强迫命令的。”

经他这么一说，田秉秀的心放下来了。

谭震林用感伤的话语说道：“看到你，使我想到了我牺牲的妻子。”

“牺牲的妻子？”田秉秀感到意外。

“是的。当时，她的年纪与你现在差不多，我们志同道合参加革命，感情很好。一次，我打仗归来，有人告诉我，她已经不在人世了。她被人诬蔑为‘社会民主党’，趁我不在的时候，把她秘密处决了！我最了解她，她是一清二白的共产党员，怎么会是什么‘社会民主党’。她的死，我很伤心，我没有保护她，没能尽到丈夫的责任……”

田秉秀又一次感到意外：这位外貌刚强、脾气爽直的将军内心却另有一番强烈的儿女柔情。二人心理上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许多。谭震林从感伤的情绪中回转过来，用一种诚恳和期待的口气说道：“秉秀同志，如果你愿意，我请你嫁给我。我们奋斗目标一致，感情上能互相体谅、理解，生活上能互相照顾。如果你不愿意，也希望你能直接给我答复。我现在不会对你不礼貌，将来也不会勉强你，不会让你为难。请相信我的诚意。”

田秉秀垂着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轻轻问道：“能让我再考虑几天吗？”

“当然可以！”谭震林爽朗而高兴地答应。

田秉秀站起身来，红着脸说：“我现在想走。”

“门锁了，怎么走？”

“我从窗子跳出去。”

“那你就走吧。”

田秉秀一纵身，真的就从窗户跳出去了……

谭震林谈恋爱，像他指挥打仗一样，很有点锲而不舍的精神。他不急不恼，他相信自己的魅力。他又吹起了那把心爱的口琴。

悠扬的琴声，牵动着田秉秀的心。以前听他吹琴好像没觉察出什么，而现在这“琴”外之音却声声打动着她，吸引着她。一次又一次，这口琴简直成了他们的联络暗号。

好事多磨。1939年6月，谭震林和田秉秀在中分村结婚了。婚礼极为简单，结婚那天，略备几碟菜，几位支队领导在一起小酌一餐，两个人的铺盖合在一起，就算办了婚事。

在人们看来，他们俩婚事从相恋到结合，乃至婚后，都处在十分神秘之中。极少数知情者严守秘密，对谁也不说；绝大多数干部、战士都不得而知，最多也不过猜测而已；至于全村那些憨厚的村民，其茫然状态就更不用说了。

的疏忽，人们看出了其中的神秘。这年腊月，那时已住在中分村北面谢村的田秉秀，有一次回到中分村来，人们发现谭震林经常穿的那件黑色皮夹克，而今穿在田秉秀的身上，晚间在栗树园看演出时，又发现谭震林与田秉秀并肩地站在一起。从这些过去从未看到的现象中，人们断定他俩已经结婚了。

至于他俩婚后为什么还这样神秘？原来在结婚时，田秉秀就向谭震林明确表示过：第一，不愿让群众知道我们的关系；第二，要照顾政治影响。正因为要做到这两点，所以他俩婚后长期分居两地，从来不在一处共餐。

婚后不久，曾发生过以下一段小插曲。

有一次，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来检查工作，有人向他反映，谭震林强行和田秉秀结婚。这怎么得了！支队的主要领导人带头这么干，还怎么管别人！

他找谭震林谈话。谭说：“要说一开始，她不愿意是对的，可跟我结婚，她是自愿的。不信可以找她来问问嘛！”

项英说：“你让她写个材料来。如果她不肯写，就是强迫。”

田秉秀痛痛快快地写了，而且还赘了一句：“我已经怀孕了。”

此事只好作罢。

谭震林和田秉秀在中分村神秘地共同度过了10个月的时间。用田秉秀自己的话来说：“我不嫌他年龄大，也不是要做‘首长夫人’。我把震林同志作为自己的良师益友。我们是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结成了患难与共的终生伴侣。”

她晚年曾回忆过中分村的这段峥嵘岁月，记叙了谭震林的战斗生活和他们间同生死、共患难的高尚情谊：

“震林带着四种疾病参加每次战役，一副黄瘦的身躯，谁也难以保证他的寿命能维持到八十一岁又七个月。每当我驻地离他近的时候，我就设法医治他的遍体疥疮和腹泻，直到治好为止。我看他吐黄黑痰时，心里多么不安啊！可是，他打起仗来忘记一切，勇往直前。他为党、为人民、为军队，是那样忘我的搏斗，根本不顾个人安危。”

“当繁昌战役紧张时，尤其是峨山头搏斗，塘口坝血战时，我带着后勤骡子、担子，还带着当地群众和三县妇女训练班的同志，在敌人飞机扫射、轰炸下转移。敌人发现了我们的指挥所，用小钢炮三次对准目标，震林同志用滚地的方法躲开敌人的炮弹，衣服只剩下里子，鞋子只剩下鞋口。我真担心，他却说：‘打仗哪有不牺牲的。’他为党、为人民，置生死于度外。”

“震林同志个人学习非常努力，对我的学习也非常关切，我想自己是个新兵，多么渴望他能帮助我解答问题。我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时，他总是启发我独立思考，常对我说，‘你应该由你所在的组织上帮助你。’”

“他对三支队的上下级干部、战士、官兵、马夫都一视同仁，同命运，共呼吸。过组织生活时，他自己只当一个普通党员，对党小组长非常尊重。不论是勤务兵还是马夫，都那么尊重。这些对我教育很深。”

“他想吃泥鳅、小鱼，稍有空时，他就拿起脸盆，和勤务兵一起捡泥鳅、抓小鱼，每次还留些给我吃。可惜因工作两地，无法同他一起吃饭，每次我都向他道歉，想起这些情景使我难以忘怀。”

转眼间，中分村的岁月过去了20多年。田秉秀早已改名葛慧敏，她和谭震林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共和国的土地上突然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动乱，谭震林和葛慧敏的夫妻深情又一次经受了时代风雨的洗礼和考验。

1967年2月，面对“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的胡作非为，谭震林忍无可忍，带头“大闹怀仁堂”。在被诬为“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和其他老同志受到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12月，江青一伙成立了“谭震林专案组”，大

大叛徒”的首都工人体育场大会几天之后，清早开来了一辆大卡车，一伙人冲进谭家，一边搜查抄家，一边把所有子女押上卡车，逐出了家门。随即，又开来一辆小吉普，连拖带拉，把葛慧敏单独押走了。从这天起，中南海原来的家里，只剩下谭震林。他在所谓“专案组”派来的警卫人员监管下单独生活，葛慧敏不知去向。举家星散，天各一方。

在极其严酷的迫害中，谭震林坚定而乐观，对邪恶势力作坚决的斗争。1969年11月，他孤身被安置在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办公厅所属的一个保密住处。他特别不放心的是跟随自己数十年的“老太”葛慧敏。其实，那时葛慧敏才50来岁，说不上老。但是，在单独监禁的一年多时间里，她已被折磨得精神失常，脸色灰涩，满头白发。由于病势日渐严重，她被送进北京医院治疗。直到病情有所好转，这才被允许带了两个有病的小儿女，前往桂林，来到谭震林住处。

这又是一个新的年头。1970年2月5日，农历除夕之夜，谭震林亲手烧了年夜饭，迎接失散了近两年的老伴和子女。他所居住的5号楼，位于小山上，坐北向南，一排四间平房。那时，谭震林属“全军管”，不仅不能走出住地，就连一家四口，谁住哪一间，都由监管人员指定。他们老两口连个名字都没有，分别叫作“5号老头”和“5号老太”，子女都用了化名。所以，直到他们离开，那一带的人谁也不知道这里住着的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谭震林。

在桂林团聚以后，葛慧敏继续养病，谭震林带着两个小儿女，在后山坡开荒种地，过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葛慧敏回顾在桂林的这段生活，曾说：“老头”也是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人。不过，不论压力有多大，处境有多难，他始终有信心，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最后一定能弄清问题。这是他所以能在逆境中保持坚定和乐观的原因。

冬去春来，1971年的春节到了。除夕之夜，这座孤单地坐落在山坡上的5号楼里，虽然没有一个亲友上门，谭震林却像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在深山密林里过年一样，想方设法要让身边的家人过好新年。除夕怎么过呢？他同葛慧敏合唱了《新四军军歌》、《繁昌之战》等战歌，他还独唱了京剧《沙家浜》里郭建光的“阳澄湖畔，芦花放，稻谷香”的唱段；然后，葛慧敏唱了青年时代投奔革命之际的《游击队员之歌》。歌声把他们的记忆带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带到了昔日中分村相恋相爱的岁月，同时，更坚定了他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信念。

1972年12月26日，谭震林特意选定了这一天写信给毛泽东，请求返京治病。毛泽东作了批示。随后，迎来了又一个新年。1973年2月，谭震林同家人在那幢5号楼里度过了第三个春节。年后，从北京发来一节“公务车”，把他和葛慧敏及子女接回北京。至此，隐姓埋名三年多的“5号老头”才公开了自己是谭震林。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消息传来，谭震林夫妇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兴奋得彻夜未眠的谭震林，快天亮时才睡着了，睡得那样香甜。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从未有过的，以至从床上掉在地板上也没有醒。当他被葛慧敏扶上床后，连自己都惊讶他说：“怎么睡到地板上来来了！”接着，是一阵爽朗的大笑。他一生经历了那么多大风大浪，此时竟兴奋到失态的程度。看着谭震林笑得那样开心、豪迈，葛慧敏也笑了。

这笑声是对跳梁小丑终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嘲弄，也意味着对新的历史时期到来的欢呼！

叶挺（1896～1946）字希夷，广东惠阳人。保定军校第6期毕业。1921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警卫团营长。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去苏联学习。1925年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和独立团团团长。1926年北伐战争中，率部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战役中，击溃军阀吴佩孚的主力，所部被称为“铁军”。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去国外，与党失去了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参加抗战，1937年底出任新四军军长。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被俘。1946年3月获释，4月8日由重庆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李秀文是出身于澳门的大家闺秀。她的父亲李少邨是位支持革命的绅士。1924年，李秀文还是中学的一个女学生的时候就结识了叶挺。当时，叶挺正在孙中山的大总统府任警卫团第二营营长。他们俩人通过一段时期的交往和了解，感情越来越深。

1924年，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决定派遣干部去苏联学习，叶挺被列入去苏学习的行列。叶挺辞去了一切职务，十分愉快地准备去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但他又怀着对李秀文满腔的热恋之情。经过反复考虑，临行前，叶挺终于忍不住向李秀文求婚了。李秀文当然满心欢喜，她对叶挺已是以心相许了。但她提出还要征求父母的意见才能最后决定。

秀文的父亲知道后，对女儿严肃地说：“叶挺是一个有为的青年军官，现在正是你们两个求上进的时候，婚姻，要作为鼓舞双方前进的力量。”秀文的母亲把女儿拉到一边，悄悄地对她说：“你爸爸早就看中了叶挺，老人是希望他当了团长你们再结婚。”

李秀文把父母的意见跟叶挺说，叶挺欣然接受。两个立下约言，互勉互励。

叶挺到了苏联后，处处感到新鲜和兴奋。他如饥如渴地刻苦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并实地考察苏联的社会情况和探求革命胜利前后的经验。叶挺广泛接触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与之建立革命的友谊。叶挺的思想进步很快，开始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由于觉悟提高，表现良好，在苏联学习半年后，便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旅英支部，成为一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1925年，叶挺回国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团长。不久，叶挺和李秀文便在肇庆阅江楼举行了婚礼。

婚后，迎接他们的不是春江花月，不是歌舞良宵，而是一阵阵猛烈的狂风暴雨。

叶挺独立团在广东省肇庆县成立以后，按照党的指示进行了紧张的军事、政治训练，协助开展广东西江的农民运动，使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

叶挺在北伐途中，英勇善战，身先士卒，战必胜，攻必克，特别是在汀泗桥、贺胜桥、破武汉城垣请战役中，均亲临前沿和城下督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大革命失败后，叶挺参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并率军南下，转战闽粤。1928年，他参与领导广州起义，被任命为总指挥。但因敌众我寡，起义第三天遭反动武装四面包围，他镇静处险，指挥部队突破重围。他坚持断后，敌军部队已进入广州市，他仍隐伏于叶家祠堂的密室内。后逃到吉隆坡山区

此后，叶挺和李秀文在国外度过了10年艰苦生活。在这期间，他们曾住在法国和德国，叶挺在那里作些零散工，还帮人在果园里采摘果子来维持生活，宋庆龄曾寄过钱帮助他们。

1937年抗战开始，叶挺到了延安。毛泽东请他吃饭，称他是北伐革命战争时期的名将，并请他出来担负新四军军长一职。叶挺欣然答应，于1938年2月正式就任新四军军长。

在延安，毛泽东还陪同叶挺参观了抗大和党校，在党校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毛泽东致欢迎词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在一片掌声中，叶挺站起来激动他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高山，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爬山的比喻形象他说明了叶挺的经历和决心。不久，他肩负党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从延安来到汉口新四军筹备处。新四军筹备处是这年夏天开始筹备工作的。叶挺和郭沫若在这里相会，作了长时间的热情交谈。郭沫若还亲笔写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对联，挂在叶挺住所的中堂，表达对叶挺那种坚韧不拔的革命斗志的赞扬。从此，他们俩人结下了非同寻常的友情。

那时，新建的新四军经济困难，装备落后。部队在岩寺集合整编的时候，战士们手里拿的，还大多是梭镖和套筒枪，汉阳造的“中正式”都很少，机关枪就更不用说了。叶挺为此费了很多心血。他从国民党一些老部属中要来了好几百支全新的匣子枪。以后，又从日军手中缴获了不少新式的武器。

最难得的还是李秀文。她与叶挺结婚后，几乎没有过上几天安逸的日子，可是她对叶挺情深似海，志坚如钢。无论生活怎样艰难凄苦，环境何等险恶恐怖，她没有流过眼泪，没有一句怨言。为了支持叶挺的新四军，李秀文从家里拿出了父母的养老金，并在别处筹集到一些钱，从广东、香港一带买了3600支手枪，亲自押送这批货物，准备运往皖南，供给新四军抗日。

不料，这批手枪从广东起运路经上饶时，竟被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无理地扣押下来。李秀文只得赶紧拍电报通知叶挺。

叶挺得到电报后，十分恼火，立即骑上马到达军部，接着坐上汽车直奔上饶。

第二天清晨，汽车直接开到了第三战区司令部门口。叶挺下了车，走进司令部，进了顾祝同的办公室。叶挺一进办公室，就气呼呼地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

顾祝同当年在黄埔军校当学生的时候，叶挺曾做过他的教官，因此，顾在叶挺面前表面上还得装作恭恭敬敬的模样。他心里早就明白叶挺的来意，嘴上却故意问：“叶军长这次来上饶，不知有何国事与本人协商？”

叶挺深知他惯耍这套外交伎俩，根本没理他。顾祝同故作殷勤地帮叶挺点上烟，凑上去说道：“为国家，为民族，我等共事多年，本人学识浅薄，能力有限，处理国事，恐有不妥之处，请叶军长多加指点！”

“请问，内子为本部谋得3600支手枪，司令官为何要百般刁难？”叶挺的声音中蕴含着蔑视与愤怒。

顾祝同一听，狡猾地冷笑两声说道：“请叶军长不必生气，本人并非故意刁难，这全是误解，这完全是一场误会！”他一边说着，一边慢腾腾地吸了口烟，然后像朗诵似地说道，“当前，我战区所属各部，武器均甚缺乏，这批枪支，新四军用，亦不过是为抗日，其他军使用亦为抗日。抗日乃我全

长多从大局计议，从整体着眼，洞察余意之所在，定能谅解。”

叶挺听了他的话，愤然站起来走到桌旁，拳头往桌上一拍，说：“顾祝同，你想搞什么名堂！我不知道，你说出这些话是否问心有愧，请扰心自问一下：司令官所属之国军部队，究竟和日本人打过多少仗？究竟为抗日做过多少贡献？新四军日以继夜在和日本人搏斗，你们又给过新四军多少枪，多少子弹？我们自己设法解决一部分武器，你们还要扣留，难道叫我们赤手空拳去抗击日本侵略者不成！请问，你们如此对待新四军，心怀何意？”

事实不容狡辩，这一下把顾祝同责问得哑口无言，弄得非常狼狈。最后不得不把 3600 支手枪如数还给了叶挺。

叶挺与夫人李秀文带着 3600 支枪回到了皖南军中，那时正是 1938 年夏季。军长的警卫员、勤务员纷纷拥到门口欢迎。只见叶挺军长穿着白色的西装，系着领带，穿着皮鞋，十分英俊潇洒。叶夫人则穿着学生装，朴素大方，一脸的端庄秀气。儿后李秀文就留下来照顾叶挺的生活。

叶挺是个闲不住的人。工作、打仗之余，就在屋后的小园子里种西红柿、黄瓜、青菜。他一干活，就脱掉鞋子，赤着双脚，完全像个农民的模样。而且他对种菜特别内行，在菜地边沤了两缸肥，每天挑水浇菜，照顾得十分细致。

结果，军长的菜园子每年都是满园春色，长势喜人。豌豆又肥又嫩，西红柿长得像小碗口大，嫩黄瓜一摘就几十条。到了丰收季节，叶挺常请参谋处、副官处的同志来会餐。

叶挺生活十分俭朴，出外的时候才穿军装，或西装，回到家一般就穿破旧的衣服。一件衫衣，有时让秀文补了又补。夜里办公往往搞得很晚，他不许叫醒炊事员，自己动手淘两把米，切两片腌肉，做夜餐，还给没睡的警卫员也捎上一份。

夫人李秀文在军营中获得了大家普遍的尊敬与爱戴。她喜爱练毛笔字，每天都坚持写好多张，然后整整齐齐地放在一块。有时，她跟着勤务员一起打扫环境，扫地抹桌。她还买来一些铅笔、本子，教警卫员识字，对人和蔼极了。

有时，她为叶挺买来水果，一定让警卫员们都来尝尝，他们不好意思吃，她就把水果放到各人的床头。有时，警卫人员生了病，她不仅前来细心照料，而且亲自下厨为他们做上几个荷包蛋吃。看到这些孩子们的鞋坏了，她也爽快地拿出钱来要他们立即去买，找回的零钱也总是送给他们零花。

在皖南的三年抗日斗争中，叶挺经常率军袭击日军，或粉碎日军的“扫荡”。李秀文在军中度过了充满艰险、动荡的生活。

1940 年秋季，军部天天开会，讨论北上问题。不久，叶挺决定先让李秀文回广州。李秀文为了孩子，不得不与叶挺分手了。她把叶挺的东西都整理好，然后叫来他的贴身警卫，告诉他，军长的衣服放在什么地方，春夏秋冬怎样关心他的冷暖，衫衣要洗干净，烫一烫。如果军长不注意身体，不听话，就写信给她，她好讲他。直到上了汽车以后，秀文还把警卫员叫到身边，含着眼泪说：“小黄，一切都交给你了，要多注意呀！”随后又在他手里塞了 20 块钱，让他零用。

皖南事变发生后，叶挺被蒋介石抓了起来。李秀文在家里看完报纸以后放声大哭，接着几天不吃饭，整天地呆坐着。

1942 年下半年，叶挺被关押在湖北恩施。李秀文经过多方奔走说情，在李济深的帮助下，获准带着女儿扬眉，去和叶挺一起生活。不久，秀文的母亲带着别的孩子也与他们住在一起了。那时，叶挺已被解到桂林，遭到软禁。

当时，叶挺一家的生活十分拮据，秀文的姐夫每天出去摆地摊，一家十

少得知叶挺状况的人，从四面八方汇钱来，可叶挺只能收到来信，汇票都不翼而飞。到邮局去查询，都答：“这是上头的命令。”

于是，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叶挺带领全家开始了生产自救。李秀文卖了自己的首饰，从市场上换回了十几只山羊和四只小猪。孩子们每天到后山放羊，并捞猪草。叶挺在房前开荒，种上蔬菜。有时，他还带着孩子到草地上挖地衣，拣菜根，采野慈菇等等。为了改善生活，叶挺还带着孩子到附近池塘中去钓田鸡。

特务们总是远远地监视着叶挺一家的生活，并且隔三岔五地派人来逼迫叶挺签“悔过书”，都遭到了叶挺的严词拒绝。不久，叶挺又一次被押往恩施。其时，李秀文已生下了“阿九”。除了老三“夭折”外，身边一共有8个孩子。

为了减轻秀文的负担，叶挺决定带3个孩子到恩施去。于是，在1943年的12月，李秀文被迫又一次与叶挺分手了。

秀文带着老老少少十几口人，开始了逃难的生活。为了逃避日本侵略者，一家人先流浪到离都城郊外几十里的一个破庙里，每日只靠野菜和向老乡买些红薯过活。不久，一家人又染上了疟疾，没药少吃，生活几陷绝境。为了不至于全家困死在破庙里，秀文又开始拉扯着一家穿山越岭的到处流浪。后来又到了罗定，再也走不动了。在罗定找到叶挺的一位朋友谭冬菁先生，便暂时住在他家里。李秀文每天靠到集市摆小摊卖估衣，换点钱养活大家。后来好不容易与李济深接上了关系，这才全家搬到了广州。

在叶挺被囚禁的5年中，还有一件让人感动的事。那是1942年冬季，叶挺还被关在恩施。李秀文带着8岁的女儿扬眉来看他。见到叶挺后把郭沫若托她捎来的香烟送给了叶挺。那时，正值郭沫若50大寿即将来临之际。

没几天，叶夫人携扬眉来到郭沫若的寓所。她送来了叶挺赠给郭沫若的一份“寿礼”。那是叶挺用香烟罐的圆纸片亲手制成的“文虎章”。正面正中用钢笔横写着“文虎章”三个字，周围环绕着“寿强萧伯纳，骏逸人中龙”10个字。背面写着“祝沫若兄五十大庆，叶挺”。“文虎章”的上面由李秀文订上了红丝线做成的佩绶，还用红墨水加上了边沿。

这真是一份宝贵的礼物。郭沫若捧着这份深情厚意时，感激得流下了眼泪。

后来，郭沫若又收到叶挺的一封信，信中说：

沫若兄：

在囚禁中与内子第二次聚会，彻夜长谈二十四小时，曾谈及十五日将往祝郭沫若兄五十大庆，戏以香烟罐内圆纸片制一“文虎章”，上写“寿强萧伯纳，骏逸人中龙”两句以祝。别后自思，不如改为下二句为佳：

寿比萧伯纳，功追高尔基

叶挺三十一，十一，十四

在渝效红炉厂囚室中

后来，郭沫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敬仰希夷，事实上他就是我的一位精神上的老师。他有峻烈的正义感，使他对于横逆永不屈服；而同时又有透避的人生观，使他自己超越在一切的苦难之上。五年的囚禁生活，假使没有这样的精神是不能够忍耐的。假使没有这样的精神，一个人不被软化，成为性格破产者，也要被瘫化，成为精神病患者。然而希夷征服了这一切。”

织送来的叶挺出狱的消息，多么令人兴奋啊！这盼望已久的消息！秀文不顾特务的盯梢捣乱，毅然收拾了简单的行装，要到重庆与叶挺相会。她带着阿九，拿着行李和全家告别，别的孩子闹着要跟着去，秀文亲亲孩子们的脸，亲切地说：“妈妈三个月后一定回来接你们。”谁知这一去，竟成永别，这些孩子从此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爸爸和妈妈。

1946年3月9日，一辆汽车飞快地驶进重庆中共代表团住地——曾家岩，在一阵爆竹声中，车门迅速地打开了，从车里出来的是叶挺，自皖南事变以后，已囚禁了5年零2个月了。在人民的声援和党的营救下，叶挺终于获得了自由。

这一天，李秀文也从广州坐飞机赶来了。两个人面对面，互相打量着：叶挺的鬓边已染上了白发，李秀文的眼角也刻下了皱纹。叶挺挽着秀文的手，千言万语涌上心头，他激动地紧挽着李秀文的手说：“秀文，我们两个，好像又结婚了！”李秀文微微点了点头，万语千言尽在不言中。

叶挺出狱后的第二天晚上就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重新入党的要求。电报发出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就批准了他的请求。

叶挺怎么能不高兴呢？！夫妻离别，异地相思，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双方吃尽了苦头终于团聚在一起了，他们共同策划着前程，准备一起到延安去。

临行前，为了祝贺叶挺出狱、入党，郭沫若和阳翰笙一同邀请叶挺一家，包括李秀文、爱女扬眉、幼子阿九共四口人，在重庆一家饭庄设宴。此外还请来了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和南方局的几位同志，周恩来因事未能来。

叶挺心情激动，生活的风雨已经把他锻炼得炉火纯青。他恳切地说：“马列主义给了我理想和信念，党组织不断给我教育和帮助，使我认识到一个真理，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党走的路，就是我走的路。我个人是渺小的，除了为人民，为最广大的劳动人民，还能有什么？我迫切想到延安去，到人民中间去，贡献自己的一切！”

叶挺的这些话发自肺腑，尽管他走过的道路是那样坎坷不平，却始终对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光明磊落、正直热诚。正如党中央批准他入党的电文中所说：“全中国都熟知你对民族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他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抗战时期的岳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骄傲。

令人万分痛心的是，1946年4月8日，叶挺夫妇，带着女儿扬眉，幼子阿九，与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同志由重庆去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而一同在山西境内遇难。举国上下，不胜痛悼。

周恩来在1946年4月19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一文。文中垂泪呼道：

“若飞！博古！希夷！邓发！黄老先生以及一切遇难的中美朋友、同志和扬眉！你们集体牺牲，你们已成了‘四八’烈士。

“十天过去了，沉重的十天！沉痛的心，悲愤的泪，残酷的回忆，还有，你们遗留下来的沉重的担子，抑压得我们还只在默默无言中悼念你们。

“二十多年来，成千成万的战友和同志，在共同奋斗中牺牲了，但没有一次像你们死得这样突然，这样意外。突然的袭击，意外的牺牲，使我们更加感觉到这真是无可补偿的损失！

.....

“希夷！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一出狱，你就要求重新入党。一见面，你就提到皖南死难同志，检讨皖南事变，要我交涉继续放人。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保护人民队伍和释放一切政治犯而奋斗到底！”

阿九才 3 岁。她分享了叶挺一生的光荣，也更多地分担了叶挺一生的苦难。

方志敏（1900～1935）江西弋阳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任江西省农民协会委员长。1928年领导横峰、弋阳农民起义，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任闽浙赣苏维埃政府主席和红十军政委。1931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1934年11月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率部北上抗日。1935年1月被俘，在狱中坚贞不屈，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遗著有《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男女之恋，人之常事。”这是方志敏将军和战友们谈到恋爱婚姻问题时说的一句话。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里，和无数共产党人一样，除了舍生忘死与敌人斗争外，方志敏同志也有着自己的爱情生活。

青年时期的方志敏曾结识过一个相貌出众的女朋友。因为老家都是赣东北的，而且方志敏与她的哥哥关系较好，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彼此间萌发了爱情。但是，当他们到南昌读书后，这位女友受到当时都市的不良风气影响，逐渐地羡慕小姐、少奶奶的寄生生活。她不是认真学习、追求进步，而是讲穿着、爱打扮，贪图安逸。方志敏目睹她的变化，心中忧虑，曾多次对她批评帮助，但是她迟迟不觉悟。于是，方志敏便断绝了和她的往来。

后来，方志敏结识了缪敏。她也是一位来自农村的青年学生，进城几年来，衣着打扮依然朴素，为人忠厚老实，保持着农村姑娘的本色。她喜欢和进步学生接触，并且学习勤奋。方志敏和缪敏接触几次，彼此都产生了很好的印象。缪敏对方志敏敢于坚持真理、忠实谦虚的品性和出众的才华非常敬佩。渐渐地，他们建立了友谊，并产生了爱情。

那时，魔鬼横行，革命战士时常遭到捕杀。1927年春，缪敏在江西鄱阳工作时不幸被捕入狱。当时，方志敏正在横峰领导农民运动，听到未婚妻被捕的消息，十分焦急，立即派人秘密到狱中看望缪敏，并给她带去了一封信，鼓励她坚持斗争。不久，缪敏出狱来到横峰。见到从狱中归来的情人，方志敏高兴得几乎流出了眼泪。他安排缪敏和另一个女同志同住，并嘱咐她形势紧张，睡觉不要脱衣服。缪敏经过狱中的折磨和路途劳累，疲劳极了，一时忘了方志敏的话，脱了衣服舒舒服服地睡着了。半夜里，白军突然袭击，缪敏从梦中惊醒，和那位女同志一起匆忙跑上山去。方志敏去她们的屋里通知她们撤走时，看到了缪敏慌乱中丢下的旗袍，他急速赶上她俩，把旗袍交给了缪敏。缪敏接过旗袍时，心底涌起一股暖流。

1927年6月，方志敏根据组织决定就要离开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南昌城，转移到农村从事组织农民起义的工作。出发前几天，方志敏和缪敏商量以后，决定在中共江西省委的秘密机关把婚事办了。

当时，方志敏同志任江西省委委员兼农民部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省农民协会主席等重要职务，常驻省会指导全省农运工作。江西各县的农民运动在方志敏的领导下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因此，在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党决定发动南昌起义，要求方志敏去农村组织农民起义加以配合。

婚礼十分简单，只是加餐吃一顿好饭而已。在这简单的结婚仪式上，方志敏表示：现在革命已经到了严重时期，需要我们作更大的努力，我们要成为革命战线上一对英勇的战士。彭湃同志正好由党中央派到江西省委视察工作。他不仅参加了婚礼，还高兴地即席献词以示祝贺。他随手写下诗句，然后贴在他们结婚房间的墙上。诗词是：“拥护中央政策，方缪双方奋斗到底；

新婚之夜，省委及有关负责同志罗亦农、彭湃、冯任等及方志敏夫妇，以打麻将为掩护，实际上是开会研究方志敏此次去农村的主要任务和目的。婚后几天，方志敏便告别缪敏，到赣西农村领导农民运动去了。

1927年10月中旬，在方志敏的领导下，弋阳、横峰两县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弋横地区纵横百余里，到处红旗漫卷，捷报频传。当时赣东北各地传遍了这样一首歌谣：“湖塘塌塌岭，出了方志敏。领导共产闹革命，都是为穷人。”

1931年，方志敏在闽浙赣苏区工作，缪敏前去与他生活、战斗在一起。方志敏率领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的多次围剿。1932年，方志敏在苏区“工农报”上发表了《加紧一切斗争迎接中央红军》的文章，号召全苏区工农群众千百倍紧张起来，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后来，苏区人民在储备红军粮食，断绝敌人给养方面均做出了很大贡献。

1934年秋天，中央红七军团来到了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在赣东北创建的红十军会合。官兵相见倍感亲切，情绪特别高涨。

方志敏和缪敏当时曾分别代表省委和省反帝拥苏同盟，携带许多慰劳品到部队参加会师大会，方志敏夫妇都上台讲了话。他们夫妇当时在苏区都是积极革命的骨干和领导。缪敏任省反帝拥苏同盟主任。

1934年7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表了庄严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1月决定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合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方志敏任总司令。

于是，方志敏亲率先遣队由葛源出发，向皖南行动，创造了8百余里的根据地。2千多人的部队，在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包围中冲杀着。

谭家桥战役，是空前未有的血战，先遣队受到了很大的损伤。这时，方志敏决定将部队退回闽浙赣苏区休整，但敌人紧紧地跟踪追击。方志敏亲自指挥后卫部队堵击敌人，使前卫部队顺利地进入苏区。这时，在敌人7倍以上兵力的强压下，退至怀玉山，经过7天7夜激烈的战斗，已弹尽粮绝，人马疲困，又正当大雪纷飞，将士吞雪啖草，挖山芋芭蕉脑以解饥渴。方志敏披着树叶，抵御寒冷。饥寒疲困已到极点，几次要冲出封锁线，敌人又层层包围上来。方志敏不幸于1935年1月24日被俘。

方志敏被解到德兴敌军团部时，亲笔写了“自述书”，表现了对革命的忠诚和伟大的理想。不久又被解到上饶禁闭室，敌人审讯逼供，均归失败。至2月2日，方志敏被解到南昌军法处看守所。

国民党百般诱降，竟派几个穿花旗袍的青年妇女来所谓“优待室”骚扰、诱惑方志敏。方志敏不但不为所动，还气愤地斥骂：“你们是什么东西！……”有个别厚颜无耻者贴近他，企图轻薄勾引，方志敏举起双手铁镣向她砸去，此后，那几个妖艳的妇女再也不敢来了。

敌人见美人计不成，就想用夫妻之情来动摇方志敏的意志。一天，一个奸诈的家伙阴阳怪气地说：“你是不是愿意看见你的夫人？你与她的感情很好吗？”敌人的问话，勾起了方志敏对妻子缪敏的深切怀念。他哪里知道，就在他被捕半年后，由于叛徒告密，缪敏也被捕了，被关在南昌第一女子监狱。妻子此时此刻也在无比地想念自己的丈夫。当然，方志敏是决不会以自己的屈服为代价来换取同妻子见面的。他毫不踌躇地回答：“我与妻子的感情很好，因为，我们是长期共患难的人。我到了这个地步，妻子儿女哪还能顾得到，我只有抛下他们！”

经过生离死别的考验，方志敏和缪敏的爱情更加纯洁而坚贞了。虽然身陷囹圄，但仍隔不断他们的思念之情。方志敏在狱中写道，每想到缪敏的音容笑貌，心头便立即涌现出“又是悲痛又是钦敬，又是快慰的情绪”，“几

为了光辉的共产主义事业，方志敏把对妻子的爱化为对敌人的无比仇恨，甚至在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的时候，他依然志韧如钢，丹心向党。正如他写到的那样：“我能舍弃一切，但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被“秘密处决”。虽然，就义前他未能与心爱的妻子缪敏见上一面，但他却用鲜血浇灌出一朵永放异彩、更加艳丽的爱情之花。

周保中（1902~1964）云南大理人，白族，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营长、团长、副师长。“九一八”事变后，他从苏联学习回国，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吉林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第二路军总指挥。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吉林省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吉林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兼民政部长，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周保中，原名叫奚李元，1920年3月，他带着探求生活之路的决心，从家乡大理来到了省城昆明，被送到云南讲武学校学习。不久，他的父母为他张罗了一门亲事。

周保中的父母因过早地失去了大儿和儿媳，把希望放到了二儿子的身上。他们盘算着、试探着和儿子商量，要为儿子娶妻成家，并告诉他女方是离湾桥村不远的大张屯人，名字叫金阿喜。周保中出于对父母的爱和同情，麻木地接受着命运的安排，答应了父母的要求。

结婚第一天，乡亲们按着白族习惯，帮助周保中家搭了一个漂亮的彩棚。这是迎喜神的一天，晚间乡亲们都来贺新郎，周保中按着父亲的意愿拜了“喜匾”。第二天一大早，周保中在湾桥村跟来的10多名伴郎的陪同下，乘坐着明轿前去迎亲。另外，还有三乘轿是迎亲回来时，供新娘和送亲的人乘坐。新娘的轿门用门帘遮着。一路上，唢呐吹奏《迎宾曲》开道，后面跟着的是准备替新娘梳妆的妇女，催妆的小孩，还有挑“海酒担”的。这副担子中装草席子两张，木炭两根，带骨肉一块，取其龙席虎炭、山盟海誓之意。周保中在迎亲队伍的陪伴下来到新娘的家门，新娘家为了表示不让自己的爱女离去，则将大门紧闭。周保中惆怅地感到白族的婚礼习俗名目太繁多了，他耐着性子等待着。顿时，唢呐声三起三歇，再三表示新郎的诚意以后，新娘家的大门才打开，从里面走出一位颇有风度的老先生，站在大门口，拦路考新郎。老人第一个对联的上联是：“北斗七星三四点，”周保中立即回答：“南山万寿十千秋。”老人又出一上联：“能刚能柔英雄度，”周保中又对出：“无私无弊圣贤心。”老人脸上露出喜悦，又说一上联：“敬德辅仁，宇宙功成降世方，”周保中对出：“除邪扶正，雷电声震消尘氛。”老人还要再对，周保中忙上前施礼，说：“阿伯，佩服阿伯知识渊博，等进得门来，我一定拜见请教。”说得老先生喜笑颜开。

周保中被请入正屋，他见妻子文雅秀丽，身姿苗条，婷婷玉立。那色彩鲜艳、加工精细的头饰，盘于姑娘的头上，上身穿一件玫瑰红的金绒夹袄，一件雪白的大襟衬衣衬在里边，镶有绣花的围腰、飘带围在身上。这一切，使周保中感到自己的妻子如同一朵盛开的山茶花。只见她端庄而有礼貌地单独招待周保中入席，其余同去的人，由她父亲另设六人席招待。席面是八大碗，红烧肉是不可缺少的第一道菜。周保中被文静贤惠的妻子迷住了。他漂泊在外的风尘之苦，顿时有云消雾散之感。他受过创伤的冷漠之心，暂时得到了一些安慰……兴奋之余，他喝完了妻子斟满的最后一杯酒，便按着白族的风俗，从怀中掏出一个小铜壶交给妻子，表示不管冷暖，今后一定对妻子忠心。

直到月儿西下，又经过媒人再三催请，新媳妇才依依不舍地哭泣着由他的兄长抱着上了轿。她头上盖着“开脸红”。周保中一路上听到妻子按着白

别从轿中出来，听到路旁的孩子们念着：“新姑娘，莫哭嘞，转过弯弯到屋嘞”的喜歌。这时，周保中家的门前早就设下一套斗、尺、秤、剪、香、纸、烛之类的用具，又由端公仗剑执法，退去车马。人们拥簇着新媳妇入洞房。

在热闹拥挤之时，周保中见到许多只手从各方伸来，向妻子的身上、手上、腿上掐，掐得妻子疼痛不堪，泪珠几乎掉下来。周保中心疼地走上前，小声地对妻子耳语：忍一忍，一会进屋就好了。妻子当然明白，这是白族婚礼上的风俗。据说，掐新娘的人，因为常年多病，掐新娘一把，沾沾喜气，其病自除。所以，妻子顺从地听着周保中的安慰，强忍着没让泪花滚下来。

周保中伴着新娘入洞房，按着白族的风俗，他夫妻二人双方都跨过了特意摆在这里的一副马鞍子，又低头经过挂在房门上的一个筛子，那里还有三支箭和一面镜子。这些都是表示今后新人吉祥平安、六畜兴旺、美满幸福之意。周保中没精打采地听任主婚人的摆布。进了洞房后，他就无力再进行夫妻俩争坐枕头的闹剧了。他只是对着天真地抢坐那个大长枕头的妻子，淡淡地一笑，然后疲倦地坐在了椅子上。至于夫妻喝交杯酒，吃团圆饭，互换三次饭等礼俗，他都没心去做了，只是应付一下了事。避开别人，只留媒人在房中互饮交杯酒，闹新房又开始了。

繁华的婚礼和美丽的妻子并没有拴住周保中的心。尽管新婚燕尔，他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日子，但是，结婚，并没有使周保中摆脱心中的苦闷，也没有给他带来新的追求，新的希望……他不肯蛰居乡里，新婚以后不久，他毅然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妻子，走上奔赴东南亚之路。

周保中在自传中这样写道：“1924年秋毕业出校，被派回原属步兵第九团担任连长。不到两个月便辞职离去。自己不怕违抗当政者，坚决脱离了云南军阀唐继尧的束缚，出国游历，到过缅甸、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后又回国到了当时的革命大本营广东省，投入了当时广东的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漩涡。”

1928年，周保中在上海干地下工作时，曾与妻儿见过一面，然而，因为工作需要，他又不得不与分别四年的妻子分手，去湖南醴陵搞兵运工作。随后，他又被党派往莫斯科学习。直到这时，他才在报上看到他的妻子、儿子和弟弟乘坐的新华轮在海上遇难，船上700余人，无一幸免。当时，他的身子一下子瘫软在床铺上，眼前似乎出现那恶风巨浪，雷电轰鸣，风卷浪涌的大海，吞噬海面的小舟和巨轮。新华轮在下沉，他仿佛听见爱妻与娇儿及可爱的小弟，在茫茫大海中绝望的叫声……

生活中的不幸没有把周保中压垮，他继续为着中国人民的事业顽强奋斗着。“九·一八”以后，他请求回国抗日，得到了驻苏中共代表团的批准。随后，他被中央军委派赴东北抗日第一线工作。从此，他出生入死，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

周保中在莫斯科留学期间，曾经结识过一位才识过人的女性，“九·一八”事变的炮声、革命的激流使得他们的感情还没来得及升华就急匆匆地分了手，留给周保中的只是一片甜蜜的回忆和幻影，即使她的影子也只是在梦中依稀出现几次。连年的战争生活告诉周保中，今生今世再见她难矣。他正视这种战争年月的残酷现实，曾立下不将日寇赶出中国不结婚的誓言。几年来，他曾谢绝过许多房东大娘以及战友们劝他成亲的关心，他曾使许多抗日联军中的女杰对他萌发的爱慕之情偷偷地藏起。

然而，就在日军重兵包围，残酷地“清剿”，在严寒与断粮中进行游击作战的日子里，周保中决定与在自己身边工作的王一知同志结为伴侣。

王一知17岁即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初，受组织派遣赴佳木斯吉林省第五师范学校上学，准备取得文凭以教师的社会职业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

离开了这个学校到部队去了。到抗联第五军后，王一知曾任文化教员、妇女团指导员。以后被调到中共吉东省委秘书处工作，1938年冬转入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秘书处工作。

王一知参加地下党和抗联第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工作期间，一贯立场坚定。她在困难面前坚强不屈，在战斗中机智勇敢。她不仅生得容貌秀丽，而且个性温柔坚强，深得同志们的敬佩。当时周保中担任第五军军长和第二路军总指挥的职务。王一知转入抗联第五军之后，一直跟随周保中南征北战，艰苦奋斗，起初她对周保中怀着崇敬的心情，非常敬仰他，后来在长期共同战斗生活的接触中，他们之间都产生了真挚的爱情，最后结成了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

1939年10月6日晚，在黑龙江宝清县兰棒山上的京石泉溪旁，在不时的传来敌人稀疏的枪声的伴奏下，以及第二党小组同志们雄壮低沉的国际歌声中，周保中和王一知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婚礼。借此机会，周保中幽默风趣地向同志们汇报了他和王一知爱情的基础，他说：

“恋爱、新婚、度蜜月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为无数人所向往和憧憬，我今年已近40岁，是真的不懂得享受新婚的幸福和甜蜜吗？我不愿与亲人形影不离，漫步于道旁，聊聊天，说说笑笑吗？不！与许许多多的人一样，我有着对爱的热烈向往，对幸福的执著的追求，也殷切地盼望着得到蜜月的欢乐。但是，日军的铁蹄，屈辱的战争，使我没有时间顾及这一切，有时虽然在梦中出现过爱情，但那只是梦，而理智告诉我，在共产党人的天平上，更重要的砝码是祖国的安危，人民的幸福，所以在个人幸福与革命需要的选择面前，我决定的是后者。在这一点上，我得到了王一知同志的支持和理解，所以我更感到幸福。

“比如，昨天我就和她商量……”他侧过脸，看了一下羞涩地低着头的王一知，又接着讲，“为着战争的需要，我俩商定好婚礼要保密，不能公开，我们住宿也要和往常一样。我还告诉她，今天举行婚礼后，明天我就要到饶河找崔石泉去，路上很可能与子弹结缘，先一步见马克思。我曾问过王一知怕不怕？她说那你就先走一步，我会在战场上为你报仇，如果我也遇上子弹，那么我就在九泉下与你同步。同志们，这就是我俩忠贞不渝、新美如画爱情基础，这就是我和王一知同志青春的使命。”

周保中发自肺腑的话，激励着第二党小组同志们的心扉。同志们含着激动的泪花，都有千言万语要表达，但在刹那间，低沉有力的国际歌声代替了这满腔的热血在进发。

晚上，周保中在桦树皮遮掩的油灯下，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王一知同志祖籍山东，吉林人，寄住依兰，曾毕业于佳木斯师范学校。1935年16岁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该地党组织领导并从事农民及学生抗日救国运动。1936年与胥杰结婚，1937年在吉东省委秘书处编辑部工作。1939年春胥杰同志为国捐躯于牡丹江莲花泡（属依兰）。一知同志虽然悲痛万分，然于敌人重重包围、内部濒于崩溃状态中（1938年冬时，省委秘书处人员即皆随军行动），一知屹然不动，斗争更加坚决。党组织拟派她赴地方作自由活动，一知誓不去，愿死于抗日军中。一知家虽富豪，但以工人阶级立场已叛绝家庭，余甚嘉纳；凡同志莫不赞佩。第二路军总部突围东征，一知在部任秘书工作，凡军中之劳动，勤务、炊事、洗碗、缝纫，无不积极参加。一知深具布尔什维克之信念，书翰亦有精进之望，有工作能力，聪敏伶俐，举止大方，余启爱恋之情感，愿求作斗争工作中之永久伴侣，渠将有利余之革命工作。一知同志亦笃信革命领导，愿作直

矣。

第二天，他正要出发，突然风雪交加，妻子王一知说：“人不留人天留人，是否再待明日出发。”周保中抓紧了这一天时间，又给黄玉清主任和张师长写好指示信，特别嘱咐他们，目前日寇对苏蒙边境冲突紧张，但对我进攻谋算亦必不放弃，勿因一时情况转变而忽略日贼对我故布疑阵，务必时刻戒备。目前，万勿再于现地盘旋，应速出西北方向活动，务必努力作袭扰敌人交通运输之积极活动，对于服装、给养、粮食须尽力筹备。总部西返时，必须依照预定方案，确保交通联络及粮食准备。同时，周保中在信中对军队及地方活动也都提及。

最后，给黄玉清主任留了一份向党组织提出申请结婚的报告：

向党组织提请求：余与王一知同志革命的爱情，结成夫妻关系。余以工作地位重要，斗争紧迫与艰难，而突有此举，在党组织与群众领导关系上，不能不有以说明。特给专信与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清同志，实有必要。但为顾虑引起敌方注意与今后工作活动计划，除黄玉清与第二党小组同志外，暂不宣布余与王一知同志之婚姻。

婚礼的第三天，周保中为下一步的军事活动计划的实施，只带了简从卫队，早7时自京石泉临时驻所出发向东南挺进，目标是虎林和饶河一带的七军和五军三师各游击区。为避免暴露行动目标，他们只好走山林荒道，沿宝石河子上游越干沟子，横过兰花顶子南山各山谷。行进方向多是曲折迂回。行约五十里，午后4时抵一谷地宿营。因未带帐幕，只有露营，和往日一样，大家急忙动手割草为遮掩和铺垫，复燃火堆。周保中观察周围动静，驻地周围都有敌人。为了避免敌人发现，只好白天睡觉，夜间行军。周保中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横过汽车道，残月微明。朝西北望，隐约可见敌人在兰花顶子驻屯所，只见哨楼高耸于西山巅，瞰视南北，视野广阔。拂晓登汽车道东山，就隐蔽地休息，燃火取暖。日出三竿以后，避免烟火飞升为敌察觉，乃另选谷地，设警戒哨于山上，部员悉就曝日安眠。美妙之日光浴，为游击生活之常事。是日须渡挠力河及越过密宝汽车道，盖因河岸及道两旁地形无遮荫，且系平夷漫岗，浅草不深，不宜白天行军。待日落西山，向东北走挠力河岸，河宽约15米至20米，涨水时非船筏不能渡，幸今水不深，流不急，得以系绳趟水而过，水深及腹下而已。在河南岸治晚餐，食毕已下午6时半，天昏黑矣，继续东进。银河突现，星点辉明，颇有助于荒林夜行，不致迷失方向。比及将到密宝汽车道西五六里，瞥见汽车六七十辆，灯光飞杨，接连不断，蜿蜒如长蛇，向南直驰。判为日贼运兵之载重汽车，大概从佳木斯、富锦往宝清。如果运兵，则兵力当在千名左右。日贼恐日间行驶暴露真相，且避免遭空袭，故利用暗夜运兵，日贼亦鬼矣。我方行动兵力太少，否则猝然袭击，给与之损害必大。……是日计行程共60里，虽亘半日半夜之行军，且渡河过道，但不感觉疲乏。

周保中就以这样平静的笔法详述了他新婚第三日一天的行踪，其中蕴含着他们在伟大的民族战争中的爱情基础与革命伴侣的充实含意。

不久，周保中便得到情报，日军已开始“围剿”抗日联军第七军和第五军三师。

山中，决定派女同志协助抢制军衣，因为二路军总指挥部和警卫大队，还有100多人没有冬装。

在敌人层层包围，前堵后追，天空随时又有飞机轰炸的危险时候，周保中究竟要派谁去执行这个艰巨任务，这是摆在周保中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因为完成这个任务女同志最合适。派谁呢？坚定沉着的冷云牺牲了，机智勇敢的陈玉华派往苏联学习无线电，季青的妻子李志雄派往教导队当教官去了，指挥部虽然还有几十个妇女团的指导员，周保中认为：这批巾帼英雄，抗日联军的女兵们，她们都是久经沙场，能文能武，他坚信这个任务不论交给哪个女同志，她们都能完成。然而，在目前的险恶环境之中，他认为妻子王一知完成这个任务把握性更强些。

日军正在“讨伐”，山下到处是敌人，要完成这个任务牺牲的可能性很大。他想，这时的王一知不但是他的同志、战友和下级，而且已成了他的终身伴侣，所以，在这种危险的时刻，他应该派自己的妻子去执行这个任务，他认为只有这样做，心中才安稳。因为他们夫妻关系没有公开，行军露宿都和往常一样各自分开。傍晚，他只得将妻子唤到一边，用商量的口气对妻子谈了这些想法。王一知深情地望着自己的丈夫，两双眼睛相对而视，秘密的新婚夫妻百感交集，妻子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是一个热情奔放、坚毅顽强的女性，一头扑到丈夫的怀中，只说了一句话：“感谢你的信任。请放心，我一定要完成任务，争取活着回来见你。”周保中为自己妻子的勇敢和坚定感到自豪。

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周保中派副官陶雨峰护送王一知到达五军二师驻地，和五军副官处王杰沈处长取得联系后，王一知便继续和王杰沈翻山去被服厂，陶雨峰便返回周保中的住处。

第二天，周保中一行正在密林中行走，前边哨兵突然发现敌兵从东北方面搜索前进。哨兵立即开枪，周保中立刻随本部全体退出宿营地，向西撤走约300米，占领小山头做好战斗准备。等了片刻，敌人的行动并未被枪声引过来，而是相当多的日满混合兵力分散包围前边的小山头。周保中取出指南针，判断了一下方位，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意识到敌人搜索的目标正是五军三师临时后方和被服厂所在地。他计算了一下时间，妻子王一知现在正是和被服厂的同志们一起染布的时候。他想到了这批棉衣，想到了他的爱妻，果断地下达命令猛然射击，转移敌人进攻搜查的目标。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森林障蔽，山峦重叠，溪谷复杂，目标极难选准，敌人毫无顾忌。由于周保中率总部刚刚行军到达此地，情况不明，不熟悉地形，他又有重任在身，不便与敌纠缠，因此，他怀着一种沉重而矛盾的心情，下令向西撤走。在距敌兵进攻五军三师被服厂的山背部的一个深谷中，选了一处露营地，其余人员分散几处宿营。

一连4日，敌人在被服厂的山背东边枪声不断，并时常进行武力搜索。周保中惦念被服厂的命运和妻子的安危。这时，老天爷更是难人之危，偏偏又下起了鹅毛大雪。他妻子临走时还只穿着单衣，已4天时间了，敌人即使搜索不着，恐怕也早已冻饿而死了。想到这里，他看看自己身上的破毛衣，摇摇头，后悔分手时为什么忘记给她穿在身上了呢！非常后悔，但一看到自己面前的部队，他屈指算一下时间，离目的地还有8天的路程，可现在已经缺粮，联络中断，喝粥也只能半饱。为了稳定同志的情绪，他虽然心急火燎，但表面很镇静。他当时这样写道：

被服制造厂必陷危险。昨日派往之秘书王一知同志也到该处，……两日来，初降雪，雪大、风紧、气候骤寒，露营无帐幕，食又不足，敌情严重。

给郑鲁岩同志送信之颜副官等，是否安全，更属可虑。似较去冬在依兰、方正、牡丹江时为甚。但余习以为常，如无异常状，为部员中之抱忧虑者，示以无事。

周保中忘却了惦念之苦，他在时而密集时而稀疏的枪声中，继续行军。11月1日到达虎林，七军密营二路军王效明参谋处长特来向他汇报，七军三师随长青师长、邵林主任也一同赶来汇报工作。

周保中立即召集了临时紧急会议。会上，他告诫同志们在紧急关头要奋斗到底，并嘱咐大家要迅速返回独木河一带集中掌握各部队，避敌主锋，寻找敌人弱点，必要时应坚决、勇敢地给敌人以严厉打击，同时，注意与行动不定的季青政委取得联络。并指示：情况越紧迫，越要重视七军内部的整顿和改造，坚持统一领导，拥护吉东省委和二路军总部的统一部署。

七军领导汇报完情况后，陆续离去。周保中指示要在三人班东南阿布沁河北岸七八里之横道河子谷地建筑临时密营。之后，他不由得又问副官陶雨峰：“五军被服厂联系上了吗？”陶雨峰参加了周保中和王一知的婚礼，明白他二人的关系，王一知至今未归，陶雨峰急得坐立不安。他已经跑了十来趟，也无任何消息。陶雨峰估计王一知很可能牺牲了。因此经周保中这一问，陶雨峰悲痛地低下了头。周保中反而安慰陶雨峰说：“好了，也许有希望。”他嘴里虽然这样讲，但心中判断，十有八九刚刚结婚几天的妻子就匆匆地离去了。当人们都纷纷走开时，他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他还没有坐定，哨兵就发现敌兵分东、南两路向他所在的密营步步逼进。他撤至山顶，观察敌情，立即决定向北撤，一口气撤出二十里，才择一谷地露营稍息，后继续向东北方向前进。枪声若远若近，敌人分区搜查，慌不择路。周保中率部肃静行军，与敌周旋两天，常相距七八里之遥。在这种危急时刻，又遇七军教导团密藏粮食仓库两处，其中一处已被敌人焚毁，另一处也仅有一半。周保中命指挥部所有成员沉着、冷静，急速地将仓内所余玉米棒子揉搓成粒，每人携带30碗，轻者20碗，足供10日，剩余的另移地点密藏。当时寒风凛冽，同志们见到粮食，欢喜雀跃。又将剩余粮食藏好后，立即转移到油松顶子山上。

周保中万万没有想到，在这里见到了九死一生的心爱的妻子，同时和妻子一起脱险的还有五军三师被服厂的冯淑艳、吴玉清和李淑英3位女同志。妻子出乎意料的出现，使得周保中非常高兴。他看到妻子在这种大雪之中只披着一条毯子，要不是在众人面前，他多想将妻子紧紧地搂在怀里，给她暖一暖冻僵了的身躯。可是，现在他不能直接享受这种爱，为了战争的需要，他们的夫妻关系还没有公开。

晚上，周保中将王一知留在自己身边，单独地了解这半月来她的经过。周保中用雪擦着王一知冻伤的手，不时地暖一暖王一知流着血的脸颊和冻伤的耳朵，默默地听着王一知以胜利者的喜悦叙述半个多月来奇迹般的脱险经过。王一知告诉他，自分手的第二天一大早就被敌人包围了。

原来宝石河子密营只有3名女同志，还有一部分机械和布匹。王一知说，连同与她一起去的两位男同志王亚东、刘华，一起共6个人。当天夜里，他们就暂歇在一个用树枝搭成的小仓库里。同志们好久不见，又是在这枪林弹雨的日子里相遇。感到格外亲切。尤其是这3名女同志，问这问那，不觉已到夜里两点多。王一知说，“在言谈中我发现，这3人长期在深山专搞衣服，认为鬼子进不来，而有些麻痹了。不到天亮，我就催她们起来，拿麻袋上山去找黄树皮。王亚东和刘华背了两麻袋粮食先走了。我们4人很快找了两麻袋树皮，用草木灰与自己烧好的土碱掺和好，就动手染布。刚刚染了四五匹，就听见枪响。我立即要同志们快收机器。可笑的冯淑艳一听枪响却说：‘哪

王一知在周保中面前，像个天真的孩子边说边比划着：“我一听，可气又可笑，立即命令停止染布，快藏机器，并笑着批评她说：‘你和亚东刚分手就又想他了。你想，在这满山遍野都是敌人的追击搜捕下，你们王亚东能用枪打野味吗？再说，我们的子弹也不多了。’我的话没说完，只听见枪声密集。这时，李淑英也说：‘怎么样，王亚东能有这么多三八大盖子弹？快藏机器。’我们4人迅速收拾机器，布匹装进麻袋，决定抢占后山。没料，一出仓库就看见鬼子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在二百米的山下，叽哩哇啦地乱叫：站住别跑，是自己人。夹在鬼子中的伪军在喊叫。这时枪声很密，我们爬山也很危险，4个人只有两条枪，7颗子弹。李淑英是大镜石匣子，坏了一个零件不能连发，最多也只有10发子弹。尽管这样，我们必须对准快速上来的敌人射击。谁知这一仗，敌人也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结果引起了四面八方的敌人枪声四起，更加密集，眼看不能爬上山顶，又准备转到另一山坡下山。刚跑不多远，一条河横在眼前，河面宽，而且水流急，浪又大，我一问，说这就是宝石河子。我们正束手无策，河对面敌人又要过河。我分析：目前的敌人不仅在四面包围，而且是层层包围，看来插翅也难飞了。急中生智，我立即命令就地躲藏，每人选一个大坑，要拉开距离，用树叶将自己埋好，敌人如搜捕，抓住谁，或用刺刀捅着谁，谁也不能吱声。我们4人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要想法把衣服做好送出去。我另嘱咐李淑英：我身上带着文件，如牺牲，望同志们将文件转交党。”

周保中听到这里，非常惊讶：“怎么，你去执行任务也背上它了。”

“是的，胥杰在莲花泡是背着你的日记殉国的。可是你的抗日游击日记又让日军得去了一部分。过去，我们两人为在杨胖子沟丢了的那部分日记惋惜过，曾有过誓言，让日记和我们的生命共存亡。胥杰牺牲了，而我也早已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我发誓要完成胥杰没有完成的任务，将日记背到胜利。所以，我执行任务时，也不把你的日记交给别人，因为每个人都是生活在枪林弹雨中，我认为放在我这里更安全些，所以，我要背着它。”周保中听完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接着又问：“后来呢？”王一知抢着说：“就这样，我们在深山密林的树坑里，利用一米多厚的大树落叶，隐蔽下来，敌人在上面搜索了两个多小时，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到处乱刺，结果一无所获。敌人走后，我们出来，又走了十几里路，选择避风地点宿营。不久，又见山上火光四起，原来敌人也在这个山上安营扎寨。我们只好又隐蔽好，就在这座山脚下和敌人一起度过了这一夜。半夜开始下雪，我身上还没有棉衣，只好将从被服厂带出来的一条毯子披上了。就这样，还是冷得发抖。第二天一早，我们趁着大雪能掩盖脚印，就出来找队伍，以便选择适当的露营地。在宝石河子东南20多里的地方找到一个石砬子，后面有个小洞，可以避避风寒。大家决定在此宿营。化雪做饭时，才发现干粮跑丢了，只好饿着肚子找部队。过了七八天，预定集合的时间也过了，我们4个人就一直朝东走，在雪地中剥树皮，找野果、蘑菇吃，每天我们还照样走几十里路。怎么活过来的，连我们自己也惊奇。”

王一知说完，逗趣地向丈夫行了个军礼，调皮地说：“总指挥，汇报完毕，请指示。”周保中一把把聪颖、年轻美丽的妻子搂在怀中，将军的泪水夺眶而出，顺着她的面颊，落在妻子胸前。

人们对新中国的创立者们充满了崇高的敬意，学习他们的业绩，追随他们的脚步，人们也渴望了解他们生平的每一个侧面。本书辑录了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婚恋故事，有的来自当事人的自述，有的来源于各种传记材料。读者可以从中更深入地了解战争年代老一辈革命家的个人生活和高尚情操。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参阅了大量的图书资料，对一些文情并茂的作品作了较多的摘引，为统一体例，未在每篇中注明出处，而集中于全书末的“主要参考书目”，在此，谨向那些作者表示谢意。

禾青

1993年10月于京郊青龙桥畔

彬子编：《毛泽东的感情世界》，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陈铁健：《瞿秋白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杨之华：《回忆秋白》，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沈葆英：《和代英共命运的岁月》
恽代英：《来鸿去燕录》，北京出版社 1981 年版
田子渝等：《恽代英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胡家模：《五大元帅的爱情生活》《红军女英雄传》，
新华出版社 1986 年版。
朱仲丽：《艳阳照我》，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1989 年版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
书真：《彭德怀分梨轶事》
汪荣华：《送伯承远行》
铁竹伟：《红军浪漫曲》，江苏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
晓植：《张茜》，中国青年出版社
石雷：《元帅逝世后的张茜》
林月琴：《悼荣桓》
刘汉等：《罗荣桓元帅》，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
《怀念罗瑞卿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黄瑶：《多年经历诚可贵，八载磨炼更同心》
王嘉翔：《大将许光达》，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董安庆：《峥嵘岁月情——许光达大将婚恋录》
尹家民：《风流大将军》，昆仑出版社 1989 年版
《忆徐海东》，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张麟：《徐海东将军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82 年版
晓音：《爱的奉献——徐海东大将和他的妻子》
林颖：《深切怀念雪枫战友》
江南：《高尚的爱情之花——记刘亚楼上将的爱情故事》
朱维扬等：《妻子眼中的肖华》
《谭震林传》，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董保存：《谭震林的婚恋传奇》
黄定民：《战地情结——记谭震林与葛慧敏》
《回忆叶挺》，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缪敏等：《方志敏的故事》，作家出版社 1959 年版
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

